

目 录

杨明斋	余世诚	张升善	(1)
潘忠汝		高玉临	(17)
刘谦初	王家鼎	邵 华	(30)
汪 铭	樊子珺	霍成勋	(65)
杨善南		陈修良	(83)
徐全直	胡云秋	陈乃宣	(88)
张汉民	周益三	张守宪	李正义 (101)
张正坤	丁文斋	曾长秋	(115)
	唐伯藩	刘 芳	
周文彬		于荣勋	(133)
毛岸英		黄 崢	(145)
杜国庠	熊泽初	马培灿	罗可群 (159)
江隆基		苗高生	马长生 (190)
艾思奇		苏浙英	(225)
何干之	胡 华	刘 炼	(248)
华 岗		傅能华	(281)
王任叔	王欣荣	王克平	(313)

附 录

莫文骅同志来信	(355)
---------	---------



刘 谦 初



汪 铭



杨 善 南



徐 全 直



张 汉 民



周 文 彬



毛岸英



杜国庠



江 隆 基



艾 思 奇



何 干 之



华 岗



王 任 叔

说明：本卷缺杨明斋、潘忠汝、张正坤烈士照片

杨明斋

余世诚 张升善

杨明斋是共产国际最早派来中国帮助建党的工作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他对党的早期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是我党历史上一位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①。

(一)

杨明斋原名杨好德，一八八二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五、六岁时，家有祖父母、父母、姐姐共六口人，有一些田产，生活还算富裕；七岁以后，天灾人祸不断。据《平度县志》记载：一八八八年“秋大雨，河口皆溢，附近村庄庄稼、房舍都被损伤。是年地震，又有大瘟疫。”一八九〇年“大瘟疫流行，城内外日死五六十人，医生昼夜不停，棺材卖空。秋又有蝗虫灾。”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盘剥更为加剧，“知州茅恩绥，以办兵役纵役扰民”，闹得“民多饥饿，十室九空”。在这荒年暴月之

^①周恩来对杨明斋的赞语，见《曹清华同志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载《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

中，杨明斋的姐姐早夭，母亲病逝，家境很快败落下来，仅靠六亩田地维持生活。

杨明斋的父亲杨仁镒，一生务农，略懂一些诗书。为了使儿子知书达理，他省吃俭用，竭力供明斋读书。杨明斋七岁入学，十五岁读完四书五经，成了马戈庄的有学问的人。但是，越来越贫穷的家庭，无力供他继续深造，终于一八九八年辍学务农。随后，他结了婚，但不久妻子就去世了。内忧外患，国衰家败，使性格活跃的杨明斋变得孤僻起来。他常常独自在村西胶莱河岸上往返踱步，苦苦思索着出路何在？

“死逼梁山上关东，走投无路下崴子（海参崴）”。这是旧社会流传在胶东一带破产农民中间的口头语。《平度县志》记载，常有大批贫苦百姓“无所得食率北走关外，近客蓬黄（蓬莱、黄县）大连，久之辄落不返。”杨明斋的许多亲邻都被逼无奈而走了这条路，他也决定走出去试一试。一九〇一年春，杨明斋告别了父老乡亲，出走海参崴，开始了“闯俄罗斯”的生涯。

（二）

沙俄统治下的海参崴，有许多从山东来谋生的同胞，仅从平度县马戈庄来的就有很多家。杨明斋一九〇一年三、四月间来到这里后，通过其族叔的介绍，在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兼作记帐员。因为他有文化，常常利用晚上教工人识字、读书。几年之后，他学会了俄语。

一九〇八年，杨明斋深入西伯利亚一带，有时做工，有时半工半读，和当地矿工有了较多的接触，并结识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几年的劳工生活，使他对工人阶级的状况，特别是

对流落在俄国的华工的状况，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帝俄时期，流入俄国的华侨苦力达二三十万之众^①。他们大都在边远地区从事开矿、修路、装卸等笨重劳动，而所得报酬甚少。以修路为例，俄国工人日工资是一卢布零二十戈比，而华工却只得八十戈比^②。工人为什么受资本家的欺压盘剥？华工的生活为什么更苦？这些问题杨明斋开始并不清楚。通过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接触，他逐渐明白了这一切不平等的现象，都是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全世界的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推翻反动统治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杨明斋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侨工人的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光荣地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被安插在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③。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热烈欢呼这一胜利的同时，帝国主义和俄国反动势力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疯狂进攻。为了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踊跃参加红军，和俄国工人阶级并肩战斗。杨明斋参加了这场斗争。他在动员华工参加红军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④。局势渐趋稳定之后，俄共（布）党组织保送杨明斋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①② 乌斯季洛夫：《在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石彦陶译，载《益阳师专学报》1981年第2—3期。

③ 1983年10月6日访问王哲记录。

④ 杨明斋族弟杨好宾生前的回忆。

(三)

杨明斋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完成学习任务后，受俄共（布）党组织的派遣，又回到了当时还被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秘密为党工作。这里有许多华侨，他开展工作的公开身份是海参崴地区“华侨负责人”^①。

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关怀下，旅俄华侨不仅为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十分关注祖国的革命斗争。中国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引起了旅俄华侨和俄共党组织的极大注意。一九二〇年初，俄共（布）海参崴党组织先后向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报告，打算派一个小组到中国了解情况，並与中国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共产国际很快批准了他们的报告，同意以共产国际工作组的名义，派出人员到中国开展工作^②。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成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佐娃、马迈也夫等人。他们于是年四月起程，前来中国。

杨明斋被选派为小组的重要成员，並不是偶然的。首先，他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得到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信任；其次，他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又通晓俄语；再次，他是旅俄华侨，对苏俄对中国都比较了解，便于和中国同志接触；同时，他与维经斯基都曾在海参崴从事过革命斗争，相互比较了解、熟悉。这些因素使他能够很好地起到翻译、参

①肖劲光：《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载《红旗飘飘》第20集。

②转引自向青：《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的探讨》，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

谋和向导作用，成为维经斯基的主要助手①。

五四运动后，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领袖，正积极酝酿建党事宜。共产国际工作小组的来华，帮助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小组成员的杨明斋，在共产国际与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系当中，做了大量工作，起了最早的桥梁作用。

（四）

一九二〇年四月，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首先到达了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他们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俄籍教授柏烈伟那里，了解到李大钊的基本情况。然后通过柏烈伟的介绍，杨明斋先与李大钊会见，安排了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的会谈②。由杨明斋担任翻译，维经斯基与李大钊的多次会谈非常融洽。他们交流了情况，分析了局势，取得了在中国建党的共同认识。在李大钊的主持下，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同一些进步青年进行了座谈，并向大家介绍和捐赠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如《国际》、《红旗》、《国际通讯》、《震撼世界的十天》等③。通过这些活动，共产国际工作小组进一步了解到五四运动著名领袖陈独秀在上海活动的情况，杨明斋遂积极地向维经斯基建议南下上海与陈独秀会晤。共产国际工作小组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马迈也夫留在北京继续工作，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持李大钊的介绍信件，起程赴上海。

①李达、包惠僧以及张闻天等人的回忆。

②访问朱务善同志的记录。

③罗章龙：《亢斋回忆录》，载《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人到达上海后，访问了陈独秀，并与《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进行了会晤。经过多次交谈，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决定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五月，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明斋参加了研究会的负责工作。八月，杨明斋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杨明斋这时也就由俄共（布）党员转为中共党员^①。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决定把《新青年》杂志改成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从一九二〇年九月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除了增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外，又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同年十一月，上海发起组又创办了旗帜鲜明的理论性月刊《共产党》，为在全国建党作理论思想准备。杨明斋参加了这两个刊物的发起和印刷出版工作的研究^②，并亲自撰写稿件。《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俄罗斯研究”专栏里，发表了他的译著《苏维埃的平民教育》，全面介绍了苏俄的教育情况。第三号上又发表了他翻译的《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这些文章，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验 and 实际情况，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上海发起组同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推动了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其间，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作了大量工作。北京共产党小组继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于同年十月成立。杨明斋和维经斯基还到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会见，推动了济南地区的共产主义运

^①据李达：《自传》，参考张国焘《我的回忆》。

^②《郑佩刚的回忆》。

动^①。杨明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

在党的上海发起组筹建过程中，为了建立一个活动基地，由杨明斋经手租赁了上海渔阳里六号的房子。这是一幢二楼二底的有一个独院的石库门的建筑，杨明斋住在楼上的一个亭子间里。党的一些公开、半公开的工作机构，如中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等，都曾设在这里。渔阳里六号成为上海党组织开展社会工作，特别是开展青年工作的主要活动场所。

中俄通讯社是维经斯基等人访华期间的公开工作机构，由杨明斋担任社长。通讯社的工作是一方面从北京、上海把中国的消息通过电报发往莫斯科；另一方面又把介绍十月革命情况的文稿送《新青年》、《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党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通讯社改由发起组领导，仍由杨明斋负责。一九二〇年十月，《新青年》发表《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全面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粮食问题和教育发展情况，就是采用中俄通讯社的来稿。通讯社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海发起组成立时，为了团结、教育青年，扩大党的影响和发展党组织，决定同时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党派发起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担任这一工作，派年长的杨明斋负责指导。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渔阳里六号成立，俞秀松、李

^①据杨一辰、丁君羊、杨得信、杨仁曲等人回忆。

震瀛、叶天底、金家凤等八名青年为首批团员，俞秀松任书记。在党的上海发起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联络和推动下，北京、长沙、广州、武昌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团组织。以后，团中央机关仍设在上海渔阳里六号。

为了掩护党、团组织在渔阳里六号的活动，同时也为了培训进步青年准备赴俄深造，在这幢楼房里又办起了一个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担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学社门口挂有招牌，并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了招生广告。广告宣称：“本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在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①。许多青年慕名而来，学生最多时达五六十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许多成员都在此讲课或学习过。杨明斋亲授俄语，李达讲授日语兼听俄语课，李汉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还有陈望道、沈泽民都任过课和听过课。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应聘教过俄语的读音和会话课。学生除了学习外语课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学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〇年冬至一九二一年春，上海党团组织从中挑选出二三十名团员，由杨明斋具体安排，分批介绍去苏俄学习^②。其中有许多同志如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许之桢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①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

^②据肖劲光、许之桢、华林等的回忆。

(六)

上海发起组在建立过程中，还注意开展工运工作。出身农民、当过工人的杨明斋，是比较重视工人运动的。他常深入工人中间，关心工人疾苦，积极引导工人组织起来，同反动势力斗争。

在陈独秀、杨明斋等上海发起组成员的引导和支持下，上海机器工人首先建立起自己的新型工会组织。一九二〇年十月三日，上海造船厂，电灯厂，厚生铁厂以及东洋、恒丰纱厂的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在杨明斋住所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陈独秀、杨明斋等被邀参加这个发起会，并被聘为名誉会员。杨明斋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通俗地向大家讲述了工人受剥削是因为资本家有“资本”，而“他们的资本，就是我们劳工替他们挣的，没有劳力，（资本家的资本）就不会发达”。他说：“现在这个时代的生活，都拉到资本家手里去了。所以我们劳工的生活，也就在资本家手里拿着了。换句话说，就是资本家打了无数的铁锁，把我们锁住了。他们叫我们受苦痛，我们不能不受苦痛”。工人要解放，就得推翻这种剥削制度；而要推翻这种制度，工人就得联合起来。杨明斋说，我们成立工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减轻自己底苦痛，救济自己底生活”^①。这个机器工会，在陈独秀、杨明斋等的关怀下，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三百七十多名会员的有影响的工人组织，还出版了自己的会刊《机器工人》。机器工会是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

^① 《劳动界》1920年10月10日第9册。

产业工人的新型工会，标志着党领导工人运动迈出了新的步伐。

此后，上海党组织以外国语学社为活动基地，还领导成立了印刷、纺织等工会组织，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又发起建立了跨行业的工人联合组织工人游艺会。十二月二十日，工人游艺会在白克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出席的有会员四百余人和许多来宾。杨明斋、李启汉、沈玄庐、邵力子等参加了大会。杨明斋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向工人们祝贺^①。游艺会和党后来领导建立的工人俱乐部一样，成为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的场所，为各行各业工人的团结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渔阳里六号成了上海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地。一九二〇年上海第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筹备活动，一九二一年的三八妇女节的纪念会和十余个劳工团体联合纪念五一的筹备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渔阳里六号的革命气氛，引起法租界反动派的注意。一九二一年五一前夕，敌人突然搜查了这个地方。但是，杨明斋和他的同志们、学生们、工友们并没有畏惧。党组织还是成功地领导上海的工人阶级在五一劳动节这天，举行了有万余人参加的纪念会。

（七）

一九二一年春，各地共产党组织相继成立，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趋成熟。杨明斋和张太雷作为中国党组织的代表专程赴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情况，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重大问

^①1920年12月20日《民国日报》。

题，同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①。根据会谈的结果，他们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六月，张太雷、杨明斋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张太雷在这大会上代表中国党发了言。他们还同其他东方代表一起，在会议上努力促成共产国际作出召开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张太雷和杨明斋是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最早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人。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杨明斋主要在党内从事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是年九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党的中央局书记，在他的住宅渔阳里二号成立了一个支部，其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李达、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沈雁冰、俞秀松等。党支部每周有一次学习会，时间是下午二时至六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的是杨明斋和李达^②。他们临时编的讲义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后来，杨明斋将这些讲义草稿修改付印。在此期间，由于陈独秀住宅常有各种会议，人员来往频繁，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十月四日下午，法国巡捕查抄了渔阳里二号，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高君曼等被捕。后经我党和共产国际多方营救，以接受“罚款”的方式将他们保释出来。

一九二二年七月，杨明斋参加了党的二大，对党制定反帝反封建纲领发表了积极的意见。以后，共产国际主张中共

① 《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

② 茅盾：《回忆录》，载《新华文摘》1979年第7号。

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实行国共合作。杨明斋和许多党员一样，对此曾持不同意见，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个“复杂主义”，和北洋军阀宣扬的“宪法”相雷同。因此，他“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①。但是，党的西湖会议和“三大”作出国共合作的决定后，杨明斋不仅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决议，并且在行动上积极为国共合作事业而努力。随后，他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翻译，在广州做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②。

(八)

杨明斋在党内讲授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候，就很注意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复古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梁梁章”，即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等。梁漱溟在其轰动一时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讲演录中，打着“倡导东方文化”的旗帜，抵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西方文化，要把人们引到所谓“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梁启超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则提出孔孟之道已包涵了社会主义，大可不必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主张“发扬国故”。章士钊的《农国辩》，更是一反儒学轻视经济的常态，从经济上大肆鼓吹“农村立国主义”，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杨明斋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用了很大精力，参加了这

①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包惠僧：《回忆张太雷》，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

场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他写出了对上述三本书的批判文稿，经李达阅后，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在北京公开出版。这部题为《评中西文化观》的著作，分四卷十六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主要阐明：第一，“文化为社会生活，可也是由社会生活而产生，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东西。”梁漱溟所说的“意欲决定文化”，是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文化观的。这种“离开社会生活的实事讲文化，犹之乎离开人的生理高谈心境”一样无知可笑。第二，分析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杨明斋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人类生活的生产演进中的一种经济革命，它和无限制的个人之私有制度相对峙，并且和资本私有之国家主义也不相和睦”。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学说，它是现代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这种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只能产生于工业发达的欧洲。它与中国的孔孟之道根本不是一回事。第三，指出章士钊等所宣扬的“农村立国主义”和儒学，不能救中国。他说，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非采用社会主义不可”。杨明斋对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复古主义的批判和见解，在这场东西方文化的论战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维汉在当时写的一篇评介《评中西文化观》的文章中指出：“这部书的确是一部有价值之作，在此东方文化的声浪至嚣尘上，真伪是非不易辨白的时候，有了这部书，可以帮助青年解决很多的疑难。”又说：“以梁梁章三君在中国之偶象，出来从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各方面提倡复古，其影响于青年非常危险，得杨君辞而辟之，其功不小”^①。

^① 《新民周报》第21期，1924年9月4日。

(九)

一九二五年十月，苏共决定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培养干部。党派杨明斋在上海负责接收和选送学员的工作。十月下旬，杨明斋送走了第一批学员之后，亲率第二批学员从上海乘船去苏联。这批学员共百余人，是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和北平、天津等地招收来的，他们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吴亮平、孙冶方、潘自力、杨放之、刘少文、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黄秀珍、马骏、马骥、于树功、刘辉、曾鸿毅、罗文炳、俞秀松等^①。杨明斋受党中央的委托，照管着这些初离祖国的年轻人，使他们在旅途上过得非常愉快。当时正逢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日，大家在船上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纪念联欢会。苏联、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同船朋友们讲了话，同声高唱《国际歌》，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好气氛。船到海参崴后，他们又改乘火车向莫斯科进发。十一月底，杨明斋率领这批学员顺利到达莫斯科。

杨明斋被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总务部门工作，负责全校五百多名中国学生的衣食住行，并兼作生活方面的翻译。当时的苏联，还处在巨大困难之中，生活物资奇缺。杨明斋竭尽全力安排好大家的食宿，使这些远离祖国的青年人得以安心学习。

然而，杨明斋人在俄京，心却怀念祖国，热恋着国内火热

^①据伍修权、黄秀珍、李培之、于树功等的回忆。

的斗争。他多次向党提出要求回国工作，但均未获准。直到一九二七年夏天，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他才接受了党的指示，告别了中山大学的同学们，取道海参崴，再次踏上了归程。

(十)

杨明斋秘密回到上海后，党中央指派他到平津地区活动。此后，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隐居平津一带，花了两年的功夫，撰写了一部上下两卷共二十章、十八万多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他在这部著作里，以学术研究为掩护，从正面进一步阐述了他在《评中西文化观》中的基本思想，大量地引证了中国文化的典籍，“意图找出个明瞭的社会进化的程序”。杨明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和意义，明确指出：“辩证法的唯物史观之应用是社会主义者求知识最重要的工具”。《中国社会改造原理》既批判了梁漱溟等人死抱着“东方文化”不放的守旧思想，又进一步指明了学习“西方文化”究竟学什么。杨明斋说：“西洋文化大抵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之社会主义本是解决西洋文化推行时所产生的利弊，那么，我们既然必须、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西洋的自然科学，当然也要采纳社会主义，正如食米必需食水一样的道理。”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他批评某些投机革命的分子“骑墙、投降、滑头、甚而至于做些卖身和害民的勾当”，热情鼓励大家要有“自己的信条，只要所持的人类生活之理是真的，社会运动的方法是对的，毅力是百折不曲的，一定会不但战胜了现在的中国，并且会战胜了将来的全世界。”

这时的杨明斋已是年逾半百的人了。坎坷的经历、长年累月的奔波和恶劣的环境，使他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后来，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一九三一年以后病逝于伊尔库次克^①。

杨明斋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的一生。他为人耿直，生活简朴，勤奋工作，不务虚名，关怀青年，奖掖后生，当年同他一起共事的同志和他的学生们，一直怀念着这位革命老人。“忠厚长者”——周恩来的这句赞语，恰当地概括了他光辉一生的高尚品德。

作者附记：

1. 本文资料来源，除注明的外，主要还有：李达、陈望道、沈雁冰、许之桢、邵力子、包惠僧、华林和张国焘、盛岳等人的有关回忆材料，调查或访问刘仁静、王会悟、伍修权、李培之、黄秀珍、罗章龙、曹靖华、丁君羊、王哲等人的信件或记录，访问杨明斋的族叔杨仁曲、杨仁乐，侄子杨德信，邻人杨景宝，以及杨明斋的族弟兄杨好宾、杨好清的亲属的回忆记录。
2. 平度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崔学良、杨学进、李玉晓、王公革、崔建仁、李向政和华东石油学院的武革非参加了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3. 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任武雄、俞乐滨、余卫平，中国人民大学的杨云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征敬，广州博物馆的林鸿暖等，提供了有关资料。

^①杨明斋病逝的时间，是根据周恩来与曹靖华的谈话及杨明斋的侄子杨德信的回忆材料推断的。周恩来说，“后来他（指杨明斋——引者注）生病，苏联送他到亚伯利亚养病，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次克。”见《曹靖华同志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载《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

潘 忠 汝

高 玉 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北黄(安)、麻(城)两县人民，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在大别山区首先举起武装斗争的红旗，建立了工农红军和红色政权。潘忠汝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为开创和保卫革命政权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

潘忠汝，原名潘汝庭，一九〇六年九月三十日^①，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甘棠铺潘家堰湾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潘达，是一名教国文、算术的老师，曾在黄陂县政府供职。忠汝排行第三，大哥潘忠寿和二哥潘忠炎，农忙种田，农闲兼做木匠手艺，以补家用。

潘忠汝七岁随父在黄陂县城关小学读书，放学归来，认真温习国文和算术，各科成绩均属优异；后就读于黄陂前川中

^①有关潘忠汝的出生年月，曾有1907、1906、1904年之说。根据潘忠汝的妻子王杏梅1979年5月谈话记录：“潘是1906年9月30日生。”及潘忠汝的拜把兄弟潘忠烈提供，潘忠汝“牺牲只有21岁。”故为1906年。

学，课余常看《水浒传》等小说。书中的英雄人物，对他鼓舞很大。

潘忠汝在前川中学还未毕业，由于父亲和大哥先后死去，未能继续求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自修功课。

一九二四年，潘忠汝抱着追求知识的愿望，来到省城武昌，考入武汉中学。这所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北地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阵地。潘忠汝除了用功学习各门课程外，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以及《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在董必武、陈潭秋等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接受了革命思想，提高了认识，懂得了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痛苦的原因，以及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及豪绅地主阶级的道理，表示决心做一个改造社会、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人。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

尧天舜日事经过，
世态崎岖要整磨。
不肯昏庸同草木，
愿输血汗改山河^①。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武汉工人阶级和各社会团体，为支援上海工人斗争，举行了游行示威。潘忠汝和武汉中学的革命师生，积极投入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他和同学们组成演讲队，深入工厂、码头，组织集会、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思想。在斗争中，潘忠汝成

① 《楚晖》第4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为进步同学中最活跃的积极分子，受到革命师生的赞扬。这年七月，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六年，潘忠汝在革命师生的赞同与资助下，奔赴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不久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这时，在黄埔军校内部，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同国民党右派势力斗争很激烈。潘忠汝积极拥护和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领导的各项活动，散发各种宣传品，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年底，他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一九二七年初，潘忠汝随黄埔军校部分学员迁往武汉。同年六月毕业后，他住在一家旅馆，等候党组织分配任务。一天夜晚，潘忠汝接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通知，要他即刻去武昌找当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的董必武。潘忠汝到武昌粮道街董必武的住处后，董必武向他介绍了当时的革命形势，递给他一封写给“黄显威”（即中共黄安县委的代号）的介绍信，并对他说：“现在省委决定派你去黄安县工作，任县警察局警备队军事教练；你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县委设法发展农民革命武装，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党相信你能够出色地完成。”^①潘忠汝当即表示：“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②

在国共合作时期，黄安县存在三支武装力量：我党由戴克敏、吴焕先等直接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三堂革命红学^③和警察

①②彭希林：《不肯昏庸同草木，愿输血汗改山河——潘忠汝传略》，载《不屈的共产党人》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

③一九二六年冬，中国共产党在紫云区四角槽门等地，利用和改造地方武装红枪会，在这个旧形式基础上建立了几支群众性的革命武装，称之为三堂革命红学。

局长吴宝善控制的县警备队。县警备队的士兵，多数出身劳动人民；但也有一些反动军官，经常抢劫民财，胡作非为。潘忠汝到黄安后，根据党的指示，决心除掉警备队中的首恶分子，争取大多数，以打开工作局面。

一次，两名警官下乡搜刮民财，因分赃不均发生械斗。局长吴宝善把这两名警官各打五十大板，却将其赃款、赃物全部收为己有。潘忠汝抓住这个机会，同我党派到黄安国民党县党部、县农协工作的同志密切配合，鼓动一些机关团体向县政府请愿，要求驱逐吴宝善。在社会压力下，县政府只好撤销了吴宝善的局长职务。

驱吴斗争胜利后，潘忠汝又发动士兵，对警备队部分贪官克扣士兵薪饷、贪污枪械管理费的行为开展清算斗争，教育士兵认识反动派的本质，规劝他们站到人民一边来。

潘忠汝为人耿直，对军官们打骂欺侮士兵的行为，敢于出面干涉，打抱不平，连国民党县党部的官员，也对他畏惧三分，因而赢得了广大士兵的拥护与爱戴。由于他的艰苦工作，国共分裂后，警备队的一部分士兵毅然脱离了国民党，跟随他参加了革命武装——黄安农民自卫军。

(二)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黄安县革命队伍中有少数领导人，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主张放弃农民武装，“交枪散伙，各谋出路”。这种主张，立即遭到潘忠汝和郑位三、戴克敏等多数同志的坚决抵制。在县委召开的秘密扩大会议上，潘忠汝严肃地指出：“交枪等于交命，散伙就是投

降”。他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紧握枪杆子，继续战斗。他的主张，得到了很多同志的支持。黄安农民自卫军和三堂革命红学在白色恐怖下不仅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且始终坚持对敌斗争。

一九二七年入夏以后，黄安县的逃亡地主劣绅纷纷回乡，勾结光山县南部反动红枪会，对七里坪、紫云、乘马、顺河等地实行南北夹击。在此严重关头，中共黄安县委派潘忠汝去武汉，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和请示工作。他化装成商人秘密来到汉口，找到省委负责人，详细汇报了黄安斗争的情况。省委认为黄麻地区农民运动基础较好，决定潘忠汝留在黄安，并任命他担任黄安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指示他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潘忠汝回到黄安后，在县委的领导下，很快拉起了几十人枪的武装，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大队，活动在黄安北乡、七里坪、紫云的丛山峻岭中，寻机打击敌人。

八月间，麻城乘马区反动区长王既文，受河南光山反动派的指使，利用他的女儿，勾引麻城县农民自卫军中旧军官出身的教练员熊振翼和一排排长余佩芳。熊、余企图拉一部分人带枪逃跑，叛变革命。中共麻城县委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派王树声去黄安县委，请求黄安农民自卫军的援助。

黄安县委听了王树声的报告，决定援救麻城农民自卫军^①。潘忠汝当即要求前往执行这一任务。县委同意后，他同戴克敏、吴先筹等率领黄安农民自卫军十五人枪和百余名革命红学队员连夜出发，奔赴麻城农民自卫军一排驻地——东岳庙。他们原拟乘夜以洽谈工作为名，扣留熊、余，同时解除一排武装。但由于那天夜晚天黑，走错了山路，到东岳庙时，天已破晓，

^①王树声：《黄麻起义及其前后的一些斗争情况》（1960年）。

被一排士兵发现，并开枪射击。四周革命群众听到枪声，以为是反动武装来进攻自卫军，纷纷赶来支援一排。潘忠汝同戴克敏、吴先筹等商议，认为不能还击，还击必将误伤群众。遂决定先由王树声向一排士兵和革命群众喊话，号召他们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一排士兵听到是王树声的喊话，就停止了射击。这时，潘忠汝等率部上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余佩芳和另一名反动班长，向广大士兵揭露了熊、余的叛变阴谋^①。

粉碎了熊、余叛变分子的阴谋后，麻城农民自卫军在王家楼集合整编。经黄、麻两县县委商议，决定由潘忠汝兼任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一个月后由吴光浩接任），统一指挥两县的革命武装。

（三）

一九二七年九月，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秋收起义计划传到黄麻地区，九月中旬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的黄安县委会议上，潘忠汝和大家一起讨论了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研究了武装暴动的计划。个别人在会上说，我们只有这十几条枪，打起红旗也顶不住敌人两个团。潘忠汝和多数同志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说：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人民的支援，打起了红旗是一定能够坚持下去的，也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他指出：俄国的武装革命，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经过了十二年的时间，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也决心干它十年、

^①当时熊振翼到新集城与反动派密商叛变活动去了。当新集的反动分子听到余佩芳被逮捕后，所部亦被缴械，就把熊振翼杀了。

二十年。他批评了个别人的悲观情绪，极力主张迅速发动群众，打刀造枪，扯起红旗暴动。会后，潘忠汝率领农民自卫军，到处刷标语，散传单，发动群众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打击反动武装，积极准备暴动。

在九月暴动的日子里，潘忠汝率领黄、麻两县一部分农民自卫军，驻防鄂豫边界，阻击河南光山反动红枪会的多次进攻，使暴动得以顺利进行。

但是，“由于两县党组织，缺乏起义的经验，没有及时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政权，没有及时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军队，因而未能把这时的农民运动推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①。至十月底，国民党三十军魏益三部窜犯黄、麻地区，加强了反动统治，致使斗争暂时停顿下来。

中共湖北省委得悉黄、麻两县尚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和很好的群众基础时，先后派王志仁、符向一（后自首叛变）、刘镇、吴光浩、黄赤光等到黄麻地区，并决定建立中共鄂东特委，以加强对这一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潘忠汝参加了特委的领导工作。省委在给特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本党的任务就在把这个土地革命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主要的斗争方法为游击战争，即组织许多农民游击队，在四乡普遍地杀戮土豪劣绅，政府官吏，大、中地主，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发展土地革命宣传与鼓动，并即时没收地主一切财产，并用很简单的方法，将土豪劣绅、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行耕者有

^①王树声、陈再道、詹才芳：《从黄麻起义到鄂豫边割据》，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其田。”^①

十一月三日，鄂东特委在黄安七里坪文昌宫召开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传达省委的指示信。潘忠汝在会上指出：举行暴动，打开黄、麻革命局面，配合两湖秋收暴动，是当前的紧急任务。会议决定，加紧训练农民自卫军，以现有的百余人枪作为暴动的骨干，以黄安的七里坪为中心，以七里坪、紫云和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的武装农民为主要依靠力量，积极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和地主的斗争，相机夺取黄安县城。会议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成立了起义指挥部，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

潘忠汝遵照特委的指示，全面部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亲自深入七里坪、紫云等区的一些乡村，具体筹划武装起义的事项，集训农民自卫军，还通过各种渠道购置和制造了一批枪枝、弹药。

十一月十日，国民党三十军一个营窜扰七里坪。潘忠汝立即向鄂东特委报告了敌情，决定消灭该敌。当晚，他指挥农民自卫军和农民群众组成的起义部队，向七里坪包围前进。敌军闻讯连夜仓皇南逃，起义部队顺利地占领了七里坪。

十一月十三日，起义指挥部从河口探悉敌三十军一个团，即将进驻黄安县城。鄂东特委根据这一情况，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会上，潘忠汝对敌我斗争形势作了扼要分析，指出：“敌三十军为土匪改编，战斗力不强，重返黄安者虽号称一团，实际仅数百人，且敌远征疲乏，而我人多气

^①《黄麻地区农运情况——湖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7年10月。

锐，进攻可以取胜。”与会者一致赞同他的看法，并认为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以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的力量为骨干，举行武装起义，夺取黄安县城。潘忠汝在七里坪的指挥部召集会议，决定起义时间为当晚十时，行动口令是“暴动，夺取黄安县城！”根据指挥部的命令，起义部队迅速在七里坪南门外的河滩上集合。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先后作了简短的起义动员，并挑选七十余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成进攻突击队，由副总指挥吴光浩率领绕小道先行化装打入城内，进行里应外合。

晚十时，潘忠汝下达了暴动的命令。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象潮水般地向黄安城涌进。

十四日凌晨四时，起义军进抵黄安的东城门口，吴光浩在城内指挥的突击队发起了攻击信号。站在城外土岗上密切注视城内动静的潘忠汝，手举盒子枪，大声喊道：“同志们，攻城开始了，冲啊！”话音刚落，起义部队有的架云梯，有的烧城门，有的放土炮……。不到一刻功夫，成千上万的起义部队和武装农民，从四面八方冲进城内。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主要领导人，按照事先的部署，各自带领一部分起义军，分别包围了敌守城部队、县政府和警备队驻地，消灭了敌武装力量近两百名，缴枪百多支，并活捉了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等反动军政人员和土豪劣绅十多人。起义胜利的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

起义军占领县城后，潘忠汝组织战士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维持秩序，张贴标语、布告和传单，宣传“暴动杀尽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夺取政权，组织农民政府，实行土地革命”等主张。在潘忠汝等的领导下，起义军对市民秋毫无犯，商店照常营业，学校按时上课，城内秩序井然。

十一月十八日，中共鄂东特委和起义指挥部，在县城南门外校场岗召开了万人大会，庄严宣告黄安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在县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的主持下，颁布了《黄安县农民政府施政纲领》，明确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商业贸易，反对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等主张^①。潘忠汝被选为县农民政府委员。

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后，鄂东特委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举行了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检阅仪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鄂东军第一路，麻城农民自卫军为第二路，共三百余人；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为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党代表，刘文蔚为第二路党代表。那天，潘忠汝和吴光浩各骑一匹大马，在参谋长的陪同下，检阅起义大军，并发表了讲话。潘忠汝向参加检阅的起义部队高声宣布：鄂东“第一支革命武装正式成立！”他满怀信心地说：“别看我们穿的是农装，拿的是‘土货’，我们这些‘土货’、‘土人’却能把那些‘阔人’、‘广货’收拾掉。”他指着黄安县城继续说：“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城，我们还要打通大别山，打通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路，打出我们的江山。任何势力，也抵挡不住我们工人、农民武装起来的革命队伍！”^②

潘忠汝讲话以后，群情激愤，检阅场响起了一片口号声：

“打倒贪官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

^①郑位三、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材料》（1944年7月）。

^②王树声、陈再道、詹才芳：《黄麻起义到鄂豫边割据》。

“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四)

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后，南乡八里湾、东乡永泉河等地仍为反革命势力占据。那里的豪绅地主及其红枪会、民团等反动武装勾结国民党军阀肖耀南残部，组织所谓的“保产党”，同农民政府对抗。

为了进一步打击反动势力和开辟南乡的革命工作，黄安农民政府根据特委的指示，派潘忠汝率领鄂东军第一路七十余人和一支宣传工作队，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携带黄安县农民政府的布告、宣言、标语等宣传品，到南乡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建立革命政权。经过很短时间的工作，南乡农民纷纷起来响应，八里湾等区三四千农民举行暴动，杀土豪、惩劣绅，革命声威大震。

这时，黄安的反动势力乘我主力部队在南乡开辟工作之际，勾结驻河口之敌三十军独立旅秦建中部四百余人，进犯县城。我守城部队仅有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二路的廖荣坤排和黄安县义勇队六十余人。二十八日清晨，敌人从西门和南门架梯攻城。城内的工农革命军和市民，在刘镇一的指挥下，共同奋战，几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敌强我弱，形势危急。潘忠汝收到留守司令的告急信后，立即率部回返，于二十九日赶到县城，配合守城部队，将秦建中部打得落荒而逃，使革命政权度过了一次危机。

十二月三日和四日，潘忠汝率鄂东军主力在河口地区，又

打退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和黄陂土匪武装的进攻，缴枪百余支。五日，潘忠汝率部从河口返回黄安。由于连日作战，部队非常疲困。当天晚上，驻宋埠的国民党十二军教导师，又向黄安城发动突然奔袭。开始，潘忠汝以为是“土匪来犯”，传令据城固守。后来，他细听枪声不对，外出查看，才发现是敌正规军来犯。他和吴光浩等紧急决定，率领主力“冲出包围圈，转至七里坪。”潘忠汝临危不惧，沉着、坚定。他要吴光浩率领鄂东军大部、农民义勇队和其他武装力量向外突围，自己带领鄂东军一部分指战员，担负掩护突围的任务。

吴光浩率主力冲出城门时，敌人疯狂堵击，子弹象雨点一样射来，眼看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生死关头，潘忠汝一手提盒子枪，一手挥舞大刀，指挥掩护部队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巷战，为主力突围开辟道路。他带领士兵与敌人浴血拼搏，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胸部和腹部，顿时鲜血直流。战士们见此情景急步上前抢救。他推开同志们，忍着剧烈的疼痛，继续指挥战斗。

潘忠汝使出最后的气力，一边挥刀向敌人砍杀，一边大声呼喊：“同志们！为保卫我们的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冲啊！”由于失血过多，他向前冲了几步，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几个战士飞步上前将他抬起，冲出了城门。当部队行至七里坪潭畈河时，吴光浩等同志们都围拢在潘忠汝身边。只见他睁开双眼，颤动着干裂的嘴唇，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把部队带到七里坪集合，一定……要保存、发展这支革命……队伍……”。话未说完即壮烈殉职，时年仅二十一岁。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1963年7月）。
2. 郑位三：《红色的黄安》，载《星火燎原》第1卷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3. 郑位三：《给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人员的报告记录》（1960年5月）。
4. 《黄安县关于黄麻暴动经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4辑。
5. 《黄麻起义及其前后的一些斗争情况——王树声同志给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室编辑人员谈话记录》（1960年）。
6. 梁业忠：《第一次检阅》，载《星火燎原》第1卷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7. 《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刘 谦 初

王家鼎 邵 华

刘谦初，山东平度人，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八月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英勇就义。

(一)

刘谦初，原名刘德元，字乾初。“谦初”是他一九二九年三月到济南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后改用的名字；笔名有潜初、鹵夫等。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日（农历丁酉年十一月初九）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刘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兄妹七人，他排行居长。幼时常随父参加农业劳动，自小养成了勤劳、质朴的品德。

刘谦初八岁时进本村私塾就读，后转入邻村潘家埠其姑父家塾，二年后升入黄土岭村由基督教会资助的高等小学堂。在学校强制下，他和同学一起接受教会洗礼，成为基督教徒。一九一三年春，刘谦初考入平度南关基督教美国浸信会主办的旧制四年的知务中学。在这里，除国文、圣经课外，他开始接触到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先后学完《形学备旨》、《形学拾级》（均为《几何》）、《地理志略》等课程。他刻苦好学，注重实验，曾在教科书《动物学详考》上批注道：“读此书慎

勿空谈，当亲手解剖物体，潜心察验。”与此同时，在课外广泛阅读文学和历史书籍，尤其喜欢梁启超呼号救亡图存、充满爱国激情的时论文章，常将《饮冰室丛书》一面阅读，一面摘录成册，从中汲取西洋新学知识和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他对中国历史上表现了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英雄，如矢志“精忠报国”、抵抗外族侵略的岳飞，为变法图强而甘愿流血牺牲的谭嗣同，以及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而奋勇赴敌的一九一一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都十分推崇和景仰，称他们为“救国的俊杰，作人的风范”^①。

刘谦初从中学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一九一四年九月上旬，日本帝国主义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德宣战之机，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从龙口和莱州强行登陆，经过、侵占平度等十四县。刘谦初目睹日军在平度县城张贴杀气腾腾的布告，残害无辜的中国农民的暴行，异常愤慨。某日，两名闯入知务中学的日军军官在教室的黑板上用中文书写了“勉强”二字，狡猾地表明他们是“为和平”不得已而来，妄图掩盖其侵略罪行。刘谦初愤然地对同班同学说：“日帝和德帝之间是虎狼之争，受害的却是中国人；将德国驱逐出中国，本应是中国自己的事，而袁世凯政府却引狼入室，其后果不堪设想！”^②

一九一六年春，袁世凯复辟帝制，立号“洪宪”，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刘谦初闻讯，义愤填膺。后从同学王心平处获悉中华革命党人居正等受孙中山的委派，已来青岛组织讨袁军事并秘密召募青年学生参加讨袁军。他怀抱忧国之思，为捍卫

①②于迺镇：《忆同学刘德元烈士》（未刊稿）。

民主共和制度，毅然弃学，决心参加讨袁战争。在二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他邀约同学数人，背着学校当局，悄然翻越学校围墙，星夜步行九十华里，黎明前赶到蓝村，乘火车前往青岛，投入讨袁队伍，被编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三支队（支队长吕子人）炮兵团。五月初，讨袁军沿胶济线西进与北洋军第五师张树元部作战。刘谦初参加了攻打潍县的战斗。五月九日，三支队挥戈回师攻打高密县城，他直接投入攻城战斗，奋勇向前。当天正值高密“庙会”，讨袁军用里应外合的战术，一举攻克了该城。接着，大部分部队继续西进，刘谦初则跟随一支部队留守高密县城。六月，袁世凯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帝制失败，山东讨袁战事结束。刘谦初荣膺银质“义勇奖牌”^①一枚，于十一月复员回到平度。不料在其投军后，知务中学当局因害怕学生中的革命影响，在一部分顽固、保守的牧师的操纵下，借口“违犯校规”，将该校先后参加讨袁的十二名学生“开除学籍”。刘谦初无法回校复学，只好转入县立师范讲习所读书。翌年，知务中学校长易人，在一些思想开明的教员的帮助下，他重返知务中学读书。

据刘谦初中学时期的同学回忆：他为人耿直，谦恭温和，处事果断，热心公益活动，同学皆乐于与其友善。他曾在学校青年会发表以《言》为题的演讲，引用《诗经·大雅》中的诗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议论风生，强调一个人谨慎言行，注意道德修养的重要。又曾写《贪财》一文，抨击贪官污吏搜括民脂民膏，不顾国家安危，聚敛民财的丑行。他熟悉历史典故和民间轶事，文思敏捷，擅长言词，在

^①即“山东三支队义勇奖牌”，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同学中颇有吸引力。由于品学兼优，深受师生器重，被推选为学校青年会干事。

刘谦初中学毕业后，于一九一八年春到济南入齐鲁大学预科附班暂读，暑假后考入文预科。翌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刘谦初怀着忧思国难的灼热心情，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五月二十四，济南大、中学校学生在学生联合会领导下，举行总罢课和游行示威。刘谦初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游行队伍，高呼“誓死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立即释放北京被捕学生”等口号。他踊跃参加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六月初，齐鲁大学英籍校长巴慕德为防止学生运动进一步扩大，宣布学校暂时停办，勒令学生在三日内离校。刘谦初被迫离校回家。他邀约于迺镇、孙策功、邵廷珍等平度籍同学步行东下，拒绝乘坐当时日本占领和管理的胶济线火车，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制和抗议。

五四运动后，齐鲁大学于一九一九年秋又开学了。这时，新文化运动也进一步发展。刘谦初热心阅读《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他曾在读过的《新潮》第一卷第三期上，写过几段“书后”。他摘录有关文章的提要说：“近世物质文明之进步，徒增大多数人之痛苦，仅供少数人之快乐。”这表明当时他在接受新思想方面是十分敏锐的。他更不放松学业上的努力，一九二〇年暑假，取得了在全班作文第一名、总分第四名的优异成绩。

刘谦初考进齐鲁大学时，家境已很困窘，弟妹们都先后辍学务农，父亲忍痛借债供他读书。及至一九二〇年底他在文预科结业时，家中已负债累累，只好中途辍学。一九二一年春，

经知务中学教员侯述先^①介绍，刘谦初到黄县崇实中学任国文教员。

(二)

一九二一年十月，刘谦初因撰文参加李提摩太奖款征文获奖^②，得到基督教会的奖学金，被允准进入北京燕京大学深造。一九二二年暑假，他在崇实中学聘期届满后，于九月十五日免试升入燕京大学文理科，插班二年级，主修历史，兼修地理，开始了他在燕大三年的学习生活。

刘谦初在燕大读书期间，学习十分勤奋。他每天黎明即起，在晨光熹微中开始读书，常年不懈。他利用学校图书馆，大量阅读了中外历史典籍，课余经常向指导教师简又文和学者陈垣等人求教，先后在《燕大周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中国国民性的观察》^③和译作《泰戈尔纪实》^④等。与此同时，他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初，他和熊佛西、董秋斯（原名董绍明）等人发起、成立燕大文学会，被推举为该会负责人之一。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刘谦初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的华北

①侯述先，山东平度人，是一位爱国、正直的基督徒，任《真光杂志》撰述人，曾著《民话》一书，记载民初至“洪宪”年间时事。

②李提摩太奖款征文是基督教上海圣公会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生前赠款作基金，为发现、培养基督教写作人才而设立的。1921年首次发起。

③见1923年4月21日第9期《燕大周刊》。

④见1923年11月24日第24期《燕大周刊》。

六大学^①学生演讲比赛大会上，作了《武力不能统一今日的中国》的演讲。他面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现实，无限同情人民的苦难生活。针对当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顽固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交通状况和军阀武力自身的分裂等三个方面论证封建军阀所追求的“武力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迷梦”。他指出：“段祺瑞当势焰熏天的时候，也曾做过武力统一的梦，但是没有等他的梦做完，早被另一个强有力者把他赶跑了。老实说，当时的袁氏、段氏的武力比起现在直系奉系的武力来，恐怕还要凶险些呢？但是他们的结果如何呢？不过是一武力推倒了，另一武力代之而起；少数的作武力梦者推倒了，多数的作武力梦者又继之而起……。”^②他的演讲，语言犀利，感情充沛，论辩滔滔，猛烈地抨击了北洋军阀各派代表人物，不啻是一篇讨伐北洋军阀的战斗檄文，一篇反对军阀混战的宣言书。这篇演讲在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当时《燕大周刊》主编熊佛西将它破例地发表在“向来不载政治文章”的《燕大周刊》上。

一九二三年六月初，熊佛西等因即将毕业离校，辞去周刊社职务，董秋斯、刘谦初等接办了周刊，刘谦初任编辑部副部长。在他们的主持下，周刊发扬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发行量在原有数千份的基础上续有增长，受到校内外读者的欢迎。一九二四年十月，周刊社为筹集出版经费，组成以刘谦初为主席的临时经济委员会。他不辞辛苦，四处奔走，向师生和校友募捐。他还一手组织了校内空前规模的募捐游艺大会，为周刊

^①当时华北六大学指：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②见1923年5月26日第14期《燕大周刊》。

解决了经费问题。刘谦初等连任两届周刊社职务，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临近毕业时，始由焦菊隐、蔡詠裳、于毅夫、张放等人接任。

一九二四年三月，华北六大学举行国语辩论会，论题是当时青年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专门以上学校学生是否应当干涉政治。以刘谦初为首的燕大学生辩论组，参加了这次辩论。他明确指出：“政治是人民权利的结合体，用以决断国家的政策，发表人民的意志，为人民谋幸福，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我们认为干涉是对于一种与我们有害关系的事体，当他措施不当时，使用种种手段去加以阻止，反抗，改革或建立，使就于适当。……干涉的手段自言论上的反抗，以至革命流血都包括在内。……我们的答案是：专门以上学校学生理合干涉政治，……第一，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干涉政治是应该的，这是他们份内的事情，不是所谓多管闲事；第二，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不但应该干涉政治，并且有这种干涉的能力；第三，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干涉政治是必须的，有重大责任在他们身上，是必要他们去干涉的。”他还对“读书救国”的主张进行了批驳，指出：“读书诚然是重要。若是躬逢政治清明的时候，所谓内无忧患，外无侵扰，四海升平，万民乐业，就是很愚的人也不能主张无理取闹地去干涉政治。何况专门以上聪慧的学生？但是，遇到政治混乱的时候，教育固以不能振兴，实业固以不能开发，万事凋蔽，民不聊生，甚且置之不顾，可陷于国破家亡的时候，是何者急，何者缓？何者先，何者后？不待明言，谁也都能断定了。”^① 这些议论出语惊人，雄辩有力，不

^①刘德元：《专门以上学校学生理合干涉政治》，见1924年4月12日第38期《燕大周刊》。

仅驳倒了那些以为学生不应当干涉政治的谬论，而且使那些不问政治的学生从昏睡中惊醒。

刘谦初在燕大读书期间，有力地抵制了教会的奴化教育，在教职员中的帝国主义分子面前，始终保持民族的尊严和气节。一九二五年春，他主持燕大文学会同学排练、公演洪深改编的以揭露和讽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和伪善本质为内容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①。这就触犯了燕大的外国传教士。英国教授说什么此剧污辱了“大英帝国”；美国女教授也说它“有伤风化”。排练刚刚开始，学校当局就没收演出广告，封闭礼堂，禁止排演。文学会同学公推刘谦初作代表和校方办理交涉。他不怕开除、不怕取消奖学金，不想得到教会的提拔（出国留学），毅然带领同学据理力争，把批评校方无理决定的文章张贴在盔甲厂的校墙上。终于迫其让步，撤销了禁令。文学会向北京市民公演了这一具有教育意义的名剧，斗争得到了胜利。

刘谦初以其勤奋、纯朴、正直、诚实的品德和出色的宣传、组织才能，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他和董秋斯、张采真、张放等人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怀着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由于教会学校对进步思想严密封锁，学生很难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些热血青年，曾为找不到民族复兴的出路而苦闷。

这时候，刘谦初身在燕大，心却向往着北京大学，并想方设法去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览进步书刊。在那里，他读了李大钊的《新纪元》、《唯物史观研究》等文章，还读了一些马克思、

^①原作为英国作家王尔德著《温特米尔夫人的扇子》。

恩格斯和考茨基的著作，视野大为开阔。一九二三年冬，他结识了刚由日本留学回国的山东同乡、国民党左派青年路友于，后又经路友于介绍，结识了共产党人方伯务和范鸿劼。刘谦初非常兴奋，经常与方、范等一起讨论时事和学习马克思学说的体会。不久，范鸿劼送给刘谦初一本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反复阅读，受到很大教育。一九二四年六月，经方伯务、范鸿劼介绍，刘谦初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方伯务直接领导下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为了便于秘密工作，避开燕大校方和同学们的注意，刘谦初从盔甲厂校内搬到校外西单卧佛寺街九号居住。此后，这个住所就成了他与方伯务等接头工作和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

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奋起响应，而燕大学生却遭遇到来自教会的阻力。英、美传教士声称：“不能反对自己的祖国”，并以“关闭学校”相威胁，企图瓦解学生的爱国斗志。六月二日，刘谦初以极大的民族义愤，首先站出来大声疾呼，提出实行全校罢课、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声援上海受难同胞。在他的倡议下，当天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告成立燕大沪案后援会。他和董秋斯被选为该会主要负责人。六月三日，刘谦初作为燕大学生代表前往东城铁狮子胡同北洋军阀执政府（今地安门东大街一号）请愿，并于当晚出席了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成立大会。四日，燕大学生奋起投入北京大、中学校罢课、游行示威的联合行动。从这天起，燕大男、女学生四百人组成演讲团，每人手执白旗和传单，走向街头，呼吁同胞奋起救国。他们深入东城区一带市区商店，动员商界参加一致行动；还分赴各戏院、粮行、洋庄进行宣传、募捐；分头在电车上讲演，组织自行车队到郊区

通县向农民宣传。刘谦初在这些日子里，整日奔忙，担负着极为繁重的组织工作。六月十一日，他主持全校大会，在特邀的上海学生代表介绍“五卅”事件实况后，悲愤难抑地发出号召：凡有血性者当奋起救国！这时全场为之失声痛哭。十七日，又邀请学者马寅初来燕大作关于外国在华租界史的演讲，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还直接参加演讲队到群众集中的街头发表演说。

六月二十四日，北京各校学生沪案后援会代表四十八人，前往执政府请愿，要求北洋政府坚持对英、日交涉，维护民族权益。刘谦初被推举为六位发言代表之一。他作为主要发言人，向接见学生代表的代理外交总长沈瑞麟、陆军总长吴光新面询政府对外交涉情况。沈瑞麟极力应付、回避，装腔作势地说什么“政府对外交有相当之运用，此时未便宣布”。刘谦初当即严肃指出：“上海案件未了，汉口事件又生，英国对我之恶机，无在〔处〕不潜伏。将来例似此类事件，尚不可缕述。请当局明令禁止内乱，电令全国军人作相当之准备。”^① 这言简意赅的发言，表达了爱国青年为保卫民族独立和权利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意志。刘谦初在燕大三年的表现，尤其是他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所起的突出作用，使学校当局惊叹不已，连燕大教务长洪煨莲也承认：“刘先生（指刘谦初——引者）无疑是北京最杰出的学生领袖，在上海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缘故，我们的学生团体才参加学生运动。”^② 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分子特别忌恨刘谦初，千方

^①1925年6月25日北京《晨报》。

^②洪煨莲给镇江润州中学校长查斯·伊·彼尔的信，原件系英文，现藏北京大学学籍档案室。

百计要把他挤出北京。同年九月，刘谦初燕大毕业。在校长司徒雷登等的作梗下，他被迫离开古都，应聘去镇江教书。

(三)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六日，刘谦初来到镇江润州中学。这是一所基督教长老会主办的教会学校。校中除了三个美籍校长、教员外，华人学监和教员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或当地的前清秀才。学校奉行的是一套基督教义和封建教育相结合的制度。刘谦初是来此任教的第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生，学校当局器重他，分配担任高年级初三班（旧制四年）国文教员。

刘谦初在教学中，打破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着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领导学生成立课外读书会，每周聚会一次，交流各自的读书心得，自由讨论、切磋琢磨，极大地活跃了学生的思想。在他的提倡下，学生们争相阅读《中国青年》、《语丝》等刊物以及鲁迅、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的新文学作品，打破了学校的落后、闭塞状态。他指导学生在课余成立了润州中学第一个进步文学团体木瓜社，并仿效《语丝》的风格，出版刊物，先后印行了《木瓜》和《流萤》各二期。学生们通过写作，干预生活，针砭时弊，既提高了学习兴趣，又推动了思想的进步。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使刘谦初无心安然于镇江一隅的教书生活。他决心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到广州去投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报效祖国。恰在这时，他接到了挚友董秋斯、蔡詠裳从北京来信，说他们暑假后将一道去广州工作。这封信更促使刘谦

初毅然辞去教职，于八月下旬赴上海转乘海轮前往广州。到广州后，他和董秋斯一起寄居在西关观音桥乐贤坊二十八号蔡詠寰家中。

时值黄埔军校第六期招生。刘谦初正拟前去报名，获悉该校表示不拟招收已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于是，他要求黄埔军校介绍进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并为此而加紧学习日文。终因无人介绍，此愿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岭南大学附中的聘书。到该校执教。九月十五日晚，他和钟敬文、冼星海等新聘教职员出席了岭南大学的迎新会。会上，在爱国人士钟荣光监督致欢迎词后，刘谦初等人致简短答词。

当时，国民革命策源地广州，到处弥漫着革命气氛。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人民书店公开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刊物。刘谦初在这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等书，《向导》、《中国青年》、《少年先锋》是他经常阅读的刊物。当时，工人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而举行的省港大罢工仍在继续。刘谦初目睹工人阶级在这次罢工中显示的伟大力量，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革命最彻底的阶级。他的思想在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急剧地转变。

刘谦初在搬进岭南大学以后，首先与毗邻而居的历史系学生兼附中教员杨志成志相识。后通过杨又结识了在岭南大学半工半读、从事国文部文牍工作的钟敬文。杨、钟两人都是思想激进的左派青年。共同的理想、抱负和文学志趣，使他们三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尤其在刘、钟之间更为投合。“邂逅之下，一见如故”^①。他们聚首谈心，暮郊散步，互相切磋，交流阅读

^①钟敬文：《潜初去后》，见《荔枝小品》，北新书局1927年版。

马列主义书籍的心得，探讨国民革命和青年运动的理论，不断地撰写文章。他们共同过着清贫的生活，吃、穿、用都十分俭朴，而对岭南大学贵族化的环境、教会学校的制度和习惯则深为不满，“觉得比较在瀚海里尤为难过”^①。刘谦初随时准备离开这里。

一九二六年十月初，钟敬文、刘谦初、杨成志等人并邀约在广州的董秋斯、蔡詠裳发起建立革命文学团体倾盖社^②，创办《倾盖周刊》^③，钟敬文担任主编，每月汇集社员作品，在当时广州市党部国民党左派主办的《国民新闻》报副刊《国花》栏内刊出。刘谦初先后在《倾盖周刊》上发表《寻求》、《试猜‘广州的学生那里去了’》（第一期）、《革命是一种艺术》（第二期）、《才百万分之一》（第三期）和《决心》（第四期）等作品。这些作品表现出他在探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孜孜以求的精神，同时也反映出他要求参加革命实际斗争的急切心情。

十月二十日，岭南大学民间文学研究会成立，同时发表征集民间文艺启事。刘谦初积极参与其活动。二十二日，刘谦初应岭南大学文学研究会邀请在该会举行的第一次演讲会上作题为《我所认识的几位当代文学家的轶事》的演讲，介绍他在主编《燕大周刊》时期熟识的新文学作家许地山（落花生）、冰心、周作人、鲁迅的生平轶事。演讲中“凡彼等之出身、品性、容貌、态度、作风、作品，……俱刻画尽致，令听者如见

①钟敬文：《潜初去后》。

②“倾盖”在广州方言中是谈天说地、聊天的意思。

③1926年10月16日《南大青年》第15卷第4期介绍，《倾盖周刊》是“广州表现实感的反抗的新鲜及人间味的唯一刊物。”

真人然”^①，取得很大成功。

刘谦初还利用课余时间研读苏俄文艺理论《文学与革命》等书籍，他陆续翻译了英国文艺评论家葛理斯著的《舞蹈的艺术》一书和一些外国诗歌作品，如《我爸爸是个社会主义者》^②等。这期间，他应钟敬文的请求，参与民间文学遗产、清代学者李调元编纂的《粤风》的整理工作。两人合作翻译了其中的俚歌和僮歌共二十七首少数民族情歌，编成少数民族语音和汉文对照的《俚僮情歌》一书。这本开拓性的译作后来由创造社作家王独清作序，于一九二八年四月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列为民俗学会丛书之三，正式出版^③。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从广州北迁，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为准备北伐出师河南讨伐奉系军阀，决定将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主力第四军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刘谦初闻讯，遂应董秋斯邀约，决定去武汉参加十一军政治部工作。十二月十五日，他和董秋斯、蔡詠裳等启程离开广州，“抱着不可压抑的雄心，乘风破浪到武汉去了。”^④

(四)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三日，刘谦初在武昌黄鹤楼出席了第四

①1926年11月7日第15卷第7期《南大青年》。

②该诗刊于1926年11月15日第3期《南风》半月刊。

③据〔日本〕直江广治：《中国民俗学》，林怀卿译，1980年10月台南庄家出版社版第214页。

④钟敬文：《请达夫吃酒的事不果了》，见《荔枝小品》，北新书局1927年版。

军第十师政治部欢迎第十一军政治部全体新任人员的大会。十五日，第十一军政治部在武昌司门口军部内成立，刘谦初被任命为宣传科社会股股长。

当时，在武汉，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第十一军担负着卫戍武汉的任务，因此军政治部兼行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的职权。军社会股主要担负着对军外的宣传任务。刘谦初在从事社会调查、发动组织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军队与民众相结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他具有突出的宣传和组织才能，颇为政治部倚重，常为军部草拟宣言、告民众书、宣传大纲、军长训词等文件，并被推举为十一军接待新闻记者委员。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设的长江书店出版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刊，刘谦初获得大量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机会，坚定地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对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和政治部内的共产党员王海萍等人共同工作和学习，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

一月三十一日，刘谦初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各军社会股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在全军加强慰劳士兵工作意义的宣传和解决负伤士兵的待遇问题。刘谦初建议各军社会股参加武汉地方工商经济研究委员会以加强对工商界的工作。此项建议为总政治部所采纳。

二月七日，武汉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七十万人，隆重举行纪念“二七”大罢工四周年大会，向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屠杀的死难烈士林祥谦、施洋等致祭，同时为树立“二七”烈士纪念碑举行奠基礼。大会会场分设在汉口江岸和武昌洪山。李立三、刘谦初等列为九人大会指挥团成员。大会愤怒

控诉北洋军阀统治的暴行，振奋了广大军民继续北伐讨奉的战斗意志。

同一天，十一军政治部决定创办理论刊物《血路》周刊，由编纂股长董秋斯任主编，刘谦初兼任副主编。在二月十五日出版的《血路》创刊号上，刘谦初发表了《“二七”四周年纪念告革命的民众》的论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指出：“‘二七’惨案之经过的情形，也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之勇猛地表现阶级斗争最浓厚的一幕。”“‘二七’惨案京汉路工人之流血，是代表各阶级民众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谋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的。”他明确地写道：中国工人阶级“不但能担负起中国国民革命之责任”，同时也是“促进世界革命的主力军。”他进而批驳“机会主义者”和“妥协家”对“二七”罢工的责难，指出：“‘二七’惨案之发生，不是人为的，不是一般唯心论者的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客观事实——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治压迫、文化侵略——所形成的大爆发大惨案。”这是一篇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战斗性很强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在纪念“二七”四周年的宣传中，刘谦初还代表十一军政治部深入武汉地区各工厂发表演说，宣传“二七”罢工的革命传统。他曾应湖北省总工会教育委员会主任林育南的邀请，到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宣讲“二七”罢工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他的演讲深入浅出，通俗动人，受到当年罢工参加者的热烈欢迎。

在此前后，刘谦初就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英国政府企图出兵干涉的严重局势，为全军政治工作人员

撰写《政治报告——特〔别〕注意外交问题》一文，条分缕析各国统治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不同态度，揭露英国侵略中国的炮舰政策。指出：“处此世界革命的潮流中，有为我们说一句好话，助我们一点气力的，都是我们的好友。”

“苏俄这种仗义的举动（指第三国际发表声明，阻止英国出兵干涉中国——引者），我们至为感激，然而一般军阀的走狗们，偏偏说这正是‘赤化’之据！”^①

刘谦初在思想、理论和行动上的表现，引起政治部内中共党组织的注意。经王海萍与其面谈，知道他在燕大读书时已经入团，遂派人赴北平与北平党组织联系，并取得了方伯务、范鸿劫的证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由王海萍介绍，刘谦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十一军政治部为准备出师河南，讨伐奉系军阀，二月十二日在武昌水陆街四十号开办宣传员训练班，从来自全国十六个省区二百五十名投考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录取四十五名学员，进行短期训练。刘谦初应聘兼任训练班教官，主讲《社会进化史》和《中国近百年史》两门课程，为十一军各师、团政治机关培养了一批宣传骨干。

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阴谋日益暴露。针对蒋介石的独裁活动，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在武汉发起了提高党权（指国民党）、反对独裁的运动，罢免了蒋介石的党、政、军重要职务。在十一军政治部内，斗争也异常激烈。亲蒋的国民党右派、政治部主任余心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革命领导权问题，企图拉拢刘谦初等人向右转。刘谦初敏

^①见《血路》周刊第2期，1927年3月18日出版。

锐地觉察到这一阴谋，在会议上勇敢地阐明了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观点，批驳了右派言论，使余心一未能得逞。由于武汉反蒋空气浓厚，右派陷于孤立，三月十七日，余心一借故辞职，追随军长陈铭枢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四月四日，十一军政治部内开展了审查亲蒋分子、缉捕潜逃人员的运动，刘谦初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此后，一批国民党右派相继离去，在政治部内，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占了绝对优势。

这一年初春，刘谦初在武昌结识了当时在京山县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张文秋，两人志同道合，于四月二十六日在武昌结婚。他俩在三月二十八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读到了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刘谦初细加研读，从中获得了深刻的启示和教益。四月四日，他和张文秋参加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隆重的开学典礼，后经朋友介绍，刘谦初怀着景仰的心情，拜访了主持农讲所工作的毛泽东。四月下旬，京山县委为发展农民武装，委派张文秋在武汉为农民协会购取枪枝，但因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作出许多反对、限制武装农民的错误规定，无法办理取枪手续。刘谦初和王海萍就设法通过十一军取得买枪证明和运枪护照，购得汉阳造长短枪一百支，在湖北省委董必武、陈潭秋的帮助下运回京山，有力地支援了那里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

四月二十七日，武汉国民革命军主力出师河南，继续北伐，讨奉战争爆发。刘谦初在新婚的第四天就随军出发。五月一日，他参预军政治部在河南确山南山坡筹备召开了庆祝“五一”军民联欢大会，到会各界群众达万人，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军民的斗志。五月间，军政治部随军部在流动作战中先后抵达

汝南、上蔡、临颍、许昌等地。刘谦初领导军社会股每到一地，都大力发动当地的农民群众支援北伐军。五月四日，部队到达汝南县境，刘谦初会同当地县党部（国民党）在十八里庙召开了汝南各村庄代表五十余人的会议，成立汝南农民协会筹备处和人民讨奉委员会；同时又联络、团结农民武装“红枪会”，协助北伐军包围盘据汝南县城的敌人、封锁敌人给养、侦察敌情、破坏敌人交通，援助国民革命军。五月十三日晚，他和社会股人员在汝南老君庙温庄召集当地农民代表开谈话会，组织农民慰劳队，深入战壕慰问士兵。五月二十八日，北伐军以巨大的伤亡强行攻取了临颍城，第十一军政治部奉命负责看护伤员工作。六月六日，刘谦初随军政治部进驻许昌。

六月上旬，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河南奉军土崩瓦解。中旬，刘谦初随军班师返回武汉。接着，第十一军、第四军、第二十军组成第二方面军，在总指挥张发奎指挥下开始沿江东征讨蒋。这时革命形势迅速逆转，在“七一五”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后，七月下旬张发奎也决定“清共”。中共中央在此紧急情况下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同月底，在九江十一军政治部的刘谦初等人，接党组织指示，赶往南昌参加起义，但此时南浔线已被张发奎亲信部队所阻，无法通过。刘谦初只得折回武汉，旋与孟用潜等人奉党组织指示，前往上海。

（五）

一九二七年八月，刘谦初到上海，党组织分配他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曾先后在沪西区委和闸北区委从事工人运动，经常到工厂活动，恢复和组织秘密工会。当时上海白色恐怖越来越

越严重，为了安全，党组织指示他在公共租界隐蔽。他和孟用潜、董秋斯、蔡詠裳、张采真等合租施高塔路（现山阴路）四达里的一幢二层楼的前楼共同居住。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组织上只能发给极其低微的生活津贴，需要自谋生计。他们就用写文章得到的一点稿费来维持生活。

十月，由于福建党的工作需要，党中央调刘谦初、孟用潜偕同张采真、苏国才等人离开上海，前往福建漳州，由闽南临时特委分配工作。福建省的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当时正在逐步地恢复和发展中。按党中央指示，已在漳州和福州分别建立了闽南临时特委和闽北临时特委；闽南临时特委管辖福建南部包括兴化、泉州、厦门、漳州、龙岩、汀州等地党的工作。刘谦初到漳州后，临时特委分配他任漳州地区党的书记，负责领导漳州市区、石码（在漳州东南三十华里处）和漳州南乡南靖县一带党的工作。党组织鉴于刘谦初初到闽南，人地生疏，又不懂闽南方言，特地分配原在漳州从事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王德协助他一道工作，为他翻译和带路。他们两人当时均无职业掩护，为了安全隐蔽，往往是利用晚间两人同时外出活动。他们首先在漳州汽车工人和印刷工人中间恢复、发展党组织，也常去附近农村开展工作。不久，刘谦初担任了闽南临时特委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中共闽南临时特委和闽北临时特委及各县、市党和共青团代表，在漳州召开联席会议，遵照党中央指示，宣告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刘谦初在参加这次会议后，调任石码党的书记并兼管海澄县党的工作。十二月中旬，他受临时省委派遣，作为省委巡视员前往福州恢复党组织。他

到福州后，通过隐蔽在佛教功德林里的党的老交通员傅炳恭，联络失散的党员江木焯、郑乃之、黄源等，恢复了党的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福州市执行委员会，筹建了福州市总工会和市农民协会。

一九二八年一月，刘谦初继续留在福州指导工作。这时，福建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黄展云在闽侯县营前区创办“营前模范农村”^①，推行改良主义的所谓“三民主义”实验。刘谦初认为这是开展党的工作的有利时机，便和中共福州市执委书记杨适研究，决定派共产党员黄源（黄展云的堂弟）打入“模范农村”，担任民团主任。在其掩护之下，党派进了一批共产党员接办了营前区玉田乡桃源小学校，白天办学，晚间开办农民夜校，向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打倒土豪，进行土地革命的宣传。刘谦初还直接在玉田乡“桃源支祠”创办了一所农运干部训练班，亲自为学员上课，为当地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他深入群众，和农民打成一片，受到当地群众和从事农运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的爱戴。一九二八年春，他给桃源小学题赠了这样一副对联：

桃红柳绿，锦绣山河谁作主。

源清流洁，革命事业我与君^②。

四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罗明等人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月间，发生了临时省委代理书

^①1928年5月19日福州《求是日报》。

^②苏建积：《回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革命情况》（1958年1月），存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记、原省委组织部长陈祖康等叛党投敌事件，一时引起福建党内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混乱。为此，临时省委相继召开紧急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决定调刘谦初来厦门临时主持省委工作。八、九月间，上海党中央派巡视员郑超麟到厦门整理福建党的组织，召开了福建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的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城市工作、农运工作、军事工作等决议案，选举刘谦初、陈昭礼、谢汉秋等十人为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刘谦初当选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刘谦初从七月间开始主持临时省委工作后，异常紧张而繁忙。他不断地到外地巡视、指导工作。在厦门，他没有固定的住处。为了工作，他不断地跑工厂、机关和学校。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是当时厦门地下党的重要活动地点，他经常到集美学校活动。

九月十五日清晨，刘谦初和省委组织部长谢汉秋两人离开鼓浪屿安海角十七号共青团省委交通站，渡海到厦门参加省委会议。当天上午八时半，国民党地方军阀张贞勾结鼓浪屿外国领事团、工部局，出动大批警特，破坏了十七号交通站，捕去学生共青团员数人（后经南洋侨商营救，全部获释）。刘谦初则因行动机敏，幸免被捕^①。十七日，在漳州石码继续发生党组织被破坏的事件，漳州、厦门一带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九月二十日，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从厦门迁往福州。随后，刘谦初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出席党的“六大”的福建代表罗明等

^①1928年9月18日上海《申报》刊载《鼓屿破获共党机关》报道称：“……又捕时，有共党闽省党部执委会秘书刘某，山东人，逃脱”等语，即指刘谦初此次脱险事。

人回到福州。刘谦初立即召开省委会议，研究传达和贯彻“六大”精神的步骤和方法。旋照省委决定召开扩大会议，由罗明传达“六大”决议精神，与会同志精神振奋，思想活跃，极受鼓舞。会后，省委派吴亚鲁、罗明、杨适、谢汉秋等人分赴闽南、闽西、闽北、诏安等地传达“六大”精神，并巡视、指导工作。刘谦初则留在福州主持省委工作并开办党员训练班，培训福州市党和共青团负责干部及工运、农运骨干。这些措施保证了党的“六大”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以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反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策略思想在福建党内的贯彻。

刘谦初在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期间，于一九二八年底主持创办了省委机关刊物《烈火》月刊。这个刊物在反映福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工运、农运、学运的斗争形势和经验，推动福建党内教育和训练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

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中央在致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中，正式调刘谦初到山东工作。福建省委书记由罗明接任。当时，山东党内由于叛徒王复元、王用章兄弟的叛变，前省委书记邓恩铭等人先后被捕，省内各地党的组织也同时遭受重大损失。为保存、隐蔽山东革命力量，党中央决策将原省委负责人卢福坦等六人调离山东，重新组建山东省委。当此危急之秋，刘谦初受命回到济南，担负起恢复、重建省委，坚持地下革命斗争的重任。

二月下旬，刘谦初离开厦门到上海，接受党中央委派来山东工作的任务。他三月上旬到青岛，着手筹建省委并书面报告党中央，请求增派干部。下旬，到济南与留守的前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①接头，开始了新的战斗。他化名“黄伯襄”，经人介绍谋得齐鲁大学代课教员作职业掩护（未曾到职），取保承租大明湖附近东西菜园子街四号（现门牌五号）后院的三间民房，以私人住房掩护设立省委机关。

四月初，党中央增派刘晓甫、党维蓉、张文秋（化名陈孟君）等四人来山东，以刘谦初、刘晓甫、王进仁组成省委常委，刘谦初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文秋任省委妇女部长兼机要技术工作。

刘谦初、张文秋这一对革命夫妻，二年前在武汉刚结婚，就因革命的需要而各奔东西，音讯杳无。刘谦初到济南后，始从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张采真的来信中，获悉她在上海中共闸北区委做地下工作。党中央应刘谦初请求将张文秋调来山东，不仅便于保护省委机关和应付环境，而且使夫妻得到团聚。刘谦初在工作上也获得了得力的助手。

当时，由于党内叛徒的告密，敌人在济南、张店、潍县和青岛等地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狂，山东各地的白色恐怖益加严重。刘谦初面对不利的斗争形势，没有退缩和畏惧。他领导着山东省委党的组织一面严密隐蔽，一面机警地开展党的活动。在济南顺贡街刘晓甫的住处设立了省委秘书机关，他本人则与家住在老东门附近的一位周姓失业工人保持单线联系，通过这位工人与济南一些工厂、学校党的组织联系。他领导省委机关

^①丁君羊，即丁基实。

不定期地油印秘密传单，在更深夜静时送往工厂和学校，以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行，宣传党的主张，使广大人民群众在黑暗中看到希望和光明，提高斗争的勇气。

一九二九年四月底，党中央巡视员任弼时化名“秋”，来到济南巡视工作。刘谦初等省委负责人向任弼时作了汇报。五月初，省委在任弼时指导下，在济南千佛山下一处僻静的小学校里，召开了有济南和外县党组织代表二十余人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刘谦初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工运、农运、学运、兵运工作的现状和任务的报告。鉴于山东党组织迭遭破坏，干部缺乏，党员政治素质急待提高，敌军中的士兵工作陷于停顿等问题，他向会议提出开办党校的计划和成立省委军委的建议。任弼时为会议作了总结发言。六月十六日，省委根据扩大会议决议，向党中央作出书面的《鲁委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①。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党中央指示山东省委根据实际斗争形势，及时发动胶济铁路沿线城市以青岛为重点的同盟罢工斗争。刘谦初在接到指示后，立即典当衣物，筹措路费，动身东去。他在博山、潍县作了适当布置后，于六月下旬赶到青岛。这时，在青岛各日本纱厂里，由于厂主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工人罢工接连不断。刘谦初和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深入各工厂，做了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在他们的领导下，七月二十一日，爆发了青岛工人反帝同盟大罢工。罢工首先在日本资本家经营的大康、内外棉（银月）、隆兴、钟渊、富士、宝来等纱厂开始，很快扩大到民族资本开办的华新纱厂，四方

^①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辑第74—78页。

机厂工人也相继投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被称为中国现代工运史上著名的青岛“民国十八年大罢工”。

青岛反帝同盟大罢工开始后，刘谦初为了筹款援救罢工工人的生活，于七月底回到了济南。不料，早在七月二日，由于叛徒王用章、李应臣告密，敌人破坏了顺贡街省委秘书机关，省委秘书长兼共青团省委书记刘晓甫夫妇和前来取文件的张文秋同时被捕。月底，刘谦初走进住处大门，从房东处得知陈孟君（张文秋）已有多日没有回来。他料到其中有变，遂借词退出，直奔齐鲁大学广智院（博物馆）一位地下工作同志处暂且隐蔽。这时，被敌人捕去的已近六十人。敌人也已侦知刘谦初回到济南，便派出侦探，密布罗网，进行搜捕。刘谦初决计去青岛布置工作，以应付当前事变。他剪去长发，身着对襟短衣，化装成一个农民，于八月七日踏上了东去青岛的火车。途中在明水车站停车时，两个手持刘谦初照片的密探走进了车厢，立刻盯上了刘谦初。接着，便恶狠狠地将他绑下火车，拉上警车向济南驶去。刘谦初不幸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七）

在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敌人军法执行处的头目，连续审问刘谦初，逼他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共产党省委负责人身分。刘谦初怒目而视，针锋相对：

“你是不是刘谦初？”

“我叫黄伯襄。”

“在济南干什么？”

“齐鲁大学教书。”

“你是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怎样派你来山东搞推翻国民政府活动的？”

“我不是共产党，我是一个教员。”

匪徒们见审问无效，就动用各种酷刑来逼供。压杠子、坐囚笼、上老虎凳等等，每次都打得刘谦初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但这些酷刑只能摧残他的身体，却丝毫不能动摇他共产党员的钢铁般革命意志。他经受了种种痛苦的折磨，严守党的秘密，坚不承认自己的政治身分。

和刘晓甫同被关押在济南南关公安局看守所里的张文秋，表现也很坚强。她按照预先和刘谦初约定好的应变言词，只承认自己叫陈孟君，是从乡下来济南看丈夫的，丈夫叫黄伯襄，在齐鲁大学教书。敌人对她也施以酷刑，但她始终坚持上述口供不变，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见她的口供与刘谦初讲的一样，遂将她和刘晓甫一起押解至警备司令部，同刘谦初合案审讯。在候审室的院落里，刘谦初与张文秋会面了。当张文秋看到他双手紧铐、脚拖双镣、面容憔悴的形象，悲苦难禁，热泪盈眶。刘谦初缓步移近张文秋身边悄声地说：“我是用照片对出来的。早下定为主义牺牲的决心了。你不要难过，在敌人面前，我们只能流血，不能流泪啊！”又说：“一定要为妈妈（指党）着想，万一我死了，你还要为我孝敬她老人家，还要为我报仇。你要做个很孝敬很贤慧的人，对得起妈妈。”^①这些话给张文秋以无比的力量，使她对敌斗争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①张文秋：《党的忠实儿子》，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11月版第26页。

敌人见酷刑对刘谦初也无济于事，便转而采取拉拢软化的手段来利诱他。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国民党省、市党部头目，“改组派”分子殷君采、吴保甫出面指认、诱降。殷、吴两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曾与刘谦初共事，知道刘谦初的一些情况，并一起合过影，密探追捕刘谦初时所持的照片，就是他们提供的。现在，他们在敌军法执行处头目的陪同下来到看守所，对刘谦初说：“你看我们是谁？你还能不承认你就是刘谦初吗？”刘谦初用轻蔑的目光朝殷、吴两人看了一眼，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共产党员身分已经无法隐瞒，但也清楚这两个人并不了解他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情况和这次来山东的任务，便昂起头，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刘乾初，共产党员，看你们把我怎么办？”敌军法执行处的头目以为“指认”发生了效用，就紧接着追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派来山东颠覆国民政府的？”刘谦初胸有成竹地答道：“我过去是共产党员，现在已与党失掉联系，是来山东教书的，你们可以到齐鲁大学去调查。”殷君采和吴保甫再也拿不出什么证据，遂以“党国珍惜人才”，“我们是以老朋友的身分前来援救”之类的鬼话进行诱降。刘谦初严词拒绝，怒斥敌人，坚持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十二月初，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军法执行处判决刘谦初、刘晓甫死刑，上报南京政府候复。

一九三〇年初，山东的国民党“改组派”在敌人内部的斗争中失利，纷纷逃离山东。党领导的“互济会”通知狱中刘谦初等立即“翻供”，上诉控告“改组派”陷害，争取案情好转。经上诉和特聘律师李化南辩护，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将此案移归省高等法院审理，将刘谦初转押到普利门外省高等法院监狱，结果改判为八年徒刑。

狱中生活极其恶劣。刘谦初被视为“要犯”，先羈押在单人牢房里，不久又关入集体牢房。牢房阴暗潮湿，不见阳光，臭虫血污涂满墙壁，秽气熏天。政治犯每餐伙食仅有高粮窝头和一小盆盐水。但刘谦初为了重获自由，争取出狱继续为党工作，坚韧地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他利用狱中允许犯人看旧小说、唱本的旧例，通过“互济会”和狱外战友的帮助，巧妙地把许多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进步书刊伪装成小说、唱本弄到狱中。他决心把监狱变成学校，鼓励和组织难友们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一九三〇年旧历年节那天，刘谦初给关在女牢的张文秋送来一盒糕点，盒子底下藏着一张小纸条，张文秋打开一看，上面是刘谦初亲笔写的一首诗：

无事不必苦忧愁，
应把真理细探求；
只要武器握在手，
可将细水变洪流^①。

这首诗迅速地在难友们中间传播开来。它充分表现出刘谦初在危难中矢志追求革命真理，乐观而坚定地献身革命事业的高贵品格。

张文秋以“共党嫌疑”被判刑半年，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出狱，行前经特许与刘谦初会面、话别。刘谦初深情地凝视着即将重返党的怀抱的妻子，叮嘱张文秋说：回到母亲（指党）身边后，要好好地照顾母亲、听母亲的话；要搞好家务（指为党工作）。最

^①张文秋：《党的忠实儿子》第48页。

后他取出了事先写好的两封信，要妻子分别带交给党中央和挚友董秋斯。信中证明“陈孟君受我牵连，没有丝毫埋怨我，在狱中时刻想念母亲”，并委托董秋斯对她多加关照。张文秋出狱后，在中共山东省委派人护送下，回到上海党中央，被分配担任中央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在秘书长林育南直接领导下工作。

一九三〇年九月，军阀韩复榘接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为了巩固在山东的统治地位，他一上台就疯狂镇压革命人民和共产党地下活动，从重审理共产党案件。刘谦初面对案情恶化的局面，心境十分坦然。这期间，他给党、给亲人写过不少书信，表达自己献身共产主义的决心。十一月初，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事已如此，没有营救的可能，请不必进行营救工作。”并且说：“我心里很平静，正在加紧读‘社会进化史’，争取时日，多懂一些真理。”^①那时，党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都在“苏准会”张文秋的办公处——英租界卡德路（现石门二路）和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交叉口的二幢楼房里，读到过刘谦初的来信。任弼时一边读信，一边说：“刘谦初雄辩滔滔，是一位搞政治宣传的人才。”周恩来看完这些信后，深情地说：“谦初是党的好干部，他象猛虎关入囚笼，无法施展威力，这是党的损失，应当通知互济会，继续想办法营救。”瞿秋白把读过的信交给张文秋，感慨地说：“这是真正的铁窗风味啊！你把这些信编上号码好好保存起来，将来我要写部小说教育后代。”^②林育南还派人将御寒的毛毯、衣物等用品和书籍寄给狱中的刘谦初。党中央同时仍在竭力组织营救。

^{①②}张文秋：《党的忠实儿子》第55页。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刘谦初在狱中收到挚友董秋斯、蔡詠裳合译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名著《士敏土》一书^①。在该书的扉页上印着：“献这译本给我们最亲爱的朋友C·C”。这“C·C”即是“谦初”二字的英文缩写。书中描写了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无产阶级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所表现的巨大热情和创造力量。这使刘谦初深受感动。他以无限向往的心情，写信给董秋斯说：

这本书我是这样地读的：我在模拟书中的描写和对话，指手划脚地读，难友们便都围在我身边听。每读到一个紧张的地方，我们常是一齐低声地喊起来——因为这里是不准大声的啊！这样经过几天的功夫，才把这本书读完。我们简直忘记了一切，眼前但有一所庄严灿烂的士敏土厂^①！

这些话使董秋斯感到“这译本已经得到无可量计的报酬，再不需要其他任何什么”，为自己的译作能在“被难者中燃起这样伟大的解放的力”^②而感到莫大的慰藉。

此后，刘谦初继续狱中的斗争。他曾将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的主要章节翻译成中文，组织难友们阅读。他还在监狱的士兵中发展党的组织。曾经计划组织越狱斗争，但

①《士敏土》，苏联格来考夫著，蔡詠裳、董绍明（董秋斯）合译，上海启智书局印行，1929年初版。原著作者名字后来再版时均作“革拉特珂夫”。

②③转引自董绍明：《〈士敏土〉再版题记》，上海新生命书店1932年7月版。

未能实现。

刘谦初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没有徘徊犹豫，没有悲苦忧伤，大难当头，处之泰然。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他给张文秋写了这样一封信：

珍妹^①：

雪业^②信已由张兄^③转去，如此次无办法，则万事俱去矣。得有消息时请即告我。

我病^④月余以来，虽无严重变化，莫以为危期已过。实则三月以来还日在增剧。许久未与妹书，别无他因，惟恐我病传染他人耳！吾妹体质自前年大病后，甚为虚弱，偶一不慎，再罹危灾，诚至易也！嗣后如无严重变化，月余一信往还已足，不须过事频繁，招致不测。请转告母亲^⑤，目前我无什需要。钱尚足供月余之用，夹衣前想置备，今觉亦无必要，俟有急切需要时定当函告，希勿挂念。

前托方文^⑥代购金冬新隶一册^⑦，系送友人之物，即望速购一册，迳寄我收可也。

①张文秋原名张国兰，小名全珍。

②雪业，即于毅夫，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张学铭的助理秘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预营救刘谦初，未果。

③张兄，指狱卒中的一位革命同情者。

④病，指案情恶化，或称革命者被捕事。

⑤母亲，指党中央。

⑥方文，即张放，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改名刘进中。

⑦金冬新隶：应为《冬心先生隶书》，冬心是清代著名书画家金农的号。

采病^①结果如何？大哥病^②怎样？景虚夫妇^③不知尚在澳门否？得有消息时望即告我。张兄待我热诚，非言可喻，唯其如此，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元书

一九三一、三、十七^④

从这封信中看出，刘谦初已预感到形势日益恶化。但他镇定自若，关心他人的命运远远胜过自己。他担心偶有不慎会危及妻子的安全；他念念不忘党的关怀；他时刻关注同志和挚友的安危，表现了共产党人光彩照人的高尚情操。

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下午二时，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作出了处决在押的刘谦初、邓恩铭等二十二名共产党员的罪恶决定。五日凌晨，在济南“第一模范监狱”的牢房里，刘谦初从容地站起来，又急忙取出身边的纸笔，写下了就义前给妻子的遗书：

我现在临死之时，

-
- ①采病，指张采真被捕事。张采真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1930年11月14日被捕，12月27日在汉口英勇就义。
- ②大哥病，指林育南被捕事。林育南原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苏维埃准备会”秘书长。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被捕，2月7日牺牲于龙华。
- ③景虚，董秋斯号景天，蔡咏裳字步虚，当时在澳门做地下工作。
- ④张文秋：《党的忠实儿子》第74页。书中原信不完整，采访时经张文秋补全。

谨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
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
望你不要为我悲伤，
希你紧记住我的话。
无论在任何条件下，
都要好好爱护母亲！
孝敬母亲！
听母亲的话！
你的快乐，也就是我的快乐；
你的幸福，也就是我的幸福^①！

当天早晨六时整，三辆囚车载着二十二名优秀共产党员，在武装警特押送下，向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疾驶而去。临刑前，刘谦初毫无惧色，神态自若，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而后，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刘谦初从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赤子般的感情热爱党，最后把鲜血和生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不愧为党的忠实儿子。在他殉难后，遗体归葬平度故里。一九三八年春，党和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会见张文秋和刘谦初的女儿刘松林时深情地说：“刘谦初同志我是知道的。他是一位好同志啊！可惜牺牲得太早了！”^①全国解放后，一九六〇年三月，山东省优抚局主持将

^①张文秋：《党的忠实儿子》第78页。

^②张文秋：《难忘的教诲——忆毛泽东同志二三事》，载1983年12月18日《解放军报》。

刘谦初遗骨迁葬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来到刘谦初墓前凭吊，永远纪念这位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

作者附记：

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访问了张文秋、刘进中、钟敬文、杨成志、于迺镇、杨文德、侯训诂、刘维汉、刘景超、杨方益、王德、郑乃之、乔天华、于道泉等同志；查阅了《燕大周刊》、《汉口民国日报》、《晨报》、《京报》等报刊。

汪 铭

樊子瑛 霍成勋

汪铭是我党的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山西党组织屡遭破坏、和党中央长期失掉联系的严重时刻，他排除万难，找到党中央，汇报情况，取得联系，坚决贯彻周恩来为党中央起草的《中央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的信》的精神，为恢复和重建山西党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坚贞不屈，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斗争，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汪铭，字仰盘，陕西省神木县人，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农历三月二十八）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祖父汪二牛是个木匠，共有五个儿子。父亲汪坤元，排行第二，生二子一女，汪铭是长子。汪铭十一岁时父亲去世，在祖母和伯叔抚育下成人，从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倔强性格。他在私塾读了几年书，一九二〇年入县城高等小学，刻苦学习，并练得一笔好字；一九二二年赴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和彭真同在旧制中等科第三十四班学习^①。

第一中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高君宇的母校，

^① 《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一览》，原件存山西省公安厅档案科。

也是他在山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一九二〇年高君宇回到太原，在这座学校创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

一九二二年冬，汪铭参加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领导的青年学会，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为了亲身投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他还参加了刘世泽等同学创办的见闻观摩会^①。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个研究学问的团体，实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

一九二四年，山西省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一九二五年初，汪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夏天转为共产党员^②。在学校里，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同其他同学领导学生走上街头，开展宣传和募捐活动，声援上海工人和各界人士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年秋天，随着太原地区党员的逐渐增多，中共北方区委派崔锄人到太原担任党的专职支部书记。同年冬，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汪铭担任地委技术书记^③，承办和处理地委机关刻印文件、宣传品等文书工作；同时还积极在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

一九二五年底，地委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学生运动转向工人运动，并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由邓国栋担任书记），派汪铭深入工厂进行革命活动。自此，他经常深入工厂，找工人谈心，和许多工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经过他和其他同

①张耀庭 1957 年对汪继尧的谈话。

②彭真 1950 年给汪继尧的信。

③马林：《汪铭小传》（1945 年 1 月），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志的努力工作，在兵工厂、纺织厂等处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汪铭还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向家乡人民传播革命火种。一九二五年寒假期间，他和他的同乡、同学、共产党员王瀛一道返回神木时，曾多次在县城高等小学进行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的宣传，并和王伯恭等同学一起，组织旅外同学排演了《可怜闺里月》、《私塾一瞥》等反对军阀、反对封建教育的时装剧，向人民群众宣传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一九二六年七月，汪铭和张友清等又一次回到家乡后，一方面大力宣传北伐战争的胜利形势，一方面积极参与领导神木人民开展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的实际斗争。汪铭给在榆林的亲戚、同乡李香斋、张心斋等写信^①，要求他们采取措施，积极配合，最后赶走了反动知县庞仁安，打倒了横行乡里的劣绅乔济，使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下，经过中共山西省委^②的斗争和推动，山西省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省党部九名执行委员中，国民党员五人，共产党员四人，国民党右派苗培成担任了宣传部长。我党为了掌握宣传工作的领导权，派汪铭到省党部宣传部工作。由于汪铭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的言论都予以坚决批驳，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山西军阀阎锡山投

^①李香斋 1980 年 10 月 16 日给汪继尧的信。

^②1926 年 10 月，中共太原地委改为山西省委。

靠蒋介石，公开打出反共旗号，自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改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实行“清党”，大肆逮捕、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此紧急情况下，中共山西省委讨论了应变措施。省委书记颜昌杰说：山西国民党已经变成反动派屠杀革命人士的工具，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应该很快转移；我们的同志必须采取分散的形式，离开太原，转向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土豪劣绅的斗争；在必要时迁省委机关到农村，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坚持斗争。省委派汪铭化名王德昌，以省委特派员身分到祁县秘密开展工作，建立党的工作基地，并负责督导祁县、介休、平遥、太谷等县党的工作。

汪铭到祁县后，在共产党员柳文渊的掩护下，隐蔽在祁县教育会，积极开展建党活动。经过柳文渊了解、考察和介绍，由他亲自谈话，批准接收乔家堡学校教员乔一华、阎定础加入共产党，并建立了祁县第一个党支部，由阎定础担任书记。之后，汪铭便住到乔家堡小学，指导祁县党的工作。学校放假后，汪铭为了找到一个公开职业做掩护，便在乔家堡学校举办暑期补习班，白天为瓦屋、贾令等地学生补课，晚上给党员讲授共产主义和党的秘密工作知识，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乔一华的同学段灿，是山西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因太原“清党”无法立足，也来到乔家堡“避难”。汪铭考查清楚后，接上段灿的组织关系，带领段灿一道工作，让段灿白天给学生补习功课，晚上广泛接触农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揭露蒋介石在上海搞大屠杀的罪行，启发他们参加革命斗争^①。

为了贯彻省委指示，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汪铭亲自起草

^①阎定础 1981 年 6 月 25 日谈话记录。

了号召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的传单，并从乔家堡学校返回祁县教育会，筹备成立了实际由共产党员掌握的国民党祁县县党部。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广泛发展，汪铭一方面支持国民党中间分子高硕年担任高小校长和县党部书记长，另一方面派进一批共产党员掌握县党部实权。经过他和许多党员的艰苦工作，农民协会在不少村庄相继建立。农民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建党工作，先后发展三十多个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在祁县城关益晋织布厂和东观、张庄、贾令等村建立了党的支部。同年九月，在汪铭主持下，中共祁县县委正式成立，由乔一华担任书记。这就为省委机关迁来祁县创造了有利条件^①。

就在这时，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中校尉营的机关被敌察觉。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省委决定，除留戎子桐在太原坚持工作外，其他领导人崔锄人、邓国栋、王鸿钧等先后转移到祁县乔家堡，设立省委临时办事处。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祁县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同年十月，祁县就有九十六个村先后建立农民协会，反土豪劣绅的斗争掀起了高潮^②。

山西国民党开始“清党”后，汪铭的亲密战友王瀛（时为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兼学生运动委员会党团书记、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从武汉返晋途中，不幸被捕，在太原惨遭杀害。噩耗传到祁县后，汪铭十分悲愤地说：“王瀛同志的牺牲，是党的损失，我们要加倍努力，完成他未竟的事业！”^③

为了在太原给省委寻找一个秘密印刷机关，一九二八年一月，汪铭（化名王振汉）回到太原，在嘉康杰陪同下，秘密来

①②③ 阎定础 1981年6月25日谈话记录。

到太原中山中学（太原市大南门外文昌庙，现为太原市南城区迎泽街小学），和学校负责人嘉红元（现名张永，是康杰胞弟）接头商定，把学校南边的偏院作为党组织的工作地址。汪铭经常把党的秘密文件带到这里显影、誊抄和印刷。开始时都是他自己刻写，嘉红元印刷装订^①。后来，经他考查了解，把该校工作人员赵万钟介绍入党，刻写任务就由赵万钟承担起来。当时，发给山西各地党组织的《北方红旗》上的文章，就是在这里翻印的^②。一九二九年太原市委恢复后，这里仍是市委印刷传单和宣传品的地方^③。

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制造反革命政变和实行“清党”后，中共山西省委同党中央和各地基层组织曾一度失掉联系。为了整顿恢复各级党组织，一九二八年元宵节后，临时省委^④在霍县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即霍州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正当省委领导成员分赴各地传达贯彻霍州会议精神的时候，由于叛徒告密，省委遭到破坏，邓国栋在祁县张庄，王世盖、杨高梧、关广荃在太原，周玉麟（共青团省委负责人）在绛州先后被捕。

霍州会议之前，汪铭就接受了赴党中央汇报工作的任务。他积极搜集、整理汇报材料，把汇报重点密写在线装书页的背面，并准备了一套商人服装。参加完霍州会议后，他同准备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王鸿钧一起离开山西南下。

①嘉红元 1980 年 4 月 12 日谈话记录。

②赵万钟 1980 年 7 月 2 日谈话记录。

③乔子甲 1980 年 6 月 20 日谈话记录。

④一九二七年秋中共山西省委改为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王鸿钧，组织部长崔锄人，宣传部长戎子桐。

路经开封时，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山西省委被破坏，负责同志被捕的消息，十分震惊，遂与河南省委研究决定，暂不赴中央，立即返回山西，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①。

三月底，汪铭和王鸿钧从运城到霍县，先后找到霍县县委书记李光杰和太原党的负责人阎念先等同志。经过汪铭和王鸿钧等的积极努力，山西临时省委在这年夏天就很快地恢复和重建起来，省委成员有王世隆、王鸿钧、汪铭、阎念先、赵秉彝（当时已被捕）、杨活新、秦晋翰等七人；接着又在省委领导下恢复了太原市委。当时，经过重新登记，能够取得联系的党员，只有二十二二人。

新省委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没能采取长期隐蔽和积蓄力量的正确方针，致使阎念先等六位同志和十余个革命群众又相继被捕。至此，山西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发展的数百名党员，除少数同志安全隐蔽外，有的被敌人逮捕关押，有的被迫离开山西，也有少数人与党脱离关系，甚至叛变；各级组织都遭到破坏，几乎全部失去了作用。

一九二八年底，在山西党组织和党中央长期失掉联系，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严重时刻，汪铭千里迢迢奔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他到上海后，首先送上《汪铭来的任务与对中央的要求》^②的书面报告。大意是：山西要与中央发生关系；要把中央的一切文件、指示带回山西去；省委三人被捕，一人未与团体接头，是否增加省委领导成员，要中央给一指示；军阀军队中有几个团、营长，仅能对党有点小的贡献，不

①阎定础 1981年6月25日谈话记录。

②汪铭手写稿，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能绝对受党的指挥，应如何办？山西经济至感困难，成立特委亦需用具和经费，要求中央拨一笔款接济；要求中央派有暴动经验的同志来山西参加指导机关工作。

党中央根据汪铭的书面报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三日，派一位名叫晓焚的同志接见了汪铭。晓焚听取了汪铭关于山西革命斗争形势和党组织遭受破坏的详细汇报，并于当天向党中央作了反映。二月二日，党中央负责同志召见了汪铭，并与汪铭一起研究了山西的情况后，就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给山西省委写了两封指示信^①。

中央对山西省委工作的指示信，深刻地剖析了阎锡山的反动政局，正确估价了山西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现状，认为目前山西群众的自发斗争是不断发生和扩大，虽然斗争的形式尚未走上阶级斗争正轨，但是使工农群众日趋于革命化。指示信明确指出：目前山西党的任务是深入到群众中去，积极地领导工农群众的斗争，加强党内教育，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注意发展产业工人的工作，建立产业工人支部；农民运动要以正太铁路沿线和几个中心区域四郊农民为主要工作区域，刻苦发展群众组织；省委实行集体领导，建立巡视员制度，省委委员经常留三人负责机关工作，其余二人分别出巡各县，积极帮助各地党部建立和发展工作。

中央在军事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山西党过去对于军事工作全未注意，党的军事工作至今没有一点基础，这实是山西党过去工作上的一大缺点。根据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革命前途以及党的新的政策，山西党在军事工作方面有四点须即进行的：

^①中央给山西省委的信（铅印件），存中央档案馆。

第一，省委应指定一专门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外县军事重心区域的党，也必须指定军事负责同志，开始可由别项工作同志兼任；第二，发展党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第三，实行党员军事化，除送党员同志到军队中当兵及入军事学校外，要在可能时组织军事训练班，学习使用武器；第四，建立工农武装，在城市有可能时组织纠察队，没有可能时设法打进反动的纠察队；乡村中有可能时秘密组织农民自卫队，没可能时要尽可能的去领导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

党中央根据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和汪铭汇报的情况起草的这两封指示信，对恢复和重建山西党组织、发展山西革命形势，有着重要的意义。

就在汪铭留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期间，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江苏省委代表蔡振德向他做“反中央的宣传”，指责中央“政治路线错误”和对江苏问题处置不当。汪铭当即批评蔡振德的错误做法妨碍党的团结和统一，建议他们按组织原则把意见提交中央进行讨论，并于当天把蔡振德对他的谈话，连同他对蔡所表示的态度，一并写成书面报告送交党中央。一月二十日，他又撰写了题为《对于江苏事件的意见》^①，批评了当时的江苏省委进行反中央的宣传和同中央断绝关系的严重错误，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机关的组织权威。

二月下旬，汪铭带着党中央的指示信回到山西，才得知由于叛徒告密，党的省委和团的省委又有两位同志被捕，使“省委组织又塌台”^②。针对这个严酷现实，汪铭一面于三月四日

^①载《党的生活》第5期，1929年2月19日出版。

^②汪铭1929年3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写信给党中央，要求“调一批人到太原”^①重建山西省委；一面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毅力，投入了恢复山西党组织的斗争。当时工作十分困难，“省委无头可接，各处全无头绪”^②。经过他一个多月的奔走，在平遥、汾阳找到九个工人党员，在榆次建立了一处商号机关，以备联络；在太原织布厂，找到四个工人党员，组成了一个支部。阳泉、榆次、正太方面，虽经努力，却无进展。

究竟怎样使山西党组织尽快恢复和建立起来，继续领导山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汪铭经过认真考虑后，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说：白色恐怖之下，山西党损失特别厉害，不断遭受打击，畏缩不前者有之，消极灰心者有之，根本悲观脱离团体自首告密者有之。这种可耻现象，虽说是革命失败后通常有的表现，但其主要原因：一是长期脱离中央领导，未能接到中央文件；二是省委集体领导没有形成，党内没有严格讨论，领导工作能力薄弱，不能负起责任；三是党内缺乏教育，政治理论认识特别缺乏；四是组织路线不能有明确了解，组织行动十分简单，只认识个人能干，不认识组织力量，组织不断遭受打击；五是先组党而后组群众，秘密工作不好，活动时间很短就暴露无余；六是在政治上缺少一个中心干部领导。因此，他认为，山西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加紧政治教育，提高一般同志政治水平线；训练干部人才；要求中央派熟悉政治，能力较强的同志来山西参加省委中心工作^③。汪

①转引自《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页。

②汪铭1929年3月22日给中央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汪铭给中央信——关于山西工作我个人有以下的意见》（1929年3月22日）。

铭的这些意见，反映了当时山西党组织的实际状况。

党中央对山西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屡遭破坏的情况十分重视。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根据汪铭三月四日来信，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央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的信》^①，明确指出：“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兼管”。“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如太原、阳泉、绛州、榆次、河东诸地”。“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健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县、市委的组织。务使这一组织，能从几个有群众基础、有社会关系的支部基础上建立起来，县、市委负责同志也要多由在业同志选出担任，这样才能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这一指示信，为在白色恐怖下恢复党的组织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汪铭根据党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首先致力于恢复和建立太原党组织的领导机构。经过他的刻苦工作，先后恢复了织布工人、印刷工人、学生、军官学校等基层党支部。在此基础上，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建立了太原市委，由汪铭任市委书记（兼管学生运动），冯彦俊任组织部长（兼管军事工作），吉甫（乔子甲）任宣传部长（兼负交通）。为了建立宣传阵地，市委还创办了党内刊物《太原工农兵红旗》^②。

接着，汪铭奔赴天津，找顺直省委，汇报山西党的工作。五月九日，顺直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和汪铭汇报的情况，派汪铭以省委巡视员的身分负责山西工作^③。汪铭返回山西后，根据

^①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2页。

^②乔子甲1980年6月20日谈话记录。

^③有资料说，汪铭当时还是顺直省委常委。

党中央对山西省委的指示和顺直省委的安排，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从六月二日起，汪铭赴河东地区进行巡视。三日，他到达夏县，找到河东特委负责人嘉康杰，听取了河东党的工作情况汇报。自从一九二八年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负责人被捕后，河东即组织了特委。不久，河东特委负责人被捕，党的活动无形中停顿。特委二次恢复后，制定了工作计划^①，给党中央写了工作汇报^②。三月份，冯彦俊、乔子甲调到太原后，特委领导力量更为削弱，仅有八个党员，一切活动均已停止。汪铭针对这种状况，和嘉康杰研究决定，于六月七日至八日，在夏县堆云洞召开了河东地区党的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形势和党的任务，并制定工作计划。汪铭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三十五号通告^③和顺直省委对河东工作的指示精神。会议认为过去特委组织涣散，没有工农成份，指导能力薄弱，没有支部组织和组织生活，工作无计划，忽视训练干部和对政治问题的讨论，缺少公开的政治宣传，没有注意群众斗争，特别是借粮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党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会议根据顺直省委指示，决定改河东特委为河东特支，选举产生了河东特支干事会，由嘉康杰担任书记，把运城、夏县、安邑、闻喜、解县、绛县以及运城盐池、绛州纱厂等地定为特支工作范围；立即建立安邑、夏县、闻喜、解县等县党支部，并就加强政治教育和扩大党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会小组、农协会小组等组织，充分利用

①汪铭：《巡视河东工作报告》（1929年6月20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周恩来为党中央起草的《中央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信》中提到了这个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即《关于五一节的工作方针》（1929年4月12日）。

组织力量来发动群众诸问题，作出了决定。

堆云洞会议结束后，汪铭在嘉康杰陪同下，巡视了河东地区，帮助各县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在运城，他先后到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和盐池寻找党员，组建党的支部。在安邑，他和北相镇农民党员同志见面，并讨论了吸收四个农民积极分子入党和建立农村支部的问题。在绛州，他们介绍李仰南入党，并共同研究有关政治形势、工农状况和发展党的问题，还提出要李仰南负责绛州党的工作，注意在绛州纱厂发展党的组织。经过十九天的紧张奔波，河东地区党的工作开始打开了新的局面。

一九二九年夏，汪铭针对许多党的负责同志被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的情况，积极想办法开辟监狱内党的工作。他经过对关押在狱中的党员进行考察后，借段嘉绂（中共党员，临汾人）保外就医的机会，设法让段转告监狱中的阎定础，让阎把关在监狱内的党员姓名、被关的房号和被捕后的表现情况等写个报告。不久，汪铭收到了阎定础写的关于监狱情况报告，立即让段嘉绂转告阎定础说：党组织准备拿一部分钱交给被关押的同志使用，由阎负责分发。正当狱中党的工作刚刚开展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汪铭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不幸被捕。

汪铭被捕以后，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敌人审讯时，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叛徒武子程出庭指认，他怒斥叛徒，毫无惧色。敌人用六至八人压杠子等酷刑，逼他招供，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几次审问都一言未答。以后，山西省民政厅科长郭怀章通过民政厅厅长邱仰濬活动营救。敌人要汪铭表示出狱后不干共产党，被汪铭严词拒绝。在

一无证据(叛徒只知他是共产党员,不知道他的具体身分),二无口供的情况下,敌人把汪铭当作“重大嫌疑犯”,长期单独关押。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百般折磨,汪铭毫不动摇,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时刻设法寻找相当的朋友,以与党发生关系”^①,想尽办法继续为党工作。他在太原公安局关押期间,针对狱中看守人员多是文盲的情况,建议监狱当局开办文化补习班,由他每天定时教这些人识字、读书。经过他半年多的细致工作,使几个看守人员转变了立场,并把看守樊有春发展为党员,使监狱内外的联系有了可靠的“交通”。

汪铭被捕后,顺直省委派人到山西,重新整顿党的组织,改太原市委为山西特委,冯彦俊为书记,习静波为组织部长,吉甫为宣传部长。一九三〇年三月,特委把中央六十号《政治通告》送给汪铭,他读后非常激动,立即给党中央写信,汇报了他对革命形势和顺直省委对山西党的工作领导等问题的看法,并给山西党组织写信,谈了他对山西工作的意见和顺直省委对于山西应切实指导的意见。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我离开党和组织已八个月了,八个月未见党内一纸,一旦读六十号‘政通’,使我兴奋万分。”他还以极其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痛心地检讨了由于对党内的反动分子失去警惕,“自己投奔走向反动分子的怀里”^②,使党的工作遭到严重打击的错

①1930年3月24日汪铭在狱中给中央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据吉甫回忆:一九二九年夏,工运负责人杨某(平遥人、太原兵工厂工人)闹情绪,要党给他以补助。汪铭和冯彦俊、吉甫商量决定,共同找杨进行说服。不料杨已叛变,宪兵早已隐蔽其家,汪先去,刚进杨家就被逮捕。故他说是“自己投奔走向反动分子的怀里。”

误。他根据中央六十号《政治通告》的精神和他入狱前山西党的工作情况，提出了意见和希望。他说：“中央过去对各地执行总路线的分量没有积极地考查过，而且对于各地的指示，也限于通告，单独的某项工作指示与信件答复，未能很快的发出。这些对于工作影响非常之大”。“苏维埃这一组织，在北方的劳苦群众中实在是不知为何物。虽然经过党的宣传，但未普遍地深入到群众中去，而知道的也不过说是共产党！究竟是不知道这一组织是工农自己的政权。为要使一般群众了解苏维埃，中央在现在应该将湘赣鄂粤等苏维埃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政府的组织、工农兵以及劳苦群众的权利义务、工作时间与工资土地问题、士兵待遇等等一桩桩一件件琐琐碎碎的材料，特别命各该区域将日常的新闻通讯，由中央编为日报性一类通讯，每日发给各级党部各下级，将此类通讯传播到群众中去”。他还提出：“山西党经过不断的破坏，党的组织损失殆尽，中央为了山西本身力量薄弱……把山西划入顺直管辖范围。顺直对山西指导不力，在我被捕前已充分表现出来”。他说：“山西是一个省，而且现在在北方政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顺直省委实在是不应该忽视山西，应该认山西为顺直的重要产业支部，人力分配也应当给他有强有力的帮助，使山西微弱的工作，得到慈母的滋养，一天天壮大起来。”“我对顺直这些说话，已有给顺直的信”。“我的希望，中央应函告顺直，一面派人来山西帮助工作，一面积极的给与实际的指示，精神上物质上给山西以助力”。

这年春，阎子祥和河东党组织失掉联系，到太原寻找党组织，碰到他的老乡、汪铭在狱中介绍入党的看守樊有春。樊有春向汪铭汇报了阎子祥的情况。经过往返联系，汪铭介绍阎子

祥和太原市委接上了组织关系，继续为党工作。

五月，汪铭用铅笔在纸烟盒的背面写了一封信，要太原市委设法营救他。党组织通过汪铭的陕北老乡，到小庆医院寻了一点“巴豆”，送往狱中，要汪铭服用，打算在他因“病”到监外就医时，组织营救。但是，汪铭出来看病时坐的囚车，有警察严密看守，途中无法得手；敌人又发现了汪铭的“病”因，返回监狱后便给他戴上脚镣，严加看管，给营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后经樊有春的秘密联系，狱外又给送来钢锯，计划锯断脚镣翻墙越狱。不料脚镣快锯断时，看守易人，秘密泄漏，敌人又给他加戴手铐，转押至警备司令部。从此，越狱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了。

汪铭在监狱中，一面顽强地坚持斗争，一面还从生活上和政治上关心其他被捕的同志。监外同志们有时给他送少量的食品和衣物，他常巧妙地分给大家。他经常对难友说：“一个人的官司好打，众人的官司难打，敌人无论怎样对付你，你都不能供别人。没有生还的希望，就坚定死，决不能用同志的生命来保全自己。”鼓励大家保持革命气节。在狱中，他还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和文学才能，写了许多歌颂党、歌颂革命斗争史实的诗词，送给同志们。在转给高克亭的一首诗中有两句是：“足迹遍南北，艰难何所惧”，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气魄和豪情壮志。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汪铭悄悄拿出监狱为自己拍摄的“囚徒”照片，写下了几行“纪影”：

“我五十多天没有剃头洗脸，发是长了，胡子也长的长了，眉头上的横纹也波皱起来了，哪儿还象个二十八

（岁的）青年？！

愁容昏迷的面孔，无劲〔精〕打采的精神，有什么思想病束着心？沉着面孔在思忖什么？垂下眼皮有什么烦恼？呵！现社会是万恶、悲惨、残酷、不仁、吃人肉、喝人血的呵①！！

汪铭在国民党阎锡山的监狱中度过了两年又三个月。正当山西党组织经过多方努力对他的营救工作将要成功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共山西特委又遭到大破坏。特委书记阴凯脚、组织部长刘天章、特委军委代理书记孙斌和中共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任国桢等被敌人逮捕。孙斌被捕后叛徒革命，出卖组织，向敌人报告了汪铭的真实身份和在狱中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敌人遂决定立即杀害汪铭。十月三十一日早晨，敌人提汪铭到法庭宣判死刑。敌人问汪铭有什么话讲，汪铭面不改色，愤怒地说：和你们这些狗东西有什么好讲的！汪铭当即被敌兵推出押上囚车。当囚车走出城门时，汪铭对一个押解的卫兵说：“我不知道今天执行，早知道今天死，我就把皮袄送给我的战友了。我的皮袄里有银元快取出来，你们和我的战友分用吧！”汪铭被押到小东门外刑场，敌人命令他跪倒。他昂首挺胸，屹立在敌人面前，愤怒地说：“我没有罪，你们无权让我跪！”说完又连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行刑的刽子手被汪铭慷慨就义的大无畏精神威慑住了，端着枪的手颤动不止，连开三枪，汪铭才倒在血泊里。押送的

①这张照片，是汪铭把它藏在棉衣里面从监狱送出，交给他的母亲保存下来的。

卫兵看到汪铭至死不屈的英雄行为，回到监狱，对关押的其他政治犯伸出大姆指连声称赞：“好样的！好样的！”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作者曾访问了汪铭的亲属汪继尧、汪兴钢、武仙仙等和熟悉汪铭的杨和春、阎定础、张永、赵万钟、乔子甲等老同志；还参阅了阎子祥、李仰南、金长庚和中共太原市委党史办公室所写的回忆录和整理的有关材料。

杨善南

陈修良

杨善南，曾任全国学联大会主席、团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团中央秘书长、浙江团省委书记、全国济难会党组书记、中共广东东江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东江苏区壮烈牺牲。

杨善南，上海人，祖籍安徽，一九〇四年生，因幼患天花，满面麻子，人们称他“麻哥”。祖父系招商局煤站职员，月入银圆百元左右。但他父亲的职薪甚微，无法抚养众多的子女，就把他送给叔父杨醒余抚养。杨醒余亦系小职员，生活常靠杨善南的祖父接济。杨善南从小聪敏，深得祖母及叔父母的抚爱，在上海浦东中学毕业后，又升入北平大学中文系求学。但他并不按照长辈们的期望，以追求功名来光耀门楣，而是投身革命，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之路。所以祖母常常训斥他，说他“不务正业”。

一九二三年，他在北平读书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了北平“三一八”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他正被北平学生界公举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北方各省学生的特派员，赴沪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共青团中央的指引下，他担任了大会的主席，向全国各地学校发出了援助“五卅”惨案的号召，要求青年学生起来组织群众，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国内军阀。他还说，过去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太笼统了。大会还为上海、汉口、广州的死难同胞致哀悼，通电全世界、全国人民和广东革命政府，声讨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①。当广州沙面惨案的消息传来后，全体代表在大华旅社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通电全世界和全国人民，一致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政府武力收回沙面、九龙和各地的租界。大会选出杨善南为临时职员，处理会后的事宜。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又发动了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大沽口、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的学生运动。杨善南当时是共青团北方区委的宣传部长，直接地领导了这次革命行动。段祺瑞下令军警悍然开枪，惨杀请愿学生，造成“三一八”惨案后，又四处捕人。杨善南被捕入狱，他矢口不招任何口供。他的叔父曾去北平探望他，要求保释，但反动当局认为他是“政治犯”、“思想犯”，拒绝释放，准备判刑。到了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势如破竹，占领了南昌、武汉、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北洋军阀看到形势不妙，只好宣布大赦。杨善南出狱后，立即回到上海，继续战斗，同时与陈逸僧（即陈维真，当时在上海作团中央的交通员）结婚。后来，他又只身去武汉，任共青团中央秘书长。

团中央机关设在汉口青年会隔壁的一幢洋房内。他与书记任弼时、宣传部长李求实和几个秘书都住在这里，团中央的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五月上旬在汉口召开团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兼秘书长。他写的一篇题为《纪念

^①见1925年6月27日《热血日报》的报道。

第四次全国大会》的文章，刊登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上，是当时介绍大会情况的重要文献之一。

“八七”会议后，杨善南随团中央机关秘密迁回上海，并主持团中央机关的迁移工作。他在上海凤阳路觅得一个地方，作为团中央的秘密机关。党中央迁回上海后也住在这里。一九二八年的上半年，团中央机关又搬到泰兴路寿椿里。同年春，他被调到杭州，任团浙江省委书记。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有汤家康（工人）、周朴农（内山书店职员）、曹晓春（四川大竹人）、杜仲英、邬景森等人。一九二八年九月或十月间，党中央曾在浙江团省委机关内召开过一次中央的重要会议，讨论浙江问题。出席者有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罗登贤，卓兰芳等人^①，杨善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一九二九年初，杨善南代表团中央前往苏联出席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会后，他留在苏联，去少共国际办的马列学院学习。学习结束后回到上海，仍在团中央工作；一九三〇年，任全国济难会党组书记。他在济难会工作期间认为，济难会的工作，主要是援助被害被捕的同志，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党外的同情者伸出援助之手，至少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也可以对被害者给以声援，如反对非刑酷打，株连亲友和不许家属送东西，狱中生活极为困难应予以救济、允许犯人公开辩论、聘请律师上堂辩护、实行按法公开审判等等。他认为要做到这些事，就不能关起门来，使济难会工作同党的秘密组织一样不与群众接触。一九三一年一月四中全会后，他的这些正确的主张却被王明等人视为“右倾”、“反党”，给他带

^①据张纪恩回忆，当时张任党中央秘书长。

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把他从王明领导的中央排挤出去，由王明的亲信裴济华（后叛变）接替济难会党组书记。这时，他因在上海无适当事情可做，请求调到苏区去工作。后来，他的请求得到批准，遂离开上海，到广东任东江特委书记。

一九三二年秋，正是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时候。敌军张瑞贵师（下有五个团）多次向大南山苏区进犯。中共东江特委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军长古大存），约有五千人枪，密切配合中央红军，牵制了广东军阀一个军的兵力，即陈济棠指挥下的第三军。一九三二年八月至九月初，广东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配合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加紧对东江苏区进攻，对大南山采取军事包围，而且进行经济封锁。面对这种形势，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导下的中共广东省委，却指责东江特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八月二十九日，省委给特委的信中说：“东江党口头上虽然天天在喊着‘转变’，喊着坚决执行国际和中央的路线，而实际上对于国际和中央的路线执行是不坚定的。到如今来讲，东江党还没有从机会主义圈套里跳出来。”^①

同时，省委的信还着重对东江特委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当时积极侵占满洲，并不是发动一场“反苏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这与共产国际与中央的看法不一致，更是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省委甚至认为东江特委“对拥护苏联工作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因此可以估计东江党几个月来在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斗任务除了机会主义的

^①1932年8月29日广东省委给东江特委的信。

消沉之外，没有任何成绩可言。”^①

一九三二年十月，东江苏维埃地区正处于十分艰苦的境地，敌人乘东江军民粮尽弹绝之际，四处大肆焚烧山林，见人就捕。东江特委并没有在这种困难面前后退，还是设法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省委的决定和应付局面。十月九日晚，东江特委在南山一个最小的村庄田墩准备召开这个会议。次日早晨七时半，国民党军队突然偷袭这个地区。因为没有准备，东江特委机关遭到极大的损失。杨善南与东江特委另外几个负责人如白希、张先等均被捕，立即就地枪决，壮烈地牺牲了，东江苏区不久也就被消灭了。这是一次血的教训。杨善南等烈士的鲜血洒流在东江的山地上，他的英名永为东江人民所纪念。

^①1932年8月29日广东省委给东江特委的信。

徐全直

胡云秋 陈乃宣

徐全直，又名虔知，宛明，湖北省沔阳县脉望嘴胡家台子（今属汉川县）人，一九〇三年二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其父徐世安，自幼在乡间种田，后因生活所迫，于一九〇六年到武昌，在湖北陆军测绘局当兵。一九〇九年，徐世安把徐全直母女三人接到武昌，住在过街楼一间矮小的平房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徐全直有姊妹四人，兄弟一人，她排行第二，家里人都亲切地叫她“二妹”。由于家境贫困，她来武昌后，无钱上学。徐世安和他的几个同事组织了一个家庭教育社，收容无钱上学的子女读书识字。徐全直是家庭教育社里最小的孩子。一九一〇年，徐全直的父亲省吃俭用攒了一点学费，把她和她姐姐徐全德送到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以下称女师附小）读书。

徐世安是共进会成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一一年武昌首义，他参加了攻打军械库的战斗。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的统治大权后，阴谋复辟帝制。徐世安极为气愤，便邀集了一些革命党人，进行秘密的反袁活动。一九一五年，徐世安被扣上“乱党”的罪名，关进了军法处监狱。

徐世安的下狱，对徐全直一家，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徐全直的母亲，只得典卖衣物，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为了托人

营救丈夫出狱，她把乡间的二亩多地也卖掉了。可是一年时间过去了，钱也花尽了，徐世安不仅没有出狱，反被判刑八年。一九一六年，徐全直的母亲不得不抛下在女师上学的大女儿，带着三女一子，回到汉川县西江亭傅家台子娘家，找条活路。

徐全直的外祖母家是个破落地主，外祖父和舅父早逝，由舅母主持家务。舅母对徐全直母女一家的到来十分不快，对待她们既冷淡又苛刻。一九一八年，徐全直的二表姐病死了。二表姐的未婚夫见徐全直聪明能干，相貌俊秀，企图仗仗其地主家庭的权势逼婚。徐全直坚决不从，只身逃到武昌，找到了在女师学习的姐姐徐全德。在姐姐的帮助下，她克服了一切困难，努力补习功课，于一九一九年春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称女师）。

女师虽然解决学生的伙食问题，可是仍需交纳学杂费。徐全直的书杂费没有着落，只得利用课余时间帮人洗衣、缝被、织毛线等，挣些钱来敷用。实在买不起的书，她就借别人的抄着读。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锻炼了她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坚强毅力。女师是湖北有名的封建堡垒，它以“三从四德”为训，培养学生做一个封建的贤妻良母；对学生视同犯人，管理极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武汉地区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徐全直等几个学生，听说北京女学生为了反封建，剪了短发。她也大着胆子，把头发剪短了。校长王式玉知道后，大发雷霆，勒令剪短发的学生一律把发接上，否则停考开除。

可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新文化潮流激荡着武汉三镇。王式玉为装点门面，于一九二一年初聘请了陈潭秋、刘子通和黄负生等几位进步教员来校兼课。陈潭秋、刘子通是徐

全直所在班的英语和国文教员。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新思想，宣讲妇女解放等，对她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

徐全直、夏之栩等学生在陈潭秋，刘子通的启迪下，进步很快。一九二二年，徐全直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暑假，由陈潭秋发起，徐全直、夏之栩、袁溥之等邀集十多位有上进心的同学，办起了妇女读书会。她们通过读书会到利群书社借了许多新书来读，同时，又聘请董必武（一九二二年来女师兼课）、陈潭秋、黄负生和李汉俊等讲解《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辅导她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她们抨击时政，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活动，遭到以王式玉为首的女师顽固势力的非难。学校当局诬蔑她们是“害群之马”，扬言要开除徐全直、夏之栩、袁溥之等人的学籍。由于中共武汉区委陈潭秋、董必武的领导和支持，她们顶住了这股压力。

学校当局看学生不吃他们那一套，就转而向进步教员开刀。一九二二年二月新学期一开始，校方无故解聘了刘子通老师。进步学生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气愤，一致公推徐全直、夏之栩、陈媿兰、庄有义等同学为代表，向学校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撤销解聘的决定，把刘先生请回来，否则就不上课。王式玉采取分化手段，提出愿意罢课者签名。由于事先没有做好联络工作，准备不充分，加之学校暗中破坏，结果只有徐全直等十二人签了名，罢课没有成功。学校勒令签名罢课的学生一律按“自动转学”论处。

徐全直正不知下一步如何办好的时候，中共武汉区委陈潭秋（因工作需要调离女师），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转告她们说：斗争“要做许多艰苦工作，要有宣传，有联络，要能争取大多数同学由同情而自愿参加行动，才能取得胜

利，失败了也要取得教训。”^①后来又告诉她们：“斗争要有策略，有计划，行动还要有步骤。”^②

徐全直等得到党组织的帮助，心里顿时亮堂起来。她们和学校的几个团员一道商量了对策，把积极分子分派到各个班去，向同学们揭露所谓“自动转学”的真象，说明这是校方对签名者的迫害，争取了多数同学的同情和支持。不久，有更多的同学参加了她们的斗争行列。

可是，校长王式玉不仅不答应收回成命，还决定挂牌开除徐全直、夏之栩等五人的学籍。徐全直、夏之栩等同学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不畏强暴，毅然再次组织罢课。这一次，她们把广大同学发动了起来，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全校做朝会时，把王式玉堵在办公室里面，进行说理斗争。徐全直等一边质问：“为什么要开除我们？”一边愤怒地揭露王式玉排除异己，任用私人，把持学校，迫害学生的恶劣行径。广大同学齐声高呼：“她们没有错，不能开除！”弄得王式玉狼狈不堪，只好托词说解聘教师和开除学生是“政府命令”，她无权收回。徐全直和夏之栩等当即带领一部分同学前往教育厅，提出撤换校长王式玉、收回解聘教师和开除学生的决定等条件，要求教育厅长出来当面答复。教育厅长害怕学生，迟迟不敢出来。愤怒的学生，在徐全直的带领下，守住教育厅大门，表示见不到厅长，不答应我们的要求，誓不罢休。

为了声援女师学生的斗争，中共武汉区委通过学生联合会，发动全市中等以上学校举行同盟罢课；又通过在报社工作

^{①②}夏之栩：《五四的浪花》，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17页。

的同志发表了学生罢课真象的消息，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最后，经社会上有名望的进步人士李汉俊等出面调停，同教育厅达成以下协议：女师校长王式玉辞职，徐全直、夏之栩等五人也离开女师，但保留学籍，按时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斗争取得了胜利。

女师学潮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武汉教育界中的封建顽固势力，有力地推动了武汉地区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发展。

徐全直离开女师后，在中共武汉区委的领导与关怀下，与其他几位同学一起，住在夏之栩家里，利用妇女读书会的名义办起了补习班，继续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董必武、陈潭秋等不仅是她们的文化补习老师，也是她们学习革命理论的辅导员，同时还领导她们参加社会活动，做工运和妇运工作。

一九二三年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中共武汉区委的领导下，徐全直全力投入了支援罢工的斗争。在大罢工的紧张日子里，她日夜奔走武汉三镇，为湖北各工团传递消息，还联络工人和学生，组织慰问队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为了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她响应募捐号召，把自己的衣物和从日常生活中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捐了出来。二月四日那天，她带领一支女工队伍，参加了在刘家庙召开的武汉人民声援京汉铁路罢工慰问大会，会后又参加了游行。她们活跃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间，齐声高呼“坚决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打倒军阀！”租界的洋人们看到这支雄赳赳的妇女队伍，也颇为震惊。二月七日，军阀肖耀南对江岸工人实行血腥大屠杀之前，徐全直、夏之栩正在江岸工人俱乐部附近开展宣传工作。当大批军警包围工人俱乐部时，徐全直毫不畏惧地与工人纠察队一起，为保卫俱乐部同反动军警进行拚死的

斗争。下午五点多钟，陈潭秋为减少损失，说服她们坐一只划子回到武昌^①。二月二十日，徐全直怀着悲愤的心情，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参加了施洋烈士的追悼会，表示了她同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经过女师学潮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的严峻考验，一九二三年，徐全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②。

“二七”惨案后，罢工领导人受到军阀肖耀南的通缉。党组织决定陈潭秋和徐全直等转移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作。

徐全直在安源的公开职业，是路矿俱乐部教育股所属职工子弟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员，实际是做工运青运工作。白天她在子弟学校教课，入夜又出现在工人夜校的课堂上，和青年工人一起谈心，介绍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英勇斗争事迹，揭露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罪行，激励工人们团结起来坚持斗争。

一九二四年五月，徐全直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团地委委员。由于徐全直等人的努力，安源青年团的工作和职工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

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革命形势的大发展，迫切需要干部。同年秋，徐全直、陈潭秋等奉命调回武汉，陈潭秋任中共武昌地方委员会委员长（即地委书记），徐全直从事妇运和工运工作。徐全直和陈潭秋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二五年

①夏之栩：《革命的引路人》，载《回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6月版。

②《中华好儿女，热血写春秋》，载1979年5月2日《长江日报》。

春，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

在武汉党组织的领导下，徐全直参加创建武汉妇女协会的筹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六月，武汉妇女协会成立，徐全直担任了《武汉妇女》旬刊的编辑和负责对外联络。七月底，徐全直、宋炜等又根据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案，在武昌成立了湖北省妇女协会。

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名目的妇女团体，干扰着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为了揭露那些所谓妇女组织的伪善面貌，阐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方向，徐全直用宛明的笔名，在《武汉妇女》第六期上发表了《妇女运动的派别和正确方针》。她指出：所谓“女子青年会、矫风会等”，不过是“救济事业的仁人”，其中多是“献媚于豪富，以伪善为饵，以贫民为食物的”；所谓“女权运动”，也不过是想“从男权的专制下解放妇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妇女悲惨痛苦”；所谓“母权运动”，这“实在和前时代贤母良妻主义相关联，其所异者即不承认男权专制罢了。”接着她明确地指出，真正的妇女运动是“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革命运动”。它“以拥护劳动妇女的权利为目的”，“以男女共同的利害、以全人类解放为终结”。文章最后指出，只有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才是妇女运动的方向。

徐全直以教书为掩护，经常深入女工比较多的第一纱厂、南洋烟厂和凯字营贫民棚户区，办识字班，同女工交朋友，帮助组织工会，领导女工斗争。她怀孕后，妊娠反应很厉害，经常头昏，身体消瘦，但仍坚持白天到附小上课，晚上到工人棚户区开展工作，以后终因劳累过度，导致早产。产后她顾不上应有的休息和恢复，又投身于迎接北伐军的活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直逼武昌城下，把吴佩孚一万余名官兵围困在武昌城内。陈潭秋和徐全直在城内领导群众坚持斗争，策应北伐军攻城。

被围困的敌人，为了负隅顽抗，大肆抢劫粮食和财物，搜捕和杀害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徐全直组织群众贮粮藏粮，寻找代食品，发动群众扰乱敌人，策动敌军投诚。十多天后，城里存的食物差不多吃光了，人们把中药店的茯苓、白术、当归、熟地、红枣、甘草等，当做代食品分着吃。后来，陈潭秋、徐全直又领导和组织群众，下紫阳湖挖藕、捕鱼捉虾，甚至把芭蕉叶心、鸡冠花和菊花叶子找来充饥。由于党的组织和领导，围城近四十天，大多数群众渡过了粮荒，并同敌人的抢劫和迫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十月十日，北伐军在城内党组织的策应下，一举攻克武昌城。一万多敌人，包括督军陈嘉模、守城司令刘玉春，全部当了俘虏。

一九二七年元月，在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徐全直被选为省党部监察委员。她除主管学校工作外，还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一月三日，英帝国主义调动大批水兵在汉口登岸，向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宣传队进行挑衅，杀死我海员一人，伤数十人，制造了“一三”惨案。消息传开，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武汉人民，迅速掀起了驱逐英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的斗争。英帝国主义停在长江江面的三艘军舰，竟升火向我示威。徐全直愤怒已极。她邀集几个青年，划了一只小船，勇敢地驶近军舰，将武汉人民的抗议传单扔到军舰甲板上，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和勇气。

十五日，武汉妇女协会召开了纪念国际无产阶级著名活动家卢森堡逝世八周年大会。徐全直主持大会并致词说：“今天为卢女士死难日期，女士为世界革命伟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今日开会纪念，一半是景仰烈士，一半是鞭策自己要继续女士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①

二月六日，徐全直被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七次常委会推选为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和妇女职业介绍委员会委员。十五日，她在湖北省党部和汉口市党部联合举行的欢迎宋庆龄等女界领袖会上致词说：“女工运动应注意下层妇女，谋妇女之真正解放。”^②表示了她对当时开展妇女运动的真知灼见。三月八日，武汉妇女迎来了北伐胜利后的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武汉三镇的妇女群众十多万人，举行了庆祝集会和示威游行。游行的人群沿途演讲，散发传单四十余万份，充分显示了妇女的力量。在武昌各界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上，徐全直又发表演说，“历数旧礼教及封建思想习惯之罪恶，与妇女应解放，及参加工作之必要。”^③同日，湖北省妇女协会第一次全省妇女代表大会在武昌隆重开幕，徐全直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代表省妇协交际部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会上，她当选为省妇协执行委员，兼交际部副主任。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不久，两湖发生夏斗寅、许克祥叛变事件。徐全直怀着对反动派的愤恨，和对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不满，奔走在武汉三镇，散发传单，参加集会，拟写宣言，揭露反动势力的罪恶，号召各界妇

^① 1927年1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③} 1927年3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

女奋起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徐全直奉命调往江西南昌，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一说是省委秘书）。她到达南昌时，正是“八一”起义前夕，江西党的各级组织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加紧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以陈潭秋为首的中共江西省的新省委，积极组织力量，配合“八一”起义。起义军撤离南昌后，他们仍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①。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徐全直在省委领导下，经常化装外出传递省委指示，了解基层情况，开展群众工作。党的“八七”会议之后，她和另一位省委机关工作人员黄慕兰一道，采取了种种巧妙的办法，把中央关于“八七”会议的精神和省委的指示，迅速传达到赣东北特委、赣西南特委、井冈山前委以及各县县委去。

一九二八年春，徐全直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工作。是年冬，中央调陈潭秋为中央巡视员，出巡顺直省。为掩护陈潭秋的工作，徐全直带着孩子同往顺直省委担任秘书工作。一九二九年秋，他们又调回上海，徐全直在中共中央机关作交通工作。她经常化装出没在党组织设立的各个秘密联络点，传递党的文件和指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她被调往中共满洲省委任秘书。

一九三一年七、八月，徐全直调回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交通员。这时正是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党的其他联络点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徐全直回沪之后，周恩来把她找去交待说，组织决定派你和戚元德一起，到

^①黄慕兰：《南昌起义前后的江西省委书记》，载《回忆陈潭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5页。

一位被捕同志的原住处，取回中央组织部的一份机密文件。周恩来告诉她，这份文件放在一张办公桌的夹缝屉子里，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好多同志的生命都要受到威胁，希望你和元德同志一起，完成这个任务。徐全直找到戚元德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她们都表示，一定要完成党组织交给的这一艰巨任务^①。当时，那个住处已被敌人特务盯住，而且在那间房子里还住了两个特务。她俩商定只好智取。经过调查，她们打听到住在里面的那两个特务每天都要出门去吃早点，便确定由戚元德化装成阔太太，趁特务外出吃早点的间隙，巧妙地取回文件。第二天早晨，戚元德化装后坐上人力车出发了，徐全直赶到那所房子的附近去策应。就这样，戚元德闯进那所房子，假装要租空房子，巧妙地躲过女佣人，取回了文件，胜利地完成了任务^②。

一九三三年初，党中央决定调陈潭秋和徐全直到中央苏区工作。听到这个消息，他俩兴奋极了。可是，徐全直已临近产期，行动不便，不能马上出发。不久，她便在医院里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这时，陈潭秋行期已近。他让徐全直暂留上海，匆匆踏上赴了中央苏区的征途。

徐全直出院后，带着孩子潜居在同乡潘怡如家中，打算把婴儿暂时寄养在潘处，等她三妹来接回湖北农村抚养，她自己则准备尽快奔赴中央苏区。六月二十日上午，徐全直到厦门路五十六号党的秘密联络点，联系去中央苏区有关事项。不期该联络点已被敌人破坏。当她进到里面发现情况有异，马上转身

①②戚元德：《恩来同志是怎样教育我的》，载《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外出时，隐藏在四周的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把她蒙头遮眼捆绑起来押走了。在审讯时她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和保护组织，声称自己叫黄世英，并且编了一套假经历，瞒过了敌人。不久，她被秘密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在狱中，徐全直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敌人的法庭上，她慷慨激昂地历数国民党当局祸国殃民，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揭露监狱当局任意虐待犯人，克扣犯人伙食的卑鄙行径。她利用监狱放风的机会联络同志，鼓励难友坚持斗争。她常对难友说：“不能做对不起党的事情，到了这里就要准备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党。”^①为了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她秘密串联狱中党员，团结其他难友，向狱方提出了改善政治犯待遇的条件，并举行了绝食斗争，迫使狱方不得不同意他们提出的条件。

徐全直被判刑后，她的老母十分焦急，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后来通过徐全直父亲的好友范某，找到了当时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出面活动。国民党反动当局答复说，必须先送反省院反省，然后看表现保释。徐全直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当即向范某表示：宁为革命死，绝不去反省院。

反动当局看到软硬兼施对徐全直都不起作用，竟以“拒绝坦白自新，侮谩公职人员，妨碍他人自新，不可理喻”的罪名，改判徐全直死刑^②。一九三四年二月的一天深夜，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徐全直，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妇女解放事业，在南京雨花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

①李一纯：《徐全直同志革命事迹的片断》（访问记录）。

②《战士的最后选择》，载《中华女英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三十一岁。

徐全直牺牲后，党的同情者将她的遗体葬于南京水西门外，并立有墓碑，上书：“古复（沔阳）徐全直女士之墓”。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已经注明者外，还查阅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湖北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湖北省博物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武汉文物管理处、天津市博物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武汉中华路中学等单位收藏的有关资料和文献；访问了徐彬如、王鹤寿、赵毅敏、魏文伯、夏之栩、李文宜、张金保、包惠僧、刘九峰、黄玠然、黄慕兰、刘子谷、袁溥之等老同志；参阅了徐全直的亲属徐全道、徐全俭写的回忆材料。

张 汉 民

周益三 张守宪 李正义

张汉民长期从事党的兵运工作，历任杨虎城部炮兵营中共军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陕甘特派员，杨虎城部团长、旅长等职，为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三五年在陕南被错杀遇难。

(一)

张汉民，一九〇三年六月一日出生于山西省稷山县高渠村一个农民家庭。八、九岁时开始读私塾，一九二〇年春考入新绛县中学，一九二四年春毕业后，为寻求救国道路，西渡黄河，到陕北定边县安边堡杨虎城将军创办的教导队（又称学兵队）学习军事。一九二五年春，杨虎城部移驻陕西耀县，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张汉民任第一队队副。不久，他随杨部在渭北参加讨伐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及麻振武部的战斗。战后，部队进驻三原。同年五月，张汉民随国民三军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西人民驱逐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的斗争。七月，吴新田被赶往汉中，国民三军开入西安，孙岳任陕西军务督办，杨虎城被任命为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九月，杨部成立炮兵营，张汉民因在追击吴新田部的战斗中立有战功，升任炮

兵营副营长。一九二五年冬，他在三原加入中国共产党^①。

一九二六年四月，刘镇华率十万镇嵩军重犯陕西，企图占领西安、三原和咸阳等重要城市。杨虎城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推动下，率部进入西安，与国民二军李虎臣部共同守卫西安，留张汉民及其领导的炮兵营守备三原。张汉民营和陕军田玉洁部一起，多次打退镇嵩军对三原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西安的守城斗争。

西安解围之后，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西安地委决定由魏野畴负责举办军事政治队，任命张汉民为队长，曹力如为秘书。军政队在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的同时，经常举办报告会、讲演会，组织大家选学马列著作，开展专题讨论，使学员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得到提高。张汉民还十分重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亲自介绍吴岱峰、李作梁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魏野畴、张汉民和曹力如等的努力，军政队在很短时间内为党培养了近百名干部^②。

一九二七年三月，军政队结业后，张汉民受党的派遣仍回三原杨虎城部炮兵营，同时参与新成立的中共三原地委的兵运领导工作^③。这期间，他除协助中共三原地委书记张秉仁开展农民运动外，在兵运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介绍了刘威诚等二十名官兵入党，建立了炮兵营党的军支，他任军支书记。

一九二七年夏、秋，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

①中共中央组织部1945年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第2分册（下）——内战时期，后改为标准第四册第79页。

②吴岱峰、陈云樵、梁俊琪等人的回忆。

③彭淑贞、刘威诚等人的回忆。

命，在河南、陕西进行“清党”。驻守三原的田玉洁部也猖狂反共，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被解散，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杀害。张汉民和中共三原县委（由地委改组）书记张秉仁一起积极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决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在共产党员许权中（时任陕军旅长）的帮助下，营救出被捕的县农民协会负责人乔国桢等，给武字区农民协会补充了一批武器，惩办了武字区和泾阳县的劣绅洛彦福、王蓓僧，还同县委的负责同志一起动员几十名中学生参加许权中率领的部队。当时，县委没有经费来源，干部食宿和办公费用均无法解决。张汉民动员共产党员黄子文将家中保存的烟土、银元和枪枝交给党组织，解决了县委存在的经济困难。

一九二七年冬，田玉洁部的政治处长兼省立第三职业学校校长尹聘三，利用同乡关系，投靠新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在三原疯狂追捕共产党人，镇压进步师生。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县委决定严惩尹聘三，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张汉民。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张汉民派党员魏子毅、雷展如等，乘尹聘三由三原去西安的机会，在泾阳永乐店附近将其处死，为人民除了一害。事后，三原的土豪劣绅联名向宋哲元和杨虎城部十路军在三原的留守司令李子高控告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杀尹聘三的“首犯”。三月，宋哲元勒令李子高将张汉民逮捕押送到西安，图谋杀害。张汉民被捕后，坚不吐实。后经党组织和杨虎城的参议蒙浚僧、韦协度及十路军留陕部队团长赵寿山等人的营救，张汉民才免于死难^①。获释后，被李子高撤职遣送回山西稷山原籍。

^①雷展如、刘威诚等人的回忆。

张汉民回到家乡稷山后，以小学教员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春，经刘威诚、米暂沉等友人荐举，他到驻守在山东临沂的杨虎城部担任杨虎城的随从副官，不久调任九团一连连长。是年夏，杨部移防河南省南阳地区，张汉民任该部新办的教导大队第四中队队长。他在杨部秘密发展党员，并帮助地方党组织培训军事干部。

一九三〇年秋，杨虎城率部由中原回陕，先后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张汉民被任命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一九三一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升任团长。他和中共陕西省委军委接通了组织关系，利用部队扩编的机会，任用共产党员阎揆要、王超北、崔启敬、白景琦、魏书琳、史唯然、吴伯畅、岳仲人、孟浩等担任军官。秋末，张汉民派阎揆要、马子敬去陕甘边三家原，给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送子弹和情报。

一九三二年警卫团先后驻防西安、彬县、旬邑等地，张汉民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①，化名田慎颐。他接受中央军委分配的任务，搜集国民党中央军和陕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改为红二十六军）的情报，以及陕西地方军阀内部矛盾的情报；并且和陕甘游击队在西安竹笆市同聚军衣庄、骡马市街擀毡作坊和彬县水帘洞附近建立了三处交通联络站，为运送上级党组织和警卫团给陕甘游击队的武器、医药器材、望远镜和军用地图等物资，安排红军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医疗，护送上海中央局、陕西省委与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当时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刘志

^①访问王超北记录（1979年5月3日）。

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在张汉民的掩护下，到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①。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警卫团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的职田镇“围剿”谢子长领导的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张汉民当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地下党员李明轩，向游击队报告了这一情况。谢子长根据张汉民的报告，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附近的阳坡头待机歼敌。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边时，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汉民的指示调转马头，边跑边喊：“红军来包围啦！快跑！”很多士兵扔下武器争先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毙、俘警卫团和民团五百余人，缴获武器四百余件^②。战后，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秘密达成协议：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枪枝给游击队丢下。

四月，国民党中央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窜到西安，在民乐园发表“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演说，遭到爱国学生的强烈反对，并砸烂烧毁了戴季陶乘坐的汽车。反动当局下令对学生进行威吓和镇压。张汉民利用警卫团团长的身分，率领工作人员暗中保护学生，还掩护了中共陕西省委的负责人和不少地下党员。

(二)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地区向西转移，先头部队于十月下旬进入陕西商洛地区的秦岭山中。蒋介石急电

^①访问王超北记录（1979年5月3日）。

^②《西北红军战史》（草稿），1965年编印。

杨虎城集中兵力阻击，妄图把红四方面军围歼在秦岭山区。杨虎城遂调三十八军到陕南秦岭山区布防。十一月，张汉民的警卫团也奉命集结于秦岭北麓的长安县引镇太乙宫待命。这时，红四方面军已穿越秦岭西去汉中。杨虎城便命令张汉民率部“尾随”红军入秦岭。

杨虎城的警卫团自成立以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日益增多，革命力量不断增强。自红四方面军入陕以来，张汉民就想让这支实际为党所控制的武装力量与主力红军汇合，开辟西北的革命局面。因此，当他接到杨虎城的命令后，当晚即召集全团骨干开会，指出去陕南的意义及光明前途，要求各营连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教育^①。部队从引镇出发，途经户县、周至县时，分别将共产党员白景琦、雷展如等从监狱里营救出来，并委以连长、排长职务。到眉县后，他又根据省委指示，派雷展如先去陕南城固上元观，与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②。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张汉民率部“尾随”红军到达汉中，与中共陕南特委及省委巡视员取得联系。党组织指示警卫团在武器上支援当地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和红四方面军联系^③。张汉民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于一九三三年春，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几担药品，并提出警卫团准备搞兵变，公开打出红旗同红军汇合的计划^④。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认为，警卫团暂时留在杨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

①②③④阎揆要、雷展如等：《追念张汉民同志》，载《西安文史资料》第1辑第5—8页。

为有利，如情况发生特大变化，可以公开打起红旗。根据这一意见，张汉民率警卫团先后驻防勉县、南郑、宁强一带靠近川北的有利地形，通过地下交通线帮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供应情报。这期间，他经常派驮骡去镇巴的核桃树和通江的两河口，向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运送物资，对巩固初建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起了一定作用。

从鄂豫皖尾随红四方面军到陕南后驻防汉中地区的蒋介石嫡系第一师胡宗南部，对警卫团的革命活动极为仇恨，常借故挑衅。一九三三年春节前后，蒋介石给胡部空运的军饷、物资因空投不准，落在警卫团防区汉中城北教场内。胡部派兵抢夺，开枪打死、打伤警卫团士兵多人。张汉民主持隆重追悼会，向胡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还命令部下对来往汉中的胡部人员，凡经过警卫团防区的，一律“人干掉，物没收”。胡宗南恼羞成怒，多次向蒋介石密告警卫团私通共产党，敌视中央军，要求把警卫团调离陕南。杨虎城也连电向蒋介石报告第一师的胡作非为，表示了对第一师驻防陕南的不满。蒋介石为稳住地方势力，只得将第一师调往陇南，使胡宗南的阴谋没有得逞。

对活动于陕南的红军游击队，张汉民曾多方给予支援。一九三三年初，他指派警卫团给川陕游击队送去了大批枪枝弹药。二月下旬，川陕游击队在西乡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领导人民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四月，反动派内外勾结，在西乡马儿岩将红二十九军和陕南特委的负责人陈潜伦、李良、孟芳洲等杀害。驻防城固县的张汉民获知这一消息，带领几名士兵处决了防区内的一个反动区长，为死难烈士祭灵。不久，新成立的中共陕南特委，在洋县西区重新组建

了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张汉民先后为其提供了六十多支枪和千余发子弹。是年秋冬，这支队伍改编为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在同数倍于己的敌军作战中弹尽粮绝，被打散。突围出来的同志转移到张汉民警卫团的防区勉县黄沙一带，同红二十九军第十游击大队的二十余人汇合。嗣后，特委指示两支部队合并，重新成立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黄沙地区整训。张汉民又为三大队补充了三十多支枪，一百多发子弹，还派干部帮助进行军事训练。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包围，死伤严重，还有二十余人被俘。张汉民获讯，立即同陕南特委联系，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进行援救。他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一面又派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以奉命提取关押的被俘人员为名，将二十多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勉县诸葛庙。接着，他以“民团配合不力”为由，将王化治逮捕处决。反动民团随即瓦解，使被围困的游击队转危为安。

事后，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军部接二连三电令张汉民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押解到汉中军部交军法处惩处。张汉民同警卫团的地下党负责人商量，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衣服就地处决，并照相上报三十八军军部说：“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在勉县已全部处决。”^①他还编造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假战报，通过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杨虎

^①许建中：《一道“嘉奖令”》，载1981年7月8日《汉中日报》第2版。

城急电报告蒋介石^①。蒋介石信以为真，立即传令嘉奖。于是，国民党控制的各大报纸都刊载了张汉民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②。

(三)

一九三三年秋，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汪锋，住在勉县张汉民警卫团团部，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次年初，中共上海中央局新派的陕南特委书记刘顺元到任后，也住在警卫团团部。刘顺元和改任特委军委书记的汪锋等领导同志，在张汉民的掩护下，开办干部训练班，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一九三四年冬，中共西安市委军委书记崔景岳因西安白色恐怖严重，无法立足，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张汉民的团部，负责地下党的工作。陕西其他一些地方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集中到警卫团隐蔽。同志们称赞张汉民领导的警卫团是“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张汉民在陕南期间，很重视军队的政治和文化教育。他批准购买大量进步书刊，成立了图书馆；每个士兵都发有学习文化的《千字课本》；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国际歌》、《士兵歌》和《士兵哗变歌》；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红军之友社”，秘密发展社员八、九十人。在警卫团内，张汉民反对军阀作风，提倡官兵平等，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对犯了

^①1934年1月19日《西北文化日报》。

^②1934年2月13日《西京日报》。

错误的官兵坚持耐心说服教育，既不苟求，也不偏袒；发现有人赌钱或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时，则不分官兵，一律进行必要的惩罚。他非常注意改善士兵伙食，和士兵一同吃饭，令各连队成立士兵自己选出的伙食委员会管理伙食。在他的耐心教育下，警卫团的军官没有“喝兵血”、克扣士兵粮饷的问题，也从未发生过士兵“开小差”的现象，曾受到杨虎城将军的赞扬。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革命的军队，张汉民非常重视加强党的领导。他常向陕南特委和省委巡视员请示汇报工作，对党的决议和指示认真贯彻执行。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他和在三十八军作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武志平、李金元、刘威诚等经常保持联系。根据党的指示，他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的营长分别由共产党员阎揆要、崔启敬、李明轩担任；副团长魏书琳也是共产党员。截止一九三四年，全团二千多官兵中已有党员二百名左右，成立了党的委员会（后改为警卫团士兵运动委员会）；十六个连队中有十个连成立了党支部，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都由党员担任。张汉民注意吸收地方上的党员到警卫团工作，先后在宁强、勉县以招考文书为名，吸收了地方上的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分配到各个连队^①。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他曾千方百计地将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老党员，聘请到警卫团任职。例如，他请省委委员、前三原地委书记张秉仁到团部办通讯小报；请曾任省农民协会军事部部长、前山东省委书记张含辉到警卫团担任特种联络任务；请曾任察哈尔民众抗日

^①阎揆要、雷展如等：《追念张汉民同志》。

同盟军第七军参谋长的周益三到警卫团担任营副；请曾任陕南特委军委书记的张明远，到警卫团负责地下党的工作，等等^①。张汉民那时信心很大，各项工作铺得很开，抓得很紧，他曾对周益三说：我们要扩大部队，加强对官兵的教育，以便找机会把部队拉向陕甘边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一起，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②。

（四）

张汉民等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内部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处境是十分艰险的，移驻陇南的蒋介石嫡系第一师胡宗南部，时刻在监视着他们；十七路军内的反动分子与保守势力，则常常以各种借口，对他们进行打击和排挤，甚至派人去警卫团搜查共产党。张汉民除教育党员注意斗争策略、保持高度警惕外，准备寻找机会，尽快把警卫团拉出汉中地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杨虎城巡视陕南，来到警卫团的防地。张汉民向杨虎城陈述了警卫团备受歧视与打击的境遇，再三请求调回关中驻防。杨虎城答应了张汉民的请求，要张汉民率警卫团护卫他完成陕南巡视后，移防关中。

一九三五年一月，张汉民率警卫团随杨虎城由城固东行，先后巡视了洋县、宁陕、镇安、山阳，于农历除夕之夜到达商县黑龙口。第二天，农历大年初一，杨虎城继续出巡，张汉民率部

① 阎揆要、雷展如等：《追念张汉民同志》。

② 周益三的回忆。

护卫，行至牧护关，与一支红军部队的宣传队相遇。杨虎城一边令警卫团集结待命，一边向驻蓝田的西安绥靖公署指挥所电询究竟。指挥所复电称：由皖西西进的红军第二十五军主力，已经到达商县的杨家斜、麻池河一带，南京严令堵截，请着警卫团就近经铁索桥向该地探“剿”，并请杨主任速回绥署。杨虎城向张汉民下达了“进剿令”，当天即离开牧护关，返回西安。

杨虎城走后，张汉民遵命率警卫团出发，到达郭家村宿营。郭家村与杨家斜只一河之隔。张汉民即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马宗仁到杨家斜和红二十五军联络，商定互不侵犯，并订立了联络信号^①。红二十五军当时没有电台，无法同中央联系，医药器材也极其缺乏，希望地下党提供这些急需物资。张汉民听了张明远、马宗仁的汇报，当即派人给红二十五军送去陕南和川北的军用地图；并派党员去上海、西安等地购买电台、医药和其他通讯器材^②。一周之后，红二十五军经黑山、漫川关，南去湖北郧县一带；张汉民率警卫团“尾随”其后，到鄂陕交界的万福地区；双方恪守信约，从未交战。不久，张汉民奉西安绥署令，回兵镇安休整。

二月下旬，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升任旅长，辖七、八、九三个团，曹伯珍、李家骥、阎揆要分任团长。三月二十三日，张汉民收到西安绥靖公署急电，略称：红二十五

^①阎揆要、雷展如等：《追念张汉民同志》。

^②据阎揆要、雷展如、孟浩、周益三、王超北等人回忆，这些器材、药品购回时，张汉民已经遇难。地下党曾两次向红二十五军转送，均因部队在紧张转战，飘忽不定，未能送到。同年九月下旬，才用卡车送到陕北，交给红二十五军。

军由郿西神速西进，在洋县、佛坪地区消灭了警备第一旅，现又回头经宁陕向东运动，命你旅即予阻击。警三旅的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如果两军遭遇，党团员要“枪朝天，打空弹”。这一决定分头传达之后，张汉民一面派两名党员去红二十五军，通报西安绥靖公署的堵击部署^①；一面率七、九两团（八团时驻西安）由镇安东进，“尾随”红二十五军。部队出发后，担任前卫的第九团团长阎揆要，随时将沿途所得情报，向张汉民报告。四月九日下午，旅部快到柞水县九间房时，张汉民收到阎揆要的报告：红军已经隐蔽，沟内似有埋伏，建议全旅在九间房西南十余里的村庄宿营，以免误会。张汉民认为已与红二十五军有约在先，且相随亦非一日，不会出现意外，遂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当先头部队进至九间房，正布置警戒、准备宿营时，突然枪声大作，警三旅（除第八团外）被红二十五军击溃，张汉民等被俘。一个多月后，“在处理九间房战斗的俘虏时，错将我党地下党员张汉民（警三旅旅长）等同志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②。

事后，党中央经过调查，于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时，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③。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贾拓夫 1933 年 11 月 25 日给党中央写的《陕西工作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 中共陕南特委 1933 年 12 月 29 日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原件

① 阎揆要、雷展如等：《追念张汉民同志》。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初稿）。

③ 《死难烈士英名录》（中共中央组织部 1945 年编印）第 4 册第 79 页。

存中央档案馆。

3. 溥泉（即刘顺元）：《陕南工作报告》（1934年2月2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 张心诚（即张德生）1934年8月9日给党中央写的关于《汉中工作报告提纲的补充》，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5. 《西北文化日报》（1934年）。
6. 《西京日报》（1934年）。
7. 《陕西文史资料》第10辑、第15辑。
8. 《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与红军第二十五军在陕西境内战斗军事报告书》（1935年1—3月），原件存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
9. 王维之：《军运工作和警卫团的情况》（1959年8月5日），原件存汉中地区档案馆。
10. 杜耀亭：《中共领导陕南有关军事活动回忆录》（1959年8月25日），原件存汉中地区档案馆。
11. 《刘明达回忆陕南军事情况》，原件存汉中地区档案馆。
12. 《郑位三同志关于红二十五军及红七十四师在陕南斗争历史的谈话纪要》，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3. 中共洋县县委党史调查办公室：《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建军及活动情况》（1959年7月30日），未刊。
14. 中共勉县县委党史调查办公室：《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的成长及元墩子战役经过》（1960年1月8日），未刊。
15. 《张归仁谈赵寿山及三十八军》（1979年10月23日），存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
16.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7. 访问程子华、汪锋、阎揆要、郭述申、刘顺元、孔从洲、吴岱峰、米暂沉、张仲实、雷展如、王超北、王云、马云泽、武志平、胡振家、彭辉、孟浩、刘威诚、王国、陈子敬、陈云樵、梁俊琪、侯书铭、何秦州、李金锋、魏含英、彭淑贞、刘依仁、戴季英、王鸿俊等和烈士亲属张怀钦、李鼎铭的记录及给作者的信。

张正坤

丁文斋 曾长秋

唐伯藩 刘芳

张正坤，浏阳人，一九二八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在红军战争时代曾负伤十三次。皖南事变时，他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负伤被俘，在组织越狱中跳崖壮烈牺牲。

(一)

张正坤，原名乐典，一八九八年十月八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北盛区乌龙乡燕舞村。他家世代务农，仅有几间草屋，租种数亩薄田，过着贫苦清寒的日子。他的父亲张英雄，身高力大，为人侠义，被当地人称为“运长子”；母亲陈氏，是个老实善良的农家妇女。他们和他们的九个儿女，都相继投身革命，先后有六人为革命壮烈牺牲^①。

张正坤从小受其父亲的影响，仇恨那些欺压百姓，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团总、土豪劣绅，好打抱不平。二十岁

^①熊晃：《浏阳河畔忆故人》（未刊稿），存浏阳县委党史办。熊晃，浏阳人，红军干部，解放后曾任乌鲁木齐部队副政委，现任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时，他也和父亲一样，身材魁梧，强壮有力，乡间那班鱼肉百姓的地头蛇都惧怕他三分。

一九二五年五一劳动节，乌龙乡正式成立了农民协会。张正坤立即赶到乡农民协会报名参加。此后，他扛上梭镖大刀，经常带领一些青年农民去打土豪，抗租税，在当地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叶挺独立团开进浏阳。党组织号召农会会员踊跃支援前线，援助北伐战争。张正坤带着一个担架队，随军转战到湘北。他吃苦耐劳，不计报酬，曾受到叶挺的夸奖。九月初，张正坤从湘北返回浏阳时，家乡办起了农民自卫军，青年们拥戴他担任分队长。就在这年十月，张正坤由潘心元与徐洪^①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率领浏阳工农义勇队向长沙进军。此次进攻失利，张正坤与一些农会干部转移到炉烟洞山区隐蔽下来。

一九二八年二月，浏阳地下县委特派员徐洪，潜回北区的乌龙、淳口、蕉溪、砰山一带。他找到张正坤、罗梓铭^②等

①徐洪，浏阳人，曾任红十八军军长，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作战牺牲。

②罗梓铭，浏阳人，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八路军总部少校副官、湘鄂赣特委书记，1939年牺牲于“平江惨案”。

人，商量秘密恢复党的支部和建立游击队。经过他们的努力，到七月份，就在砰山建立了北区区委，在淳口建立了游击队。

游击队开始只有十几个人，没有武器，徐洪便领着张正坤等人赤手空拳去夺枪。一天，淳口镇来了四个逃兵，徐洪略施巧计，卖了一只野鸡给逃兵下酒，趁逃兵喝得酩酊大醉时，张正坤等人一跃而上，将枪缴获，把逃兵轰走，第一次夺枪获得成功。

当时，淳口的地主武装有一百多人，由劣绅陈怀中担任联防队长。一九二九年春节期间，陈怀内在朱氏祠堂大摆酒席，宴请乡间豪绅，一直闹到深夜。徐洪事前已侦知这一消息。那天，他命张正坤率三十名游击队员，身背大刀，腰扎草绳，臂缠白布，趁夜摸进村子，把干柴、火把投进朱氏祠堂。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在村外助阵的数百名农民一齐呐喊，并在空煤油桶里放鞭炮，吓得绅士、团丁乱作一团，纷纷逃散。张正坤等人又一次缴了团丁不少枪枝弹药，然后迅速撤退。

一年过去了，游击队扩大到一百多人。他们又攻下了蕉溪镇，击溃守敌一个连，缴枪三十余支，子弹一担。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在淳口炉烟洞的古桑村，正式成立了浏北第一支队，张正坤任支队长，苏劳任党代表，王震任党支部书记。

不久，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从平江开往浏阳接防。张正坤闻知后，立即集合部队，赶到百岩，截住敌军尾巴，打了一个伏击战，毙敌数名，还抓到几个俘虏。敌人在淳口的玉皇殿筑了一个炮楼，驻有两个排民团，有六十多条快枪，扼守住通往浏阳、平江和长沙的交叉路口，控制着通往苏区的要道。为了拔掉这颗钉子，浏北第一支队接连组织了两次袭击，都没有成

功。徐洪、张正坤等带领大家总结经验，决定利用附近瓦窑上的柴草实行火攻。一天傍晚，张正坤按照部署，率领突击队员头顶铺着湿棉絮的方桌，在火力掩护下，把上百担柴草运送到炮楼底下点燃，立时烧得满天通红。守敌无路可走，多数葬身火海，少数跳了出来，也被打死在田垅里。

火攻玉皇殿炮楼的胜利，使北区的反动势力大为震惊，以张忍、周首生^①为首的民团头子，跑到县城请求派兵镇压。张正坤探知此情，便带领一个排，在县城通往北区的咽喉之地——蕉溪岭设下埋伏。不久，由县城返回北区的周首生，由轿夫抬着，在几个团丁的护卫下，爬上岭来。刚准备下轿休息，张正坤等跃出树丛，打翻团丁，生擒周首生，就地将其处死。接着，浏北第一支队乘胜攻北盛、取山田，声东击西，四处活动，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县政府悬赏捉拿张正坤，并派人烧了他家的茅屋，枪杀了他的父亲。

(三)

一九三〇年四月，浏阳县召开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成立赤卫军，每乡组建一个连，三乡一个营，每区一个团，全县共有六个赤卫师，约十万人，由徐洪任总指挥。此时，浏北第一支队由王震带领去江西萍乡，编入湘东红军独立师（后并入红十七师）；张正坤因负伤留下治疗，便参加了浏阳赤卫军的工作。当时，赤卫军的枪枝集中在特务连，张正坤任此连

^①周首生是乌龙乡大户周露吾的儿子，大革命时混入共产党，后投敌当了民团团总。

连长。不久，特务连与县总队部合编，成立警卫营，张正坤任营长。

六月，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在军长黄公略、政委潘心元的率领下，攻打浏阳县城。张正坤率浏阳警卫营配合作战。红六军的主力从南面的唐家洲涉水过河，发起总攻，警卫营则从城北重阳山偷袭，前后夹攻，一举破城。张正坤进入县城后，迅速派人打开监狱，营救了一百多名被关押的革命群众，并将县城富商屯积的食盐，装满两船。溯浏阳河而上，运回东乡苏区。八月，红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镇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浏阳赤卫军向红一方面军输送了数千名战士。张正坤仍留在地方，率领赤卫军警卫营转战浏阳河两岸。

红一方面军撤离湖南后，驻长沙的国民党第十九军军长刘建绪，立即派一个团的兵力来浏阳“清剿”，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报复。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一天晚上，徐洪命张正坤率六十名游击队员，手持大刀，腰揣炸弹，摸到敌团部的驻地周洛，将炸弹一齐扔向敌团部，炸得白军血肉横飞，未死残兵仓皇撤退。隔了几日，这股白军又卷土重来。徐洪、张正坤把警卫营分成两部，埋伏在关山至周洛中间的山上。为避免暴露目标，警卫营没有生火做饭，战士们吃干粮、喝凉水，苦苦等待了一昼夜，白军终于闯进了伏击圈。警卫营战士从山上猛冲下来，枪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打败了敌人，缴获甚多。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湘鄂赣苏区浏（阳）宜（春）万（载）根据地的地方部队编为正规红军，组建湘鄂赣独立第一师，邱金生任师长、徐洪任政委；下辖三个营，第一营营长刘国祯；第二营营长金成中；第三营营长张正坤。

独一师成立后，决定奇袭永安镇。部队从湘赣边境的高村

出发，绕开大路，翻山越岭，插出大围山，穿过炉烟洞、岚坑洞，疾走一昼夜，赶到离永安镇只有二十里地的芦绪，就地隐蔽休息。第二天拂晓前发起攻击，张正坤率第三营担任主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永安镇，全歼守敌一个连，缴获了不少军饷和布匹。与此同时，独一师还派出一支部队奔袭长沙郊区东屯渡。红军的突然出现，使长沙守敌极为震惊。第二天，长沙《国民日报》惊呼：“平浏赤匪由北盛仓窜入永安，省城戒严！”部队凯旋回到根据地时，湘鄂赣省军区举行了祝捷会。首长表扬说：“独一师象架飞机，一下子就飞到长沙城下，吓得何健丢魂丧魄，害怕再次丢了长沙”^①。

不久，何健下令陈光中师进驻浏阳，陈光中派一个营驻守官渡。官渡在浏阳河上游，是浏东重镇。守敌在所有枪托上都刻有“陈光中师长喻：消灭共匪，不成功则成仁！”以示与红军不共戴天。独一师决定消灭官渡敌军，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徐洪把攻打官渡的任务交给了张正坤营。张正坤立即派人潜入官渡镇侦察，摸清了敌人的驻防情况和活动规律，然后，率领部队从双洞（大光洞、仁和洞）根据地出发，连夜奔袭，到官渡镇边时，守敌竟毫无警觉。张正坤指挥尖刀班摸掉了敌人的桥头哨兵，接着，又指挥全营战士朝敌军驻地冲去，军号声、枪炮声以及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不知来了多少红军，慌成一团，被枪打的、被水淹死的不计其数。那个少校营长，既没有“成功”，也没有“成仁”，而是乖乖地做了俘虏。此役，缴获了不少军需品，还从河里打捞出二三十支

^①熊晃：《“齐天大圣”英雄传》（未刊稿），存中共浏阳县委党史办。

步枪。

一九三三年初，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共湘鄂赣省委为了配合中共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努力扩大正规红军。二月十日，浏阳县党团组织决定独立一、二师编为十八军^①。当天，在浏东小河田心乡清溪湾的牛形下坳上，召开了红十八军的成立大会，严图阁任军长、徐洪任政委；下辖三个团：第一五四团团长沙益霜、政委徐晃、参谋长李英艾，第一五五团团长沙矢久、政委张敬修、副团长金成中，第一五六团团长沙正坤^②、政委苏芳、参谋长周协和。

红十八军成立后，多次同湘鄂赣军区所辖的红十六军和鄂东南红三师协同作战。继红十六军在铜鼓县排埠歼灭敌第七十七师罗霖部一个营后，红十八军又在宜丰县港口歼灭该部一个团。当时，湘鄂赣省委和军区都设在万载县小源。国民党对小源发动了重点进攻。一九三三年夏，敌第十六师彭位仁部来势汹汹，闯入苏区腹地。红军与敌激战于距万载小源十五里的株木桥，相持两天一夜，难分胜负。第二天午夜，张正坤奉命率部冒着倾盆大雨偷袭敌营，把敌军挫败。当时，敌第六十二师陶广部，控制着通往湘鄂赣苏区的交通要道小洞，沿山修筑碉堡，对红军的活动威胁很大。张正坤团接受了打击该敌的战斗任务后，挑选了四十名身强力壮的党团员，组成夜袭队，每人一把大刀一支枪，还有四个手榴弹，连夜轻装出发，趁着拂晓前的大雾掩护，摸进敌直属营的碉堡，杀得敌人鬼哭狼嚎。此时，后续部队一涌而上，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战斗，俘敌

^①浏阳县党团组织联合发出的《为拥护红六军团成立红十八军告全县工农劳苦群众书》，存浏阳县档案馆。

^②中国革命博物馆红军序列表。

官兵百余人，缴获步枪二百支、机关枪四挺。

一九三三年六月，红十八军改为红十八师，奉命转移到湘赣苏区，与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十七师（原红八军改编）准备合编红六军团。张正坤因身负重伤，不能随军转战，回到浏阳警卫二团，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十一月，湘鄂赣省委军事部命令浏阳各游击队开往文家市附近的岩前集中，与萍乡、醴陵游击队合编为萍浏醴游击大队，张正坤任大队长、苏劳任政委。不久，这支游击队又升编为正规军，组成红十六师（原红十六军改编）第四十六团，张正坤担任团长^①。这年冬天，张正坤被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随湘鄂赣苏区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途中，他主动承担了武装保卫代表团的任務。大会之后，他留在中央苏区，入红军大学学习。

一九三四年五月，张正坤结束了在红军大学的学习生活，被派往湘赣苏区，回到原来战斗过的红十八师，任五十三团团长^②，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

（四）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党中央、中央军委电令湘赣红军组成红六军团，作为长征的先遣队，向湘鄂川黔边境转移。

在西进途中，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在黔桂边境与敌军遭遇，损失惨重，团长赵雄和三个营长战死，政委方理明负伤。

①见《湖南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载熊晃对吴咏湘《回忆十六军》一文的意见。

②中国革命博物馆红军序列表。

亲历这次战斗的熊晃回忆说：“就在这个生死存亡关头，张正坤率五十三团前来接应我们。他站在一个山头上，穿一件老百姓的棉衣，腰里扎着一根绳子，满脸黑胡须，一头蓬乱的头发，象个砍柴的山民。只是他手中的匣子枪，不停地吐着火舌。他指挥部队，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了我们撤退”^①。

接着，红六军突破了贵州、广西和湖南敌军的围追堵截，终于在十月二十四日到达黔东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会师。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川东秀山县南腰界形成统一的指挥机关。这时，红十八师因长途跋涉，减员过半，上级决定将第五十二团并入第五十三团，仍由张正坤任团长。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经过一年的苦战，湘鄂川黔苏区有了较大的发展，部队扩大到两万余人。此时，敌人调整了军事部署，开始对湘鄂川黔苏区实行重兵“清剿”。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六军团从湘西的桑植出发，再次作战略转移。张正坤奉命率第五十三团留在根据地内牵制敌军，担负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

在和主力部队分开后，第五十三团仅靠一部电台与上级联系。新开辟的湘鄂川黔根据地还不巩固，加上湘西土匪较多，情况异常复杂。第五十三团在十分艰苦的处境下，抗击着数十倍于我的敌军，坚持月余，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撤离根据地时，他们在石门县遭到了敌人的四面包围。危急时刻，随军的中央代表刘士杰却企图投敌叛变，被一位排长发觉捆绑起来，押到团部。正在考虑如何突出敌人包围的张正坤，见此情景，

^①熊晃：《浏阳河畔忆故人》（未刊稿）。

感到不好处理，遂要战士先为刘士杰松绑，交警卫连严密监视，他自己又去指挥部队作战。铁心背叛革命的刘士杰，又借机煽动警卫连叛变。战士们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张正坤。张正坤怒不可遏，利用战斗空隙当场审问。刘士杰气焰嚣张，又吵又闹。这时，敌人又发动了新的进攻，张正坤无暇与之纠缠，遂向大家宣布：“同志们，这个刘士杰在战斗中煽动叛变，是个真正的叛徒，我现在要处死他，一切后果由我负责，也请大家作证。日后，上级认为杀得不对，我张正坤情愿抵命。”刘士杰听了，仍然气盛地威胁道：“我是中央代表，你无权杀我。”张正坤火冒三丈，啐了他一口，连连说：“不要脸！不要脸！”话毕举枪将其击毙。后来，五十三团追上主力部队时，张正坤把这件事向指挥部作了汇报，任弼时当场肯定地说：“杀得好！”

杀了刘士杰后，张正坤采取避实就虚的打法，从根据地的西面突破敌人的包围，经抬头寨、黔江、酉阳、秀山、松桃；到达贵州东北部的江口县。这时，前有大河拦住去路，后有大队敌人追赶。在紧急情况下，张正坤冷静地指挥部队抢占河滩阵地，先掩护伤病员过河。突然，一颗子弹打来，穿过张正坤左胸，鲜血直流。这是他第六次负伤。警卫员要扶他下火线，他厉声说：“别管我，部队渡河要紧！”他撕下一片衣襟，忍痛包扎了伤口，又投入了战斗。时值寒冬，他带伤涉水过河，既发高烧，又打摆子，晕倒在地，被战士们抬上了担架。

敌人开始四面合围。第五十三团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当年曾作过张正坤警卫员的龚长富^①回忆说：在枪炮声中，“张正坤清

^①龚长富，曾任八路军三五九旅侦察队长，现离休。

醒过来，马上命令架设电台和军团部联系，又命令侦察排在四周警戒。这时，偏偏电台发生了故障，张正坤又急又气，但当他看到电台台长黎东汉满头大汗，已十分焦急时，便又克制住自己，走到黎东汉前面宽慰地说：‘伢子，不要慌，仔细检查。’他离开电台又去观察地形，有个侦察员跑来报告：‘十多里外发现敌人，正朝我们追来。张正坤决定：部队立即向西转移。这时，电台修好了，和主力部队取得了联系。原来，我们和主力部队相距仅九十里，军团部已派红十七师的晏福生团前来接应。’就这样，张正坤率部追上了主力部队。

一九三六年初，在贵州板桥的一次战斗中，红十八师师长龙云不幸被俘，旋被押往长沙，惨遭杀害；师政委甘泗淇已调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指挥部遂任命张正坤为红十八师师长兼政委^①、苏鳌（即张正坤老战友苏劳的弟弟）为副师长。

二月间，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黔（西）大（定）毕（节）新根据地，刚想驻下来休整部队，又接红军总司令部的电报，命令部队继续西进，渡金沙江，到西康（今四川省西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月三十日部队到达中甸，然后兵分两路，以红二军团为左路纵队，红六军团为右路纵队，北上甘孜。张正坤率红十八师在右路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塘、瞻化，于六月二十四日到达甘孜县蒲玉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七月二日，红二、六军团在甘孜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并且将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编入建制，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

^① 《辞海·中国现代史》分册“张正坤”条，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时任总政委。整编后，张正坤仍为红十八师师长，余立金升任政委。过草地时，张正坤因多次负伤，缺医少药，体质已很虚弱，加上又害了一场大病，原来魁梧的身体已瘦骨嶙峋，浓密的头发脱落了一大半。贺龙闻知，带着几名干部专程前来看望，临走时，见张正坤很久没有抽烟了，便把自己所带的烟草全部留下。张正坤很受感动。他把部下召集起来，把贺龙送烟的感人事情告诉大家，并将烟草分给会抽烟的同志们。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张正坤拖着负过伤的腿，强支病体，顽强地走出了草地。

十月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县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然后胜利地到达陕北，来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张正坤百感交集，兴奋得热泪纵横。一九三七年初，党组织将他送入延安红军大学学习。

（五）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湘鄂赣省派出的代表罗其南^①、李楚民、邓洪、李民秋等人先后到达延安，住在凤凰山中央招待所。这时，正在中央红军大学（不久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张正坤，听说家乡来了人，便到中央招待所找罗其南等了解情况。当他得悉湘鄂赣边缺乏军政干部，便托罗其南向中央转达他的请求，派他回湘鄂赣边工作。党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

^①罗其南，浏阳人，曾任过中共湘鄂赣特委青年部长，出席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任湖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不久，李楚民和李秋民先行返回湘鄂赣。八月四日，张正坤、罗其南、邓洪、胡荣一行四人也离开延安，经西安、郑州、武汉，抵达长沙。由长沙东行时，为了路上安全，张正坤和罗其南化装成商人，在永安镇雇了两顶轿子，沿着大路，回到浏阳北乡，在张正坤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赶到了湘鄂赣省委所在地——平江县嘉义镇。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坚持在湘鄂赣边活动的红十六师，由于国民党重兵“围剿”，损失很大，已不足一千兵力。抗日战争开始后，湘鄂赣苏区决定将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抗日游击支队。中共湘鄂赣省委任命傅秋涛为游击支队司令员，张正坤为副司令员^①。

九月间，延安八路军总部又派李涛、罗梓铭到平江嘉义，帮助湘鄂赣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由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团长，张正坤和江渭清担任副团长^②。

一九三八年初，湘鄂赣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开进平江嘉义集结，正式成立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第一团在傅秋涛、张正坤和江渭清的率领下，从平江嘉义出发，在萍乡乘火车到达南昌，然后又步行开赴皖南。到达皖南岩寺整编部队时，张正坤从第一团调到第二团担任团长^③。

五月，陈毅、粟裕率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为了振奋苏南人民的抗日热情，陈毅等决定消灭京沪线上新丰火车站的日寇，作为给江南父老的见面礼。新丰火车站位于镇江市东南郊，驻有六十名日本兵。陈毅把袭击车

①②平江县党史办编印：《平江革命斗争历史资料选编》。

③泾县云岭新四军纪念馆陈列的战斗序列表。

站的任务交给张正坤团，自己也亲临前线指挥。张正坤根据陈毅“初战一定要慎之又慎”的指示，对战斗作了周密的部署，命令第一、三营分别向铁路两端的上海、南京方向警戒，自己率第二营担任主攻。

是夜，月明星疏。张正坤带领数十名战士，在机枪的掩护下，很快跃到敌人的炮楼底下。他采用当年火烧玉皇殿的办法，指挥战士们用晒簟^①把炮楼团团围住，浇上汽油，将日本鬼子活活烧死在炮楼里，痛快淋漓地拔掉了这颗钉在京沪线上的钉子。陈毅当场题诗赞曰：

弯月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②。

六月底，指挥部派人侦察到日军从金坛运输军用物资去丹阳。经研究，又把这一伏击任务交给了张正坤团。拂晓前，张正坤率部进入阵地，埋伏在金丹公路的一处隘口。上午八时许，从金坛方向开来三辆大卡车，有三十多名日军押送。刚进入火力圈，张正坤的驳壳枪一挥，就把第一辆军车的轮胎打破了。顿时，公路两旁机枪齐鸣，打得日军哇哇乱叫，不少日军跳下卡车，往回逃命。战斗很快结束，共毙敌两名、生俘四人，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

^①我国南方农村老百姓晒谷子的一种竹制用具。

^②《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新四军频繁活动，到处袭击敌人，使日军龟缩到城里，不敢轻易下乡骚扰。金坛县城外数十里处有一片茶园，有个叫纪正纲的资本家在这里开了一个茅芦茶叶公司。他手下虽然有一支武装自卫队，但在日军面前，只能虚招几下。现在有新四军把日军挡住了，他感激涕零，马上派人联络，并给张正坤的第二团送来两挺机枪和一些钱币、衣物和药品。后来，经我党的帮助，纪正纲积极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张正坤在戎马倥偬之中，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不久，他兼任了第一支队的参谋长^①，写报告和总结材料，都是自己动手，有的文稿长达万言，写得词严语顺。陈毅看到他的进步，十分高兴，夸他有一股“犟劲”。

张正坤治军严谨，铁面无私。有一次，他的弟弟张本久在战斗中缴获了几包鸦片烟，出于好奇，偷偷尝了几口。张正坤知道后，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同时给予开除军籍的处分。这件事对张本久教育很深。后来，他留在苏南地方工作，吸取了教训，成为当地人民欢迎的好干部。

一九四〇年，陈毅率苏南主力渡过长江，建立苏北指挥部，开辟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新根据地。张正坤奉命留在苏南。不久，江南新四军重新组编了三个新的支队，直属军部指挥。军部任命张正坤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兼参谋长^②，胡荣为政委，辖第五团和特务团，约二千多人。这时，党中央准备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南方各省代表团的四十多名代表先后到了泾

①易武：《回忆张正坤烈士点滴》（未刊稿），存浏阳县党史办。

②泾县云岭新四军纪念馆陈列室的战斗序列表及《辞海》“张正坤”条目。

县云岭，在新四军军部集中。张正坤率部队护送他们过江。任务完成后，又率部驰回江南，继续与日寇浴血苦战，为巩固华东抗日的前哨阵地作出了贡献。

(六)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党中央电令新四军军部，准备北渡长江。但项英留恋皖南根据地，迟迟下不了决心。他先派林维先率一个挺进团赶到长江北岸的无为，侦察行军路线，筹集渡江船只。然后，才同意在无为东部的临江坝设立渡江指挥部，任命曾希圣为指挥长、张正坤和孙仲德为副指挥长。张正坤率第三支队移抵长江南岸，为全军北移开辟道路。然而，由于项英一味相信国民党的许诺，放弃了直接北上渡江的行军路线，改为向南取道国民党统治区，然后向东再北上的路线，终于导致部队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罗网。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夜，第三支队从铜陵前线被调回云岭集结待命。

一月四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九千人，从泾县的云岭地区出发，准备绕天目山到苏南，伺机渡江，将第一支队的新一团和老一团编为第一纵队，以傅秋涛任司令员兼政委、赵凌波任副司令员、赵希仲任参谋长，居左行动；第三支队的第五团和特务团编为第三纵队，以张正坤任司令员、胡荣任政委、黄序周任参谋长，居右行动；第二支队的第三团和老三团编为第二纵队，以周桂生任司令员、冯达飞任副司令员、黄火星任政委、谢忠良任参谋长，与军部机关一道，居中行动。一月六日，部队在泾县的茂林地区遭到伏击，被国

民党第三战区七个师又一个旅的八万兵力所包围。

突围战斗打响后，军部命令张正坤负责组成前线指挥部，与顽敌激战。部队原定在张家渡涉水过河，由于连夜天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不能徒涉。张正坤立即命特务团找来一些空煤油桶和木板，搭成浮桥，渡过章家渡，到达章村。但是，国民党早在茂林地区布下重兵，新四军已陷入重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张正坤急率特务团跑步前进，占领高岭阵地，然后又命第五团猛扑星潭，在牛栏岭与蒋军第四十师第一一九团激战半日，打垮该团第三营，将其营长杨孝忠击毙。

九日拂晓，蒋军开始发动全线总攻。敌众我寡，第三纵队特务团和第五团先后被迫撤出自己的阵地，且战且退。十一日，第三纵队布下的最后一道防线石井坑阵地又被蒋军突破，双方陷入混战。到十三日夜，张正坤已与蒋军激战了七个昼夜，这时，他的脚又负了枪伤，站立不稳。这是他第十三次负伤。战士们用担架将他抬下火线，转移途中，与蒋军遭遇，不幸被俘。

国民党反动派将张正坤转到江西上饶集中营，囚禁在关押高级干部的七峰岩监狱。在狱中，他白天一面做苦役，一面观察地形；晚上便与同房的难友冯达飞、郑龙泉商量越狱的行动计划。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张正坤向铁窗外扔了一块泥土，见外面毫无动静，便立即与两个难友撬开牢门，躲过岗哨，隐入附近的山林。眼看可以脱险，但冯、郑两人因伤病交加，无力攀登，渐渐走不动了。这时，国民党发现有人越狱，派出军警四处搜捕，终于发现了他们，顿时，枪声大作。为了战友的安全，张正坤不愿个人脱险。他用全身力气，扶着冯、郑二人登上山顶。然而，张正坤的腰部却中了数弹，倒在地上。在这

紧要关头，他催战友赶快脱离险区，自己却朝另一个方向挪动，并故意蹬落一块石头，把追捕的敌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爬到悬崖边，举起身边的石头，向蒋军砸去，然后，纵身跳下深渊。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四十三岁的张正坤就这样带着一身枪伤，离开了人世。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2.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等三个单位编：《湘鄂赣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黄开源、吴长庚、郭桂兰、房列曙：《皖南事变简史》，未刊稿。
4. 熊晃：《难忘的师长》，载《星火燎原》第3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6. 陈念棣、黄迪菲：《上饶集中营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 访问王震、李信、罗其南、熊晃、龚长富、易武等老同志及张正坤亲友的回忆记录。

周文彬

于荣勳

(一)

周文彬，原名金成镐，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红南洞人，生于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兄妹五人中排行第三。母亲洪基柱；父亲金基昌曾因参加朝鲜独立革命运动而被追捕，一九一四年携眷逃往中国，侨居河北通县，以养鸡、养奶牛、种葡萄维持全家生活，以后加入中国国籍。他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子女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朝中两国人民共同的凶恶敌人。”这些教诲，在文彬兄妹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种子。

一九一六年，周文彬入通县潞河小学；一九二二年，又考入潞河中学。潞河中学是外国教会开办的，常借宗教进行欺骗宣传。周文彬民族自尊心很强，不甘忍受民族的歧视。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在学校办了一个摄影展览，图片中有侮辱朝鲜民族的内容。周文彬非常气愤，便邀其二哥金永镐，利用中午休息展品无人看管之机，将照片撕毁。金永镐参加革命活动较早，周文彬受二哥的影响，思想进步，在本班组织了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成员发展到三十多人。通过学习和讨论一些马

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俄国的革命道路，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铲除军阀势力，广大群众才能摆脱贫困落后。一九二六年，十八岁的周文彬由其二哥金永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遭到屠杀。在革命受到挫折的关头，周文彬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坚持党的秘密活动。是年秋，他发展康景新、洪庆隆、张树棣、金祥镐（周文彬的弟弟）和张珍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潞中支部，他被选为支部书记。

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校内的一些国民党分子精心策划了一次名为改选实为篡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活动。他们首先抛出一个“候选人名单”，预谋在改选时控制会场，强行通过。改选那天，周文彬在会上发言，揭露国民党分子的阴谋，同学们也纷纷揭露候选人中，某人是军阀的阔少爷，某人是土豪劣绅的子孙。大家听了，十分气愤，场上激起了一片怒斥声，弄得那些家伙十分狼狈，赶快溜出会场。

学校的反动分子对周文彬的活动十分仇视，时刻图谋对他进行迫害。同年七月，周文彬在中学毕业时，同学们相约到他家举行茶话会。消息被当局得知，那天上午，通县驻军突然闯进周家搜查，拘捕了周文彬和前来帮助做糕点以便在茶话会上招待大家的几位同学。陆续如约前来聚会的同学则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拒之门外。同学们愤怒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开茶话会？”“为什么随便抓人？”“难道连毕业聚会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气势汹汹地嚷道：“明明是共产党在金成镐家开秘密会议，你们还有什么可说。”周文彬和被捕同学质问军方：“说我们是共产党有什么根据？”那个

军官确实没有抓住什么把柄，只好将他们释放了。

周文彬从潞中毕业后，组织上派他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他的一日三餐，常常是在街上啃两个窝窝头度过的，有时甚至勒紧裤带饿肚皮。后来，他被派往辽宁省抚顺煤矿做地下工作。

一九三六年，周文彬奉命调任中共唐山市工委书记。他在唐山华东电料行找到一个修理收音机的工作，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有一次，一个英国人来修理一台收音机，周文彬只用几分钟就修好了。这个英国人非常满意。从此，华东电料行的技术出了名，生意兴隆。经理赵永生看到周文彬成了自己的摇钱树，便把业务交给他负责，并安排他住在自己家的西屋。周文彬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地安装了一台发报机，经常在这里向领导机关发出情报，并接收上级党组织的有关指示。

(二)

开滦矿是我国最大的煤矿之一，下辖唐山、马家沟、赵各庄、林西、唐家庄五矿。开滦矿务局名为中、英合办，实际大权操纵在英人之手。广大矿工在重重剥削压迫之下，长年在井下劳动，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牛马生活。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各矿贴出布告，规定从十六日开始，实行井下记工制：即上班时先到井上牌子房领出工牌，交井下牌子房；下工时再从井下牌子房要回工牌，交井上牌子房，方可记工。因工牌的事，每人每天至少多花二个小时，还规定时间晚一点就算旷工。矿方这一作法，激起了全体矿工的愤怒。

上级指示周文彬，要利用这一事件在开滦发动矿工，组织罢工，以配合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周文彬当即深入到我地下党员比较多的赵各庄矿。这个矿的共产党员胡志发、王家义，在工人中有比较高的威信。他们向周文彬汇报了井下记工制和工人们的情绪。周文彬说：“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罢工的意义很大，我们必须引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配合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进行。”他们为使运动稳步发展，决定先举行怠工，提出要求条件，根据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发动罢工。

三月十六日，赵各庄矿首先揭开了大罢工的序幕。当晚十点，胡志发先发动四道巷工人怠工，别的道巷工人也跟着停工，工人们集合在四道巷牌子房门前。胡志发见时机已到，喊了声：“砸！”不到几分钟，牌子房的玻璃全碎了。第二天早晨，井上牌子房也被砸了。

矿司陈甲三听说井下井上牌子房都被工人砸了，立刻打电话指示矿警所所长印永颐带领武装矿警去井下弹压。印永颐提着手枪对工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开工？矿司有令，立即开工干活！听懂了吗？”工人们说：“听得倒清楚，就是不开工！”接着就是一阵高呼：“不开工！”“不开工！”印永颐见来硬的不行，就改换口吻说：“是好工人都去干活，领头不开工的站出来！”一个工人站出来说：“我不开工！”接着又是一阵：“不开工！”“不开工！”印永颐不知所措，带着矿警溜走了。

十八日上午十点，工人代表来到陈甲三的公事房。陈甲三说：“怎么，工友们要罢工了？”工人们选出的代表王家义把事先写好的条件递给陈甲三。陈甲三一看，意识到这次罢工是

有组织、有领导，并且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的。于是他推说自己作不了主，企图阻挠罢工的举行。

二十一日晚，周文彬在赵各庄北山沟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会上，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矿区的人民特别是工人恨透了英国资本家，也恨透了日本鬼子。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很深，开滦是日寇军事用煤的重要来源，日寇一直想插手开滦，曾极力交涉包销、入股，争夺煤炭税捐收入，但遭到了英国资本家的拒绝。矿方与包工之间也有矛盾，设立牌子房，实行井下记工，就是矿方想取消包工制。因此，我们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开展斗争，就容易达到目的。周文彬说：

“咱们这次罢工，首先要把矛头指向英国资本家，同时要提防日寇的破坏和干涉！”会议研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以保证斗争的顺利进行，并决定于二十三日下午一点正式罢工。

罢工开始后，井下的工人呼喊口号涌到井口，和井上的罢工队伍一道到矿灯房前集合，推选出蒋振元为罢工领头人，胡志发、王家义等为临时代表，然后一齐包围了公事房，向矿方提三条要求：第一，立刻取消牌子房，废除井下记工制；第二，每日增加工资一角二分；第三，不准开除工人。陈甲三见众怒难犯，但又不愿立即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便推说：“我实在是作不了主啊，我得请示唐山总管！”

在赵各庄矿罢工的影响下，林西、马家沟矿工人也于三月二十四日举行罢工。唐家庄矿矿方组织了四百七十多人的护矿队与保安队配合，封锁了矿区，企图防止工人罢工。赵各庄矿罢工委员会按照周文彬的部署，决定组织工人去援助唐家庄矿工人起来罢工。二十五日清晨，赵各庄矿全体罢工工人分三路

向唐家庄矿进发。林西矿的工人也赶来了。两矿工人把唐家庄矿围住，先和护矿队讲理，护矿队竟开枪威吓。愤怒的工人纠察队员在大队长节振国率领下攻开了矿门，两矿工人涌进了唐家庄矿，接应唐家庄矿工人。于是唐家庄矿工人也宣布罢工。在赵各庄、林西、唐家庄三矿罢工的影响下，马家沟矿、唐山矿也宣布罢工。这样，开滦五矿三万五千多名矿工，在中共唐山市工委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

罢工前矿方欠工人的工资，罢工委员会向矿方提出要求，每人先发一袋面粉。但两天过去了仍不答复，原来是陈甲三用两千元代价收买了工人代表刘青山、刘化亭。事情被揭穿后，工人们十分气愤，当即处死了刘化亭，吓得陈甲三赶快答应了先发一袋面粉的要求。矿务局也被迫于四月十一日贴出布告，表示愿与工人代表谈判。但他们继续玩弄花招，妄图欺骗工人。

四月十五日，开滦五矿罢工委员会向矿务局提出最后通牒。英国经理凶相毕露，请求日军调兵镇压罢工，并电请英国驻东京大使支持。由于当时冀东抗日运动蜂起，日军未敢轻举妄动。英国经理再也无计可施，只得忍痛答应工人的要求，订立了劳资协约十六项。坚持五十天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于五月四日胜利结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滦五矿工人团结战斗的胜利，也显示了周文彬的组织才能。

(三)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著名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参加的工农群众达二十万人。七月十八日，周文彬和胡志

发等组织赵各庄矿几千名工人起义响应。在冀东抗联第四纵队的策应下，起义工人攻进赵各庄矿警察局，缴获了警察局的全部枪枝，武装了自己。矿工起义的第三天，日军一部从天津赶来唐山，向工人起义军发起猛烈进攻。起义军被迫撤出矿区。日军走后，起义部队又回到赵各庄矿，袭击了唐家庄矿包工大柜和当地民团。接着，林西矿一千多名工人在陈德礼的率领下也宣布起义，使起义部队很快发展到七千多人，奉命向山区转移。因缺乏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途中被日军打散，只周文彬率五百余人，转入冀东农村。这支工人武装以后成为冀东我军的主力之一。

冀东大暴动取得胜利后，一九三八年八月，冀东抗日联军在遵化铁厂与八路军四纵队会师，召开了有名的铁厂会议。周文彬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冀察热宁军区，统一指挥所有抗日部队。但此决定未能实现。不久，召开了九间房会议，又决定冀东八路军主力和“抗联”全部西撤，只留包森、陈群等三个支队共几百人，分散在基础较好的地区坚持抗战。周文彬也被留了下来，任地委书记兼八路军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领导冀东东部地区的抗日斗争。

我军主力大部西撤以后，冀东的斗争环境极其艰苦。周文彬经常鼓励同志们说：“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都是生死相关、血肉相连的一家人，任何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死对头。”要求大家在艰苦的环境中顾全大局，严格要求自己，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遵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他在领导冀东的游击战争时，采取有事集中，平时分散隐蔽和便衣活动的灵活方法，依靠人民群众与敌周旋，在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一九三九年底，为了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冀东的抗日工作，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了冀察热区党委冀东分委，李楚离任书记，李运昌、周文彬、李子光、赵冠民等为委员。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冀东分委在葛老湾召开会议，决定首先肃清迁安、遵化、蓟县等地的土匪，建立三块根据地，由周文彬、刘诚光、丁振军率五、九两个总队，坚持丰（润）、滦（县）、迁（安）老根据地，肃清土匪，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各抗日群众组织。会后，周文彬等率部首先解决了以抗日为名而胡作非为的高奎武部，随即派出一支游击队深入到迁西马蹄峪、团头岗一带，除奸灭匪，袭击据点，处决了破坏抗日的恶霸地主侯老七；又在杨店子一带铲除了惯匪郭满，为当地群众除了大害。在部队和地方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丰、滦、迁老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一九四〇年夏天，周文彬派张振宇、田荣和高纯一等组成工作团，到迁（安）、滦（县）、卢（龙）开辟新区。张振宇问周文彬：“给多少人？”周文彬说：“就你们三人！”张振宇接着说：“环境这么残酷，又不给我们兵，又不给我们枪，是不是让我们三人当光杆司令！”周文彬笑了笑说：“那边有老百姓没有？有老百姓就有兵！”又说：“那边有敌人没有？有敌人就有枪。”由于周文彬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三位同志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葛老湾会议后，我军连战连捷，加之地方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冀东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以焦若愚为专员的冀东专员公署，下属各级政府也相继建立。

一九四一年夏，冀东分委在大张屯举行会议，决定全力开

辟热河山区根据地，以扩大部队的回旋地区，同时加强老根据地的除奸防特工作。年底，冀东我军发起攻打伪“治安军”的战役，连续取得几次胜利，并攻下了敌人吹嘘为“固若金汤，牢不可破”的杨子店据点，对日伪军震动很大。这些胜利，为进一步开辟滦河以东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配合开辟新区工作，由丁振军等主持，举办一个开辟新区训练班。周文彬等领导人到训练班讲述开辟新区的政策、策略和任务等问题。在讨论中，大家认为最大困难，就是开辟新区没有枪。周文彬风趣地给大家讲：“给我们发枪的，过去是伦敦、汉阳；现在是东京、沈阳。你们找他们去要吧！”周文彬的讲话，对与会同志有很大启发，大家感到向领导提出要枪，是胸无大志的表现，应当从敌人手里去夺。训练班结束后，学员们满怀信心地投入了开辟新区的战斗。

一九四二年春天，周文彬借去晋察冀中央局汇报工作之机，带领部分同志到军区工业部直属兵工厂参观学习十多天。他们拜老工人为师，刨根问底地询问子弹、手榴弹、地雷、炮弹和烈性炸药等产品的生产技术，并动手操作，直到完全学会为止。回冀东后，周文彬立即着手抓军工生产。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经常带着警卫员去搞试制工作。后来，聂荣臻指示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派黄锡川等十几人组成一个小组到冀东，帮助周文彬等建立起军工厂，使冀东部队的武器弹药有了一个重要来源，大大有利于我军的对日作战。

一九四三年夏，冀东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把冀东地委改为冀热边特委，周文彬任特委组织部部长。

周文彬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及时

发现并及时解决。一次，地方武装打下沙河驿据点，据点的碉堡被拆除了，敌人住的房子也变成了废墟。群众对敌人仇恨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做，既毁坏了大量的房屋，又不能阻止敌人卷土重来。当时，拆房的事情时有发生，带有普遍性，周文彬便指示报社，要发表文章及时宣传，但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讲清道理，不要批评指责。为此事，他还亲自代报社写了一篇社论。

周文彬关心战士，平日自己的生活却很朴素。他常常自己穿打补丁的衣服，而把新发下来的服装，送给同志们穿。一次，他们转移到一个新地方刚住下，警卫员收拾房子时穿得整整齐齐，周文彬穿着一件打补丁的衣服坐在院子里批阅文件。房东老大爷好奇地指着周文彬对邻居说：“你瞧这个警卫员怎么这么邋遢。”恰好这个邻居认识周文彬，笑着说：“大哥，你老眼神不灵，正好看拧了。在外边坐着的那个才是首长呢！”房东大爷听了很受感动，以后他见人就说：“八路军的干部越大越不象‘官’。”

周文彬在伙食上坚持不接受照顾。他经常工作到深夜，白天还要行军，身体越来越瘦。两个警卫员感到很心痛，多次想为他改善一下生活，都被他拒绝了。

周文彬有一匹他非常喜爱的枣红马，但他却很少骑。每次行军这匹马都是为女同志、小同志和身体弱的同志驮背包等东西，好象“杂货驮子”，他坚持和大家一起步行，边走边谈心。有一年春节前夕，发现了敌情。机关连夜转移时，周文彬坚持要一位身体瘦弱的女同志骑在枣红马上，自己拉着马，走在最前面。他说：“这里道路、地形我都熟悉，后面听我的命令。”他的这些事迹，使同志们深受教育。

(四)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冀热边特委正在驻地丰润县张店子召开“双减”（减租减息）会议，接到侦察员的报告：北面十五里的铁厂发现有二百鬼子；东面杨子店、南面丰润城等地敌人的兵力均有增加。

周文彬与特委宣传部部长吕光、秘书长李杉等共同研究这一情况。就当时敌情看，特委机关应及时西渡还乡河，或从铁厂以东插到敌人背后较为安全，但大家考虑，丰润、滦县、迁安的干部都集中在这里参加“双减”会议，不便远行，因此决定立即转移到不远的李庄子，待把会议开完以后再分散转移。当晚十点左右，大家赶到李庄子继续开会。

第二天拂晓，周围笼罩着云雾，附近什么都看不清。二连的战士正在出操，突然，西面响起了枪声。这时，十七地委书记丁振军走了进来，向周文彬报告说：“老周，敌人向我进攻，赶快命令集合转移吧！”周文彬当即说：“通知二连，扼守阵地，掩护机关干部向杨家铺转移。”

到杨家铺后，周文彬和丁振军等继续研究敌情和作战部署。这时，一个通讯员跑来报告：“敌人太多了！四连三面受敌。”周文彬急忙命令向北面转移，但北面亦发现敌人，人们又回到原处。在这紧急关头，丁振军带着一班人，跑上马头山进行观察，发现四面都有敌人，总数不下五千人。与此同时，周文彬根据敌情的发展，改变了向北突围的想法，打算以干河作掩护向南冲，并派人去和丁振军联络。一会儿，通讯员跑回来，沉痛地说：“丁振军同志牺牲了！”

周文彬忍住内心悲痛，烧掉文件，坚定地号召大家：“同志们！我们要打到最后一颗子弹！一定要冲出去！”接着便下达了向南突围的命令。

突围开始不久，周文彬的子弹打光了。他从牺牲的战士手中拿来一支枪，大声喊道：“李滔，你打东面，我打南面，掩护同志们突围！”但就在这时，周文彬的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了。

经过苦战，一部分同志突出了重围。傍晚，他们在迁西县马蹄峪集合，一个个含着热泪，深切悼念为革命英勇献身的首长和同志们。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初编》，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编辑委员会编印。
2. 《河北革命回忆录》第2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迁西县革命回忆录编写组：《动地凯歌》。
4. 胡青：《杨家铺突围》，载1949年7月1日《冀东日报》。
5. 开滦矿史编写组：《开滦烽火》，载1961年10月12日《工人日报》。
6.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管理处保存的周文彬烈士档案资料。

毛岸英

黄 峥

毛岸英，是毛泽东主席和杨开慧烈士的长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年仅二十八岁。

苦难的童年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毛岸英出生在湖南长沙。由于革命的需要，毛泽东的工作职务经常变动。所以，婴儿时期的毛岸英，也就随着父母亲的革命活动辗转于上海、广州、武汉、湖南等地。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带着五岁的毛岸英和他的两个弟弟毛岸青、毛岸龙，回到湖南长沙县东乡的板仓，转入地下隐蔽工作。毛岸英跟着母亲在板仓生活了三年。一九三〇年十月，杨开慧被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逮捕，毛岸英和杨家的保姆陈玉英也一同被敌人抓去，关在长沙监狱。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杨开慧在长沙英勇就义。毛岸英对母亲的牺牲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一九三一年，还不满九岁的毛岸英在见到叔叔毛泽民时，就悲愤地讲了妈妈牺牲的情景，并且表示长大了要为妈妈报仇^①。他成年后也常常对妻子刘松林讲

^①李静峰：《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的情况》，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

起敌人给母亲用刑和母亲英勇斗争的情况，并不止一次地称她是“伟大的母亲”，“她配得上是一位女英雄”^①。

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和陈玉英经家乡亲友保释出狱，又回到板仓随外祖母生活。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毛岸英兄弟三人的处境十分危险。为此，我地下党组织决定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接到上海。一九三一年春节后，兄弟三人跟着外祖母和舅母李崇德来到上海，同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民夫妇见了面。

毛泽民把情况向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等汇报后，决定把毛岸英等送到我地下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互济会主办的大同幼稚园抚养。

大同幼稚园创办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园中的小孩，大多是在白区工作的我党干部和被反动派逮捕的同志的子女，恽代英、彭湃、李立三、杨殷等的孩子，当时都在里面。幼稚园的经费由党组织供给，负责人是董健吾，他的公开身份是基督教的王牧师。毛岸英兄弟三人入园后，没有过多长时间，幼弟岸龙就因患痢疾去世了^②。

①刘松林：《毛主席的好儿子——毛岸英》，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

②关于毛岸龙的下落，曾经有过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在破庙里突然失踪（金振林：《毛岸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一说在颠沛流离中去向不明（《毛主席一家六烈士》，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一说因患痢疾经广慈医院救治无效死亡并由大同幼稚园姚亚夫买棺入殓（李静峰：《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的情况》，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笔者经分析各种资料后采用最后一种说法。另据刘松林回忆，毛岸英生前曾对她讲过：那天早晨，他和岸青去看弟弟，发现弟弟的床空了。

一九三二年，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很大破坏。党组织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将园中的孩子分别疏散安置，毛岸英、毛岸青由董健吾暂时负责照料。该园保育员、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将毛岸英、毛岸青领到淮海中路松柏斋古玩号家中，大约生活了两三个月。一九三二年八、九月间，董健吾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到他的原配夫人黄慧光处寄养。兄弟二人在那里生活了将近四年。

这一时期的上海，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寄养在黄慧光家的毛岸英、毛岸青处境非常艰险，在三年多时间里曾三易住处。由于党中央机关于一九三三年初迁往江西瑞金，上海地下党组织又一再遭到敌人破坏，董健吾在经济上也无力资助他们；黄慧光本人是家庭妇女，只靠长子的微薄收入糊口。因此，毛岸英、毛岸青这期间的生活极端艰苦，真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冬天盖的是烂棉絮。有一段时间，他兄弟俩甚至流浪街头，拣垃圾，拾烟头，推黄包车，当报童……。即使在黄慧光的家中，也要从事许多家务劳动。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后，毛岸英在给他外婆和舅舅的第一封信上便说：“一九三一年与外婆分别后，在上海过了五年流浪生活。”

赴苏联学习

一九三六年春，上海地下党决定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往苏联读书。经组织安排，他俩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李杜将军，于同年六月底乘轮船离开上海，七月底到达法国。在巴黎为办去苏联的护照停留了半年之久，于一九三七年初到达莫斯科。

毛岸英在莫斯科，开始时住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宿舍，主要是学习俄语。一九三八年底进入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学习。一九三九年夏，又转入附近的一所苏联十年制学校继续读书。

在校期间，毛岸英学习用功，德智体诸方面都很好，那些苏联老师和在苏联疗养的中国同志都很喜欢他。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二日，延安《新中华报》登载了一封毛岸英写的信。这封长达三千多字的信是由周恩来从莫斯科带回延安的。毛岸英在信中生动地描绘了他在苏联学习生活中的一些情景。他写道：

我于一九三七年初来到苏联后，真好比到了天堂一般。当我在中国时，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幸福的生活，苏联的人民看待我们比看待自己的儿女还要好，把我们当作上等的贵客看待，想尽一切方法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圆满和快乐。我和其他的中国儿童住在一起，我们所住的房子真可说是头等楼房。里面陈设得美丽精壮，又宽敞，又清洁。有图书馆、有打球室、有电影、有演剧及表演台等。外面则更是雄壮：有足球场、有篮球场、有对球场（排球场）、有网球场、有专门的运动场，有专门避雨、避风、避太阳的亭子，有我们自己所种的菜园子，有天然供给我们游泳、钓鱼、划船的河流等。……

毛岸英在信的最后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我要百倍的努力来完成我的学习。我很注重于政治和

军事，并且愿意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家，成为一个很好的宣传家，以便将来为伟大的新中国的事业而斗争。我坚决相信抗战胜利以后，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中国一定会被建设成一个先进的、自由的、幸福的强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民将享受自由与平等的生活。那时啊！中国是伟大的、强大的、民主的中国了！

在莫尼诺学习期间，毛岸英还常给父亲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①

一九四〇年夏天，在莫尼诺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孩子，都转入伊凡诺市共产国际第一儿童院。毛岸英也来到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57页。

了这里。这个儿童院的学生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等二十多个国家，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烈士。我们党的领导人刘少奇、朱德、李富春、瞿秋白、张太雷等的子女也都在这里。

这个儿童院没有自己的专门学校。毛岸英和其他孩子一样，在附近的罗细诺——彼得罗夫斯基中学上学。他们白天去中学读书，放学后回到儿童院。一九四〇年，毛岸英上十年制中学的七年级。由于他学习成绩好，又是政治活动和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同学中间很有威信。毛岸英进这个学院不久，就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一九三九年加入共青团，后又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

这期间，毛岸英多次把自己的学习情况写信向父亲报告，还寄去了一些照片。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又给毛岸英、毛岸青回了一封较长的亲笔信。信中称赞了毛岸英的进步，同时也为他们指出了学习的方向。毛泽东写道：“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①

但是，正当毛岸英他们紧张学习的时候，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了。战争破坏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打乱了毛岸英的正常学习。这年，他已经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6页。

是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了。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毛岸英自觉地把保卫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当作自己的应尽义务。他经过慎重考虑，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正式向斯大林写了一封要求参加卫国战争的信：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象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

革命敬礼

谢廖沙

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瓦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这封信发出后，毛岸英焦急地等待着批准。没过多久，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将军来伊万诺瓦视察，毛岸英又性急地找了他。这位将军当然不便贸然答应毛岸英上战场，但在岸英的强烈要求下，批准他转入附近的一所军事学校——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军事。

一九四三年一月，毛岸英从快速班毕业后，又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并且被授予中尉军衔。与此同时，在毛岸英的申请下，这个学校的党组织批准他加入苏联共产党，一九四四年转为联共正式党员。一九四六年毛岸英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由于是战争环境，毛岸英在列宁军政学校学习几个月就结业了。不久，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是苏联红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学校，毛岸英在这里前后共两年。中间，在毛岸英的强烈要求下，曾被派往卫国战争的白俄罗斯战线，并担任坦克连的党代表，后随部队开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参加反法西斯战斗。

一九四五年五月苏德战争结束后，毛岸英又来到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这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强烈地吸引着毛岸英，他迫切要求投身到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年底，他要求回国的申请得到了国内的批准。一九四六年元月初，毛岸英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乘飞机回到延安，开始了在祖国的学习和战斗。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曾接见过他，并送给他一支小手枪。这支枪曾伴随他入朝作战，他牺牲后，还在他的身旁发现了这支枪的残骸。

在 实 践 中 成 长

毛岸英回到延安后，毛泽东首先要他到延安附近的吴家枣园学习种地，上“劳动大学”。后来，又让他到中央宣传部机关边学习边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大肆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毛岸英随中央机关转战于陕北的瓦窑堡等地。就在这样艰苦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毛岸英仍抓紧时间学习，并不时把自己的学习、工作情况写信向父亲报告。这期间，毛岸英又收到了父亲给他的回信，称赞他“不但文字有进步，思想品质也有进步”。

为了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岸英，一九四七年四月，毛泽东又

要毛岸英参加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山西临县郝家坡进行土改试点工作。在郝家坡，毛岸英同样很注意学习，注意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两个月后，他把自己的体会作了一个总结，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我在郝家坡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中，学得了如下东西：（一）最重要的一点，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二）群众路线就是阶级路线加上民主作风。（三）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四）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便必然变坏，必然会站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那怕这干部在未当干部时成分是很好的，人也是很好的。（五）只有用群众的力量才能彻底改造我们的党、政、军。”经过实践的锻炼，毛岸英在思想上的这些收获和认识，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毛岸英也结束了在郝家坡的工作，参加土地会议旁听，并在分组讨论会上介绍了郝家坡土改工作的经验教训。其间，他再次总结了自己参加实际斗争的体会，写信向父亲作了汇报。他还创作了一首题为《鞋下一层土》的很长的顺口溜，其中有几句是：“郝家坡土改两个月，人问我最贵何所得？是不是金、是不是银，是不是地位和美名？我说一样也不是，却是那鞋下一层土！……今后的方针很明白：下乡去搞土地改革，永不离群众永不离土，埋头苦干把力努！但望我那鞋下之土层层加，但望群众真正变成我亲妈妈，步步登高据此而来，幸福的大门由此而开！”

不久，毛岸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①

值得钦佩的是，毛岸英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在自己的一次日记中写道：“我不希望由于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儿子，而受到特殊照顾，被‘另眼看待’。”他在另一次日记中又写道：“翻了一下还在郝家坡时写给父亲的信，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来到郝家坡才两个月，已深刻感觉到自己长大了不少，土地改革工作中学习两个月所得的东西，要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经过三个多月以后，这段话看起来竟是很不顺眼，而当时竟毫无此种感觉，须要把它分析和检查一下。”“一方面它表明当时还严重的存在着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另一方面，它反映出先前的极端幼稚无知。”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毛岸英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参加冀中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85页，信中提到的永寿即毛岸青。

土改工作团，到山东渤海区搞了几个月的土改复查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起，又先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工作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十月十五日，毛岸英同刘松林结了婚。婚礼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身边举行的，毛泽东亲自请几位革命老人来吃了一顿便饭，还把自己穿的一件大衣作为礼品送给岸英夫妇。由于毛岸英在生活上一向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婚礼和新房都极其简朴。

当时，由于全国解放不久，不少亲友经常通过写信或直接找上门来，要求毛岸英帮助解决生活、工作方面的困难。毛岸英总是根据党的原则来处理这些问题，从不讲个人情面。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给表舅向立三的复信中，坦率地谈了他反对利用亲属关系谋私利的看法：“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种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九日，毛岸英在给曾经同开慧妈妈和自己一起坐过牢的陈玉英老人的信中，也同样表达了这种原则性。他写道：“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的。这是你二十几年前在

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挨骂挨打，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这是你的光荣，但你可千万不要因此而自高自大，这也要那也要，若如此，那就会把你自己的光荣历史污辱了。我想你不会这样的，你将仍是一个老实的，朴素的，对众人好的，为众人做事的，因而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就主动要求下基层工作。一九五〇年夏，他担任了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这一工作变化时高兴地说：“我离开了中央机关的上层工作，达到了自己一向所追求的目的，转为做群众工作，做党的工作了，我现任北京机器总厂党的副书记，工作的内容要比过去机关工作不知丰富多少倍，缺点是我不懂技术。……如果党不调动我的话，我准备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随着它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搞出一套完整的工厂中党的工作经验来。”

光 荣 牺 牲

但是，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的“十年计划”没能实现。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岸英坚决响应党的号召，要求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作战。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一九五〇年十月，他匆匆告别了正在生病住院的爱人刘松林，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朝鲜国土。

毛岸英被分配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的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彭德怀办公室的作战室设在朝鲜平安北道两座大山之间的原大榆洞金矿洞口，是一座长方形的木板房。毛

岸英在办公室承担着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等工作。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无论是翻译、收发文电、守电话以及照顾彭德怀的生活，他都积极努力地去，深受彭德怀和机关同志们的赞许。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进入第二战役的头一天。这一天上午九点钟左右，几架美军轰炸机从志愿军总部的上空掠过，向北方飞去。总部的同志注意到这一情况，连忙布置防空。但是，还没有等人们完全作好准备，这些轰炸机很快又从北边飞了回来，随着轰然作响的马达声，迅速飞临作战室的上空。紧接着，几十个、上百个凝固汽油弹从轰炸机上砸了下来。整个基地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几百度高温的烈焰顿时吞没了作战室，吞没了正在坚守岗位的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

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好战士，毛泽东的好儿子毛岸英，就这样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光荣地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毛岸英的遗体安葬在志愿军总部驻地的山头上。停战以后，又迁到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一块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的墓碑，立在烈士的墓前。墓碑的碑文写道：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一九五〇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

和鼓舞着青年的一代。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新湘评论》编辑部编：《毛主席一家六烈士》，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2 月版。
2. 刘松林：《毛主席的好儿子——毛岸英》，载《人民文学》1978 年第 2 期。
3. 金振林：《毛岸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9 月版。
4. 李静峰：《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的情况》，载《党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
5. 任武雄、余卫平：《毛岸英、毛岸青同志幼年在上海的一些情况》，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 年第 2 辑。
6. 《杨开慧》，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0 月版。
7. 王颖：《毛岸英之死》，载《解放军文艺》1983 年第 5 期。
8. 田志芳：《对毛岸英约法三章》，载《星火燎原》1983 年第 6 期。
9. 关于毛岸英的一些资料，载辽宁《共产党员》1983 年第 12 期。
10. 韩铁生：《“请允许我到军校去”（忆毛岸英）》，载《纵横》1984 年第 1 期。

杜 国 庠

熊泽初 马培灿 罗可群

杜国庠，广东澄海县人。曾用笔名有杜守素、林伯修、吴啸仙、林素庵、吴念慈、杜惑、林柏等。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员。

(一)

杜国庠于一八八九年四月十六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杜建珪是秀才，以教书为生，还有祖遗沙田数亩，年收一造，不足一家四口的口粮。国庠五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更加穷苦。幸嫡娘为人勤劳慈惠，省吃俭用，使国庠八岁时得进私塾，读了四书、五经、唐诗和古文，受到了严格的启蒙教育。

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爆发战争。腐朽的清王朝任由豺狼蹂躏国土而宣布中立。十五岁的杜国庠对此深感痛心。一九〇五年春，他在一篇策论里，极力主张彻底收回东北主权，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感情。私塾先生的友人吴贯因（别号柳愚）看了，极为赞赏，主动提出要国庠到他那里免费就读。

在柳愚先生的指导下，杜国庠开始接触当时上海出版的报

章杂志，受新思想的启发，眼界渐为开阔。不久，柳愚先生弃置私塾，把国庠带到澄海县城，参加短期数学传授班，学习现代知识。杜国庠发愤攻读，对几何、代数很有兴趣。一九〇七年，成绩优异的杜国庠，因得杜氏大宗祠及邑同善祠的留学津贴，前往日本留学。

到东京后，杜国庠先进行了短期日语补习。一九〇八年进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普通科。一九一二年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第一高等学校。一九一六年九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一九一九年帝国大学毕业，取得了经济学士学位。

杜国庠在日本留学的十二年间，勤奋好学，追求上进，在学业上和思想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日后的学术道路和政治道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郭沫若一九一四年考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杜、郭开始结识，并一同听过佛学大师桂馨谷讲授《金刚经》和《大乘起信论》。杜国庠因研究佛学而获知“因明”（印度逻辑）的大意，这对他后来治理墨经很有帮助。又因研究王阳明而导致研究哲学，尤其注意它的方法论。可是，一切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方法论，都不能使他满足。在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的第一学年，他有幸聆听了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博士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初步认识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在学习了作为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后，才使得他多年所探求的方法论问题，得到解决，从此，杜国庠确定了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道路。

身在异国他乡，目睹日本帝国主义扩军奋战，对中国虎视眈眈，杜国庠的爱国热情更为强烈。一九一三年，日本帝国主

义发起组织所谓“日支亲善”的日华同学会，为其侵略中国作组织、舆论准备。它的机构就设在第一高等学校，杜国庠了解到这个组织的反动本质后，利用自己被选为一高中国留学生同窗会会长的身分，在中国同学中开展宣传鼓动。在大家的赞助下，他向日方干事会宣布解散日华同学会。由此直到毕业回国，他一直受到日本特务的监视。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勾结日帝，复辟帝制，全国人民群起声讨，杜国庠和李大钊等也在东京筹组丙辰学社^①，进行反袁斗争。

(二)

一九一九年七月，杜国庠在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九月，应聘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还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平民大学等校兼课，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政党论、社会政策和工业政策、行政法等课程。当时柳愚担任内务部参事兼编译处长，杜国庠也兼任该处的编辑。这期间，他仍把主要精力用于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

一九二〇年，他和谭平山、李春涛、邝摩汉等，创办《社会问题》杂志，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但仅出一期，即遭查禁。

一九二四年前后，杜国庠与李春涛、李沧萍等合住在北京

^①参见《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20页、229页。

地安门内织染局胡同十三号。他们把住屋命名为“赭庐”（红楼之意），常有进步青年、学者来此居住，他们常常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各种学术问题与现实问题。一九二四年一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逝世，杜国庠、李春涛等怀着敬仰而悲痛的心情，参加了追悼列宁大会。会后，他们编印出一本《列宁逝世纪念册》，广为散发，引起了人们对“赭庐”的注意。

一九二二年，杜国庠与郭沫若等原京都帝大同学组成了群众团体孤军社。九月，何公敢等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孤军》杂志。杜国庠与李春涛合写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出版的《孤军》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上。文章指出“今日而欲根本的改造中国，非反抗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国之经济的榨取，换言之，即非实行世界的社会革命，必不奏功。”郭沫若回忆说，孤军社开展讨论的结果，“只有他（杜国庠）和我主张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其他的人都和我们相反。那些人（其中包括叛徒周佛海）和醒狮派相呼应，成为了国家主义的别动队”^①。

当时的北洋政府腐败不堪，教育事业更是一片黑暗。教育部长彭元彝克扣北大经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杜国庠曾挺身而出，带领一批学生，直接到彭宅说理。当时北大也被胡适、蒋梦麟等学阀所把持，杜国庠深感此非栖身之所，便乘奔母丧的机会，辞去一切教职，于一九二五年春天回到家乡。

同年六、七月间，澄海县立中学校长辞职，校董会一致公推

^①郭沫若：《序〈杜国庠文集〉》，见《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第1版。

杜国庠继任。八月，杜国庠到校视事。半年中，他改革校政，还曾组织进步教师李春蕃（柯柏年）、方展雄（方君壮）等和一些优秀学生，到城西的基督教堂里，现场揭发帝国主义利用传教自由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说明宗教是剥削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收到了良好效果^①。

十月上旬，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彻底打垮了陈炯明的势力，周恩来出任东江行政委员，管辖惠、潮、梅二十五县。周恩来早年在日本就同杜国庠相识，他动员杜国庠与王鼎新、杜式榜（农会负责人）等人负责改组国民党澄海县党部。改组后，杜国庠当选为国民党澄海县执行委员会主席。年底，金山中学（省立第四中学）发生学潮，反动校长黎贯被逐，周恩来又命杜国庠前往接办。杜国庠到任后，一反前任校长的官僚习气，拒绝搬进为校长特设的“玻璃厅”居住，经常深入到师生中了解情况，同时，大力整饬校政，实行民主办校，通过选举，组成有教师、学生、工友代表参加的校务委员会，参与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并对学校行政进行监督。他还积极组织师生，轮流参加工农运动，使金中校貌焕然一新。

杜国庠在金中的革新创举，得到了进步人士与青年学生的热烈支持，但也引起了地主豪绅的不满，他们视国庠为共产党或准共产党人，肆意造谣污蔑。不久，蒋介石到金中演说，公然支持该校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右派遂在金中掀起了驱杜风潮。杜国庠在多数师生的支持下，顶住了逆流，使右派的阴谋未能得逞^②。

①参见杜伯奎：《回忆杜老早年在潮汕的革命活动》，原件存汕头市档案馆。

②参见《金中概览·校史》1935年编印，存汕头市档案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汕头国民党反动派跟着行动，十四日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也派兵到金中抓人。杜国庠因事去了汕头，反动派便密谋待他一回潮安即行逮捕。金中一位进步工友得知此情，连夜赶赴汕头报告消息，杜国庠才幸免于难。他在汕头隐居数日，然后，绕道回乡躲避。

九月下旬，八一南昌起义军进驻潮汕。国庠闻讯，立即赶赴汕头，与周恩来相会，周恩来要杜国庠出任潮阳县长。这时，革命虽遭严重挫折，而杜国庠对党的认识，却更加深刻。他从自己的体验中“深深地领会了党的正确”，表示要“死心塌地甘愿为革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①于是，他恳切地向周恩来表示：“目前是革命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应吃苦，我希望党允许我加入，给我更多的教育。”^②周恩来高兴地答应提交汕头市委讨论。这时，随军南下的郭沫若也来到了汕头，郭、杜在革命的道路上重逢，倍加亲切，晚上，他们同榻而眠，畅叙革命情怀，十分欢欣。

正当杜国庠筹备前往潮阳赴任时，形势逆转，潮汕政权仅存七日，便被反革命摧毁。杜国庠的入党手续未及办理，就匆忙随军撤退了。流沙失利后，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向农民打听彭湃的消息，虽未能找到彭湃，却得到农民的帮助。农民把他送到一个偏僻的乡村。杜国庠在那里隐蔽了十日，躲过了白色恐怖的高潮，才设法雇船前往香港。

杜国庠在香港住了两个月，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到了上海。二月，由阿英（钱杏邨）、蒋光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①②}杜国庠《自传》，存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从此，在党的领导下，杜国庠在我国的文化战线上，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

(三)

杜国庠一到上海，就积极投身于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他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又和洪灵菲、戴平万等组织我们社，从事文学活动。在太阳社、我们社出版的刊物《太阳》、《我们》、《新流》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发表。“前后三年中，在文艺理论方面，他从日文选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和柯根的《无产阶级文学论》。也翻译了藏原惟人的《普罗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翻译的小说，主要是当时日本的左翼文学作品，先后辑印成册的有《一束古典的情书》、《俘虏》、《废人》；没有收集的有德国的独幕剧《炭矿夫》等等。”^①

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版的《海风周报》第十二号上，杜国庠发表了《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这是当时第一篇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②。该文提出了“大众化”、“新写实主义”、“艺术运动的二重性”三个问题，批判了当时的一些错误言论，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展，起了良好作用。

杜国庠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哲学方面的译

①阿英：《回忆杜国庠同志的文学活动》，196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②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著与研究。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几年间，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德波林的《辩证唯物论入门》、亚色利罗德的《社会学的批判》、雅各武莱夫的《普列汉诺夫论》。此外还译有《金融资本论》、自编了《政治经济学辞典》，又与王心民、柯柏年合编了《新术语辞典》。

这期间，杜国庠还和李达、柯柏年、许美勋等同在南强书局担任编辑。南强书局的出版计划和稿件，多由杜国庠审阅。杜国庠的著述，也多由春野书店、创造社出版部和南强书局出版。

阿英回忆这期间与杜国庠的共事关系时说：“杜国庠同志在我们一群中，年纪是最长的，我们都尊之为‘老大哥’，而不名。我个人对他的关系，就是摆在师友之间。他对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有很多的帮助。我就跟他学过几个月的日文。对同志他总是满面笑容，从没有见过他疾言厉色。任何时候到他家里，总见他孜孜不倦地在阅读，在写作，生活清苦，言行不苟。在在使人感到是一位淳厚的‘长者’”。^①

杜国庠在上海期间，不仅紧握犀利的笔剑，勇敢地向敌人冲杀，而且，肩负党的重托，为团结左翼文化界人士，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一九二九年秋，我党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直属中宣部领导。潘汉年是第一任“文委”书记，杜国庠是“文委”成员之一。“文委”成立以后，立即筹备组建“左联”。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杜国庠是“左联”最早的成员之一。随后，他按照党的指示，与潘梓年、邓初民等，

^①阿英：《回忆杜国庠同志的文学活动》。

发起组织了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逐渐转到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他参加了“社联”党团，还是主要负责人之一。“社联”开展了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组织读书小组，帮助大家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据许涤新回忆，他在一九三〇年与杜国庠相识时，杜国庠“工作相当紧张，而生活又极为贫困。为了带动我们几个人——其中，有现在暨南大学任经济系主任的蔡馥生同志——的进步，经常出席我们所组织的读书会。他要我们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作为学习的主要读物。但是，我们对恩格斯在书中所提出、所发挥的问题，总是搞不清楚。而杜老呢？总是耐性地给我们解释。因为工作忙，来不及吃饭，他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时，经常买两个包着玻璃纸的小面包，一面吃，一面讲解。”^①

党为了培养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把理论宣传工作做得更深入，又发起建立了“社联”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夏、光华等大学的学习小组和闸北、小沙渡、杨树浦一带工厂中的工人读书班，都是它的基层组织。杜国庠对这些组织的活动，经常加以具体指导。“社联”先后创办了许多刊物，如《研究》、《新文化》、《社会现象》周刊等，杜国庠经常为这些刊物撰稿。

随着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开展，继“左联”、“社联”之后，又成立了“剧联”、“影联”、“美联”、“教联”、“记联”等左翼组织。在此基础上，党又建立了一个公开领导这些群众团体的机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实际上，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左翼文化总同盟，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文委”成

^①许涤新：《南国老树》，载《学术研究》1981年第1期。

员之一的杜国庠，也是“文总”的一位负责人。“文总”单独建立的党团，杜国庠也参加了。他在“文总”工作的时候，“对于‘左联’的负责同志，反复指出必须尊重鲁迅对于文艺的意见，必须善于同鲁迅合作。”^①他经常称赞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诗句，用“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精神增强自己的工作动力。他是“文总”的机关刊物《中国文化》的主编，写了许多文章，积极参加当时的理论论战。

一九三三年夏，杜国庠又代表“文委”参加了“左联”党团，经常出席“左联”的常委会，并主持“左联”的党团会议。那时，“文委”的负责同志既要做领导工作，又要写文章取得稿费作为生活费用，同时还要躲避敌人的搜捕，处境险恶，工作繁重。可是杜国庠始终保持着任劳任怨、沉着机警的作风，深受同志们的尊敬。

后来，因“文总”所属各联的活动受敌人注意，于是，又组织了一个群众性的苏联之友社，分支组织遍布于各界，章乃器、李公朴、柳湜等都是该社的社员，杜国庠也参加了对该社的领导。

杜国庠在沪期间，还兼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参与党的机关报《红旗报》的编辑工作。

(四)

一九三三年初，党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苏区，成立了上海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一九

^①许涤新：《南国老树》。

三三年底到一九三五年间，蒋介石加紧对根据地进 行反革命“围剿”的同时，疯狂破坏国统区我党的地下组织，上海中央局先后遭到三次大破坏。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第三次大破坏中，杜国庠与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中央文委田汉等三十六人同时被捕。

经过多年地下斗争的锻炼，杜国庠对于敌人的搜捕，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他回忆说：“当被捕的那一刹那，有十几分钟为了编口供而着急，准备好了，便觉泰然，转而生起瞧他们把我怎样的好奇感觉。这时，我那些英勇牺牲的学生如吴文兰等，也浮现在我的眼前，觉得我应该对得住他们……。因此，我除了写姓名——吴啸仙（被捕后用这个名字，因为我曾用这个笔名译过一本书，准备万一被捕时用的），打指模之外，什么也坚决不写，不承认是共产党员，连家信也不写了。”^①杜国庠被捕后，先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关了一个月，每天都被叫到办公室谈话。不久，由于叛徒告密，警方知道了他就是有名的文人林伯修，便伪装客气，说只和他谈“政治”，不谈“关系”。杜国庠当即表示，如果国民党抗日，他随时都愿意去前线工作，但这要看事实。如果国民党只说 不做，他是不会相信的。以后每次谈话，杜国庠都反复强调这一点。他针对敌人的心理，决定以缓对急、以笑对怒、以柔克刚，用打太极拳的策略来对付敌人。在审问中，敌人多次进行反动宣传，妄图使杜国庠改变观点。杜国庠说：“我四十多岁了，要改变自己的气质，怕也要三十年吧，急是急不来的。”言词诱说无效，敌人遂以用刑进行威胁，杜国庠微笑着回敬：“吃苦头也不算什么，打到

^①杜国庠《自传》。

发昏，便不觉得痛了。”当敌人因不能使杜国庠屈服，而老羞成怒，大声叫骂时，杜国庠便以轻蔑冷笑对之，说：“权在你们手中由你，假如在我们手中便由我，杀便杀，发脾气对于彼此都不合卫生。”警方在审讯中得不到口供，就想从被囚人员的杂谈中勾稽出些漏洞，因此平日允许他们随意交谈。田汉被引渡到上海公安局后，在国庠、田汉等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就更丰富了。他们谈诗歌，谈戏剧，谈抗日，什么都谈。但敌人仍没能捞到他们所需要的材料，而杜国庠等却利用这种机会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

三月十六日，警方通知杜国庠，说国民党中央要他们到南京去，让他先写一份入狱后的谈话概要。杜国庠说，去什么地方都可以，“至于谈话概要，你们每次都有人记录，如不自信，可给我看。看过无错，也可签字。”拒绝了警方的要求。三月十七日，杜国庠被调到另一囚室。这天，正是巴黎公社革命六十三周年前夕，同室难友知道他是林伯修，要他做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杜国庠高兴地答应了。三月十八日上午，他以巴黎公社的报告结束了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被囚生活。当天深夜，杜国庠和黄文杰、朱镜我、田汉、阳翰笙等八人，一同被解往南京。在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看守所，杜国庠又被关押了五个多月。

南京看守所有“甲所”、“乙所”之分。杜国庠先被关在“乙所”，这里只锁大门，同所各室可以互相串门，据说，这是为了优待文化人。黄文杰、朱镜我等被关在“甲所”。那里控制严密，同所各室之间不能往来。头两个月，所方只找杜国庠谈过两次话，他仍然只强调抗日，别的不谈。第二次谈话后，杜国庠被转押到“甲所”。“甲所”共有十多个房间，开始他被

关在第一室，接着挨次转移到第二室、第三室……，过几天转移一次。据说，关到第十一室的人，就将被提到雨花台枪毙。杜国庠已被调到九号囚室了，他心中明白，这是敌人在以死来威胁他屈服。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根本不予理睬。杜国庠在九号囚室一直被关到八月上旬，又被调回“乙所”。

杜国庠在狱中悠然从容，他把蒜头种在热水瓶盖里，长出嫩绿的新苗，大家都很喜欢。他的乐观精神，引发了田汉的词兴，特写《虞美人》词一阙，对杜国庠表示敬意：

艳阳照遍阶前地，狱底生春意。故乡流水绕孤村，
应有幽花数朵最销魂。

由他两鬓丝如雪，此志坚如铁。四郊又是鼓鼙声，
我也懒抛心力作词人。①

杜国庠调回“乙所”不久，就被解往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关押了将近两年。

苏州反省院把杜国庠、李初梨、彭康、章汉夫、廖茂华、丁瓚、李默农等二十多人编在“研究班”。这些人大都具有大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院方要他们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自行“阅读研究”。起先，院方要杜国庠写学习三民主义的笔记。为了应付敌人，他就把孙中山演讲中的正确论述，加上引用符号，连缀起来，交卷了事。当时，敌人千方百计拖人下水，虽然很不满意这种写作方式，竟也在“院刊”上登了出来。后

①转引自许涤新：《一个走着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196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来，院方又指定杜国庠研究陈立夫的《唯生论》，而且要写出论文。杜国庠趁机要求院方购买包括唯物论著作的日文书作参考。院方只给了几本就不肯给了，却一再催索论文。国庠一再推延，拖了一年多，才交出一篇三万余字的题为《中国哲学上对于“生”的看法》的文章，其中十分之九写的是中国唯物论哲学关于“生”的看法，十分之一照抄《唯生论》的某些辞句。还是采取引用符号加以连缀的办法。院方训育科长梁某看后质问：为什么不加评论？杜国庠说：“《唯生论》实在是经不起批评的，依我看还是这样的好。如若批评，势将体无完肤，就是我也看到了几十处的错误。”说着，即向梁某指出《唯生论》的谬误所在，如它说“生是宇宙的中心”，是引用中山先生的话。但遍查中山著述，都没有这句话……。末了，杜国庠正告梁某：“若一定要批评，可把草稿退回来改写。写出来我至多还是坐牢，但不知梁先生做了一年多的工作，又怎样向上交代！”^①这事就此不了了之。杜国庠却借这次写作机会概略研究了中国哲学史。

杜国庠在苏州反省院后期，国民党两广监督史刘侯武前来探望。刘侯武也是潮汕人，杜国庠于大革命时期在金中工作时，刘是潮安县县长。刘这次到反省院，自称是代表潮州文教界来的。他力劝杜国庠“写点东西，表示悔意”。杜国庠说：“我要是愿写东西，早在南京就出去了。并且，我无过可悔，更不愿意躯壳出去而把灵魂留在院内。”^②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找杜国庠谈话，说是院里夏天太热，要他“设法”出院。杜国庠估计这又是暗示

^{①②}杜国庠：《自传》。

他写什么悔过报告之类，立即回答说：“这里很好，两个暑假也过去了。既不怕丢东西，又不要房租饭钱，好得很。”这样半开玩笑之后，刘云又说：“刘侯武替你找了两个保人，其中之一是孙科，因为你一向尊敬孙总理，所以孙科愿意作保。如果不出去，对孙院长的面子不好看。希望你同意孙科作保出院”。杜国庠坚持说，要出院，释放就行。否则，没有其它办法可想。至于孙科的面子好看不好看，那是你们的事。接着，刘云又进一步示意：“比如报病，请求转地疗养如何？”杜国庠仍然开玩笑似的说：“我很好，饭能吃得，觉也睡得，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称病？”这次谈话过后几天，刘云叫医院写了一张附有病历的报告，说杜国庠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和脚气病，非转地疗养不可。并派人再三劝说杜国庠，只要在病历上签字，就可释放。杜国庠见没有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就同意了。但对于为什么这样轻易放人，心中还不明白。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杜国庠结束了两年多的狱中生活，终于重见天日了。恰巧在他出狱的那一天，阿英“从上海到苏州买书，在玄庙观附近见到了他。还是瘦削的面庞上架着深度的近视光镜，还是满面笑容。腋下夹着一把雨伞。”^①阿英见到他，一时喜欢得说不出话来。杜国庠的高兴心情，就更不用说了。两人紧紧地握住双手，深情地凝望了好一会，才互诉离别后的情况。阿英告诉杜国庠，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安事变之后，经过我党的斗争，国民党同意释放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同意实行共同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即将实现了。杜国庠这才明白释放他的真正原因。

^①阿英：《回忆杜国庠同志的文学活动》。

(五)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转入全面抗战。在这种形势下，杜国庠更加难以按捺心头的激愤，他要尽快走向抗日的第一线，去实践我党的抗日主张。八月初，经熟人介绍，杜国庠到了浙江嘉兴，在抗日将领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军法科当上尉书记。不久，中共上海党组织为推动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加强抗日宣传，要郭沫若与张发奎联系，争取在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中成立一个战地服务队，这主张得到了张的同意。战地服务队的成立，是后来国民党军队恢复政治部的先声。郭沫若举荐钱亦石为这个队的队长，党派到这个队的的党员和进步人士有左洪涛、石凌鹤、刘田夫、何家槐、王河天、朱河康、孙慎、林默涵、杨应彬、张凌清、麦新、王亚平、柳倩、唐瑜、肖昆等。战地服务队里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稍后，上海党组织又通过郭沫若向张发奎建议，调杜国庠到战地服务队，任上校总务科长，协助钱亦石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钱亦石因病去世，由杜国庠代理队长。

上海沦陷前，战地服务队基本上都在浦东和嘉兴一带活动，他们写标语、印传单、演讲、唱歌，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同时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进行救护、慰劳等，工作很有成效。

十一月初，日军从杭州湾上的金山登陆，切断浦东的后路。服务队奉司令部之命，仓促撤至松江青浦。途中，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虽然生活紧张艰苦，但大家的革命热情都十分高涨。由于日寇步步逼进，服务队沿运河

到达杭州后，又乘两条大木船，上溯富春江，前往桐庐、建德。为了加快航速，避免意外，杜国庠处处以身作则，严守纪律，队员还轮流上岸背纤。到建德后，杜国庠带领大家又立即边行军，边开展民众宣传工作。一九三七年底，服务队到了江山。这时第八集团军已撤销，张发奎奉调江西训练新兵，不能带服务队前往，就把服务队人马全部暂时交给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指挥。初春，服务队到达金华，住了三个月左右。他们积极开展工作，把县城里的工人、店员、公教人员、县郊的农村青年、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还在当地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文章，经常进行文艺演出。杜国庠十分重视文艺演出，常到后台巡视。一次，有两个演员边化妆，边开玩笑，杜国庠立即批评：“严肃些！”教育队员以积极、热情而又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抗日宣传。一九三八年四月间，张发奎筹组第二兵团，又把战地服务队调往武汉。杜国庠先期到达武汉，将服务队工作情况向党中央的负责同志作了汇报。服务队人员全部到达武汉后，周恩来、博古等同志和特支全体党员座谈。当时，许多人要求去延安，周恩来勉励大家说，去延安是追求革命，你们坚持抗日也是革命，你们都是党员，要服从党的需要，党要你们去哪里就去哪里。会后，服务队的绝大部分人员，经我党长江局批准，调去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学习，以便取得合法地位，继续坚持在张发奎部队工作。杜国庠则遵照党的指示，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第三厅是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的，主管军中宣传。它是抗战初期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实际上是由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郭沫若出任厅长。当时国统区的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如胡愈之、尹伯休、徐寿轩、田汉、洪深、

范寿康、董维键、冯乃超、阳翰笙、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洗星海、张曙、张志让等，都在三厅任职。三厅除编制三百多人外，还有孩子剧团、抗战宣传队四个队、抗敌演剧队十个队和漫画宣传队，加上各科处的雇员、公役、卫士等，共有两千人左右。他们冲破国民党的种种迫害、刁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深入前线、后方，城市、乡村，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成为我党在国统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三厅下面又设三个处，分管动员、艺术宣传和对外宣传，杜国庠担任对外宣传处第一科科长，负责设计和日文翻译。在武汉时期，我党在三厅领导干部中单独成立党小组，成员有杜国庠、董维键、冯乃超、田汉、阳翰笙，直接由周恩来领导。在下面设地下党特别支部。领导干部党小组与特别支部不直接联系。

四月七日，刚成立几天的第三厅，就以政治部的名义在武汉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扩大宣传周。杜国庠夜以继日地参加各项工作，並赶制宣传资料。四月七日恰逢台儿庄大捷，这喜讯更加助长了宣传工作的声势。七天中，每天都安排一个主要节目，如歌咏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等。讲演会天天进行，报纸每天出特刊，宣传品大量散发。白天有示威游行，晚上有火炬游行，组织电台举办的中、英、日文的广播节目，慷慨激昂、生动活泼。宣传周掀起了武汉三镇百万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热潮，可是，国民党官老爷对此却恐慌万状。宣传周还未结束，严厉的检查工作就在政治部内部开始了，三厅成了检查的主要对象。三厅在宣传材料中所用“人民”、“祖

国”、“岗位”等字样，被指责“殊不妥贴”，要一律改为“国民”、“国家”与“职分”。并规定“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宣传周最后一天举行十万人游行。正当人群从四面八方会场集中的时候，国民党竟制造假警报，命令人们解散。后来，检查工作越来越苛刻无理，连“工会”也要改成“公会”，“农村”也要改成“乡村”。杜国庠对国民党党棍们的阻挠刁难十分恼怒。为了抗日，他费尽脑筋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寻求能通过检查的途径。那时，每月均要派飞机到前线去散发日语宣传品，号召日军士兵放下武器，起义投诚。杜国庠为编制这些日语宣传品，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日寇步步逼进，武汉连遭轰炸。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武汉开始疏散。政治部决定一部分人预先撤往衡山，三厅也不例外。当时，三厅有些人不愿过早地去偏僻的衡山，而且当时上面决定由国民党党棍、政治部副部长张厉生主持衡山方面工作，大家更不愿在他下边受冷气。因此，周恩来与郭沫若决定由有与敌人周旋经验的杜国庠负责三厅的这项工作。八月十三日，杜国庠率领三厅大半人员，连同孩子剧团，前往衡山，准备等全部人马会合后，再经桂林迁往重庆。

杜国庠率队到衡山后，驻在空旷的文庙里。“墨家巨子”^①与孔门圣人分庭抗礼，他自己也觉得是一件趣事。杜国庠不仅喜欢墨学，而且在生活作风上也具有墨家勤劳节俭，摩顶放踵的精神。他在衡山把各项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卫生勤务，整饬严明。对外没有隔宿公文，对内没有积压事务。在困难的条件下

^①杜国庠推崇墨子，被人称为“墨家巨子”。

下把伙食作了多样的安排，而且经常组织文体活动。在他的指导下，孩子剧团也大有长进，到长沙、衡阳、湘潭等地宣传演出，都受到观众的赞扬。周恩来与郭沫若对杜国庠的工作非常满意，后来郭沫若曾称杜国庠这段工作是“代余坐镇三厅”。甚至连张厉生也私下对人说，“象杜守素这样的人，可惜我们国民党太少了。”

随着武汉失守，长沙大火，敌机滥炸衡山，三厅人员又于十一月南迁衡阳，日常工作仍由杜国庠负责。在衡阳时，一位青年美术工作者在铁路沿线发现有不少国民党地方机关写的反动标语，非常气愤，当即向杜国庠报告。杜国庠指示组织一个突击宣传队，用团结抗日的大标语加以覆盖。

一九三九年初，三厅随政治部撤到重庆。三厅大部分人员都驻在乡下——赖家桥全家院子和三塘院子，由杜国庠与冯乃超主持日常工作。由于在撤离武汉之前，已有一批人转移去新四军，又有些同志经地下党同意去了延安，到桂林后又分出了一部分，这时三厅人员已大为减少。政治部又对三厅编制紧缩精简，由原来三处九科改为四个科。但不管情况如何变化，杜国庠始终抱着抗战到底的决心，在生活与工作都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组织大家群策群力，积极开展各项宣传，使团结抗日的口号，深入到山城人民的心中。

蒋介石原来同意建立由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是为了招揽名人，装点门面。但是，随着三厅工作的广泛开展，他越来越感到这是扎在他内脏里的一颗钉子。因此，想方设法，务以拔除而后快。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一方面指使党棍对三厅所属活动于各地的演剧队、抗敌宣传队、放映队、战地文化服务站等基层组织，进行扣压、捣毁、逮捕、监禁等暴力迫

害；一方面对三厅本部人员施行“溶共政策”。一九三八年底在桂林时和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周恩来暂时离开重庆时，蒋介石两次要三厅人员参加国民党，但都被顶了回去。一九四〇年八月，蒋介石又一次策划把郭沫若调去政治部当部务委员，派国民党反动分子何浩若取代三厅厅长，并且下“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

“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三厅。”为此，他们在赖家桥三厅每人的办公桌上都摆上一张加入国民党的表格，要大家填写，并对一些人进行威胁利诱。一个姓范的国民党副厅长在三厅全体人员大会上以威胁性口吻说，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要留在三厅，就必须加入国民党。郭沫若听后气愤填膺，立刻站起来，针锋相对地抗议道：“入党不入党（指国民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当场打电报向当局辞职。郭沫若的誓言与行动，极大地鼓舞了三厅全体进步人员的斗志，杜国庠等四十余人也立即提出辞职^①。

周恩来得知情况，马上采取对策，找张治中谈话。周恩来郑重地说，三厅这批人多是无党派的文化人，多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张治中一听，感到事情严重。连忙说，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这事情还要好好商量一下^②。

没隔几天，蒋介石突然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

①②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五），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汉、阳翰笙等三厅主要负责人。蒋介石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郭沫若等表示，我们在朝也是抗战，在野也是抗战。我们离开了政治部也一样抗战。蒋介石说：“我们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郭先生主持。详细情况由李维国同你们诸位商谈。”接着，蒋的机要秘书李维国在另一间会客室谦恭地对大家说，诸公都是学问渊博的知名之士，委员长的意思，是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宗旨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现在研究工作也很重要。仍然请郭先生主持，请诸公参加。这样也就是离厅不离部嘛！①

郭沫若随即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说：“蒋介石分明要把我们圈起来，怕我们去延安，你看怎么办？”周恩来说：“就答应他吧，他划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②就这样，在郭沫若、杜国庠等退出三厅之后，不久就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它仍属政治部管辖，但不在编制之内。文化工作委员会名义上虽属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机构，但实际工作仍继续在我党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之下进行。

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时，周恩来计划要建立一个编译社，想让杜国庠去那儿工作，指示杜国庠在“文工会”里不要担负行政工作，只挂一个委员名义。杜国庠于一九四〇年十月，收到了担任“文工会”委员的聘书。

①②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文工会”成立前后，杜国庠的夫人陈御仙由广东澄海取道香港、越南、昆明，万里迢迢来到了重庆。陈御仙是一个纯朴的农村妇女，他们是在杜国庠赴日留学前，由家人主持成婚的。杜国庠长期在外为革命奔波，陈御仙在家乡勤俭操劳，服侍老母，杜国庠对她一直十分感激。这次夫妻久别重逢，不仅杜国庠欢喜，三厅的人们都为之高兴。郭沫若特意书赠《蝶恋花》一阙：

万里关河烽燧绕，胡骑隆流，胜利前途好。几见
薰风摇碧草，南来宾雁知多少？

石化珊瑚成绿岛，海底潜龙，海上神鹰跃。鹊架
新桥多一道，三塘古木逢人笑^①。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周恩来指示山城的进步文化力量，要适当疏散，留下的注意保存实力，放弃成立编译社的计划，指示杜国庠于三月取道香港，前往仰光办报，向海外侨胞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杜国庠抵港后，国民党当局不发出国护照。他只得暂留香港，在友人帮助下，办了一间孟夏书店，出版了郭沫若的《羽书集》等六种书刊。开业约有半年，卒因日本占领香港而关闭。一九四二年春天，日寇大批疏散在港华人。杜国庠随同难民，经海陆丰回到故乡澄海，住了四十来天，又绕道韶关、桂林、贵阳，回到重庆，继续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

^①转引自蔡英豪，《风云潮汕榻尝联》，载《汕头文艺》1981年第1期。

国民党原以为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就可以捆住进步文化人士的手脚，其实，他们的算盘完全打错了。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文工会”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的各项学术活动，很快就蓬勃开展起来。“党为了帮助重庆文化、学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水平、政治水平，特地组织大家成立读书会，进行学习和交流。”^①杜国庠与侯外庐、许涤新、胡绳、翦伯赞、王寅生等同在一个小组。周恩来很关心读书会的活动，只要有空，总会赶去参加小组讨论。当时，许多同志都把唯心主义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杜国庠所在的小组，每次聚会碰头，就分析他们的政治动向，研究他们的每一篇新文章。有一次，大家正热烈地讨论着这个话题的时候，周恩来来了。他静静地听了好一会，才开口对大家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②。周恩来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口服心服。杜国庠显得特别兴奋，会后，很长时间还对周恩来的讲话称道不已。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文工会”还组织开展了许多次学术交流活动的，郭沫若作过有关孔子的学术报告，杜国庠作过关于墨子的研究报告，翦伯赞、马寅初、邓初民、侯外庐等专家学者都作过学术讲演。除了一些集体活动之外，大家紧紧抓

^{①②}侯外庐：《坎坷的道路》回忆录之四，载《中国哲学》第六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5月出版。

住这难得的机会，专心从事研究、创作和著述。杜国庠就是在这时集中精力，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先秦诸子的研究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整理祖国的文化遗产，写出了许多论文，对各种错误的观点进行严肃批判。如他在《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一文中，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中国古代礼乐的起源、发展和新的前途，批判了一小撮国民党文化党棍鼓吹“复兴礼学”，为蒋介石没落王朝“制礼作乐”的反动意图，指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礼乐，“其本身实随着时代而发展，……是适应于奴隶社会后半期到封建社会建立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东西，”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文章斥责御用的“理论家”们，“不加批判地提倡什么‘礼学’，那必然要做古人的俘虏，而根据那些‘礼节’来鼓吹‘制礼作乐’，也必然开倒车，硬拉中国走上复古的道路。”在现实政治活动中，这种言论是极大的罪恶。他还针对以冯友兰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写了许多札记或论文，发表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杜国庠这些文章虽囿于时局而不能畅所欲言，却仍然充溢着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给人们以有力的启迪。杜国庠在这几年中的研究工作，为他后来写作《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和与侯外庐等合著《中国思想通史》，作了扎实的准备。他在这期间写作的部分文章，后来收集为《先秦诸子批判》一书，解放前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

重庆期间，杜国庠与侯外庐交往甚密。侯外庐回忆说：“我一生中最堪称知己的朋友，莫过于杜国庠，杜老对我远不止是朋友，更重要的是老师。”“杜老时时处处恪守墨家人格，是个一丝不苟的长者。”“杜老和我的相知相交是逐步深入的。彼此学术观点完全一致，是我们能深交的一个重要原

因。”^①

侯外庐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友人曾给他从国内带去一本杜国庠翻译的《唯物论入门》。他发觉这本书的译著水平很高，便写信向杜国庠请教译事中的难题，因而两人有过一段通信联系。在重庆结识后，由于学术见解的一致，革命情谊也就越来越深厚。他们在重庆共同编辑过《中国学术》、《新思想》等刊物。在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指引下，又共同发起成立新史学会，使得著名学者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等，都会聚到了这面“新史学”的旗帜之下。

“文工会”卓有成效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只因碍于都是名家搞学术，难以下手。但他们究竟按捺不住，终于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把“文工会”解散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玩弄和平阴谋，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谈判。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到达重庆，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毛泽东在驻地接见了杜国庠，这使杜国庠十分激动。他心里明白，毛泽东接见他，不单是他个人的光荣，而且是对和他一样战斗在国统区的文化人的关怀。他把自己入党以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并请求指示。毛泽东安详地听着杜国庠的谈话，间或插问几句，最后亲切地对杜国庠说：“你做得不错，就这样做吧。党信任你。”^②谈话继续了一个半小时，杜国庠才依依惜别。这次难忘的会见，后来一直成为鼓舞他努力工作

^①侯外庐：《坎坷的历程》回忆录之五，载《中国哲学》第七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3月出版。

^②杜国庠：《自传》。

的动力。

一九四六年春，八路军办事处由重庆迁往上海，杜国庠随机飞沪。周恩来指示他不要公开参加政治活动，不要突出，以便今后为党工作。杜国庠遂继续以文化人的身分从事研究和著述。七月间，他集中精力，用一个月时间，写出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自孔子到韩非子，即从春秋末叶到战国末叶儒、墨、道、法、名几家的重要代表者的思想，都作了精湛的研究和论述。

一九四六年九月，经郭沫若介绍，杜国庠到黄炎培所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授，同时继续学术研究。一九四七年夏天，当解放战争炮火纷飞，人民解放军即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候，杜国庠在上海狄思威路（今溧阳路）侯外庐寓所，与侯外庐等热烈讨论《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的编写计划。他们都很兴奋，决心加紧学术研究，以新的成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在上海这一阶段，杜国庠除了教书和搞学术研究外，还遵照党的指示，在民主人士与工商界上层分子中开展团结、争取工作。叶圣陶、郑振铎等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杜国庠去和他们接洽的。随着淮海战役进入高潮，国民党对上海进步人士的迫害越来越甚，杜国庠遵照党的指示，由上海转移香港。这时，上海的气氛非常紧张，车站码头戒备森严。他装扮成普通老百姓，避开军警查询，从容不迫地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平安到达了目的地。抵港后，他接替侯外庐，任《文汇报》的《新思潮》周刊的主编^①。

^①见侯外庐：《坎坷的历程》回忆录之六，载《中国哲学》第八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0月出版。

(六)

建国前夕，杜国庠被推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他于八月由香港动身北上，进入古都北平。

九月二十一日，政协全体会议开幕。杜国庠第一次与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汇聚一起，共商建国大业，感到十分荣幸。他积极参加会议的各项活动，在小组会上热烈发言。十月一日，他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他决心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为新中国作出最大的贡献。

建国以后，杜国庠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文教厅厅长。他以年已花甲的高龄，为开创广东的社会主义文教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为了解决发展教育的师资问题，一九五一年冬，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创办广东师范学院（即今华南师范大学），由杜国庠兼任第一任院长。创业伊始，头绪纷繁，他于百忙中经常到校处理各种重大问题，协调各方关系，主持拟定建校规划，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时期，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时。

一九五二年以后，杜国庠历任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兼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等职；还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一九五四年，杜国庠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他老当益壮，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忘我工

作，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了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党的周围，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贡献了他所有的力量。这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中苏友好协会副主席等职，积极从事国际宣传活动。

杜国庠在解放后的十一年间，尽管工作十分繁忙，时间非常紧迫，但从未放弃学术研究。一九五九年，他收集自己二十年来先后发表过的部分文章，编辑成书，取名《便桥集》。他在编后记中写道：这本书“一俟更好的钢筋水泥的乃至全钢结构桥梁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可毫不惋惜地弃置或拉杂摧烧了它。”充分表现了他治学的谦逊态度和对发展祖国文化事业的殷切期望。

杜国庠几十年勤学苦研，学识渊博，著述甚丰。诸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佛学、逻辑学、因明学等，都有相当的造诣。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中国哲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上自先秦诸子百家，下至近现代胡适思想，贯通数千年的过程，他都探索不止。他一贯坚持用马列主义观点，阐扬思想史上唯物主义的传统，批判唯心主义的谬误。他对墨子和公孙龙子的研究，更有独到之处。他从墨子思想中提炼出来的“不劳不获”、“不义不取”、不“亏人利己”、“团结兼爱”、“三表法仪”、“选贤任能”、“官不常贵、民不常贱”、“布衣粗食”、“不肯安逸”、“以身作则”等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长期的治学活动中，杜国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精用宏”，“由博返约”，就是其中的主要之点。解放后，他常以此教育青年。他说，只有从广博的知识中，加以深入研究，

才能比较、分析，吸取其真义与精华，提出自己的创见。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如“蚕吐丝”、“蜂酿蜜”那样，勤劳踏实，孜孜不倦，要有谦虚好学的精神，切忌自以为是的态度。而他自己正是通过这条道路才在学术上达到了高深的造诣的。越到晚年，他在学术上积累的心得体会越丰富、越精深。他雄心勃勃，古稀之年，还有编撰《中国逻辑史》、《中国佛学概论》和其它论著的计划，可惜由于行政事务占去了他晚年的许多时间，心愿未及实现，就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杜国庠襟怀坦白，正直忠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却从不居功骄傲，总是把自己看成群众中的普遍一员，不计较任何个人得失，没有丝毫特殊的气味。在五十年代末的经济困难时期，他已年迈多病，国家对高干的某些物质照顾，他都不肯享受，要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后来病重住院，组织上每天给他送去一磅面包，半两牛油，他还多次表示过意不去。临危，中南局领导同志前往医院探望，问他有何嘱托。他只是说，自己没有听从组织的劝告，及早进行治疗，以致沉痾不起，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应该检讨。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杜国庠因积劳成疾，患胃癌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二岁。噩耗传到北京，周恩来与邓颖超随即发来唁电。几天之后，郭沫若从国外访问归来，为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友而十分悲痛，立即写下悼诗，高度称颂杜国庠一生的为人与成就：

铁窗当日着南冠，

松柏后凋阅岁寒。

早赋壮怀常落落，
晚成大器自磬磬。
东游共席推心腹，
西狩同舟沥胆肝。
尽翳成风臣善斫，
郢人不作抚斤叹。

生死交游五十年，
老兄风格胜前贤。
墨名绝学劳针指，
马列真诠费火传。
夜雨巴山窗尚在，
风云潮汕榻尝联。
便桥一集成千古，
手把红棉读逸篇。

江 隆 基

苗高生 马长生

(一)

江隆基，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六日（清光绪三十年腊月十一）出生于陕西省西乡县白杨沟村。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父亲江廷瑜，以跑外经商为主，兼营祖传的三十亩土地。母亲董氏，是一个勤劳、善良而又倔强的农村妇女。主持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教育孩子，要正正经经做人。她待人和气，不卑不亢，给江隆基兄弟以良好的影响。

江隆基七岁发蒙，在江氏宗祠里读私塾；十二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距家四里路的西乡南区高等小学。他学习刻苦，各门功课都名列全班前茅，尤其是作文写得好，经常受老师夸奖，几乎每篇都要“贴堂”。

一九二〇年夏，十五岁的江隆基，跋涉七百余里，来到省会西安，考入了省立第二中学。省立二中是一所受五四以来新思想影响较深的学校。教务主任杨明轩是北京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这所学校里，可以看到《独秀文存》、《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还可以看到陕西旅京学生创办的进步刊物《共进》半月刊和杨贤江主编的《学生

杂志》。这些新的书刊，好象给江隆基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天窗，他贪婪地阅读这许许多多的新书刊。杨明轩通过讲授国文课和历史课，给学生讲述国内外大事，不断地灌输新思想，对江隆基的思想影响很大。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西安市爆发了爱国学生抗议“九国公约”的游行示威。江隆基作为二中的学生代表之一，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活动。

一九二三年初，西安的爱国学生运动又出现了高潮，江隆基和很多同学冒雨参加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决要求收回旅顺、大连。会后游行时，江隆基激愤的高呼：“粉身碎骨，以救旅大！”第二天，群众的活动继续扩大，在西安掀起了一个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

江隆基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学生自治会也是在杨明轩的关怀下成立的，江隆基是学生会会刊《二中旬刊》的编辑。他既要编稿，又搞校对，还是《旬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在一篇题为《三国局面的再现》的短文里，以我国历史上三国时期群雄割据和混战的局面，猛烈地抨击当时的中国时局。江隆基是学生会举办的“谈话会”的组织者之一，每次“谈话会”的题目大都是江隆基提出来的。有一次，他针对曹锟贿选总统，颁布猪仔宪法，出了一个“宪法有没有价值”的题目，发动大家讨论。通过热烈的争辩，很多同学进一步认清了混乱的时局，知道了猪仔宪法的欺骗性。除“谈话会”以外，学生会还搞讲演比赛会，每次讲演比赛江隆基都积极参加，并且得到好评。

江隆基在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中，还为同学们办了不少有益的事。他们同班有一位姓戴的同学，染上了肺结核，学校

为避免传染，就将其安置在城外一个偏僻的房子里。江隆基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照料这位患病同学的事，每天按时给病人送饭送药。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从没有因为学习和工作忙而间断过。这位同学不幸去世后，江隆基又主持追悼会，并且帮助把这位同学的尸体护送回他的家乡。

(二)

一九二四年夏，江隆基中学毕业后，先考入北京农业大学预科，接着又考入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一年，因学费无着，返回西乡筹措学费，休学一年。

一九二六年夏，江隆基到北京大学复学。这时，他向往革命，并且结识了许多革命者。共产党员张翼唐看到他秉性耿直，为人正派，对国内外的时局都有很好的见解，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就主动担任了他入党的联系人。一九二七年六月，江隆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起点。

一九二七年暑假，江隆基接到长兄江裕基从日本寄来的信，说他在东京已考取了官费生，希望隆基也到日本来试考官费生。在长兄的鼓励下，江隆基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东渡去日本东京，并于次年三月考取了日本明治大学。

江隆基到东京以后不久，就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冬，他又和冯乃超、张磐石、童蒙正、崔仲远、江裕基等共同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还担任了明治大学中华校友会的主任，组织留日学生进行革命活动。

在日本，江隆基以顽强的毅力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

并和长兄江裕基共同翻译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著作。他们的住地距明治大学较远，为了查阅资料，搞好翻译，有时一天要往返几次，也有时为了某一词句的准确性，要询问很多人。他们以顽强的钻研劲头和“不耻下问”的精神，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译出《新经济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此外，他们还翻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文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于一九三〇年由上海申江书店出版。

一九二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和“济南惨案”；一九二九年，又进一步加紧了武装侵略中国的部署。为了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一九二九年九月，在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闹市区——银座，举行抗议示威活动。江隆基参加了这次活动的组织工作。那天，二百多名留日学生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银座，相继发表演说，诉说“皇姑屯事件”、“济南惨案”的经过，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还向日本民众散发了传单。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时，江隆基走在队伍的前列高呼口号。当游行队伍刚刚行进不远的时候，日本警察汹涌而来，抡起棍棒向学生乱打，江隆基和二十多个学生被抓走，投入监狱。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当局将江隆基等五六个人驱逐出境押送回中国。当他们到达天津码头时，受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学联代表的热烈欢迎。

江隆基由天津转到北京，在党的领导下，又组织了留日同胞被捕后援会，声援留日的被捕同学。一九三〇年四月，江隆基因筹备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被李服膺的宪兵队拘留了三个星期。释放之后，他前往上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联合会

的执行委员。当时，社联下设两个支部，一个是大学支部，一个是街道支部，江隆基兼任街道支部书记。他积极地投入了党领导的各项工作，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整天忙个不停。

当时，杨虎城资助陕西籍的一些爱国青年出洋留学，江隆基也得到资助，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到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经济系。不久，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语言组和中国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工作（社联的主席是张铁生，以后江隆基也担任过社联主席）。“九一八”事变后，他和王炳南等学生组织了旅德旅欧华侨反帝大同盟，江隆基担任书记，进行反帝救国活动。他们还联合日本、朝鲜、印度等国的一些留学生，成立了东亚革命分子联合会，出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刊物《东亚革命》。

一九三六年冬，江隆基回到西安不久，正赶上“双十二”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出任省立第二中学校长。陕西的抗日民主运动，经过“西安事变”以后空前高涨，我党领导的进步力量特别活跃。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由杜斌丞接任，教育厅长由李寿亭接任。江隆基到二中后，提出发扬民主精神，为抗日救国办学的主张。他聘请了许多进步人士到学校任教（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如教务主任周彬如，训育主任艾稚青、田静沉，教员田克恭、余达夫、李一青、张寒暉、许冷梅、郑竹逸、易厚庵、余海波、郑月波、雷五斋、曹慕贤（女）、向愚等。他草拟的《战时教育工作计划》中明确规定：“抗日期间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应是动员全国的智力，使其与人力、财力配合起来，以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课程设置上，他提出“应尽量与抗战发生联系”，“周授课时时间应酌

量减少，以使学生有参加抗战救亡之机会”^①。同时，根据他的提议，二中将每天升国旗时按规定唱的国民党党歌，改为唱《义勇军进行曲》。学校还出版了《二中校刊》，宣传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后，江隆基还邀请了不少著名人士到校讲演，宣传抗日。如林伯渠讲《团结抗战》、艾思奇讲《抗战与学生责任》、许权中讲《前线归来》、杨明轩讲《欧游见闻》等。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也到校作过讲演。左明领队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五队和由丁玲、聂绀弩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到西安二中演戏，宣传抗日救国。西安二中成了西安抗日救亡活动最活跃的中等学校之一。

江隆基既是学生的严师，也是学生的挚友。学生有问题乐于向他请教，心里有话也乐于对他讲，就连已毕业的学生，也常常给他写信，期望得到他的指导。而他总是满腔热情地关怀学生，竭尽所能给予帮助。《二中校刊》经常发表他给学生的公开通信。

江隆基以他全部心血，倾注于抗日救亡教育，赢得了广大师生的信赖与爱戴，也唤醒和教育了许许多多的革命青年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他是大家公认的“革命”校长，同时又是党的秘密工作者。他把党所需要的许多重要情况，通过吴德峰、陈养山，转到了延安党中央。

(三)

一九三八年五月，江隆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

^① 《二中校刊》1937年第8期，存陕西省图书馆。

来到久已向往的抗日圣地——延安，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陕北公学是遵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要加强红军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要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的决议，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校长成仿吾，副校长兼党组书记李维汉，教务长先是邵式平，一九三九年一月邵式平到晋察冀边区创办抗大二分校，陕北公学教务长由江隆基接任。

江隆基到陕公后，主要工作是协助邵式平主管全校教务。他一方面抓紧时间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学习抗大的办学经验；另一方面深入到教员和学生中去，和他们开座谈会，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他依据陕公是为着“培养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初步军事知识，有独立进行群众工作和政治工作能力的抗战建国干部”^①的要求，提出全校的教务工作一定要为这个培养目标服务。就教务工作来说，他认为，重要的是规划好全校的教学计划。他说，教学计划“是通过具体课程和教材，从教与学两个方面完成教学任务”^②的重要保证。根据课程的内容和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他认为，教学计划既要有稳定性，又要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使全校的教学活动有章可循。而且，通过教学计划的实施又会变成教师和学生的自觉行动。

在教学内容上，江隆基提出了要着重基础知识的讲授，同时又要“少一些、深一些”，尤其在陕公坚持这些原则更为重要。他认为，教材的内容不能单纯地从传授知识上考虑，更重要的是要从学生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上考虑。“少而深”，并不意味着支离破碎，而是精心筛选出

①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②访问高舍梓记录。

最有价值的和最迫切需要的内容。

江隆基十分尊重教师，经常和学生一起听教员讲课，还经常帮助教员改进教学方法。他常对教员说，学生的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我们讲课“应当从多数人的实际出发，照顾到少数”。他还说，讲课也不能象“竹筒倒豆子”，把所有的知识一下子全灌给学生，一定要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根据抗大的经验，他认为，在教学上一个重要问题是发扬教学民主。陕公开设的各门课程，就我国来讲，可以说是全新的，既是旧大学所没有的，又没有现成教材，所以要保证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他还认为，要给教师在讲授和学术研究上有较大的自主权，使每个教师都能发挥他们的才智；还要发挥集体智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搞好教学。

江隆基经常同学生谈学习方法问题。陕公学生在学习中坚持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集体讨论。他认为集体讨论是个好方法。但他同时也认为，这种方法一定要和个人努力结合起来，只有以个人努力学习为基础，才能发挥集体讨论的好处。他说，如果是机械的或形式的以集体讨论代替个人的学习，是不可取的。他主张一定要有比较多的个人学习时间，不要过多地限制个人的学习活动。陕公的学生，都订立个人的学习计划，他认为在学习上是有计划的，这种计划既和整个教学计划相一致，又要按照学生自己的需要和可能，不要“好高骛远、贪多求全”。他说，开始时不要求多，而要求真正了解；不要求快，而要求真正深入；只有这样慢慢地才能广求博览，举一反三。

除了繁忙的学校教务以外，江隆基还讲授高级班的“世界革命运动史”和“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讲座。他备课非常认

真，对讲授内容的每个细节，都要仔细的琢磨，然后一字不漏地写在自己的讲稿上，讲课之前再反复看几遍，这样到讲课时，却几乎不怎么看讲稿了。他讲的很熟练，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还经常联系到他在国外耳闻目睹的种种与授课内容有关的情况，使学生受益很大。

陕北公学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江隆基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了一套实事求是的教务管理制度。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共培养了六千多名干部，其中三千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日寇增兵华北，妄图渡过黄河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增兵关中，加紧对我边区进行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华北抗战，开展国防教育，党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合并，开赴华北前线，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江隆基被任命为华北联大教务长兼社会科学部部长。

华北联大继承了陕北公学政治思想教育的传统，特别重视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一九四〇年一月，在江隆基的主持下，成立了政治研究室，江隆基兼这个研究室的主任。研究室下设五个教研组，即中国革命问题组，组长赵宗亚（赵聪），副组长胡华；哲学组，组长宋士达（宋振庭）；政治经济学组，组长杨伯箴（王文克也做过组长）；马列主义组，组长李光灿；群众运动组，组长张立之。这五个组除了进行政治理论各学科的科学的研究以外，还承担了全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

江隆基十分关心对教员的培养。他认为办好学校一个最关

紧要的问题，就是要重视对教员的培养，发挥教员的积极性，发挥每个教员的长处。他经常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教员是干部之干部”，来开导大家，要大家尊敬教师。他说，尊师爱生应当成为学校的固有品德。江隆基对教师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他认为，“重师必先师自重”，一个教师不仅应该有合格的业务水平，而且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和良好的品德作风。教师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在“博”的基础上，有所“精”，应当着重一个学习和研究的方向，“不要什么都要教，什么都要学，不求深入，结果什么都是一知半解，半通不通。”^①

江隆基特别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初次任教的教师宋士达（宋振庭）、胡华、汪志天（项子明）和李滔等都是年仅十九岁的青年；其他如刘克明、师唯三、何戊双、明吉顺等，也都是二十多岁的年青人。除宋士达外，大都是本校第一批培养的青年教师。他经常对大家说：“你们都是马列主义理论队伍中的新生力量，任重而道远，希望你们都要有深的造诣。”他还谦虚地说：“我行政工作忙，没有多的时间来研究，要落在你们后边了。”他要求每个讲马列主义课的教员，都要学习原著。有一次，他让胡华读《资本论》第三卷，胡华也有些胆怯。他鼓励说，《资本论》第三卷很好读，多读几遍，读下去，是可以读懂的。在江隆基的关心下，联大这批青年教师都有着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

江隆基除主管全校的教务外，还讲授“世界革命运动史”，有时也做些专题报告。有一次他给教师做“西安事变”的

^①访问李光灿记录。

专题报告。他讲得很详尽，从张学良、杨虎诚两位爱国将领的抗战爱国热忱、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以及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方针，讲到张、杨两位将军的从苦谏到兵谏，捉住蒋介石、逼蒋抗日的整个过程，还讲到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机智果断和不辞辛劳忘我工作的精神。江隆基是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因而讲得非常生动、具体。广大教师都是第一次听到关于西安事变这样详尽的报告，都感到很受教益。他还常常以自己的革命经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一九四一年七月，华北联大成立二周年时，他写了一篇《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前进》的纪念文章，指出：华北联大在残酷的敌后战场，能够成为“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坚强的堡垒”，能为抗日战争和边区的建设培养大批骨干力量，归根到底，是由于它既清除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也废止了半封建的“愚民教育”，是由于它贯彻了以“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教育”^①。江隆基在华北联大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为新民主主义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四二年底，晋察冀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决定联大缩编，只留一个教育学院，其它文艺学院、法政学院的学生分配工作，校部和这两个学院的干部，一部分回延安，一部分在晋察冀边区分配工作。一九四三年一月，江隆基继李志民之后担任了抗大二分校附中校长。他是做为一位有丰富办学经验的教育家被分配到这个学校里来的。到任之后，就根据附中的培养目标

^①原载 1941 年 7 月 4 日《晋察冀日报》。

和要求，强调要学习外语，要打好外语的基础。在他的主持下，附中从此开设了俄语、日语、英语三门外国语的课程。

(四)

一九四五年十月，江隆基担任了延安大学校长。这时，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延安大学的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学院已大部东调。在大批教师调离的情况下，江隆基认为再继续维持原体制已不适宜。他从实际出发，将原有的行政、司法、财经、教育四个系，改为四个班（科），学制也由原来的二至三年，改为一至二年；另外还设立了一个预科和高中部。

当时，延安大学的教师都比较年轻，而且基础理论也比较薄弱。江隆基非常关心这批年轻教师的培养和成长，经常勉励他们“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大海”。对待教学要象对待学术那样，要做一滴一点的工作。他还鼓励教师自己编写讲义，从编写讲义中去学习、去提高。

延安大学原设的理论政策课，共开设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和时事教育四门课程。江隆基认为，在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中，应以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学为主。根据抗战胜利后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提出应当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课程。新课程开设后，由于教师的紧缺，他还讲授了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学课程。

一九四六年十月，李敷仁接任延安大学校长，江隆基调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教育厅长贺连城，年老体弱，教育厅的工作，实际上是由江隆基全面负责的。到任后，他为了使全边区的教育工作适应战争形势，及时转入战时体制，起草了

边区战时教育方案^①。这个方案明确指出：“目前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军事、政治、经济、群运等工作，争取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②方案对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教学内容的实施，以及组织形式等等，都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性的措施。这个文件，对于使边区的教育工作及时地、有条不紊地转入战时体制，对由于战争使学校教育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九四七年夏，随着边区军民粉碎胡宗南进攻的节节胜利，江隆基于七月五日及时起草了恢复国民教育工作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在“边区战局日趋好转”的情况下，应尽快地恢复国民教育工作。有些地区借口“战争期间各种工作繁忙”而取消了教育是不对的，“教育工作决不可任其停顿”^③。指示信还就敌人进攻陕北后学校教育遭受破坏的情况，提出了恢复的具体方针。

一九四八年春，西北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陕西的黄龙地区。为了做好新区的教育工作，在江隆基的主持下，拟定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内容和方法的标语口号八十六条。这些标语口号，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引起了强烈反应，它在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和政策中起了良好的作用。

为了团结和教育新区的知识分子，在江隆基的主持下，边区教育厅利用暑假在韩城举办了黄龙新区教师座谈会。参加座

^{①②③}《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539—540页。

谈会的除边区教育厅的干部外，有黄龙分区五个县的中小学教师共约七百多人。这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座谈会，它对于开展新区的教育工作，特别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团结教育新区的知识分子等问题，取得了重要经验。江隆基认为这些经验主要是：第一，对于旧教育的改造，“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去改造的过程中，“必须争取团结新解放区的广大教职员及失学、失业的知识分子，建立广泛的文教统一战线”。第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要求过高，求成过急”，“应以他们的觉悟程度及具体要求为出发点”。当前，主要是使他们“认清革命与反革命、人民与反人民、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界限，同时注意有重点地清除由于敌人的欺骗、蒙蔽而制造的某些反动观点，从而初步地培植其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观点与群众观点”。第三，对新区知识分子的争取和团结，“要有诚恳的态度，谦虚的作风，民主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原则性要强，方式要灵活，切忌盛气凌人，以胜利者自居”；“你落后，我来改造你”的态度是绝对要不得的。要认识到，“在团结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改造，没有团结就谈不上改造”。第四，“必须发扬‘自由思想与自由争辩’的精神”，“敢于讲话，勇于暴露”。“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但要注意方式和分寸，对于因政治上的无知而发生的谬论和基于政治成见而发出的反动言论，应有所区别”。同时，对我们本身的缺点和错误，“也应该公开承认，进行自我批评。这样才能使他们对于党的政策有正确的认识，才能相信我们是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①。

^① 《文教统一战线问题》，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52页。

黄龙新区暑期教师座谈会是一次成功的座谈会。它的重要经验，受到了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肯定和赞扬。以后，西北局在总结黄龙新区经验的基础上，拟定了《关于黄龙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边区政府也发布了《关于开展黄龙分区国民教育的指示》。要求各地、县参照执行。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五月二十四日，人民解放军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江隆基任教育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江隆基任教育部长，主管西北五省的教育。建国初期，党在教育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党的领导下，江隆基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江隆基认为首要的一个问题，是要对知识分子的状况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他认为，“新区绝大部分旧教育工作者，都要求进步，愿意为人民服务，是可以和能够团结并改造成为新教师的”^①。其次，他认为，要使这项工作收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提出改造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是：一，逐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纠正旧教育的传统思想，切实领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改革自己的教学工作；三，用科学的历史观点与辩证观点解释和研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任何过高或过低的要求都是不对的。他认为，在这里重要的是划清人民内部的落后思想和敌对阶级的反动思想的本质区

^① 《西北区中等教育现状与今后改革意见》，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第71页。

别，“我们不应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等同起来，应该辨别主要次要与轻重缓急，有步骤有重点地去加以改造”^①。再次，他认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问题。所以，应当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地改造其错误与落后的思想”^②。他不同意那种为了清除旧观点旧作风，甚至要求“教员过军事生活”，“采取粗鲁的斗争，坦白等方法”^③。江隆基在重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培养和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他说：“培养和提高教师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是办好教育的关键^④。为了及时地做好这项工作，在他的安排下，西北教育部于一九五〇年着手编辑了一批业务学习资料，如《普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文选》、《论教师的任务》、《语言教育的方向问题》、《中国历史教学参考资料》。

建国初期，江隆基还强调要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并提出当时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要树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的思想必须在各级学校中取得公开合法的领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应该在我们的各级学校中逐渐取得优势”；第二，“要把爱国主义的思想贯彻到各种课程和各种活动中去”。他认为，爱国主义是“一切工作和一切业务所内涵的东西”，而“决不是额外附加物”。同时，爱国主义的教育也不是“临时

①《稳步改革旧教育，努力建设新教育》，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集》第77页。

②③④《西北区中等教育现状与今后改革意见》，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集》第65、59、69页。

的、突击的任务”，而是“经常的、持久的工作”。他说，政治思想教育要从积极方面下功夫，应当“提倡正确的思想作风，培养科学的观点方法，启发其自觉性，发扬其上进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不要搞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也不要“消极应付，处处防范，使政治思想教育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①。

江隆基结合西北地区教育的特点，坚决地贯彻执行了教育改革的方针。在西北区第一次教育会议上，他就明确指出：“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细致的工作，应根据主客观条件有步骤地进行”；“西北教育事业的建设，必须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来进行”，“必须依靠新区教育工作者，去改革学校，同时也改造他们自己”。他一再强调，这一工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拖延不改”。特别是对于“操之过急”的问题，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他认为是一种“主要的偏向”。他多次地批评了这种“急性病”，坚决地纠正了“机械地搬运干部学校和短期训练班的”^②办法来改革旧教育的错误偏向。

在教学改革中，江隆基认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清楚认识教学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中心”。他指出，解放后，我们已经取消了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和国民党党义等反动课程，在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思想教育制度，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课。现在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正常的学习秩序”。社会活动也以“不妨害功课为宜，并须密切配合

^{①②}《稳步改革旧教育，努力建设新教育》，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第78、73页。

教学计划，以发挥其教育的作用”。他明确地提出：“在土改中，任何学校都不应在学校内进行查阶级、订成分、斗争地主清算恶霸一类的活动”^①。在对学校学习的指导上，也不应采取“挑战、竞赛方式”。他说，“企图用突击的方法去解决文化科学的学习”是违背教学规律的，这是“和科学的新教学方法不符合的”^②。

在课程的改革上，江隆基提出，主要目的在于使“课程内容能够适合国家建设需要，课程的份量能够适应学生的消化能力”，改革的重点应放在社会科学课程方面。对于教材中的理论观点、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等问题，要“逐步加以研究解决”，其基本原则应当是“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注意基础知识与专门知识的配合；要准备“采取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制度，以增强教学的计划性”。同时，还要把“每一门功课的讲授、自习、实验，恰当地配合起来，这样才能保证教学效果”^③。对于考试制度，他认为必须改革旧社会“形式主义弊病”，但是“也不宜机械地搬运干部学校的民主考试制度”^④。

西北五省是个多民族地区，做好少数民族教育的改革占有重要地位。江隆基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他多次强调，对“各少数民族教育必须重视，对其学校的改革必须根据其民族特点与社会历史条件，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去进行”^⑤。他指出：有的

①④《稳定改革旧教育，努力建设新教育》，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第79—85页。

②⑤《西北区中等教育现状和今后改革意见》，见《江隆基教育文选》第61、67页。

③江隆基：《在西北农学院的讲话》（1951年秋），原件存宋超同志处。

地方没有根据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企图用行政命令方式去取消宗教课程和经文学堂”等，都是脱离实际的做法，“甚至影响民族团结的”^①。

两年来，由于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西北地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和对旧教育制度的改革，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五)

一九五二年十月，江隆基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在北大师生召开的欢迎会上，马寅初校长致了欢迎词。他风趣的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延安，江隆基是延安教育界多年的领导人之一，是延安大学校长。他是来自我国新文化运动中心之中心。他来北大我们很幸运，我相信一定会把北大办得更好。”马寅初的话，反映了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殷切愿望。全校师生对第一个党的老干部进入北大，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爱戴！

北京大学，这所古老而驰名中外的最高学府，解放后获得了新生。江隆基到校时，正是北京大学从市内沙滩迁至西郊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不久，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刚刚结束，学校正面临着全面的教学改革和建立新的教学秩序的新时期。特别是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即将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实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到来

^①《西北区中等教育现状与今后改革意见》，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第60页。

的时候，北京大学和全国的其它高等院校一样，又将是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

江隆基来到北京大学以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全副精力熟悉、思考着北大的工作。他非常重视建立学校的领导核心。北大校长马寅初、副校长汤用彤都是非党人士、知名的学者，从解放区来的领导干部只江隆基一人（以后又陆续调来两三人），原北大的党员，大都是解放战争后期在学运中入党的地下党员，而且都很年轻，也缺乏管理学校的经验。所以，如何使党的领导起到核心作用，是个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在他的提议下，学校很快的成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凡属学校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都经这个小组讨论研究决定。之后，又以这个小组为核心，组成了包括校长、副校长，各系、室负责人和教师代表等参加的校务委员会。江隆基认为，“象北大这样的高等学校，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能没有党外人士参加领导”，“否则就难于调动非党领导干部和广大教师的积极性”^①。事实说明，在党委制还没有建立以前，正是这样的组织领导形式，起到了党对学校的核心领导作用。

在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所学校合并来的，但实际上远不止三个院校，如北京大学的哲学系，就是把全国大学里的所有哲学系合并在一起的。所以，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是由各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单位组成的。江隆基深切地感到，怎样才能把大家团结好，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是办好北大又一个关键问题。为此，他做了不少的

^①江隆基，《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转北京大学党委的申辩书》（1962年3月28日）

工作。一九五三年学校开学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布置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江隆基借此机会，组织了一个全校性的学习会。他把知名的学者、教授和系主任以上的行政负责人，都组织到这个学习会里，结合北京大学的实际，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每周活动一次。过去，这些同志虽然都曾接触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但是系统的学习，特别是通过听辅导、集体讨论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学习中国现代革命的基本问题，还是第一次。江隆基非常重视这一工作，从组织领导到辅导报告，都亲自过问。他自己学习也很认真，和大家一起读书，一起讨论，一起谈学习体会。由于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比较高，同时，又把他自己的思想和大家的思想交融在一起，所以大家都乐于积极地参加这个学习会，也敢于暴露思想，很多思想上、理论上的问题都互相见面，展开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不仅使大家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在感情上也融洽在一起，形成了和谐的团结的气氛。参加这个学习会的老教授，都感到有很大的收获。

江隆基到校后不久，北京大学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下，开始了对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及教学方法等一系列的改革。江隆基对这次改革提出了三条原则意见：一是学习苏联要考虑到中国的实际，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实际，注意避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二是注意继承和学习老解放区教育的优良传统；三是注意吸收旧教育中某些合理的因素。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既学到了苏联教学方面的长处，也结合了北京大学的实际，发挥了北京大学的潜力，成绩是显著的。一九五六年，江隆基去苏联访问。回国后，他进一步指

出：“我们的高等院校应当按照党的传统，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这两条，不能有任何的削弱。”

江隆基经常深入下去，随学生听课，参加教研组的活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认为北京大学的教改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把旧的脱离实际需要的自由主义教学制度转变为有明确培养目标的、有计划的、结合国家建设需要的教学制度；二，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整个教学工作中的指导地位；三，扩展知识传播的领域，丰富教学内容。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到一九五六年，北京大学不仅建立起系、专业和教研组的完整的教学组织体系，而且还相应的制订了系、教研组的工作条例；不仅提出了教学各环节中的教学形式和具体要求的规定（其中包括讲授、辅导、习题、实验和自习等）；而且还制订了教务管理中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其中包括学籍管理、考勤、考试考查、生产实习、进修、旁听、教学设备管理、函授教学以及人事管理、财物管理、图书管理等等）。另外，在加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中，还提出了具体措施和制订了有关制度。经过系科调整，在充分发挥北京大学的潜力和教师积极性的基础上，全校共设置了三十三个专业，开设了二百七十三门基础课和专业课；成立了十二个系，七个专修科，七十九个教研组。同时，每个系、教研组都制订了自己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每年都做一次修订，到一九五六年大都做了三至四次修订），百分之七十八的课程有了自己的教学大纲，百分之五十九的课程有了自己编写的教科书或讲义。

办学校主要依靠教师，这是江隆基一贯的办学思想。北京大学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有很多知名学者和专家教授。所以，在北大正确的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做好教师的工

作，显得更加重要。江隆基到北京大学后不久，对每位教师或者登门拜访或者相约谈话，很快就成了这些社会名流的知心朋友。他反复的强调，“在党的周围团结一批业务修养较好、政治思想进步的教授、讲师、在校一级和系一级形成科学领导核心”，是非常重要的。他从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从长远看必须“依靠新生力量”，在当前要“借重老教师”。在掌握团结和斗争的政策上，他认为，“强调团结是适宜的”^①。当然，强调团结，也不是放弃斗争，做无原则的迁就，但这种斗争决不是“开斗争会，出专栏，扣大帽子”等等^②。他认为，这种剧烈的，粗暴的作法是有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的。

建国后，经过党的教育，知识分子面貌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江隆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应当是“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知识上尊重他们，在思想上耐心地和风细雨地达到改造的目的”，“充分地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③。

江隆基不仅自己主动做老教师的工作，还要求学校的各级领导成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重视教师工作，注意搞好共产党员和老教授的关系。他提出，每个共产党员应当和老师建立“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商量、互相学习”的关系。

江隆基认为，办好学校除了主要依靠教师外，还必须有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北京大学在院系调整后，有一支比较强的原

^{①②}江隆基：《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月13日）。

^③江隆基：《在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4月8日）。

地下党员队伍，担任了基层领导工作。江隆基认为，他们虽然比较年轻，但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而且对大学比较熟悉，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应当成为办好北大的一支重要力量，要重视对这批青年干部的培养。江隆基对干部培养的特点是：放手使用，严格要求。他说：“不严格要求，是抓不好干部队伍的”。干部有错误或缺点，他也严肃地批评。但他的批评，从不是盛气凌人的，而是出于一种为了工作的责任感，一种关心和爱护。所以使受批评者往往是不仅心悦诚服，而且还感到温暖和关怀。他认为，干部对自己的工作必须是认真负责的。他不容忍那种对于工作不负责任，玩忽职守的现象。他也反对那种看风使舵，不讲原则，表里不一的作风。他还认为，干部一定要熟悉本职的业务，不能做“外行”。他要求北大的干部，除了学习本身的业务外，都要学习点教育学，教务处的干部则要系统地学习教育学。

江隆基根据大学的任务和特点提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任务是：“加紧培养党内专家”。他明确指出：“发展党员也必须通过教学、通过科学研究，才能确定他是否够党员标准”。他认为，“衡量一个教师或学生党员的阶级觉悟，首先应当看他所负担的教学、科学研究或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他还鼓励党员干部，要努力学习业务，要成为业务指挥上的“内行”。他认为，“学校是搞学术的，不懂业务或者业务条件很差的人，硬要去指挥一切，势必出现很多毛病”。结合高等学校的实际，他提出，教员党支部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提高师资水平，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力开展科研工作为中心，来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①。学生党支部的工作，也应

^① 《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会工作报告》（1956年5月）。

当“着重围绕着不断提高学习质量来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并注意从各方面来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①。

一九五六年，在党的号召下，教育、科技战线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共青团北京大学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江隆基作了专题报告，着重阐述了高等院校的学生如何正确地向科学进军的问题。他指出，向科学进军，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出色地完成学习任务，同时加强课外研究工作”，绝不能理解为“脱离教学计划”去另搞一套。他说，向科学进军的前提，“是建立和巩固专业思想”，不能“狭窄地理解科学”，也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同时，应当看到“向科学进军是步步前进的”，必须“按一定的步骤循序渐进”，“想一步登天是不合实际的，也是有害的。”^②

他认为，对学生的培养，重要的是坚持全面发展的方针。但是，对全面发展也不能做片面理解，“似乎是并重的，平均发展”。他说“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专业知识的学习应作为中心”^③。他认为，“一个学生的主要活动应当是他的学习和课外科学研究活动，他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学习方面。他的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和对国家的负责精神，是首先应该表现在他的学习效率的不断提高上”^④。

①《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会工作报告》（1956年5月）。

②《和青年同志们谈谈向科学进军的问题》（1956年2月），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第172、173页。

③江隆基：《在北京大学第三届学代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载1956年11月北京大学校刊。

④江隆基：《在北京大学学生先进班给奖大会上的讲话》（1956年5月4日），存北京大学档案室。

在江隆基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由于全面地正确地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了党内外的大众，巩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使得教师和干部的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教学和科学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全校的上下级之间，新老教师之间以及广大的师生之间出现了空前团结融洽的气氛。北京大学走上了一个繁荣兴盛的新阶段。

一九五八年，伴随着“大跃进”口号的出现，在高等学校里也进行了一次“教育革命”。针对这次“教育革命”对教育造成的严重影响，江隆基指出：“政治上革命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教育却不能这样。他还对在教育革命中“学生上讲台，教师下讲台”的所谓“群众路线”，提出不同的看法，说……教学工作绝不能搞这样的“群众路线”；“教育革命”不能影响教学，不能破坏教学秩序。北京大学六十年校庆时，陈伯达来北大，说要把北大办成共产主义大学。江隆基当即指出：“现在没有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怎么能办共产主义的大学？”事后他又给陈伯达打电话，说这是“不了解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制度混为一谈了”。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和它给学校带来的损害，在北京大学一次书记碰头会上，江隆基又明确地提出三点意见：

“一，政治运动要搞，但教学业务也不能不抓。二，破坏现有秩序很容易，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却很难，现在的秩序是解放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秩序。我认为学校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改革，不可轻易破坏现有秩序。三，过去几年的群众运动每次都有些副作用，因此，我觉得领导干部在群众运动中必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这些中肯的实事求是的意见，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六)

一九五九年一月，江隆基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兰州大学是西北高原上一所历史较久的高等院校，解放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几年的改革和建设，已成为初具规模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但是，江隆基到兰大时，正是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之后，学校教学秩序混乱，问题成堆。

江隆基为了亲自摸清和掌握兰州大学的历史和现状，除了召开几种类型的座谈会外，还专门组织了两个调查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根据调查的结果，他认为兰州大学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为了纠正这种“左”倾偏向，他指出，学校不同于工厂，“学生读书是获得知识的主要方法”，“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教师要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①。并开始了整顿学校教学秩序的工作。

一九五九年六月，江隆基撰写了《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中的几个原则问题》^②一文，指出，高等学校的中心任务是不断的提高教学质量。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坚持这样几个原则：一是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种教学和各项活动中发挥统帅作用和灵魂作用。二是要以教学为中心，把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他说，“所谓三结合，并不是三分天下，而是以教学为主”。三是正确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任何“片面地强调理论或者片

^①江隆基：《在中共兰州大学党委会上的发言》（1959年初）。

^②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第211—225页。

面地强调实践，都会使教学工作受到影响”。四是在业务教学上要使“博”与“精”统一起来，只有在“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精”。所以“首先要重视基础课的教学”，要提倡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基础课。五是在党的领导和“教学相长”的原则下，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①。这篇论文对于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学校教育中的混乱现象，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高教六十条下达后，他积极贯彻执行。从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红专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双百方针、教师队伍的建设、教学计划、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学习方法等方面，根据兰州大学的实际，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在培养目标上，他指出：

“我们所培养的是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有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劳动者”，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本质特征来说的。不能把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误认为我们的培养目标是普通劳动者”^②。他明确指出：“做什么学什么”，“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同样会降低我们的培养目标。

在红与专的问题上，他指出，我们应该坚持又红又专。学生的红不仅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学习的实际中。他说，“很难设想，一个学生学无一技之长，空具一片赤心，能够成为合格的革命者和建设者”^③。

在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理论与实际的联

^①载 1959 年 6 月 22 日《甘肃日报》。

^②《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几个问题》，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第 230 页。

^③《中共兰州大学党代会的工作报告》（1961 年 1 月 23 日）。

系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条基本原则”，必须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但是不能硬套“实践——理论——实践”这一公式。因为一切知识和理论虽然都是从实际经验中积累起来的，但这种经验却有直接和间接之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间接经验是大量存在的。就青年学生来讲，一般情况下都是从现成知识开始的，特别是“在较短的学习时间要想获得丰富的知识，必须注重古今中外的间接经验。接受间接经验的主要方法，就是要细心听讲和认真读书。”^①他认为在讲课中，理论联系实际要以理论为主，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要以教育为主。

关于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他提出，“任何科学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方法指导下，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贯彻“双百方针”的主要精神是“活跃学术空气，发扬学术民主”。对“两家争鸣”的说法，他认为必须有正确的理解，这种说法是指哲学思想，即世界观的问题。至于学术问题，应该是有多少家就算多少家，不能硬套阶级观点，乱贴标签。他说：“贯彻双百方针，从领导角度来说，首先必须积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既不能听任某一学派实行科学垄断，又不能对学术讨论问题轻易地下结论，强制推行某一学派，而压抑或禁止另一学派。在学术讨论中，应坚持平等精神”。同时，我们还应当“进一步解除学术工作者的思想顾虑，鼓励他们大胆地自由辩论，自由竞赛”^②。

关于教师队伍的建设，江隆基提出，“教师是教学和科学

①《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几个问题》，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第229页。

②江隆基：《兰州大学科学讨论会开幕词》（1962年）。

研究的主导力量，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的高低决定于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思想水平”^①。所以，搞好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业务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条是通过教学实践，另一条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应当持续不断地狠抓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时鼓励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因为“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是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最基本的道路”^②。对于青年教师，“一般培养成长的过程大体是打好基础，过好教学关，掌握独立科研能力，逐步使他们扎扎实实的成长起来，不能要求过急，否则欲速则不达”。无论是对老教师还是青年教师，他认为都应当“本着严格要求的原则，认真做好师资的考核、鉴定、评审、提升、选留和调整等工作。”他还特别强调说：“教师不能依靠他的称号取得学生的尊敬，更不能依靠封建统治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要靠他出色的教学成绩、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优良作风，去赢得学生的尊敬和信仰”^③。

江隆基认为，要做好教师的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指出，对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把团结和使用结合起来，最好的团结就是最有效地使用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同时，我们还要“关怀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替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帮助他们做出成绩”。他认为，在贯彻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要注

① 《谈谈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第253页。

② 《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几个问题》，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第231、233页。

③ 《中共兰州大学第三次党代会工作报告》（1963年12月）。

意“纠正在教师工作中的‘左’倾”。他说，“过去我们改造讲得多，团结讲得少，今后要多讲团结，少讲改造”^①。

在教学计划等方面，江隆基提出，要有严密稳定的教学计划和良好的教学秩序。他说：“教学计划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现培养目标的行动方案”^②。“教学大纲在决定课程内容、贯彻教学计划和保证教学质量上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而教材建设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他还说：“有了好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如果教学方法不好，仍然不能很好地提高教学质量”^③。所以，要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他认为，改进教学方法要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和发挥学生独立钻研精神三项原则，并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各种教学环节中。

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地进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教育。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注意调动和保护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讲求实效，“避免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实际上却是空空洞洞的形式的做法”。他主张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得细致深入，要深入到教室、实验室、车间、宿舍、饭堂、俱乐部去，密切结合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和课外活动，因人因事因时，采取多种多样机动灵活的方式，去解决各种各样的思想问

①江隆基：《怎样改进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1962年）。

②③《关于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些措施和经验》，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第244、248、250页。

题。

在学生的学习方法方面，他还提出，要遵循学习规律，改进学习方法，循序渐进，逐步提高。

高等学校由教师、学生、职工三部分人组成，这三部分之中又有党与非党之分，教师之中，又有青老之分。江隆基说，“办好学校，必须搞好这几部分人的团结与合作”，正确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师生之间应当是“尊师爱生，教学相长”；青老教师之间应当是“青年教师虚心学习老教师的专长，老教师帮助新生力量的成长”；师生与职工之间应当是“职工为师生服务，师生尊重职工的劳动”；党与非党之间应当是“党员对非党员人士要平等对待，尊重人家的职权，非党人士对党组织要思想见面，主动靠拢党的组织”^①。

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江隆基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和制订了许多相应的制度。如在稳定教学秩序方面的“四大固定”（教学计划、教材、教师任务、科研方向）和“三小固定”（教学日历、课程表、作息时间表）。在提高教学质量上提出要“三抓”（师资培养、教材、学生的基本训练）。在规章制度方面，制订了如《保证教师业务活动时间的具体规定》、《学生考试评分标准和成绩登记的暂行规定》、《关于各个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关于仪器设置管理细则》等，约有十六种。

江隆基在兰州大学工作的几年中，还结合“大跃进”以来教育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他多年来领导高等学校的

^①《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1962年春），见《江隆基教育论文选》第268—269页。

实践，撰写了有关教育方面的许多论文。其中在一九六二年写的《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可以说是一篇代表作。它总结了高等学校工作的基本经验，实际上是比较全面地揭示了高等学校教育工作的规律，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九六三年秋，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派出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江隆基任副团长（团长张友渔有病住院后又代理团长）。访问期间，江隆基向日本人民介绍了我党的教育方针和我国高等学校教学改革中的情况，传播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日本教育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江隆基的主持下，兰州大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全面地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正确地执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建立了稳定的教学秩序。基础课的教学，教材和实验室的建设以及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都得到了全面的加强；干部队伍的素质也有了新的提高。学校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了教学和科学研究上来，并初步建立了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科学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到“文化大革命”前，全校共设置九个系，二十六个专业，其中有机化学、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和细胞生物已成为全国闻名的专业和学科。兰州大学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贡献了力量。

江隆基品德高尚，作风正派。他既是诲人不倦的良师，又是严以律己的模范。他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宣扬自己。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迁就错误，也不随波逐流。他待人宽厚，谦虚礼让。同志有错误，他会当面指出，自己有错误，也

会主动检讨，从不文过饰非。他工作勤奋刻苦，朴实严谨，报告讲话，大都是自己起草。他善于广泛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并把每周五的晚上，定为接见群众来访的时间。每次外出开会回来，他总是先到各处、室走走，问寒问暖。他处处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近处开会，总是步行，看电影、办私事，从不用公家汽车。在北大时，原配给他一名警卫员，他坚持不要。他的爱人宋超，在一所工农速中工作，交通很不方便，来回都是乘公共汽车，从不乘坐学校的小汽车。有人提出，是否将宋超调到北大或者附近工作，互相也有个照顾。他也婉言谢绝了。他生活俭朴，经常教育子女在政治上不要有优越感，在生活上不能特殊化。越南抗美战争中，他拿出二千元支援了越南人民。听到工会互助金周转困难，他又拿出三百元，支援了互助会。三年困难时期，他下到食堂和学生同桌吃饭，而且总是叮咛炊事员不要对他另眼相待，不要把菜给多了，馒头给大了。逢年过节，他总忘不了住在医院里的病号，不是亲自看望，就是派人慰问。江隆基在广大师生中，赢得了深切的崇敬和爱戴。

五十年代起，江隆基曾先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康生就叫嚷“江隆基不是自己人”。于是，他遭到极其残酷的批斗，不幸被迫害致死，享年六十一岁。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由中共甘肃省委主持，在兰州为江隆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宣布：“原

省委强加给江隆基同志的罪名和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处分决定，应予撤销。给予彻底平反昭雪”。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胡乔木等都送了花圈。兰州军区和中共甘肃省委的负责同志出席了追悼会。十二年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

江隆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党卓越的教育家，教育战线上一位卓有成就的领导和组织者，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坚强战士。他一生献身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全心全意，鞠躬尽瘁，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他的全部精力。在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史和社会主义教育史上，都凝结了他的智慧和艰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江隆基身前有关教育问题的论著较多，由于战争关系，失散了一些，选编有十七万字的《江隆基教育论文选》，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附记：

本文在征集资料过程中，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中共兰州大学党委和许多革命老前辈都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怀和支持；兰州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部分同志也参与了某些访问调查，谨此致谢。

艾 思 奇

苏 浙 英

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一九一〇年二月三日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母亲寸宽福是位勤劳贤淑的家庭妇女。父亲李曰核(字梓畅)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曾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系同盟会员，在护国讨袁斗争中任蔡锷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兼秘书处长，后因反对新军阀唐继尧险遭杀害，被迫流亡他乡，致力于先秦哲学研究，著有《天地一庵诗文集》、《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汗漫录》等，家中有丰富的藏书。

艾思奇两岁时随母亲迁居昆明，七岁入私塾，后入国民小学。十四岁到父亲流亡的香港，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在港期间，父亲常与他说起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志士，以及蔡锷护国讨袁慷慨悲歌的壮举。艾思奇自幼勤奋好学，喜欢思考。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指导下，除四书五经外，他还读了《老子》、《庄子》等先秦哲学典籍，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启蒙

教育。同时，父亲的遭遇和颠沛的生活，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二五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艾思奇回到昆明，同年考入省立一中。这是一所进步学校。共产党员李国柱（一九三一年被军阀杀害）在该校任图书馆管理员，秘密组织青年读书努力会，开展革命活动。艾思奇在这里初次读到《新青年》、《向导》等刊物，深受新思潮的影响，决心投入反对黑暗世界的斗争中去。他很快成为斗争中的骨干，负责学生会学艺部的工作，并任校刊《滇潮》的编委，经常撰写充满激情的反帝反封建的稿子。由于他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文笔出众，受到进步教师楚图南、陈小航（罗稷南）的称赞。一次，在市学联组织的讲演会上，他作了《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演说，引起师生们的惊异。这时，他初步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并表现出敏锐的政治头脑和对理论的极大兴趣。

这期间，艾思奇还热情地与两位进步同学组织了一所工人夜校，自任训导主任兼教员，学生都是附近兵工厂、造币厂和街道上穷苦人家的子弟。他白天在一中读书，晚上到夜校讲课，教文化，宣传进步思想。虽然条件十分简陋，时常要工作到深夜，但他不以为苦，而以能切实为劳苦大众做事为快。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举行了各种抗议活动。艾思奇总是积极参加，并在《滇潮》上发表声援文章。

一九二六年，北京又发生“三一八”惨案，昆明学生运动进一步高涨。反动当局下令逮捕骨干分子，艾思奇也被通缉，后在他父亲的学生李沛阶帮助下，才乔装成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取道越南，逃到苏州，找到流亡中的父亲。为继续读

书，一九二七年初，他到南京找到大哥李生庄。当时李生庄在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是共产党员，学生会负责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的思想和行为给艾思奇以很大的影响。北伐军打到江浙之际，军阀孙传芳到处抓人，李生庄得到消息，来不及通知弟弟便逃往上海。艾思奇被捕，且被判死刑，幸有知名人士、宗伯李根源出面才保释出狱。

风云变幻，政局不稳，艾思奇的父亲对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他觉得自己虽然满腔热忱投身革命，但推翻了清王朝和袁世凯，却仍是军阀混战，国弱民穷，他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振兴实业的人才”。因此，希望艾思奇走工业救国之路^①。一九二七年春，十七岁的艾思奇，怀着探求知识与真理，立志救国的雄心，东渡日本求学。

(二)

一九二七年春，艾思奇到达东京。那时的东京，世界各种思潮、学派、学说充斥，艾思奇仿佛置身于知识的原野，开始了顽强的追求与探索。人们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青年，终日如饥似渴地读书，涉猎各种知识，几乎把所有能用的时间都用上了。美丽的富士山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近在咫尺的洗足池公园也从未去；但他却是神田书店的常客。在浩瀚的书海中最吸引他的是哲学。一本黑格尔的《逻辑学》几乎被他翻烂了。对于凡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更是悉心研读。以前，他喜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而今，大量西方哲学原著，在

^① 《艾思奇文集》第2卷第902页。

他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新天地。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培根、康德、黑格尔，尽管学派纷纭，枝蔓芜杂，但他锲而不舍地钻研、探索，纵观几千年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发现了许多人类精神的瑰宝，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历史地位。这时，由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负责人张天放、寸树声介绍，他参加了社会主义学习小组。从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加刻苦、自觉了。在读了日文版《反杜林论》以后，他深感日译本不够好。为了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开始自学德语，把日、德文本对照攻读，力求取其精义。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东京支部组织同学回国以示抗议；他于一九二八年春回国。

由于生活艰苦，劳累过度，艾思奇在日本患了严重的胃病。回国后，在昆明养病的两年期间，艾思奇刻苦钻研了从日本带回的许多马列著作，并积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如以云南书报社名义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团体等；还与大哥李生庄一起研究西方哲学。当时，李生庄主编的《民众日报》副刊上辟有《象牙之塔》和《杂货店》专栏，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艾思奇常常用“小叻”、“店小二”、“SG”、“三本森”等笔名投稿，以杂文、译文形式介绍新文化和新的哲学观点。其中在对《费尔巴哈论》的解释和对公孙龙子“白马非马”命题的讨论上，兄弟间在报上公开争论，引起人们的兴趣。艾思奇还常常为《市政日报》撰稿，成为该报副刊“小宇宙”的骨干之一。这期间，他还翻译介绍了英国青年诗人济慈的名著《夜莺歌》和日本国木田独步的小说《孤独者》等作品。

艾思奇将《国际歌》、《马赛曲》和日本渔民打渔的小调

带回昆明，并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由聂耳在音乐会上教唱。他和聂耳早在昆明省立一中读书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他从日本回来，专门给聂耳带回来了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传记，并给聂耳介绍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使他们成为亲密的战友。

一九三〇年初，艾思奇病愈，再度赴日，年底，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这期间，他仍然广泛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甚至在同学聚会的喧闹场合仍手不释卷，其刻苦精神为同学们所叹服。在哲学方面，他更加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颇有所获。当时，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中国青年会，每周在神田区学习一次。艾思奇住在大冈，每次不顾路远，从不缺席。他的发言很有见地，时常把从社会上调查感受到的材料作理论上的深入分析，鞭辟入理，给人启发。经过三年多的刻苦学习与思考，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却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宇宙和社会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同时，他对救国之路也作出了新的判断，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①”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艾思奇和许多爱国留日学生愤慨万分，毅然弃学回国。

^① 《艾思奇文集》第2卷第902页。

(三)

艾思奇曾向往能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留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实现。当时，他的父亲已出任云南“殖边督办”。老人仍希望儿子继续学工，以助他兴办实业。对此，艾思奇断然拒绝。他决心脱离家庭，走自己的路。

一九三二年初，艾思奇到达上海，曾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文章。八月，他在留日同学的帮助下到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该校的共产党员团结广大教师、青年正同反动当局作斗争。艾思奇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并积极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的革命活动。他开始以“思奇”、“李东明”等笔名在《中华月报》上发表哲学短文，并着手翻译苏联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九三三年初，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人杜国庠到泉漳中学了解斗争情况。该校有人反映艾思奇对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不积极，要杜国庠做艾的工作。杜国庠则发现，尽管艾思奇不爱出头露面，但思想活跃，学习勤奋，有较好的理论基础，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应该发挥他的长处。于是便与当时“社联”的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艾思奇的关系转到了“社联”，使他有了充分的时间进行哲学研究工作。不久，由杜国庠和许涤新介绍，艾思奇正式加入“社联”，并担任研究部的工作。从此，他以笔为武器，更加坚定地走上了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而奋斗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五月，艾思奇第一次写作了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在党领导的“文总”主办的《正

路》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编者指出：“作者以宏博精深的研究说明抽象作用，以及抽象作用在辩证法的正确运用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以丰富的哲学史知识，阐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反映出艾思奇已具有相当的哲学水平。

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在实行暴力统治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围剿”。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着上海。艾思奇从自觉地走上革命的文化道路那一天起，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充斥思想界的形形色色的反动哲学进行了勇敢的战斗。他系统地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哲学界的斗争，剖析了几种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派别，写成了《二十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对当时流行的胡适实用主义和玄学派张君勱的形而上学，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旧哲学统治的时代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在中国有着无限未来的必然是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使被压迫者的前进之势更加锐不可当。

当时中国反动哲学界的主要代表是新康德主义者张东荪和叛徒、托派分子叶青。艾思奇指出：他们的哲学是一种“披着辩证法外装的另一种唯心论”。围绕着哲学消灭与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和唯物辩证法的实质等问题，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同他们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并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叶青早年曾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长沙叛变革命。当时叶青的叛徒面目尚未被揭穿，他的假唯物论、假辩证法在进步青年中还有相当的欺骗性。他鼓吹“宗教——哲学——科学”的公式，胡说哲学离开宗教而独立时，它

便否定了宗教；现代科学既离开哲学而独立，哲学也就被科学所否定而走向消灭。艾思奇揭露了这一理论的反动本质，指出其目的是使唯心体系复活，消灭唯物论，并引用大量事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驳斥，论证了企图用科学代替哲学的荒谬性。

叶青等还歪曲和篡改新哲学的辩证法，说什么唯物辩证法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逻辑就是形式逻辑，鼓吹什么“运动是静止的积累，静止是运动的停留”，企图使运动附属于静止，挖掉辩证逻辑的灵魂。艾思奇一针见血地指出：两千年前古希腊的诡辩论者，就是把运动看作是空间中的无数停留点，因此，他们认为只有无数的停留点而没有运动。叶青的谬论不过是这种古老的形而上学在二十世纪的还魂。

叶青、严灵峰等人还从哲学上宣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功的所谓“外烁论”。艾思奇愤然命笔给予迎头痛击，揭露了叶青等人在中国问题上夸大外力，是抹煞和否定辩证法基本原理的诡辩论。他联系中国近代历史事实，从内因外因统一论出发，论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批判了叶青等人把一个国家的变化说成是“全面由外力造成”，民族解放的前途要“受外力的左右”的荒谬论点，指出这种论点不过是和敌人、汉奸的反共嘈声相呼应。

在这场哲学论战中，艾思奇有力地驳斥了叶青等人对新哲学的歪曲和诬蔑，揭露了他们的阶级本性，扩大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贡献^①。

^①参阅《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303、310、328、487页。

为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以胡秋原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人”，鼓吹文艺自由论，反对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大肆攻击左翼文化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鲁迅和“左联”的革命作家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当时，艾思奇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写了不少文章，如《文艺的永久性和政治性》、《诗人自己的道路》、《论文学的鉴赏》等等，阐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指出艺术的永久性不排斥文艺的政治性，两者始终是统一的。胡秋原等还断言马克思在文艺领域内也是自由论者。艾思奇撰文批判了这一荒谬论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的现实主义基础是“奠于唯物史观之上的”，而我们“在写作中应始终贯彻唯物史观的真理。”^①

一九三四年春，《申报》副刊“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开辟了一个“读书问答”栏，宣传进步思想，影响很大。当时国难深重，广大读者热切地探索求知，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负责这个栏目的柳湜要求“社联”派一位有理论修养的盟员去支持这个副刊，“社联”党团组织决定派艾思奇去工作，一同为读者解答生活和读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艾思奇把它当作宣传新思想的阵地，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非常认真。仅仅一年时间，指导部发出的有关学术内容的复信就有一千八百多件。主持“读书问答”的艾思奇、柳湜，在李公朴先生的积极赞助下，创办了《读书生活》杂志，由李公朴任主编，艾思奇、柳湜、夏征农任编辑。这个刊物以通俗活泼、紧密联系实际见称。两年后，被反动当局查封。

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蓬勃开展，面临民族

^①参阅艾思奇，《论文化与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版。

危机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新的思想武器。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作用，使它能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是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开拓性工作，“还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是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①。艾思奇曾经苦苦思索，他认为：“我们这个国家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不多，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我们写文章，做工作，一定要把这些人当作我们的对象”。他坚定地开始了新哲学通俗化的探索。一九三四年他写出了《哲学讲话》，成为实践哲学大众化的开端。这个“讲话”原是在“量才业余学校”的讲稿。在广泛征求学员意见的基础上，又作了整理，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哲学并不神秘”。此后，“讲话”在《读书生活》上连续发表，第四版后改名为《大众哲学》。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别开生面的形式，阐述了新哲学的基本原理，一扫以往哲学艰深玄奥的色彩，使新哲学开始走到人民大众中去。它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启发引导人们探求真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路。很快，这本书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这本书还有一些缺点，并遭到反动文人的种种诬蔑和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但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全国解放前共印行了三十二版。在黑暗的旧中国，首次以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动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作用。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三五年十月，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更加自觉、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更加

^① 《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285页。

积极地参加全国救国会和文化界救亡协会等团体的工作，积极从事以鲁迅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为了调动抗日救亡的积极因素，使新文化运动能在抗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与老舍、郑振铎、李公朴、郁达夫等共同署名发表了《我们对文化运动的意见》。艾思奇当时发表的文章还有《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论思想文化问题》、《论赛金花的风波》等，其中心都是强调爱国主义的。一九三六年，艾思奇发起组织了秘密的新哲学研究会，并主讲哲学史。陶行知主办的山海工学团，艾思奇热心地去讲课，还为江苏省委的地下党报写社论。这一阶段，他出版了《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哲学与生活》等书，并和郑易里合作翻译出版了苏联米丁的《新哲学大纲》，还写了一些科学小品。他创办了综合性学术杂志《认识月刊》，参与了《文化战线》旬刊、《战线》等刊物的编辑工作。一九三七年，他参加上海著作人协会，与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等共同署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宣言》。

一九三七年九月，艾思奇与上海文化界十几位知名人士被党组织调往革命圣地延安。

(四)

从上海到延安，从白区的文化战场到抗日根据地的讲坛，艾思奇的革命生涯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任教，并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协会主任。

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

括、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党在路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常与艾思奇一起研究哲学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毛泽东对《哲学与生活》作了长篇摘录后，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①。

一九三八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同年九月三十日，在《解放周刊》第五十三期上公布了《新哲学会缘起》，提出：“为着要使理论更有实际指导力量，在研究上就不仅仅要综合从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些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新哲学会的成立，推动了延安和全国各解放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

一九三八年底，延安马列学院成立。艾思奇转到马列学院任教，并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在这期间，他除了讲课以外，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信》，并为《解放周刊》、《解放日报》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报刊撰稿。

一九三九年，艾思奇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管延安文化协会和救亡协会的文化工作。他除了参与边区文化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外，还写了不少有关文化和艺术方面的文章。

这一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成员有艾思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奇、何思敬等，每周活动一次。随后，中央各机关的学习小组也纷纷成立，读书学习蔚成风气。中宣部的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艾思奇为指导员，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同志。每周的学习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以便大家研究讨论。为了配合学习，他还编了《哲学选辑》一书，并与吴黎平合作，完成了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的任务。党采用此书作为对干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的教材。

一九四〇年二月，延安出版了综合性学术刊物《中国文化》，艾思奇担任主编，在创刊号上首次发表了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文化》积极倡导学术研究和开展讨论，鼓励学术争鸣，艾思奇也撰写了许多文章，并从第四期起连载他的“哲学讲座”。是年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艾思奇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

这一年六月，延安新哲学会举行了第一届年会，艾思奇作了会务工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的方向和取得的成绩，并指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

一九四一年七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随后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艾思奇任该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五月间，艾思奇听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曾十分认真地对身边的同志说：“过去我们对于马列主义怎么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理解不深的，现在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后，他就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确定了研究“五四”以来文化思想的发展，特别要重点研究蒋介石、

陈立夫、阎锡山、胡适等人的哲学思想。这一阶段，艾思奇发表了《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等文章，批判了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以及阎锡山的“中”的哲学等等。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并亲自布置编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主编，要求两个月内交稿。艾思奇和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教研室的同志们连夜赶编，如期完成任务，成为整风运动必读文件之一。

艾思奇严于律己，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在整风运动中，他针对自己偏重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的缺点，以及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严格解剖自己，认真作了自我批评。在整风期间，他有针对性地写了《“有的放矢”及其他》、《不要误解实事求是》、《学习观念的革新》、《主观主义的来源》、《一往无前》、《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他深刻总结了自己的学习体会，指出：“这一个运动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干部，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也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在这些教育的帮助下，开始认识了和改正了自己许多知识分子的缺点”。在运动后期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过程中，他坚决反对“左”的偏向，勇于仗义直言，坚持实事求是，反对“逼、供、信”，主张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表现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五月间，艾思奇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年底，又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党的代表大会。

一九四三年初，艾思奇调往《解放日报》社，任副刊部主任。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蒋介石抛出

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艾思奇当即写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对蒋介石反动的“力行哲学”进行了尖锐有力的分析批判。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界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动人景象，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为工农兵写作蔚然成风。艾思奇写了不少文章宣传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的正确方向，如《群众需要精神食粮》、《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等等，热情称颂了当时的延安文艺运动。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艾思奇还挤时间翻译了海涅的政治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就写了《海涅的政治诗》一文，介绍这位德国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称赞他不仅是歌咏爱情的好手，还是社会斗争中的一名战士。当时只有人翻译海涅的情诗，艾思奇决心把他的政治诗介绍给中国读者。自一九三一年开始，他用点滴时间，断断续续，历时十四年之久，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冬，了却了这桩心愿。是年底，经林默涵费尽周折，将这部译稿带到重庆出版。

一九四五年四月，艾思奇出席了党的“七大”。八月，担任了《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一九四六年底，担任总编辑。这期间，他工作十分繁忙，夜以继日地审稿、写作，为办好党报付出了极大心血。同时，还出版了他的《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等论著。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解放日报》于三月二十七日以后停刊，报社全体人员向晋察冀撤退。艾思奇于行军途中得了副伤寒，不得不留在晋西北的岢岚伤兵医院

治疗。痊愈后即到晋察冀边区建屏县党中央所在地，参加了中央工委召开的土地会议。年底，他受中央委托去解决北方大学的一些问题并工作了一个时期。这期间，他计划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并组成了助手班子，但由于形势发展迅速，迫切需要开展哲学普及教育，他打消原计划，全力以赴赶写《社会发展史》。十月，中央决定重办马列学院，艾思奇调该院任教。从此，他按照党的要求，以主要精力兢兢业业地从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研究工作，一直到建国以后。

(五)

全国解放以后，艾思奇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工作。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党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还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对外文委常务理事；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一九五五年参加中苏友好代表团访苏；一九五六年冬赴波兰参加国际哲学讨论会。一九六四年夏，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非地区科学讨论会。以《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哲学思想》为题作了报告。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新的贡献。

建国之初，党为提高广大干部以及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决定在全国开展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活动。艾思奇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他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从头学

起》一文，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就要达到全国胜利，在全国人民面前，还有更多复杂艰巨的任务要完成。为了掌握思想武器，要求经过这一学习、教育，系统地掌握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二、阶级斗争的思想；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这期间，他应邀到许多单位作报告；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一书，经修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社会发展史讲座》节目里，进行了系统的讲授。这本书后来改名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先后出了十版，印刷十三次。这次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对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确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心投身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的解放和进步服务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艾思奇除了自己担负大量讲授任务外，还培养了一批教学骨干，进行辅导讲学。针对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和倾向，他还写了《评关于社会发展史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反驳唯心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斗争》等文章。

解放初，中国哲学会组织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定期举行讨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观、研究学术问题。会上常由艾思奇和胡绳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解答问题；也请教授们介绍中、西方哲学。

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一贯重视对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在近代先后输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是实用主义。一九五五年，艾思奇撰写了长篇论文——《胡适实用主义批判》，有力地揭穿了实用主义的“科学”和“最新哲学”的假面具，剖析了它的主观唯心

主义的实质。文章指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才是一切科学的真正的理论基础，才能提供我们真正完善的科学方法”。以后，他又写了《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从其不可知论、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三方面深刻地揭露了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系统地批驳了这种土生土长的主观唯心主义。

艾思奇在延安时，正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由于工作关系，他与毛泽东的交往较多，比较切实地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建国后，艾思奇仍十分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曾多次讲课，撰写文章，一九五〇年发表了《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一九五二年又发表了《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理解和运用》、《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方法》等等。一九六〇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他写了两万多字的读书笔记，以《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上。在多年深入研究的过程中，艾思奇对毛泽东思想始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并非僵死不变的，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同时他又坚决反对在没有弄清一般原理时就“任意用贴标签的方式空谈毛主席对它的发展”，而认为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他反复强调，只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对革命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作出结

论，找出指导工作和斗争的方针、计划、方法，以此推动工作和斗争取得胜利”，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以后，艾思奇写文章赞扬过群众的革命热情。随着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开始泛滥，他在河南下放期间看到不少问题。于是直接写信给省委负责同志，说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时，他还发表了题为《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的文章，一方面赞扬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必须要注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文章指出：“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而一点也不能离开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是我们一条重要经验。”一九五九年初，他又在《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特别指出“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群众力量的发挥总有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群众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他在总结下放工作时曾严肃地指出：下面刮“五风”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认真纠正，农民就要打扁担。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艾思奇一生最喜欢的格言是“实事求是”，并把它当作自己践履笃行的生活准则。他为人善良正直，诚实敦厚，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一片赤诚，从不在人背后议人长短，更不存有意整人之心。但当同志受到诬陷，遭到打击时，他则置

个人安危于度外，勇于坚持真理。如对于一九五三年“三反”时被整而自杀的周文同志，他在会议上公开为之鸣不平。一九五八年哲学教研室副主任陈仲平被错打成右派，他一直认为是冤案，积极奔走，要求为之平反。而对于自己则始终谦虚谨慎，自律甚严。一九五二年，他写过一篇《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文章，当同志们指出其中的片面性之后，他认真检查，诚恳接受，多次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解放后的十七年中，艾思奇一直从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他在中央高级党校担负了大量教学工作，为党培养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兢兢业业、呕心沥血，除了组织、计划教学外，无论是高级干部班、师训班、理论班，还是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等，几乎每期、每班他都去讲过课；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还是经典著作、形式逻辑、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或中外哲学史等，在许多哲学领域的科目他都进行探讨和讲授。其它机关、团体、学校等来请他讲课，作报告，他也是有求必应，不辞劳苦。他一贯以治学严谨著称，每次讲课，都要研究新情况，重新修改讲稿。他常对搞教学的同志说：那种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一味引章摘句，照本宣科，课是讲不好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透彻朴实，逻辑性强，联系实际，力求从理论上给人以新的启迪，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更是一丝不苟、扎扎实实，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而对于不同意见，则认真听取，反复探讨。他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总会越辩越明。

一九五四年起，他就在校内系统地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初步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一书，一九五七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易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这本书，紧

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一九六一年，中央宣传部和高教部联名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艾思奇任哲学专业组组长，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为此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编写过程中，他和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都力求准确、简明，无论从总体结构到各章内容，从基本观点到材料的选用，都逐章逐节，字斟句酌地修改。这本书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说明问题，联系实际斗争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的哲学思想，成为建国后第一本较为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艾思奇十分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研究自然辩证法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任上海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致力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宣传和著述。如通过分析洛治·汤姆生、爱丁顿等科学家的研究道路，指出科学家如不能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就难免陷入形而上学。在《进化论与真凭实据》一文中，他用丰富的实验材料阐述了进化论的科学内容，有力驳斥了歪曲进化论的邪说。他还积极撰写科学小品，如《孔子也莫明其妙的事》、《由爬虫类说到人类》、《谈死光》等，并与高士其合编了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热情从事科学普及事业。建国初，他应邀到北京的一些大学作报告，曾三进清华园讲辩证唯物主义。当讲到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指出“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时候，许多老教授都不能接受。这使他感到，在我国宣传和普及唯物辩证法思想，以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一项十分迫切而艰巨的任务。他曾恳切地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说：“科学家如果不能

自觉地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就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难以解决现代科学的困难问题。”^①他对身边搞哲学的同志则多次提出要求：必须好好学习自然科学，关心新的自然科学理论和前沿学科。把握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向，认真研究其中的哲学问题。他坚决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又反对夸大哲学的作用，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企图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作法。他亲自抓党校自然辩证法班的教学，先后讲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中的有关篇章。在他的领导下，党校编写了我国第一批比较完整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并培养了一批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骨干人才。一九六四年，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在我国译出之后，艾思奇非常重视，认为它“阐发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很有价值的思想”，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的文章。他曾提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要面向整个自然科学领域，既要研究理论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也要研究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他还认为，既要从认识自然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也要从社会角度，从社会总体上考察自然科学问题，因为自然科学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离开社会、生产、哲学等方向去孤立地研究自然科学现象，就难以弄清现代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这些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艾思奇对党和人民一片赤诚，他的心始终和人民大众息息相通。在对敌斗争中他是一个勇猛的战斗士，而在工农群众面

^①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版第168页。

前，他又是一个很谦逊的学生。解放后，他多次下乡、下厂，一方面向工农群众学习，另一方面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工作。一九五八年在天津，他向工人群众作过多次演讲，并认真总结了工人学哲学的经验。随后下放河南，他又虚心向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学习，对登封县三官庙群众学哲学的活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具体的帮助。逝世前一年，还两次到北京郊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虽然当时他已患有较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但他认为这“是深入实际，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并坚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与群众亲切聊天，细心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言谈中总是充满深挚的感情。一九六六年初，他读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事迹的报道，激动不已，热泪盈眶，直到病重时，仍然表示要向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学习。他一直把周恩来的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一辈子实践了这句名言。

一九六六年初，艾思奇应邀参加《新建设》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顺路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的心脏病已很严重，当晚即令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准备着手为《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第一国际史》等中译本撰写前言。医生和同志们一再劝阻，他未以为意，自信自己还可以为党工作十年、二十年，并打算用文学的笔调写一本通俗哲学书，退休后再撰写长篇专著。不幸病情日重，于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晚九时逝世，终年五十六岁。

何 干 之

胡 华 刘 炼

何干之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家。他从事教育工作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宣传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培育了一批批革命青年，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刻苦读书，探求救国真理

何干之原名谭郁君，又名谭秀峰，曾用过谭卫中、谭华生、杜鲁人、何汉生等化名。一九三六年用何干之笔名发表文章，此后，即改名何干之。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一日，何干之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辛亥革命前叫新宁县）筋坑堡塘口村。他的祖父谭闻溥乡试落第，在本乡任私塾教师；父亲谭德辉（号文业）青年时即去美国做工，短期回国，何干之出生几个月后又去美国，一九三一年在美国去世；母亲李氏在乡务农，家有六斗水田和几间瓦屋。何干之幼年在谭氏学校（后改为育英学校）读书时，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十二、三岁时曾以《论汉武帝》为题，写过一篇作文，评论汉武帝的功业。老师写的批语是：“人细如豆，眼大如箕。”赞他人小有见地。台

山是华侨之乡，绝大多数男子小学毕业后就出洋做工或经营工商业。何干之小学毕业后，父亲也来信要他出洋做侨工。可是何干之不愿意，他想留在国内读书。一九一九年，他到广州，先入广雅书院（即省一中），后考入岭南大学附中，曾和冼星海同班学习。一九二三年中学四年级时，因无力交纳学费，辍学回乡，做昌明小学校长。他深感失学的痛苦，在家乡一年多，刻苦自学，广泛阅读新书刊，接触了五四新思潮。这时他最崇拜的人物是陈独秀和胡适之。他把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研究书目”贴在案头，想通过自学考大学。最初他想去北京，苦于没有路费。后来广东大学（一九二六年后改为中山大学）招考，他便瞒着家里悄悄去应试，结果竟名列第一。这样，他由亲友资助，一九二五年进入广东大学教育系。这时的何干之，是一个“教育改造论”者。他志愿读教育系，是受了陶行知的影响，认为社会改造要靠教育，想在大学毕业后，回乡做本乡中学的校长，以传播进步文化。何干之入学时，正值沙基惨案之后。他怀着对帝国主义的义愤，开始了大学生活。

五卅运动后的广州，反帝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省港大罢工推动了广东的革命化，民众运动盛极一时。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很少上课，每个月都有几次群众大会，会场有时就设在中山大学。何干之经常参加这些大会，听过肖楚女的讲演，参加过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的一些活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编辑出版的进步文学刊物，阅读中国共产党的党刊《向导》周报和《新青年》等杂志，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撕掉了贴在案头的那份胡适、梁启超开列的“国学研究书目”，换上施存统的青年读书纲要，开始有计划地阅读社会科学书籍。经过对各种各样“主义”的对比研究，他确定信仰

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阅读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评论时政的文章。他对瞿秋白的文章和才华，尤其钦佩，曾说瞿秋白是大革命时期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他在《自传》中说：自一九二五年开始，即走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道路，之后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何干之这时还主要是从书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广东国民党反动派“清党”，追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何干之在广东目击革命政府的蜕变；又看到广州起义后工农政府的出现，狂飙似的革命浪潮骤然卷起，但短短几天后又猝然失败。白鹅潭的炮声和呼啸而过的子弹，轰碎了他的“教育改造”梦。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使他逐渐改变了态度，开始重新思索自己应走的道路。他看到中山大学这所培养青年的著名学府里同样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早在戴季陶任校长期间，虽然郭沫若、鲁迅等进步作家来任过教，作过许多学术讲演，但戴季陶主义的分共反共思潮对学生也有很大的影响。国民党反动派“清党”后，中山大学每况愈下，反动势力日增。可见办教育并摆脱不了政治。因此，一九二八年后，他走出了书斋，开始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这时他找不到党的组织，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他积极参加了中大学生会工作，并向亲友招股集资，和谭国标、周彬等几个中大进步同学开办了秋明书店，由他任经理，经售进步的革命的书籍报刊。但是不久，中山大学清查师生的言行，秋明书店被反动当局查封，逮捕了经营业务的代经理周彬，开除了何干之等人的学籍。

一九二八年冬，何干之回台山任昌明学校校长和《台山日报》编辑，以谭秀峰为名在《台山日报》、《南华日报》和

《劲风日报》上发表了十多万字的社论和文章，主要内容有：反对封建制度和家长制，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早婚、盲婚和买卖婚姻；反对教育氏族化，如谭氏、黄氏、李氏等学校，主张并校，打破姓氏界线，一个大乡建立一个中心小学（为此何干之专门考察了白水乡小学，写了《到白水去》的调查报告）；批评台山某些官吏身兼多职而一事不做的腐败现象等等。这些反对封建制度、宣传初步民主思想的文章，引起了当地新旧绅士的仇视。他们依仗权势指令《台山日报》，不准刊登谭秀峰的文章。恰在这时，传来广州反动当局追查秋明书店前任经理谭秀峰的消息。这些劣绅便推波助澜，硬说：“谭秀峰是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等等。在内外夹攻下，何干之被迫出走，在堂伯父的资助下，于一九二九年初东渡日本求学。

何干之在日本先后入早稻田大学专修科和明治大学经济科。但他认为学校课程内容陈旧，学习无自由又浪费时间，因此只在学校挂了个名，不常去听课，主要在公寓里自学马克思主义书籍。在这期间，他系统地读了《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还组织留日同学集体学习了英译本《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即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既学了理论，又学了英语。日本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如《普罗科学》杂志、《战旗》、《产业劳动时报》等，也给他以很大的影响。

一九三〇年暑假，何干之回国探亲，利用假期在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台山县立中学（今台山一中）北院举办了台山青年暑期学术研究班，主讲《现代世界观》（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用《现代世界观》之名是为了避过敌人耳目）。此讲稿曾在《台山日报》上连载。参加这个研究班的学员主要

是台山小学教员和进步的中学生。当时在台山任远中学读书的林为梁（即林基路烈士）就参加了这次学习，之后离开家乡投身革命。

何干之的学习目的很明确。他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为了掌握研究中国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这是基础工夫。因此，在日本的最后一年，他就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

在日本三年苦读，何干之打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参加了东京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日本侵华罢课斗争，之后，愤然回国。

组织广州文总，投身革命

何干之回国后，先在台山县立中学当主任教员，兼任《台山日报》总编辑；只半年，又因撰写批评台山时政的文章，与其他日报发生笔战。报社社长不满意他的过激言论。他遂于一九三二年辞职去广州，到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做级主任教员，还被聘为国民大学讲师，讲授《中国经济》和《社会科学》两门课，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国民大学是华侨捐款兴办的商业性的私立大学，有一定的学术自由。何干之的讲课颇受学生欢迎。特别是以失学青年和中小学教师、机关职员为主要对象的夜大学，自何干之任课后，学员由一二百人猛增至千人。学校为了创声誉，第二年就升何干之为教授兼经济系主任，还邀请他参加校务会议。何干之很快成为广州知名的左倾教授。

何干之利用这个讲坛和阵地，公开地或秘密地宣传马克思

主义，并参加一些进步活动。他先是和温盛刚、谭国标等创办进步杂志《世界情势》半月刊，由他任主编，用谭卫中笔名发表文章，介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世界政治、经济情况。但只出了六期，就被反动当局查禁；后又组织省立女师和国民大学、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辅导青年学习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学习时事，揭露广东当局的劣政，讨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社会发展规律，有时他还带领学生到社会底层去了解贫民生活。有的学生对流浪街头的乞食者和穷苦人表示可怜和同情时，何干之就对她们说：“对穷人只是可怜同情，这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人道主义不能根本拯救穷人，只有推翻旧制度，劳苦大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帮助学生认识阶级剥削压迫的根源。参加读书会的学生，后来大都走上革命的道路。

何干之得知上海文化总同盟成立的消息后，就筹划联合各进步团体，加强广州的进步文化运动。一九三二年夏，由何干之、谭国标、温盛刚领导的读书会和世界情势社发起，与欧阳山领导的广州文艺社、袁文殊领导的广州前卫戏剧家同盟联合，成立了广州文化大同盟。组织建立后，何干之积极找寻党组织，争取党的领导，但是找不到，就设法由温盛刚（秘密党员）通过中山大学进步教授何思敬（秘密党员）与上海文总联系，得到一些文件和宣传品。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广州文化大同盟进一步联合其他广州进步文化团体，改组为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直接受上海文总领导。他们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底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以郊游为名，召开了成立大会，确定广州文总的宗旨是宣传革命理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红军的到来等；并宣布过去组织一律取消。大会

推选了何干之等七人为执委，何干之任分盟书记。分盟下设“社联”，“左联”和“剧联”，何干之兼社联书记。广州文总是党领导的秘密群众团体，主要活动是领导盟员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学习北伐战争史，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动力等问题；其次是出版秘密油印刊物，先后出版了《一般文化》、《文化阵线》、《社会科学》等杂志，刊载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专事反共内战政策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刊物秘密向各校递发，或通过报贩转送，但不久都相继被反动当局查禁了。此外，他们还组织盟员贴标语、散传单。何干之也曾在讲义皮包里夹着传单夜晚到中山公园去散发。他还陆续介绍了一批进步学生参加各联，到一九三三年底，盟员发展到一百多人。

五月底，他们在广州河南漱珠岗组织过一次较大的座谈会，有几十人参加，主要讨论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有几个持托派观点的中山大学学生也参加了座谈会，他们发表的意见引起激烈的争论。何干之、温盛刚、谭国标等人的发言，论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现阶段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力地驳倒了对方。座谈会整整开了一天。

在三十年代，何干之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何干之自一九三二年开始就参加了理论界、思想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战。他曾计划写一部《中问题总论》，上编写在国民大学讲授，编出了《中国经济》讲义，一九三四年到上海后整理为《中国经济读本》一书出版，作为上海社联内部读物。书中系统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

和方法，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的变化，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的关系，论证了中国经济的三大特点：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和民族资本不得发展，批判了陶希圣的谬见和托陈取消派的错误观点。这本书不久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这是何干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最早的一本著作。

由于何干之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暴露了政治面目，逐渐引起敌人的注意。一九三三年秋，省立女师秘密调查他的历史，还注意到和他接近的学生。这些学生也受到家长的警告，要他们远离何干之。不久，女师就以“思想赤化”为名，将他辞聘了。这是敌人行动的第一个信号。当时文总的领导人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团体活动是秘密的，而许多盟员都有公开职业为掩护，有公开地址，学生都住在学校。因此一人出事就可能使整个组织遭到破坏。这个信号引起广州文总的警惕。在何干之主持下，广州文总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凡是身份暴露或被反动当局所注意的人，都要设法转移到上海或者广东各地去做中小学教师，并决定何干之等人第一批转移，到上海去找党组织。会后，准备转移的师生正在筹集路费和生活费时，敌人的魔爪首先伸向了何干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大学副校长找何干之谈话，说：“你在学校教书，得到了学生的欢迎，在大学里也有学术研究的自由，作为学术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大学讲坛也是可以讲的，只要没有共产党的活动，写个公开声明，政府也可以谅解的。”并表示何干之如这样做，学校可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还可以继续留下任教。何干之明白这是先用软的方法引他上钩，就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任何秘密组织，无须发表什么声明”。谈话不欢而散。何干之立即向文总报告谈

话经过，认为这是敌人要下手的征候。广州文总当即决定何干之立刻离开广州。果然不几天，何干之在社会局工作的一位同乡，悄悄告诉他，反动政府已发出通缉谭秀峰的命令。何干之遂于当天离开广州，由香港回到台山，告别亲人后，在除夕之夜又转道香港去上海。

一九三四年二月，广州文总被破坏，反动政府大肆追捕和杀害文总盟员。敌人在广州没有抓到何干之等人并不就此罢休，广东军阀、“南天王”陈济棠打电报给上海市长吴铁城，要吴铁城向暨南大学校长查问并追缉李凡夫、何干之等七人。消息透露出来，李凡夫离开暨南大学，何干之化名谭华生、杜鲁人，转入地下活动。

参加共产党，奋力著述

在上海，何干之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他通过上海暨南大学进步学生，找到秘密党员温健公和李凡夫。经温健公介绍，何干之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参加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在社联编辑部工作。与艾思奇、柳湜等在一起，编辑“社联”内部油印刊物，先后出了二十期，内容主要是“社联”会务报告，工作计划和经验交流等。何干之的《中国经济读本》，就是这时用杜鲁人的笔名，作为“社联”丛书出版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何干之由社联常委王华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广州文总分盟为纪念一·二八抗日举行演出，遭到广东反动当局的镇压，大批盟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的消息传到上海，何干之听后极为愤恨。他想回广东做工作，为死者雪

恨复仇，曾找上海党组织商量，但因接头的同志被捕，未能实现回粤计划。不久，他被调到文总宣传部工作。

当时的上海，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导下，不管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悬殊，每逢革命纪念日都要在南京路上组织飞行集会，在街头贴标语，在电影院等群众场所呼口号、撒传单，教授、文化人也同样要求参加。何干之鉴于广州文总被破坏的惨痛教训，不赞成这样做。但是，作为组织分配的任务，他还要执行。这样做的结果，使革命力量暴露在敌人面前。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文化委员会和文总党团都遭到敌人破坏，领导人大多被捕。中央军委交通及时通知何干之转移，但也因此失掉了党组织关系。

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何干之和一批社联成员决定东渡日本。他这次去日本的目的虽是避敌人搜捕，但更重要的是感到学识不足，须力求深造。临行前，他曾对一些社联成员说：我们这次东渡去学习理论，研究外文有重要意义。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列宁在国外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这本书是伟大的战斗文献。我们此去要认真读这些书，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到日本后，他改名何汉生，未入学校，在东京专门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国社会史。因为当时上海学术界正在争论中国社会史问题，他要利用此时机作好准备，以便日后回国参加理论斗争。这时，正在日本留学的林为梁对何干之说，日本留学生爱国反日情绪很高涨，倾向马克思主义，准备成立留日学生左翼文化团体——东京文总。要何干之参加东京文总工作。为了得到国内党的领导，经何干之介绍，林为梁回上海和周扬联系，九月初返回东京，正式成立了东京文总领导机构，林为梁任书

记，何干之任宣传部长，负责指导东京文总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国际国内时事。何干之还专程去千叶县访郭沫若，请郭沫若支持东京文总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底，因旅费用尽，加以日本警察拘留了几个留日学生，何干之等人被迫回国。他先在南京一所中学任教，讲授国文与经济学课程。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他于一九三六年春到上海，见到周扬，恢复了组织关系。这时上海文总各联已解散，社联改组为上海著作人协会，何干之在协会党团工作。

华北事变和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发表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党发动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积极参加进步文化运动，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他开始用何干之笔名公开发表文章。为什么有这个名字？他曾在自传中解释说：“取‘做什么’的意义，意思是说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做文化斗争的工作。”^①这就是何干之毕生的志愿。

自这时起，何干之在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运动中，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奋笔写作。从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一年间，他出版了七本专著，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约七十万字。这是何干之一生中理论著述最丰硕的时期，三、四个月就写出一本十几万字的专著。这是他六、七年来，在躲避敌人搜捕，东奔西走的艰难环境中，始终坚持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资料储备的结果。

这一时期，何干之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社会、近代社会、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抗日战争诸方面。关于

^①何干之《自传》（1943年）。

论述抗日战争的理论和战略的有与李凡夫合写的《列强支配中国的经济网》和《中日国力的对比》两本专著，何干之撰写了英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部分。此外，他还写了一系列论述中日战争的文章，评论了广田内阁的侵华政策；分析了国际联盟的性质；从中国的资源问题、财政问题、军备问题和国际关系诸方面，论证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和建立抗敌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些文章主要在生活书店编的进步杂志《时代论坛》、《世界知识》和《现世界》半月刊上发表。

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理论方面的著述，有《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本书编入“当代青年丛书”中，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何干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阐明了中国革命应分“两着”进行，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①；这个革命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体是工农，革命政权是“工农民主主义”，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的这些论点，在中国共产党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起了有益的探索作用。这本书一九三七年四月经何干之修订再版，改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先后印行七次。一九四〇年八月被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不送原稿”为名，下令查禁。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本书，是何干之对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史学界和思想理论界关于这两个问题长达十年的论战的总结性、概括性的评述。何干之鲜

^①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上海当代青年出版社，1936年11月版第100页。

明地站在进步的社会科学家一边，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着重对托派思想作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特别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影响较大，到一九四〇年发行至十版。国民党政府害怕真理的传播，一九四一年六月又以“触犯审查标准”为由，下令停止发行。

何干之当时还是个不太出名的青年作家。他的著作，不仅反动出版社不给出版，就是一般商业性的出版社也不敢接受，只有生活书店勇敢地一本一本地出版他的著作。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除在生活书店主编的《时代论坛》、《世界经济》和《现世界》等进步杂志上发表何干之的文章外，还支持出版了上述两本关于论战的著作。之后又向何干之约稿，希望他再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书，一本是关于中国经济制度剖析的书。这也是何干之的宿愿。他说，写《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书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始，并准备再写三本书：一本中国通史，一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一本中国近代史。前两本准备在两年内完成，首先写第三本。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这本十二万字的著作，是他从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开始到六月底的短短三个多月内写成的，是我国最早较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书中，他用科学观点评价了自洋务运动以来历次思想运动的历史意义，论述了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指出中国的思想家必须努力推动新社会科学运动，用坚实的思想运动作社会运动的前驱，把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这就是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新启蒙运动的实践意义。

何干之在这些著作中，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左”倾关

门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正确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刚刚写完，连序也来不及作，何干之就奉命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开始了延安的战斗生活。

何干之三十年代学术活动的基本特点是：有较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在理论论战和思想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战略策略问题，阐发了一些有价值的科学见解，对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和新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奔赴延安，“用笔和口继续战斗”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党为了培养万千抗日干部以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在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党中央电报通知上海党组织，调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人到陕北公学任理论教员。九月初，中央文化特派员冯雪峰通知何干之等准备启程，并宣布十二人同行，除上述三人外，还有李初梨、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阳、舒群、苏灵扬、梁唯文、何琪之、王丹一。动身前，何干之、艾思奇、周扬、李初梨等四人到南京路华懋饭店秘密会见上海市委书记潘汉年。潘汉年说：“延安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成仿吾是陕公校长，招收各大城市青年去延安进行政治训练，急需教员，中央打电报来要你们去当教员。”并问大家是否有困难。何干之七月间回家省亲时，老母不舍独子远行，曾哭着说：“我嫁了这样的丈夫，又生了这样的儿子。”如今儿子走的更远，而且归期无限，何干之心中也颇不安。

但为了革命事业，一切都不能顾及了。他没有说出这些困难，准备第二天就启程北上。冯雪峰取出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各地八路军办事处，由队长李初梨携带；一封是党员介绍信，由何干之携带。途中，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见了博古，办事处为他们开了身份证，作为八路军工作人员，并发给每人路费二百元，由何干之管理经济。次日晚，他们离开南京，由徐州转陇海路到西安。为了等候延安派来的汽车，他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个星期，受到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和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在西安，何干之等人还会见了史沫特莱和曹清华等人。

十月初，何干之等人乘延安派来的汽车北上，在蜿蜒的山道上整整走了一天，到延安城时已是万家灯火了。何干之把党员介绍信交给党中央书记处转组织部，李富春找他们谈话后，分配何干之、周扬到陕北公学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请他们吃饭。席间，他们报告了上海文化界的斗争和工作情况。毛泽东对何干之等人说：“由上海到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大家认真在革命斗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继续有所贡献。”这次谈话给何干之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还经常提起这些话。从此他更加自觉地把自已的理论研究，溶进整个革命事业中去。一九三八年欢送陕公毕业生上抗日前线，他代表教员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毕业上前线的同学，将用枪炮在前线与敌人肉搏血战，我在这里就用笔和口来与敌人斗争，前线后方用一切武器和力量，要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去。”^①

^①邵式平：《陕公一年来教学的点滴经验》（1939年），载《解放》周刊第63、64期。

延安的生活热气腾腾，工农翻身做了主人，积极参加选举、减租减息和参军等各种运动，进一步印证了何干之所阐述的工农是革命的主力的原理。他十分感奋地说：延安是一个旋乾倒坤、翻天覆地的新社会。特别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他认真学习了全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报告，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表示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王明路线。在延安，他获得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充分自由，那种为宣传革命真理而东逃西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何干之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写作热情，空前高涨。他把自己的写作计划告诉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并征求意见。成仿吾对他说：“过去你在上海写了不少书和文章，现在到了延安，在党的领导下，应当写得更多更好，你自由写吧。你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放开手放开思想去研究吧。”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很艰苦，除伙食外，每人只发给五元零用钱，陕公校长成仿吾也是如此。为了优待何干之，中央决定发给他每月二十元津贴费，并派一个警卫员照顾他，这在延安是很高的待遇了。

在延安的窑洞里，在柅邑（今旬邑）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的土屋中，何干之一面进行教学工作，编写讲义；一面开展研究工作，著书立说。每天他窗口的灯光，总是亮到后半夜。

何干之根据抗战的需要，一年内开设多门新课程，先后在普通班和高级班讲授《中国问题》、《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史》和《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陕北公学设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何干之任主任。他带领一批青年教员，开展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这些年轻的理论教员，后来都成长为

新中国理论战线的骨干力量。为革命育英才，为革命的教育事业献力，正是他的夙志。过去在白区时，他曾对友人说，他的志愿就是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当一名红色教授。

一九三八年六月陕北公学在关中栒邑县看花宫，开办了分校，扩大招生，何干之调到分校任教。教学之余，他开始写作由生活书店张仲实约写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于十一月底完成，约八、九万字，寄到武汉生活书店，一九三九年三月出版。这本书是何干之过去研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设想中的一部分，是他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起点。他在这本书中，着重结合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日本侵入中国后“经济界的新变动”，系统地评述了国民党十年来经济政策的得失；引述大量的经济资料，论证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指出中国必须在对日抗战的大转变时期“建立民族经济的基础”，以“迅速完成抗日战争的经济准备”；这就必须把抗战与民生统一起来，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作基础”，“而民族革命战争是建立新社会制度的起点。”书中宣传了党关于全面抗战的经济方针和政策。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系统评议国民党十年经济政策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三月出版后，六月再版，十月就被国民党政府以“触犯审查标准”为名，下令“暂停发行”。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书尚未最后写完，何干之又开始着手撰写《三民主义研究》，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是由于当时教学的需要，也是国共合作后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如何正确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共两党长期存在着分歧，特别是抗战以来一年中出版了好几种三民

主义入门书，有的是好的，“也有若干别有用意的妄人，表面上装成一个神气十足的三民主义的研究者或信从者，而骨子里却到处贩卖私货，曲解阉割、湮没三民主义”。何干之认为：

“对于这些有害的论调，每个中山先生的学友都应当联合起来发动一个思想上的消毒大运动。”^①这就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对什么是三民主义的“真释”和“伪释”，从理论上历史上加以正确的阐述。何干之说他到延安后一年内，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研究欲望。他白天工作忙，划不出时间来，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把孙中山的著作、讲演笔记仔细地读了几遍。经过认真的思索，归纳整理了九个问题，然后动笔写作，一个星期写几千字，五、六个月内写了十多万字。

《三民主义研究》一书，上海新中出版社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出版，以后又两次重印，在国民党统治区颇有影响。

何干之在教学、研究和紧张写作的繁忙日子里，创作的欲望如泉涌流。这期间，他正准备研究《中国民族文化史》，并拟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史概论》的研究大纲。关于中国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他曾谈到过这样的观点：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溶合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人民构成的，因此要研究社会史；而社会史的材料，大量地从民间小说、传说、笔记、野史和文物中反映出来，这些材料比“官书”价值还高。因此他用很多时间研究小说史，研究社会发展史。一九三九年一月，他把自己写中国民族文化史的计划 and 想法函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复信，表示支持。信中说：“你又在想作民族

^①何干之：《〈三民主义研究〉后记》，新中出版社第3版第197页。

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对何干之研究民族史的态度，毛泽东也深表赞同，信中说：“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①毛泽东在信中还向何干之索要他即将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三民主义研究》两本新书。何干之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他认为这是指出了学术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必须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重要原则。他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一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定要坚持这个原则。几十年来这封信始终珍藏在何干之的身边，一直到十年浩劫中才被送到中央档案馆保存，一九八三年底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

何干之到延安后，曾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后来，党中央曾考虑调他到陕甘宁边区政策研究室工作，毛泽东也曾想留他做理论秘书。他考虑再三，感到自己是刚从上海来的文化人，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锻炼，怕不能胜任这些工作。这

^①毛泽东：《致何干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137页。

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的陕公分校受到军事威胁，中央决定分校撤回延安和鲁迅艺术学院等三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华北敌后，开展国防教育。何干之认为这正是自己接受民族革命战争锻炼的好机会，遂要求随联大到敌后去。经与张闻天、李富春商量后，党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华北联合大学的组织很快建立起来，下设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等四个部；陕北公学改编为社会科学部，何干之任副部长。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华北联大在延安正式成立后，中央举行了欢送联大上前线的大会。那时，刘少奇正在延安，特地请成仿吾和何干之到他住的窑洞里吃饭，为他们饯行。刘少奇知道何干之是广东人，会做菜，请他任主烹。何干之卷袖下厨，做了一桌广东风味菜，宾主畅饮，尽欢而散。这种革命的情谊，使何干之年久不忘。

到晋察冀敌后办学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何干之随联大校部从延安出发，西渡黄河到山西兴县，再翻越吕梁山、云中山，突破了敌人控制的同蒲路“钢铁”封锁线，经过两个半月三千里行军，于九月底到达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城南庄。联大师生以战斗的作风，经过短期的安顿，于十月中旬开始上课，何干之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不到一个月，日本侵略者开始了第一次冬季大“扫荡”。何干之和学员们在反“扫荡”斗争中，一面行军、一面坚持教学，利用休息时间，隐蔽在树林里上课。

一九四一年二月，联大扩大招生，并相应调整机构，何干

之任联大社会科学院院长并兼中学部主任。这时，晋察冀边区正实施边区施政纲领，在财政上实行统一累进税。何干之为了研究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曾带领一个小分队深入到农村，一家一户地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统一累进税和边区各项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并向中央局写了一份报告。

一九四一年九月，日本侵略军又一次向晋察冀边区腹地阜平、平山等地进行长达两三个月的残酷大“扫荡”。联大师生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最严重的时候，不能进村，只能穴居野外。何干之就住在山洞里，以黑豆和玉米充饥。

一九四二年冬，由于敌人重兵压境，根据地缩小，党实行精兵简政，华北联大缩编，只留下一个教育学院。为了加强边区政权建设，坚持抗战，晋察冀边区成立参议会，一九四三年一月在阜平县温塘召开第一届参议会，何干之当选为参议员，离开学校。这时，他还兼任晋察冀文委委员。不久，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党中央调何干之回延安。

一九四三年夏，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和自然科学学院合并为延安大学，何干之任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的总支书记，参加了延安大学的整风学习小组。参加延安整风学习小组的，都是原上海文总和各联的领导成员与骨干。他们在一起讨论了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斗争中的问题。这期间，结合整风运动，何干之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艺上的主观主义》和《新八股的始终》等评论文章；还写了《命运二种》一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假三民主义、真法西斯主义。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何干之断断续续写了《鲁迅思想研究》一书。他认真地研究鲁迅的著作和生平，是从一九

三八年开始的。尽管当时忙于写其它著作，其间又由延安到敌后办学，环境险恶，生活艰苦，但他随身带一套鲁迅三十年集，从未间断过阅读。起初，他准备写一部鲁迅传，并已草拟好一部分提纲，终因战争环境，驻地移动频繁和材料不易收集而未果。后来，他又改变计划，研究鲁迅思想。他采取边读边写的方法，一九四〇年后，在一两年内陆续写了九章，又经过不断修改和增订，于一九四六年作为鲁迅研究丛书在张家口市出版。何干之认为，“写鲁迅的思想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是用现在的时事和自己的经验来写，二是用鲁迅用过的史实和他自己的经历来写。用第一种写法可以使读者容易接近鲁迅，文体也可能做到通俗；用第二种写法可以使读者对于鲁迅的认识较亲切，印象也可能较深刻些。”^①他采用了第二种写法。他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研究鲁迅所经历过而昭示我们的道路，研究他所确切相信的道路在现在的发展，研究鲁迅三十年文化斗争的业绩，以及各种袭击敌人的战法”^②，用以教育青年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鲁迅的人生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以及鲁迅作品表现思想的方法、形式和风格等等，是我国较早地系统研究鲁迅思想的专著之一。

一九四四年，党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为了促进全国民主政权的实现，加强对各解放区的统一领导，党准备在延安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为此成立了筹备会，何干之被推选为筹备会的广东省代表。后来因形势变化，这个会议没有召开。

^{①②}何干之：《鲁迅思想研究》，东北书店1948年10月再版序言。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干之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大会，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何干之在延安和晋察冀敌后度过了烽烟战斗的八年，实践了自己“用笔和口与侵略者作战”的信念，不仅培养了万千抗战干部，还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撰写并出版了四本专著和若干篇论文，共五十余万字，用以奉献给中国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

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联合大学恢复原有建制，并迁至张家口市。何干之被任命为联大法政学院院长。他除教学工作外，还担任《北方文化》和《鲁迅学刊》的编委。《北方文化》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发行，影响颇大。不少读者投书编辑部，提出许多关于战后党的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何干之先后撰写了《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若干问题》、《土地改革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问题》等论文，在《北方文化》上发表，回答了国统区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

在这些文章中，何干之依据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基本思想，阐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纲领和政策。他指出：“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扬弃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①文章批评了国民党压制私人资本主义发展，

^①何干之：《马克思主义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问题》，载《北方文化》第1卷第6期，1946年5月

单纯依赖外资搞工业化的错误政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主张，政治制度民主化和农业改革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首先主要地依靠人民自己积累的资本，然后借助于外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业化资金问题的根本主张”^①。

一九四六年七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华北联大撤出张家口，在山西广灵县停留了一个多月，法政学院驻在西石门村。十月十日，在国民党反动派悍然进犯下，我军撤出张家口市。十一月间，联大离开山西广灵，从河北定县、望都之间过平汉铁路，突破封锁线，向冀中转移。何干之领导的法政学院编为平原宣教团(对外名称)第四中队，行程八百里，年底到达冀中根据地束鹿县，又改称政治学院，驻杜科村。这时，冀中地区形势比较稳定，联大政治学院扩大招收平津学生，进行比较正规的理论教育，除短期政治班外，还成立了政治系、经济系和研究室，培养比较正规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何干之讲授《思想方法论》和《新民主主义论解说》两门课程，系统介绍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一九四七年九月，何干之到阜平史家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会上，他听了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同各地的同志一起学习、讨论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期间，正值清风店战役大捷，活捉了国民党第七军军长罗历戎等许多高级军官。这些俘虏军官送到军区时，他们害怕群众，不敢下车。经军区副司令员王平再三解释，他们才

^①何干之：《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若干问题》，载《北方文化》第1卷第4期，1946年4月。

一个个走下车来，并介绍自己的名字。这场景，使在场目睹的何干之切实地看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了。

全国土地会议后，上级决定联大师生参加新区土改，政治学院担负正定县第六区和第七区的土改任务。何干之回到学校，当即动员、组织全院师生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先后四个多月，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师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何干之参加正定县县委，领导这次运动。新区情况复杂，阶级阵线不清，曾发生过武装驱赶土改工作组事件。何干之认为：为了顺利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必须执行正确的政策，才能争取群众，孤立敌人，揭露坏分子。当时，联大师生在工作中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何干之坚决反对种种极“左”的做法，他说，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不是肉体消灭地主，不应吊打。有一个地主女儿被一些农民用铁丝捆住手腕吊打，何干之闻讯，立刻命令释放，并亲自和她谈话，说明不该这样对待她，同时帮助她认识地主家庭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对她的影响，希望她划清界线。

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何干之注意指导学生把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他领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了《正定新区土地改革》、《正定七区留村土地改革》和《正定七区三个重点村工作小结》等综合性的总结报告；还作了一些专题调查，如从正定七区留村阶级关系、土地状况的调查，《新区封建剥削种种》、《妇女的思想障碍是怎样打破的》、《谈固村土地关系调查》、《地主酝酿和平斗争》、《郝家营骚动事件前前后后》、《大马村酝酿驱逐土改干部》、《北豆村土改中的错误》和《正定七区反国民党的一点经验》等。他还作了几个经济调查，如《西两岭村纸坊调查》、《北豆村粉坊调查》等。这些调查报告，给县委领

导土地改革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材料,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是对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良好训练。

一九四八年五月,联大迁至正定。何干之根据党的指示,领导政治学院师生进行“三查”整风运动。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大批平津知识青年涌向解放区,到联大来学习。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迎接全国胜利,中央决定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一九四八年八月,华北大学正式成立,下设四个部、两个学院(农学院、工学院),何干之任第二部(社会科学部)主任,并兼社会科学系主任,主要任务是培养师资和理论教育人才。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四年中,何干之以主要精力进行教学工作和领导学生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为党和新中国培养、输送了大批理论教育人才和大批既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会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之隙,他仍坚持写作,除出版《鲁迅思想研究》一书外,还编写了《思想方法论》和《〈新民主主义论〉解说》两本讲义,写了六、七篇涉及历史、文学的文章,如《刘邦与项羽》、《论三国时代刘孙联合抗曹的得失》及《官场古今录》等,约二三十万字。

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何干之随华北大学迁至北平。

与共和国共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的学术生涯与共和国共命运,走过了曲折艰辛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华北大学迁到北平后,扩大招生,以适应广

大群众学习的需要。何干之除在北大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之外，还应接不暇地接受平津各大学的邀请去做报告，常常是上千人听讲，有时一天两次。群众渴求真理的热望，激励他以极大的热情日以继夜地工作。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

何干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也并未止步。他深感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需要重新学习，需要重整科学研究的旗鼓，继续前进。他在给亲人的信中，流露出这种急迫心情。他说，现在只有早晚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必须占用睡眠的时间读书，“时代走得多么快呢？不努力赶上，怎么办？”他一面“贪婪”地读书，一面考虑新的研究计划。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史经验。读此文后，何干之就开始有了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设想。一九五〇年，他在通信中曾说：“我还要开首进行研究‘走俄国人的道路’这样的题目，先研究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然后回过头来研究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所走过的道路。”这一设想导致他后来在人民大学历史系组建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并拟定了“中国现代思潮”十六章的研究计划。

一九五〇年以华北大学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先后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研究部副部长和历史系主任，校党委委员。一九五〇年十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一九五五年十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一九五八年二月被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历史组组长。

一九五〇年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全国高等院校开设中国现代革命史课程，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并委托何干之为高等学校革命史教师讲课、编写教材，举办暑期讲习班培养师资等。

在短短三四年中，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一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教师队伍。一九五四年，由何干之主编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一书，高教部规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先后三次修订再版，到一九五九年发行上百万册，并译成俄、英、越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行。何干之对中国现代革命史课程的建设 and 师资队伍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期间，在教学工作之余，何干之还积极参加理论斗争，撰写了《五四以来胡适派怎样歪曲了中国古典文学》、《论胡适派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刘鹗与胡适》等，以及其他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题论文多篇。

由于何干之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的成绩显著，一九五六年由教育部定为一级教授，同时被选为先进工作者，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一九五七年后，何干之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开始遇到了艰难和挫折。

一九五七年的政治风浪中，有人企图否定建国以来的理论教育工作的成绩。康生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攻击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本营”，并扬言他要来冲一冲，第一个目标就是人民大学两位全国知名的一级教授何思敬和何干之。康生特地跑到人民大学来贴了一张大字报，气势汹汹地写道：“我不怕资产阶级权威，也不怕无产阶级权威……”，对何干之等施加政治压力。何干之不知所以，十分反感。但他不为所动，认为教条主义可以批评，系统理论教育则必须坚持。

人大校长吴玉章明辨是非，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中保护了何干之，这一次又是他实事求是地支持何干之顶住了康生的政治压力。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打乱了各个领域的正常秩序，学校纷纷外迁、“下放”，系统的理论教育和教学秩序被破坏了。何干之也“下放”到北京郊区办学，实行半工半读。他一面参加农村办学的实践，一面调查了解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况和问题，还特地到当时名噪一时的徐水去参观。诸此种引起他深深地思考。他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对当时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想，他不能沉默，便公开批评了忽视系统理论教育的倾向，批评了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和平均主义，批评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宣传。有一次，他在某大学门口看见一副大字对联，写着“史书万卷脚下踩，共产主义我们来”，便皱起眉头说，史书怎么能脚下踩呢？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怎么能只有少数人去进行呢？他认为这副对联否定历史，不利于团结，是错误的，当即向该校党委宣传部长反映了这个意见。第二天，这副对联就被摘掉了。

鉴于当时“左”的思潮泛滥，何干之深感有全面科学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必要。在一九五九年初，他主动开了一门新课，取名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共分十二章，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好心人劝他不要讲这些问题。他说，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被人遗忘了，为了教育青年一代，我们不怕重复讲。后来受批判时，他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坦率地说：“我开这门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左’。”这门课从一九五九年二月讲到八月，并编写了讲义。庐山会议后，果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诬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宣扬了“修正主义”，颠倒是非。他十分愤慨，从思想上抵制这场反右倾运动，在理论观点上始终没有屈服。他说，民主革命时期主要反“左”，建国后只反右不反“左”，不合

实际，他想不通。

他一度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奋斗了三十年的“红色教授”，今天竟失去了讲授真理的自由！后来在参加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时，他在小组会上愤慨地说：“教书的人不让教书，就好象不让梅兰芳上台演戏一样，这种滋味是很苦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的打击，使他身心都受到创伤，患了心脏病。

何干之并没有颓丧。他说：“我还有一支笔。”一九六〇年，他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协作搞科研。开始，他决定写一部《中日关系史》，从古至今，计划写一百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拟就了中、下卷十六章的写作大纲。正准备着手写作时，近代史所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外交部长陈毅提出建议写一部《蒋介石传》，向第三世界国家介绍蒋介石走过的联共、反共，又联共、又反共的历史道路，说明反殖民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政治代表人物）要想取得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联合共产党、联合工农。近代史研究所李新请何干之来写这本书，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范文澜还特地为此事写信给何干之说：“您来我所工作，实是意外之喜，……介绍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大援助。”何干之准备完成这本书之后再写《中日关系史》。这本书经研究所再三考虑，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顾名思义，书的基本内容已经有所改变了。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本系统研究党同资产阶级关系的专著。一九六一年三月，他搬到近代史所的一间小屋里，深居简出，带领几个助手，从编写专题资料，访问历史事件当事人入手，不分昼夜地勤奋工作，于一九六三年完成初稿。

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国家政治形势有所好

转。会议前后，对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何干之也得到了平反，又重登讲台上，并开始参加学术活动。一九六一年十月，他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一九六二年一月，又到广州参加中国历史学会的年会，并回到阔别二十五年的家乡——台山参观，应台山县委之请，向全县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教师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报告。一九六三年十月，他应阿尔巴尼亚的邀请，赴阿讲学，编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讲义，约七万字，还被译成俄文。

政治形势的好转，又给了何干之勇气。一九六五年，他着手修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的草稿，准备出版。刚刚修改了一半，印了几份清样，更大的政治风暴铺天盖地而来，这本书就夭折在摇篮里，并成为他被打倒的第一条“罪状”。

十年动乱中，何干之倍受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的一生和他的理论著作、教学工作全部被否定了。他从青年时代自觉追求又经三十多年艰苦研究培植起来的真理和信念，岂能屈于暴力和压迫？！从动乱一开始，他就说：“这是右派翻天！”批判他的著作是“修正主义”时，他说：“我是为了反‘左’。”诬蔑他是“为蒋介石树碑立传”时，他说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敌我友。当他受到“史无前例”的猛烈冲击时，也曾一度难以忍受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经过冷静的思考，他怀疑这不正常的一切，他说：“这决不是我们党的政策，是非迟早会弄清的。”他要顽强地活下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愤而自杀，惊动了中央某些领导人。落实政策的步伐加快了。一九六九年五月，何干之被匆忙地“解放”。天上的乌云尚未散去，头上的某些“罪名”尚未勾销，何干之

又开始筹划如何进行新的工作了。经过这一番对文化的大摧残，许多人视研究中共党史为畏途，忍痛卖书焚稿。他却说：“我还要研究党史，希望还能为党工作十年。”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何干之心绞痛频频发作，仍坚持翻阅所存旧文稿和多种提纲。他对《中日关系史》未能完成深表遗憾，并准备首先修改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这时，何干之又得知毛泽东希望范文澜写完《中国近代史》下册，范文澜则想请何干之、李新、胡华等帮助他续写党史部分的消息。他十分高兴，准备待形势稳定后接受这一任务。可是，这时他已经被折磨得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早八时二十分，他在“下放”的京郊苏家坨公社前沙涧村，突发心肌梗塞，倒卧在农村中的土路上，久久睁着双眼，壮志未酬，雄心未已，满怀遗憾地离开了人间，终年六十四岁。

何干之去世后，“四人帮”仍不罢休，组织专案组重新审查他。一九七九年一月，何干之的冤案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重新复查做了结论。结论中说：“何干之同志是理论教育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活动，对引导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接受革命思想，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培养党的理论、教育干部方面献出了毕生精力，做出了很多贡献。”

一九八〇年，何干之的最后遗著《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历十多载沧桑，终于重见天日，经过刘炼的整理修订后出版。他一生的理论著作，也将编成《何干之文集》三卷出版，作为文化遗产留于后世。

附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及资料来源：

1. 杜鲁人（何干之）：《中国经济读本》，上海现实出版社 1934 年版。
2.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 1937 年版。
3.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 1937 年版。
4. 何干之：《转变期的中国》，上海当代青年出版社 1937 年 5 月版。
5.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 1937 年 12 月版。
6. 何干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国文化社 1939 年版。
7. 何干之：《思想方法论》，1947 年华北联大印行。
8. 何干之：《〈新民主主义论〉解说》，1947 年华北联大印行。
9. 何干之：《土地改革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46 年 4 月《北方文化》第 1 卷 4 期。
10.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高教出版社 1954 年版。
11. 何干之：《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12. 何干之：《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版。
13. 何干之书信、写作大纲手稿。
14. 何干之生前所写有关广州文总、上海文总、上海社联、东京文总和个人经历资料。
15. 《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始末》，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16. 一九四七年正定七区土地改革调查报告（手抄稿）。
17. 张仲实、黄苇文访问记录。
18. 朱伯濂、何琪之的回忆（通信访问资料）。

华 岗

傅能华

华岗，又名华少峰、华西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著名学者。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团省委宣传部长、团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华北巡视员，《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和山东大学校长等职。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五年受到错误的审查和处理，长期关押，一九七二年在狱中含冤病逝。一九八〇年经党中央批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华岗不仅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也是一位勤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一生在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上都有很大的成绩，为革命和学术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

一九〇三年六月九日，华岗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现衢县)庙下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幼名华延年。他的父亲华三铭毕生务农，耕种着祖上遗留下来的十八亩薄田，养活全家七口

人。父亲性格耿直，思想比较开明，上过几年私塾，爱阅读报刊，关心时事，对子女影响较大。他的母亲是个勤劳俭朴的妇女，终日为家务操劳。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由于受家庭影响，华岗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年令稍大，就到田地里帮助大人干农活。

辛亥革命后，村里有几个外出求学的青年人回到家乡，宣传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兴办实业和教育。在他们的倡议下，庙下村集资办起了一所初级小学。于是，十一岁的华岗才有了入学读书的机会。

初小的先生思想比较进步，学校颇有点“新式”味道，课程有国文、算术、手工和美术等。先生在课堂上还给学生讲讲述帝国主义列强怎样侵略中国，清朝封建专制政府怎样腐败，中国四万万同胞应该自强以御外侮。这些民族民主的启蒙教育，使华岗幼小的心灵渐渐插上了理想的翅膀。他决心要按照先生的教导，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华岗学习很用功，每门功课都是优等，经常受到先生的夸奖。两年后，他考入了离家五里路的溪口镇高等小学。

这所高等小学，设在溪口镇内的一座祠堂里，设备虽然并不十分齐全，但华岗已感到非常满意。他每天总是带着课本和午饭，早早来到学校，无论刮风下雨，从不迟到或缺课。他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按时完成作业，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务求弄懂弄通，从不轻易放过。十三、四岁的华岗，就懂得爱惜时间，每天从家里到学校的来回路上，他也利用时间背诵课文。课余时间到图书室去阅读书报，并把对时事的看法写成日记和作文。老师很称赞他的日记和作文，常常在他的本子上批写“清顺无癖，识解俱超”之类的评语。

那时浙江西部山区的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山村里书籍十分稀少。华岗每得到一本书，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一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农历正月村子里有灯会，镇上还请戏班子来演戏，华岗很少出去玩耍。父亲看他这样好学，尽管家境不甚宽裕，还是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地筹措学费，让他继续上学。

高小毕业后，华岗要求继续上学。可是当时浙江省西部山区中学很少，每个县只有一所中学，而且学费很贵，一般人家是读不起的。贫家子弟要升学，不能不首先报考半官费的师范学校。但师范学校几个县才有一所，每年招收四五十名学生，只有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考取。华岗终于以优异成绩考进了衢州师范学校。

衢州是浙西重镇，北临衢江，江岸是一片葱笼的桔树林。衢州师范学校就在城中的烂柯山下、钟鼓楼前；校舍是一排灰白色的半旧楼房。生长在小山村的华岗，初到城里，一切都感到新鲜，视野也开阔了许多。可是，他最感兴趣的仍然是读书。

师范学校的课业负担比较重，一般学生往往感到学习吃力。华岗学业基础扎实，又很用功，所以能够应付自如。他在同班同学中，不仅功课好，而且也谦虚，乐于助人，所以很快得到同学们的推崇，被选为级长。华岗平日生活俭朴，能吃苦耐劳，从家里到衢州城内有六十多里山路，每次寒暑假，他总是挑着铺盖步行来回，有时还要从家里背些山芋粉之类东西以备充饥。冬天寒风凛冽，虽有时无棉衣御寒，却从不松懈学习。生活再苦，他也要尽量积攒下一点零钱用，到旧书摊上买些有价值的书籍认真阅读。他自己每读一本书，总要作笔记，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去请教师长，或者与同学进行讨论。华岗在星期天也很

少休息，决心趁年轻精力旺盛的时期，抓紧一切时间尽量地多吸收些古今中外的科学文化知识。后来，索性连假期也不回家，留在学校里看书学习。他读书涉猎的范围越来越广，吸收知识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大量的知识装进他的脑海里，为他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和进行理论宣传及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

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也震动了衢州这个古老的山城。衢州师范沸腾起来了。陈独秀、胡适、吴虞等人的一些论著在学校内流传开来。北京、上海等地的新报刊，在学生中竞相传阅。华岗和同学们一起分析各种观点，力求辨别正误，还写出文章投寄报刊，阐述自己的见解。从此，华岗对新兴科学和新文化运动悉心探求，热心于学生运动。学校当局蛮横地干涉学生运动。华岗因领导同学反对学校当局的蛮横干涉而被开除，迫使他中断了在师范学校的学习。

一九二四年暑假，华岗改名华少峰转入宁波第四中学学习。宁波第四中学，全称是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是由原来的宁波中学和宁波师范合并起来的。校长经亨颐（字子渊），是一位国民党左派、开明人士、进步的教育家。他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校长时，因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而被军阀卢永祥撤职。来到宁波后，他继续支持学生们的进步活动，撤换了那些思想顽固的教员，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具有真才实学和救国抱负的教师。当时，宁波是浙江革命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在宁波已成立了特委。经亨颐校长在中共宁波特委的影响和推动

下，在校内进步师生的合作下，大胆发动师生宣传革命，积极鼓励学生进行爱国活动。他不但允许学生星期天可以上街宣传，还允许在每星期三下午作为进行爱国活动的时间。华岗在这里，通过努力学习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生中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封建势力，宣传革命的骨干分子^①。就在这一年，他由张秋人、潘念之（潘枫涂）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担任了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这年下半年，恽代英来到宁波，作了多次讲演，在宁波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全国性的“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中，宁波党团组织不仅发行了特刊，还在“圣诞节”组织全市教会学校的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化教育。华岗作为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积极协助党组织领导了这些活动，并且从中受到很大的锻炼和考验。

在参加和领导政治运动的同时，华岗逐渐显露出他在理论宣传方面的才能。他开始给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写文章，批判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对青年的影响，驳斥“学生只应该读书，不要参加政治活动”的谬论^②。他还参加了《四中周刊》和《火曜》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四中周刊》是宁波第四中学出版的一份油印刊物，在学生中宣传激进的革命思想，只出版了二期就被禁止了。《火曜》是中共宁波特委领导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它的公开发行人是中共宁波工委书记卓兰芳。华岗是这个刊物的编辑之一。该刊物曾登载过《介绍

^①周闪耀：《北伐前夕宁波学生“拥经亨颐”的斗争》，载《浙江革命史料》198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特辑。

^②1983年12月3日访史永记录。

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共产主义是什么？》、《五一节与中国被压迫民众》、《农村运动的参考资料》、《我们要亲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等很好的文章，在青年中影响很大。而反动派却把它看作“洪水猛兽”，出版了二十多期，也被查封了^①。

“五卅”运动中，宁波的革命群众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五卅”惨案发生后，宁波各界立即组织“外交后援会”，由各公团、学校四十多个团体的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十项决议^②。六月五日，宁波全市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有二万多人参加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分子杀害中国人民，提出“经济绝交”、“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打倒英帝国主义分子”等革命口号。华岗以宁波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一运动的领导。在运动中，他同以李绶卿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党对运动的统一领导。

一九二五年夏天，中共江浙区委为了发展革命运动，有计划地从宁波抽调一批党团员到各地工作。华岗根据组织的决定，毅然离开学校到南京担任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在那里，他由吴芳和曹壮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职业

①潘念之1983年接待谈滨若访问时的谈话记录。

②一，组织外交后援团；二，致电外交部为“五卅”惨案提出抗议交涉；三，致沪各公团继续斗争；四，警告上海领事馆及本埠英领事馆和外侨；五，电慰死伤学生和工人家属；六，组织募捐团，给上海工人以经济援助；七，通电各报馆及各公团一致声援；八，定期举行大规模示威并分组出发演讲；九，通函宁波所属各县举行游行示威；十，出版刊物。

③李绶卿是宁波《四明日报》的主笔。以他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分子假借“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国民党统一”，“一致对外”，叫嚷“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我党领导的工农运动。

革命活动家的生涯。

大革命时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工作需要，华岗不断地变换工作岗位，但一直从事青年团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在南京工作将近半年（一九二五年六月至十一月），就被调到上海担任团沪西区委书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六年三月），不久又担任团江浙区委宣传部长（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团江浙区委时，他除了负责宣传工作外，还主管上海以外地区的团的领导工作，不断地奔波于南京、杭州、宁波等地，指导各地青年团的工作，配合党领导的各条战线的斗争，迎接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华岗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革命岗位。共青团江浙区委改组后，分设浙江和江苏两个团省委，华岗担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按照党的指示，负责恢复和重建浙江团的组织（一九二七年四月至八月）。不久，江苏团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华岗又调任团江苏省委书记，并兼管团上海市委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随后，他又调任共青团顺直（河北）省委书记，为恢复和建设北方的团组织而紧张地工作（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五月）。

一九二八年五月，华岗接受党的委派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他见到了中国共产党许多著名的领导人，还见到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些著名领导人。回

国后，他在上海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里，华岗始终没有离开过青年团的领导岗位。他很善于在青年和学生中做细致的组织宣传工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专门从事青年工作的一位重要干部^①。

一九二九年三月，华岗离开团中央，专门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一九二九年四月至十二月）、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二年三月）和华北巡视员（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九月），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进行着出生入死的战斗。

在这期间，华岗还从事紧张的著述活动。他从当时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撰写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他最初起意写这部书，是在广州暴动后不久的时候。那时革命开始走向低潮，在革命营垒中，有的人背叛了，有的人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华岗作为这次大革命的参加者和幸存者，他“觉得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可以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了，它不但教训了领袖，而且教训了群众，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来，一定可以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②于是，他广泛搜集材

①陆定一1983年4月15日在一次征集党史资料的座谈会上，讲到华岗的这一段革命活动时说：“从1925年我就同他一起在青年团里工作，他当时是上海青年团干部中的‘四大金刚’之一，他很有学问。”

②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自序。

料，并且很快编写了一个大纲。后来，因出国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的会议，不得不把这项工作暂时搁置下来，把材料和大纲存放在上海一位同志家里。一九二八年秋，华岗从国外回来，发现那位同志已经被捕，而他过去苦心搜集的材料也完全丢失了。他并没有因此灰心，又重新搜集材料。特别是一九二九年秋天，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结合成托陈取消派，一起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华岗认为“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这就更促使他加快了大革命史的编撰工作。他根据当时能够搜集到的材料和自己参加实际运动的回忆，力图按照党的“六大”精神，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总结这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其中，他大量录用了瞿秋白在党的“六大”时所写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从一九二九年秋天开始动笔，到一九三〇年春天完成了初稿，同年冬天又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一九三一年七月，在鲁迅的帮助下，由上海春耕书店首次出版。此书的第六章《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还连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

这部书共分七章，三十万字。华岗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我敬以至诚，将此书纪念大革命中及大革命失败后成千上万为革命牺牲的英勇战士。”尽管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书中有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免受当时流行的“左”倾观点的影响而不尽恰当，但他确是怀着很深的革命激情，热烈地歌颂了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新民主主义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痛斥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国内外人民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种种诬蔑；为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流血牺牲的几十万革命烈士，树

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我国的史学史上，这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现代史著作。有的人评价说：“从那时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华岗同志的这本书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读来使人感奋，使人神往，使人充满民族的自豪感。”^①当时一些地下党组织，把《中国大革命史》作为党员和革命群众学习的教材之一，许多革命同志都从此书中受到教益。

（三）

一九三二年九月，党中央任命华岗为中共满州特委书记。他化名为刘少陵，在由上海出发到东北赴任途中，因护送的交通员被特务认识跟踪，他和交通员一起在青岛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华岗一口咬定自己是“皮货商人，非共产党员”。他坚决不暴露自己的政治身分，保守了党的机密。敌人使用种种威胁利诱的办法，企图迫他就范。但他沉着应付，巧妙地编造口供，迷惑了敌人，使敌人始终弄清他的真实姓名和政治身分。结果，他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判了五年徒刑，先被关在济南法院看守所，后来转到山东省第一“模范”监狱。

在狱中，他和任作民（山东地下党省委负责人之一，狱中化名王敬功）等同志一起，团结全体政治犯，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在狱中开办干部训练班，提出在狱政治犯的主要任务，一是“保健”，二是“学习”。为此，规定了读书、休

^①廖盖隆：《华岗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

息、游戏的一定时间，禁止抽烟喝酒。他们秘密地购买和阅读报纸和理论书籍，定期讨论各种政治时事问题。华岗和任作民分别担负政治、党建、群众工作等课程的指导任务，提高青年同志的政治理论水平；还指定文化水平高的同志帮助文化水平低的同志读书识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在此期间，他们多次组织狱中的政治犯进行绝食斗争，以抗议监狱当局对政治犯的虐待和限制，提出了反对打骂犯人，开放脚镣手铐，自由看书看报，改良犯人伙食等要求。通过这些斗争，使狱中的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并且锻炼和考验了每个政治犯的意志，鼓舞了他们争取自由的胜利信心。

他们在狱中的这些活动，对山东后来的工作（如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都有一定的影响，确实证明了“监狱是革命者的休养所和学校”这句名言。

一九三六年底，山东在监政治犯除少数判无期徒刑的人外，按国民党的法令已经服满三分之二刑期者，都应该进反省院了。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法院和监狱当局就奉国民党政府命令，将全部政治犯送往反省院。山东反省院仅能容纳九十多人，他们决定把大批政治犯分送南京、太原和武昌等地。一九三七年二月，华岗和任作民等十九人被送往湖北武昌反省院。

在武昌反省院，华岗和任作民等根据新的条件，继续进行斗争。他们早在看守所和监狱里时，就讨论过到反省院后应该坚持的立场：“不求出院（有可能再送回监狱），不损害党的组织和政治影响。”^①

^①任作民：《两次被捕情形》，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省志资料》1959年第3期。

在反省院中，被反省的人按文化程度编为研究组（大学生以上）、甲组（高中生）、乙组（初中生）、丙组（稍识字）、丁组（不识字的）共五个组。华岗和任作民一起被编在甲组。院内出版了一种“反省”月刊。月刊的编辑，名义上是由“反省”人中选出，实际是由院方的训育科负责编辑，所有稿子都由他们选择、修改。内容有什么随感录、政治论文、三民主义、院长主任们的讲演词，以及诗词、小说，有时还把那些“精彩”的自述登上一篇。他们屡次催华岗和任作民为月刊撰文，但都被拒绝了。于是又逼迫他们为院长主任们整理讲演记录，但他们每次整理的记录院方总不满意，有时还要叫教员们去大加修改。因为那些讲演，本来就不漂亮，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华岗和任作民从来不为他们修饰美化。

凡入反省院的人都要参加上课，课目有国民党的党义、国文、历史、地理、政治学、军事体操等。国文课每隔两三星期有一次作文，题目是什么“时事评论”、“历史论文”、“谈交友”、“我的家庭”等等，故意要把它联系到反共、党派、主义等方面来，是反省院对反省者的一种“考验”。此外，还规定每天要写日记，日记上可以表示悔过或告密等。训育科随时抽阅各人的日记，对那些符合他们要求的，就批上“颇有进步”之类的话。再有，每星期要开一次讨论会，形式上由反省人自己召开，但主任教员旁听，讨论题目是指定的，离不开“反省生活”、“入院感想”、“自我检查”等等。华岗和任作民对那些作文、日记之类，向来采取敷衍的态度，日记往往三、五天甚至一星期才写一次，内容只写天气晴雨变化，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抄录一些《中山全集》的语录之类，从不写任何卑躬屈膝和不利于党的言论。他们的日记可以随时向任何人公

开。讨论会则经常请病假不去参加。相反，则利用反省院的图书室，广泛读书，研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至于自然科学等等，以丰富和加深自己的学识。

武昌反省院没有正式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华岗和任作民（王敬功）、向明（王仲和）自动在一起商量一些问题，如研究“自述”如何写法、讨论会如何发言、对反动分子怎样给以精神制裁、对某些青年如何教育等。他们还曾发动全院反省人要求上前线杀敌、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抗议对某个人的处罚、邀集二十多个人自己组织伙食团等等斗争活动。

反省院以六个月为一期。满六个月的，经个别审查，院方评判委员会通过后，公布出院人名单，出院人公开发表“宣言”，然后可以交保出院。华岗同任作民一样，在反省院住满六个月后并未被释放。理由是他们“表现不好”，没有按院方所要求的说出组织关系，不表示反对共产党的态度，日记写得充分，不肯写文章等等。院方决定要他再住六个月。管理主任找华岗和任作民谈话，要他们重新填写一张入院调查表，再写一篇“自述”。他们表示拒绝，并且找院长提出抗议，质问说：“现在已经是全国抗战的局面，共产党已经实行改苏维埃为边区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国共两党重行合作，为何还不释放我们？我们出去了难道不是和国民党去一致抗日吗？”院长被问得无言可对，只得连连说道：“我也愿意你们出去，不过这是上边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于是，华岗和任作民就“请长假”休息，从此不再上课，不参加开会，不写日记，除吃饭、睡觉，看自己想看的书外，其它的活动一概不参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华岗买通

狱卒，给当时在武汉地区做秘密工作的冯乃超送去一封信。冯乃超立即报告当时在武汉的董必武。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指名在湖北反省院要释放华岗和任作民两名政治犯。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被敌人折磨了五年之久的华岗和任作民，以共产党要员的身份，昂首阔步走出武昌反省院。敌人从华岗身上什么也没有捞到，反省院的“主任”、“教员”们，直到这时才知道自称皮货商人的刘少陵原来就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华岗。他们都惊愕而又无可奈何地望着他和任作民，出院时居然还在反省院内排列两行，夹道欢送。

华岗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里，立场坚定，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五年的监狱生活，丝毫没有动摇华岗的革命意志，却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不顾个人身体虚弱，又迅速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四)

华岗从武昌反省院出来后，担任了短期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接着党又派他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办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潘梓年担任社长，华岗担任总编辑。那时报社的人员不多，工作十分繁忙。华岗作为总编辑，掌握编辑部的全面工作，从新闻和文章的审阅修改、重要专论的撰写，一直到版面的编排以至校对工作，都亲自动手、过问，“他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①。他除了

^①石西民：《忆第一任总编辑华岗同志》，《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

用华岗、华西园署名写重要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外，还常用林石父、华石峰、晓风等笔名写各种类型的文章，内容涉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他那忘我的工作精神，瘦小的个子，伶俐的口才，文章写得相当快而有力，这些特点，给同志们以深刻的印象^①。一位当年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同志回忆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学问渊博文思敏捷的学者。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写作文章和社论，真是‘下笔千言，立等可待’。他对待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从没有见过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但他对待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却十分认真，从不苟同，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这一切引起我对他的尊敬，把他当作自己的导师。”^②

在《新华日报》社，华岗坚持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路线，抵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那时，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又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党内实行家长式统治，常常要《新华日报》登载“王明启事”、“陈绍禹启事”，宣传他那一套所谓“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纲领，并要求配发他的标准像，大肆宣传自己。华岗对此深恶痛绝，常常嗤之以鼻。他说：“这那里是什么启事，明明是为他自己做政治广告！”他在私下对人说：“王明那一套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希望是在延安，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③正因为如此，王明对华岗十分忌恨，在长江局会议上对华岗进行打击报复，常常借故痛骂或旁敲侧击。到后来，作

①许涤新：《忆华岗同志》，载1980年7月10日《光明日报》。

②熊复：《时代哲学思索》，载1982年6月4日《人民日报》。

③石西民：《忆第一任总编辑华岗同志》，《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

为总编辑的华岗，在工作上处处遭到王明的排斥和打击，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一九三八年春，他被派往东南战场作战地记者。他深入前线，写下了第一篇战地通讯——《活跃在东南战场的新四军》，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报纸上发表。他从东南战场回到武汉后，又奉命提前撤离武汉，带领一部分编辑、印刷、营业部门的同志，携带一部分物资，乘两条大木船溯江西上，到重庆去筹办《新华日报》。一九三九年秋，华岗因病不得不离开《新华日报》社。

长期监狱生活的摧残和出狱后的紧张工作，使华岗的健康恶化，离开《新华日报》社后，他在重庆郊区养病。养病期间，他仍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紧紧围绕当时革命的需要，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之间，他编写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籍以鼓舞抗日战争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方针，反对中途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的覆辙”^①。这本书虽然名为民族解放运动史，但对于中国内部的社会解放运动也加以记载。他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求解放的斗争历史，同时也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一部克服阶级矛盾并在克服这种矛盾的基础上来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的历史。”^②此书长达四十万字，一九四〇年由上海鸡鸣书店正式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数年之间，重印八版之多。当时的一些学校，将它作为学习中国近代史的课本或必读参考书。

在四十年代初期，华岗还写了《社会发展史纲》、《苏联

^{①②}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增订本自序。

外交史》和许多历史论文（其中《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阻滞的基因》，后来汇编成《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华岗又将原《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关于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两章，加以修改和补充，写成《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两册单行本，由海燕书店出版。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南方局为了保存干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部分干部疏散到外地。华岗根据周恩来的直接指示，到西康雅安（今四川西部）联系几个同志，做刘文辉、潘文华和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当时环境十分艰险，在雅安，特务到处横行，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华岗夫妇不得不将刚刚生下的第一个孩子送给一家贫农抚养。三个月后，孩子生病，无钱医治而死去。华岗没顾上去看一下自己的孩子，又马上赶回重庆，参加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和整顿三风的学习。

一九四三年，华岗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接着，他又被派往云南工作。这年春天，他从重庆到了昆明。他当时的正式身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云南龙云处的代表，公开任务是清理和收容长征时散失在云南各地的红军指战员。实际上他到昆明还有更重要的使命：作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和共产党合作；另外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昆明民主运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运动积极地进行指导和开展工作^①。

^①楚图南：《记和华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载1980年6月21日山东大学校刊。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化名林少侯，由楚图南及尚钺两位同志介绍，应聘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他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分，参加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等，开展地下工作。他同周新民、李文宜等团结政界、文化教育界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大力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他主动结识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著名人士，参加他们主办的定期学术讨论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当时，云南的情况十分复杂。知识界也存在着许多分歧。华岗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引导各方面的人士摒弃歧见，在抗日、民主、进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经常在各种场合下呼吁团结，呼吁大家协商切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气魄。他还经常在云南进步人士组织的各种集会上作报告，介绍形势，鼓舞大家共同进步。

起初，党内有的同志对争取团结象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偏见，认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云南后又钻进了小楼，醉心于经史楚辞的研究，象他那样的人，能和我们走到一起来吗？就在这时，华岗带来了周恩来的指示，指出：象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华岗和其他同志，主动去接触和了解闻一多，多次同他们开诚布公地促膝谈心，终于使他从长期徘徊苦闷之后，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走上了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行列。

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导下，经华岗等的辛勤工作，抗日

后方各种不同经历、不同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团结，云南的民主同盟支部建立起来了，闻一多被推选为宣传部长，而且一直和共产党合作配合。甚至象龙云这样的人，也让他的儿子秘密参加民盟组织。云南民主运动的发展，教育和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为后来的“一二·一”运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积极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华岗还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对统一战线内部的一些错误倾向作了必要的斗争。例如，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对美国式的民主抱有幻想，企图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结成“第三势力”，有些人主张把青年学生中的“民青”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作为民主同盟领导下的青年组织，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些人同共产党争夺外围组织的企图。对此，华岗都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纠正了这些脱离共产党领导的错误倾向，密切了“民青”与党的关系，并使更多的人认识了美国杜鲁门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反共反人民的本质。

在此期间，华岗对龙云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一九四四年，在川、滇、康等地曾酝酿过一场反对蒋介石迁都西昌的联合斗争，其中就包含着华岗等的工作成果。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由延安飞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问题。华岗应召由昆明到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了谈判工作。毛泽东在谈判之余与华岗亲切谈话，称赞他所撰写的《中国大革命史》说：“这是一部好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上海。华岗随周恩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共代表团下面设立了一个上海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在民主党派、民族工商业家和外国驻

沪记者中间展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华岗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上海工委的办事处设在上海马思南路一百零七号、对外称为“周公馆”的一座西班牙式的小洋房内。华岗在这里与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六月二十三日，在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上海工委组织群众在上海车站召开五万人反内战的声讨大会，会后进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并推举马叙伦、阎宝航等十名代表前往南京政府请愿。代表到达南京后，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演成著名的“下关惨案”。

这年年底，北平发生了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各大学纷纷要求上街示威抗议。当时，中央指出要积蓄力量，准备长期斗争，周恩来又回延安去了，怎么办呢？华岗听取了学生方面负责人的详细汇报之后，与上海地下党同志一起进行了认真讨论，毅然决定支持学生们走上街头、声讨美蒋的滔天罪行。革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很快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约有五十万以上的学生相继举行了罢课和游行示威，形成一个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反美“抗暴”斗争的高潮。

华岗在这一时期，还努力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中的上层人物。他经常出入于国民党特务的包围之中，还要处理繁忙的机关工作。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工作。

全面内战爆发后，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代表团全部撤退，强制封闭了中共代表办事处。作为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华岗，坚持到三月初，才同董必武等最后一批乘飞机撤回延安。他们

到达延安时，受到毛泽东、朱德和先期回到延安的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和慰问。

一九四八年春，华岗经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秘密从解放区到香港。他的任务是作为后备队伍，准备“香港工委”万一被破坏而无法工作时，由他继续进行工作。他在香港时，同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等著名的民主人士都有密切来往。这年五月，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筹备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华岗按照党的要求，协助香港工委积极争取民主人士回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当华岗准备陪同一批民主人士回内地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他却因患病不能启程，不得不继续留在香港治病。

(五)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一九四九年九月，华岗应党中央召喚从香港搭乘最后一班轮船返回内地。本来是计划先到上海，再到北京，但因吴淞口被敌机轰炸不能靠岸，轮船只得驶往青岛登陆。到了青岛，又由于健康原因，华岗不得不暂时留了下来。

在青岛，他受到当地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并且很快同文化教育界的同志发生了联系。当时，青岛刚解放不久，接管山东大学的军代表和一些著名教授经常到宾馆看望华岗，征求他如何办好山东大学的意见。华岗对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怀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责任感，他很想青岛定居下来，长期从事教育和著述活动。有一次，他对前来探望的同志说：“如果

不去北京，新学年开始后，我可以担任讲授《社会发展史》这门新课。”^①这时，华岗还应青岛政协和中苏友协等单位的邀请，做了不少政治报告和学术报告，讲解“新民主主义文化”等问题，深为广大听众所欢迎。

当时的山东大学，急需一位既有革命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老干部来主持工作。于是，经山东省领导同志的建议，中央同意华岗留在青岛工作。他开始以教授的身分给全校学生和教职员讲授《社会发展史》这门政治大课。一九五〇年春天，山东大学选举成立校务委员会，华岗当选为主任委员。一九五〇年冬，原在济南的华东大学迁到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并于一九五一年三月成立新的山东大学，中央任命华岗为山东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以后，他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哲学研究》编委等职务。

新的山东大学具有五院十八系的规模，是一所文、理、工、农、医齐全的大学。华岗为办好这所大学，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首先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为了改变师生员工的思想面貌，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思想毒素，急需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当时政治理论课教师又十分缺乏，华岗便亲自抓政治理论课教育。他给全校师生员工讲授《社会发展史》、《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政治大课，还结合形势和任务定期给大家作时事政治报告，引导大家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学习革命理论，明确党的方针

^①罗竹风：《悼念华岗同志》，载《柳泉》1980年第2期。

政策，提高思想觉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山大师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担任副校长的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曾多次对人说：“我解放初期在山东大学，本是埋头搞科学研究的。华岗同志曾多次登门来看我，与我促膝谈心，之后我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了。”他还说：“后来我到了北京中国科学院，在生物研究中有了新的突破，是由于华岗校长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使我懂得了辩证法，所以在科学研究中作出了成绩。”

在学校领导工作中，华岗强调学校要“以教学科研为中心”，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抓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上。他认为总务后勤工作必须为教学服务，政治思想工作更应环绕这个中心。那时，山大校园内的中心建筑是“六二”楼^①，校部办公室就设在里边。华岗提出：“六二”楼大部分应归教学使用，办公室用房只能占很少部分，凡与教学无关的用房，应尽量缩减。一九五二年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时，华岗主张：校内进行“三反”，首先是要把那些教学上的浪费反掉，各院系应首先检查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形式主义、脱离实际、教条主义等。他带领校部干部，深入院系检查教学设备、教材上的浪费情况，发动师生员工起来揭露旧教育的危害，清扫旧教育思想，洗涤旧山大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为进行教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华岗十分重视系科的调整及专业课的设置和改革，加强重点课程的建设。解放初，山大的文学院内中文和历史合在一起

^① “六二”楼是山大校园内最高最大的建筑，因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而命名。

叫做文史系，华岗支持文、史分开，单独成立中文系和历史系。为了加强师资力量，特地聘请了几位著名教授来校任教。鉴于以往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施，中国史以古代史为主，而世界史又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情况，在华岗的倡导下，山大新成立的历史系，一开始就着手扭转这种偏向，突破过去的老框框，一方面加强中国近现代史，一方面加强对亚洲及周围国家的研究。同时，决定开设《苏联史》和《美国史》。在中文系，华岗支持开设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相当于后来的《现代文学史》）。他还聘请了几位校外作家和学者来兼课，以提高教学质量。华岗带头研究鲁迅，并在中文系组织成立“鲁迅研究”小组，开设鲁迅研究课。

对于理、工、农、医，他同样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强调这些院系的教学工作应同国家建设需要相结合，首先和青岛及山东的建设事业密切联系起来。他在校刊《新山大》创刊号上提出：“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法，培养热爱祖国及具有高级文化水准，能够掌握现代科学与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这就是目前我们新山大的方向和任务。”^①

为了把学校办好，把教学与科学研究搞上去，华岗并不满足于自己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造诣，还挤出时间，深入到自然科学领域中去，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和钻研物理学和生物学。他曾在《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辩证唯物论与物理学》，对哲学与物理学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以回答当时理科某些教师提出的质疑。

在教学工作上，华岗坚持亲临第一线，深入院系，与教师

^①见《新山大》创刊号题词，1951年3月。

和学生共同研究课程改革。他不仅亲自为全校师生员工讲授政治理论课，而且还带头为历史系和中文系开设“中国近代史专题”和“鲁迅研究”等业务课程，培养训练学生科学研究的能力，并且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教师，成为这些课程的骨干力量。

华岗在山东大学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主持创办了山大的学报《文史哲》杂志。《文史哲》刚创刊时，经费很困难。他为了不增加国家负担，自己带头捐款，支付印刷费。他还兼任《文史哲》杂志社的社长，亲自审稿，并带头写稿。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一九五四年，文科两名学生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许多报刊不予发表。在华岗的支持下，《文史哲》发表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的重视，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文史哲》在华岗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大家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国内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刊物。陈毅曾称赞说：“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和研究，为国家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材，而学报正是检验这种成就的标尺。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群起仿效。”^①

从华岗担任校长时起，山大每年校庆都要开科学讨论会。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五年初，山大连续举行《红楼梦》研究的大型讨论会五次，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两次。一些大型的讨论会，华岗都亲自参加。他善于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自己发言，既不强加于人，更不以势压人。在学术上提

^①1951年暑假，陈毅在上海一次招待华岗的便宴上的讲话，见罗竹风：《悼念华岗同志》，《柳泉》1980年第2期。

僵发表不同意见，开展自由讨论，在当时的山大已初步形成了一种风气。例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当时在山大就同时存在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以及魏晋南北朝封建说等几种不同的意见。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推动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不断发展。

华岗十分关心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他除了通过政治报告和大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外，还具体地指导和帮助学生如何学习。他经常接待学生来访，有时还参加学生的班级活动。他在一次接待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来访时，鼓励他们“要始终保持饱满的革命情绪，不要因为安定的日子而松弛”，要有目标，有计划地学习，要持之以恒，讲究方法。华岗对学生的体育文娱活动也十分关心，曾把自己的一部分稿费捐赠给学校，为学生们购置文体用品。

华岗十分注意在校内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放前后，山大有一批国外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华岗没有因“海外关系”而歧视他们，而把他们视为办好学校、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安排他们到适当的岗位上，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例如生物系陈机教授，曾获里昂中法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解放后担任了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工会主席、生物系主任。他回忆说：“每次同华岗校长谈话，都受到不少启发，他从不板起面孔，用一套理论往你脑子硬灌，而是循循善诱，潜移默化。他同知识分子谈话，总是鼓励多于批评，从他家里出来，心里总觉得有一股向上的力量。”华岗很善于团结知识分子。那时，山大的两位副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都是非党人士、著名学者，华岗很尊重他们的职权，也很重视他们的学识。凡是学校的重大兴革事项，都同他们共同商量，一起作出

决定，由各方分工去办。他的民主作风，深得广大师生员工的称赞。一些曾在山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同志说：“那时教师们对华岗同志毫无隔阂，思想上随便聊，学术上谈得拢。他常到教师中去谈心，很多学生也常成为他家的座上客。在他带动下，山大的党政干部深入基层，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极大地推动了工作。和华岗同志相处过的人都觉得他平易近人，和颜悦色，即使你提的问题或作的事情错了，他也总是心平气和讲明道理，从不训人，使你觉得可亲可敬。他真是党的一位老干部，好同志，我们的良师益友。”^①

华岗在山东大学期间，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努力搞好教学科学研究。在他的主持下，全校上下一致，生气勃勃，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之一。师生们赞誉华岗是“懂政策、有能力、会办学”的好校长。

（六）

正当华岗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可以运用他丰富的学识和经验，为党和人民做更多工作的时候，却突然意外地遭受诬陷，竟以冤案而身陷囹圄。

一九五五年秋天，在全国“反胡风反革命集团”^②及肃反运

①张惠等：《怀念我们的良师益友》，载1980年7月6日，山东大学校刊。

②“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某些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实事求是的复查，已于1980年9月宣布彻底平反。

动高潮中，华岗被认为与胡风有关系。同时，山东党内开展了对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华岗因过去和向明一起坐过牢，解放后又在青岛工作与向明有过接触而受到牵连。因为他不肯昧心揭发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问题，而竟无端地也成了这个“集团”的成员，突然失去了自由。

那年八月，事情发生之前，华岗还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刚结束，山东省委负责人找华岗谈话说：“青岛市委正在揭发向明问题，你们关系密切，可是至今没有看到你一份揭发材料，回去后须认真揭发交代。”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华岗冷静地回答：“我一定实事求是，有就揭发。”回青岛后，他明知道“不揭发”的严重后果，但仍表示：“我不能凭空捏造事实去陷害自己的同志。”结果，不久他就以“胡风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后改为“隔离审查”。在青岛关押了两年，一九五七年送往北京。到一九六五年，整整审查了十年，始终未查清他的“罪证”（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罪证）。但是，最后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公民权七年。随后，他被押送到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

华岗在被审查和关押期间，刚直不阿，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坚贞不屈的品质。在隔离审查期间，专案组三天两头审问他，并且动员家属子女来劝说，他始终只是一句话：“我没有罪可服”，“那些罪状都是他们强加于我的，不是事实！”被判刑后，监狱领导每天找他谈话，说只要他好好“服罪”，就可以争取“提前释放”或“从轻处理。”华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只相信真理，我无罪可服！”正因为这样，他被认为

“态度严重恶劣”，“顽固不化”。因此，非但不能从轻，反而一再地加重处理。一九六二年，山东的所谓“向明反党集团”问题已经弄清，这个所谓“反党集团”的成员一一得到了甄别平反，而华岗却连甄别的资格也没有。一九六五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从一九五五年被捕之日算起，到一九六八年本应刑满释放，而又值“文化大革命”，刑满仍留在监狱，遭受更加残酷的迫害。

对于这一切，华岗始终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他坚信党迟早总会有一天搞清楚他的问题，坚信我们党一定会恢复自己的老传统，实事求是对待一切问题。他虽然被剥夺了自由，但始终没有停止为党工作。他曾对人说：“只要一口气尚存，我就要为党为人民工作。”他在狱中仍用马列主义对各种问题进行探讨，以惊人的毅力继续进行研究和写作。狱中不准许写有关政治的文章，他就写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著作；不准许用钢笔写，他就用毛笔写。他本来眼睛高度近视，在狱中关押多年，近视又有加深，读书和写作非常吃力。然而他却整天眼不离书，手不离笔，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写着，日积月累，写下了许多著作。《规律论》是他在狱中完成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哲学著作，可以说是他晚年的一部力作。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曾对人说过：“现在学术界某些题目还没有人注意研究，如客观规律问题，而这是对党的事业有重要意义的，我一定要努力写作来完成它。”

作为党的思想战士，紧扣着时代的步伐来著书立说，这是华岗一贯的优点。他虽然身处含冤莫伸的幽禁之中，思想上仍然没有离开党的事业，没有落后于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为党取得的每一个成功而高兴，为党遭受每一个挫折而忧心。他

把这些思虑凝结在自己的哲学探索中。在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生曲折的时期，他抓住了研究客观规律性问题这样一个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哲学课题，是很有见地的。他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规律和法则都是科学用语和哲学用语，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要使用它，可以说在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场合，都离不开规律或法则这个概念和范畴；但社会上对于规律或法则这个概念和范畴的涵义却常有不同的了解和分歧，误用和滥用的现象甚为普遍……为了澄清这些分歧和克服这些不合理现象，有必要对规律问题进行一番较有系统的科学研究。”

他不满足于简单地给规律的客观性下一个判断，而是引用了大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包括科学史、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多方面的材料，进行论证。为此，他付出了十分艰巨的劳动。他读了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写了大量笔记。对于一个原来并非专攻自然科学的学者，要贯通和处理如此众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实在是很难的，更何况华岗要克服的远远不只是知识上的困难。但他还是顽强地坚持下来了，年复一年，勤奋学习，长年累月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事艰辛的脑力劳动，终于完成了《规律论》这一丰硕的成果。

除了《规律论》外，他还完成了《美学论要》、《自然科学发展史纲要》、《科学的分类》、《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五、六部著作，总共近百万字。这些都是他晚年心血的结晶，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党和人民作出的新贡献，也是他为革命后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九六七年以后，华岗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更加严重的迫害。他在狱中原来稍受照顾的待遇，也被完全取消了。他和一般犯人一样，住到大牢房，白天要到田地里劳动，晚上躺在拥挤不堪的铺位上，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他的健康状况也随之日趋恶化，不得不停止了写作。但他仍然深深地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关心他工作过的地方和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停课、停产、武斗等混乱局面表示很大的担忧。他说：“国家怎么能搞成这种样子？这样子一旦打起仗来，怎么能抵抗外来的侵略？”他也很关心国际局势。作为一个有几十年斗争经验的老共产党员，他对苏联及国际上一些重大问题，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分析。

在狱中，华岗对周围的人，态度始终是热情和蔼的，从不发什么怨言。人们有事求他时，他总是尽力相助。他生活得十分艰苦，自己的一点点生活费，除了帮助有困难的人外，大部分用来买书本和笔墨纸张，却舍不得添一件象样的衣服。他身边留下的，只是一本本认真书写的整齐的文稿和一叠叠精心制作的卡片和标鉴，几只装满了书报的柳条包，还有他亲自用粗针密线缝补过的衣衫、鞋袜……。狱中的一位政委对华岗的为人品德非常钦佩。他回忆说：“华岗同志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尽管对某几个人有意见，但对党从无一点牢骚和不满，时时处处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努力学习，注意锻炼，主动劳动。他一心向往有朝一日能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为党的事业贡献毕生的力量。”

由于多年狱中生活的折磨，华岗多种疾病并发，一九七一年初由监狱送回家治病。经过大约一年的治疗，华岗病情稍有好转。这时已快临近春节，他考虑到自己“重罪在身”，不忍

心拖累家人，同时，也考虑到全家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
里多有不便，便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在春节前夕又回到了监
狱。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七日，华岗病情加重，在狱中含冤去
世，终年六十九岁。

粉碎“四人帮”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重新审理了华岗的案件，认为过去判处华岗的“罪证”失
实，应予纠正。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为华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四月十日，最高法院撤销原判，
宣告其无罪。五月二十二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华岗同
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七月五日，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英雄山
烈士陵园为华岗举行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悼词对华岗的
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指出他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一贯
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人民无限热爱，为中
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华岗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
生，战斗的一生。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高尚品质
和革命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的。

作者附记：

此文写作，得到华岗同志亲属和战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淡滨若
和华景杭同志提供了有关资料，王启新同志曾帮助对初稿进行校阅
和打印。特此表示最深切的感谢。

王任叔

王欣荣 王克平

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学者，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王任叔，于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几经波折，一九三八年重新入党。在他艰难、曲折的一生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九日，王任叔诞生在浙江省奉化县大堰村一个农民家庭。根据族谱记载，他的谱名运镗，乳名朝伦，字任叔，号愚庵，官名士侠，又名子虔^①。兄妹五人，他排行第四，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家里有十来亩地，两片竹山。他的父亲务农，还兼管族众的公务，农忙时则雇工，有时与乡人合做竹木生意，善于经营、交际，家庭经济在当时当地尚属小康。在王任叔十岁的时候，父亲因肺病卧床不起，五年后去世，家境由此败落下来。

王任叔七岁时进村里的务本小学。四年后，老师即教《说文范》一类课程，其中文章大部分是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人

^① 《王氏宗谱》，现存大堰乡大堰村。

如陈天华、邹容等的政治论文，这给他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种子。从此他读书愈发认真，一次全县统考，作文名列前茅。老师因事或因病不能上课，他就自任班级小先生，俨然教起书来了。

由于农村生活的熏陶，王任叔自小喜欢学锯木头、补箩筐，被乡亲们亲昵地称为“五通”，意思是说他学什么象什么。他父亲粗通文墨，善讲故事。《西游记》、《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他最早就是从父亲那儿听来的。村中农民，每在夏秋之夜，常在桥头、溪岸乘凉，听少年王任叔讲述“长毛”（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故事和邻县宁海秀才王锡彤领导平洋党和当地人民反清灭洋的英勇事迹。

父亲卧床五年，家资消耗大半。父亲死后，支撑家业的大哥无力供他继续读书，准备让他在家务农或到商店当学徒。在宁波第四师范读书的二哥王仲隅，暑假时借到一张高小毕业文凭，拉他去参加师范考试，竟然被录取了。这给家庭带来极大的矛盾：大嫂反对他进师范读书，母亲不敢作主，而二哥再三来信让他快去报到。经过一个多月的苦苦哀求，母亲才下了决心，让他跟着村里的一个鱼贩子到宁波去。王任叔带着一颗创痛的心，走进宁波师范学校时，学校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读师范交费很少，在当时是清苦学生的较好出路。加之王任叔的课本是二哥读过的，制服是二哥穿过的，这就更为家里节省了开支。

宁波是鸦片战争后开埠的港口城市，英、法、美、德等国的领事馆林立，外国商船和开办的工厂到处可见。但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顺利地发展，除了渔业、商号之外，就是制造锡器和迷信品锡箔之类的手工业。王任叔在四师学到一些自

然科学知识，也读一点英文，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完成陈腐的宋明理学和桐城派古文等课业。一、二年级时，他安分守己，很少活动，在一位爱好“老庄之学”的老师影响下，钻研《古文辞类纂》、点读《纲鉴易知录》、抄读《李太白集》等唐诗，进而读《红楼梦》等小说。一位同学的父亲会作古诗，常将诗作寄给儿子看，由此在同学中传阅。王任叔和几位同学相约也习作古诗。他曾将自己习作交给奉化女校校长、当地有名的才女王慕兰，受到她的称誉，赞曰：“真吾家之千里驹也”。这对他激发很大，于是课余大多读古书、作古诗。王任叔读三年级时，由家庭包办，跟他姑母的独养女、比他大三岁的表姐结了婚。那时他还不懂得反抗封建婚姻，对家庭生活心里充满了苦闷，就常以作古诗来排忧解难。

王任叔从好友毛信望那里了解到许多官僚如何拍马钻营，贫苦妇女如何被拐卖等社会问题。在“神圣”的学府里，他也亲眼看到，学监对贫苦家庭出身的学生态度蛮横，动辄训斥、指责；有的教师玩忽职守，沉溺于酗酒、搓麻将……这些都使他睁开双眼，去观察社会的黑暗面。

师范生是要培养口才的，每周都要安排学生练习演讲。有一次轮到王任叔演讲，他选的题目是《卫生不必要论》。他说：中国人不必讲什么卫生，有钱人家子女受到父母溺爱，吃得好、穿得好，还有人参、鹿茸调理着，到头来还是个柔软多病之身。而农民、工人吃不好，讲不起卫生，照样身体健壮。就以甬江上船户来说吧，妇女在船上生孩子，也请不起助产医生，第二天照样摇船使橹，孩子还不是也能壮实地长大起来^①。

^①巴人：《论鲁迅的杂文·后记》，载《论鲁迅的杂文》，远东书局1940年10月版。

这席话，反映了王任叔对当时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愤懑。

(二)

“五四”运动前夕，宁波第四师范学校王任叔所在的班级，即倡议全校成立了反抗学监压迫，促进校政改革的学生自觉会。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宁波，四师同学积极响应，于五月九日与兄弟学校的同学一起集会游行。十九日，由四师、效实中学发起，各校代表在后乐园开会，成立宁波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宁波学生联合会，毛信望被推选为评议部议长，王任叔作他的助手，任秘书长。

“五四”运动期间，宁波工人和“救国十人团”的活动，对王任叔的触动颇大。五月下旬，宁波的码头工人即组织起来不卸日货^①，不替日商运煤。“救国十人团”成立大会上，小学教师王吟雪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并咬破手指，当场血书“誓死抗日”四个大字，千余群众无不感动。王吟雪毕业于第四师范，是王任叔二哥王仲隅的同班同学。王任叔对他很敬重，自此成为挚友。

宁波学联领导学生运动颇有声色。他们编写歌曲，组织演讲队，轮流走街串弄进行宣传，还编演活报剧如《痛打卖国贼》、《东洋乌龟爬不动》等进行演出。为抗议军阀政府对学学生运动的迫害和污蔑，继杭州学生总罢课后，五月二十一日，宁波学联宣布全市学生罢课^②。

①杭州大学历史系：《浙江现代史讲义》，打印稿第16页。

②《五四运动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

宁波学生运动受到奸商的报复和官僚的压迫，一些中学的学生会先后被分化，坚持到最后的只有第四师范。第四师范校园也不平静，学监利用学生的矛盾，把高年级同学驱逐出校门。王任叔、张宗麟代表学生和进步教师联络，争取同情。最后，学校以考察教育为名，带他们到苏州、无锡等地走了一圈，回校后匆匆举行考试，就算毕业了。如火如荼的青年学生运动暂时平息了，但从此引起了王任叔对社会问题的更深的思考。

王任叔回到奉化大堰，家里的境况使他益发苦恼：三个兄弟分家了，他分到三亩地、两间房；妻子与他的思想感情不合，终日赌气、争吵，还以自杀相威胁。王任叔只好离家，去镇海、鄞县等地的义庄小学^①教书。他在烦闷中思想找不到寄托，开始对老子、庄子的学说发生兴趣。庄子的颓废思想对王任叔有影响，但庄子的某些辩证法思想，却使他敢于否定现实，否定旧的社会制度。

一九二一年，王任叔开始读到《新青年》和郭沫若、田汉、宗白华的《三叶集》，以及《时事新报》的《学灯》、《文学旬刊》等书刊。这些书刊使他受到新思想的启蒙教育，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他从创造社的作品中感受到浪漫主义的气息；他从文学研究会沈雁冰、郑振铎的言论里，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文学必须深入生活、面对人生的观点，并且身体力行。从此，他立志献身新文学事业，决心做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战士。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王任叔到宁波星荫小学教书。这是一

^①义庄小学是同族集资办的小学校。

所实行新式教育法的学校，在这里工作的半年间，有三件事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他看到了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署名“巴人”的鲁迅作品《阿Q正传》，思想受到巨大的震动，深感新文学作品的巨大力量。第二，星荫小学的教员大都是他的师范同学或奉化同乡，除二哥王仲隅外，还有庄世楣、胡行之都在这里。一九二一年，奉化曾发起“剡社”，王氏兄弟和庄世楣、胡行之，还有《四明日报》编辑严竹书，都是第一批成员。“剡社”团结青年知识分子，拥护开明绅士、老同盟会员庄崧甫，与劣绅组织的“法治协会”相对抗，在奉化作社会改良与教育工作。其三，暑假期间，沈雁冰、郑振铎来宁波讲学，他听了沈雁冰的《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并为郑振铎《儿童文学教授法》的讲演作笔录，使他坚信了文学必须“为人生”的主张。与此同时，在上海读大学的老同学宓如卓，曾找他与谢传茂谈起在宁波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情。宓如卓是慈溪人，自称已加入了共产党，要在宁波发展组织。王任叔从和宓如卓的谈话中，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认识到中国要改革现状，非实行彻底革命不可。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上半年，王任叔到慈溪普迪小学任教。这一年时间里，他埋头学习新文学，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许多诗歌，并由郑振铎介绍，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他的新诗《告弟兄们》^①，歌颂光明，诅咒黑暗，呼唤民众起来与恶势力斗争，代表了他在这一时期思想的积极方面。这时，浙江教育当局正拟委派经亨颐任宁波第四师范学校校

① 《新奉化》1923年第1期。

长。经亨颐是著名教育家，国民党左派人物，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校长期间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早期共产党人如施存统、俞秀松、宣中华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到宁波来，进步人士当然欢迎。但是，以张让三为首的地方绅士，却发动舆论指责经亨颐为赤祸头子，妄图加以拒绝。张让三曾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比等国，在国内曾任铁路督办盛宣怀、浙江巡抚张曾敫幕府和南洋公学总理、宪政编查馆咨议，著有《土耳其志》、《东南海岛图经》、《奉化县志》、《绿绮阁诗集》等，门生故吏遍及甬沪之间，是“德”、“威”两重的宁波学阀。王任叔敢于蔑视这个权威，起草欢迎经亨颐莅临宁波主持四师校政的宣言，征集知识界进步人士签名，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一时舆论哗然。他被视为赤化分子，于一九二三年六月被普迪小学解聘。此后，身患严重神经衰弱症的王任叔，寄住在好友王雪吟主持的佛教孤儿院中，边疗养边创作。同年底，宁波春风学社出版了他的新诗集《情诗》。

一九二四年一月，王任叔被聘为奉化松林小学教务主任。这时，宁波成立了国民党宁波分部，共产党人都跨党参加了国民党分部活动，并在里面成立了共产党支部。担任分部干事的谢传茂写信，要王任叔参加共产党和国民党。王任叔回信表示同意，但没有履行任何组织手续。

一九二四年暑假前，王任叔再次失业。他在奉化初中寄居两个月后，得到宁波《四明日报》馆的邀请，遂到宁波任《四明日报》地方编辑，还参加雪花社的活动，以“雪花社文学社”的名义为《四明日报》编《文学》副刊。在《文学》上，他鼓吹文学研究会的主张，编发了不少带有革命倾向的文学作品。雪花社成员中，当时有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如蒋本菁、

潘风图（潘念之）、干书稼、宓如卓、谢传茂、张宗麟；有的成了学者，如张孟闻、毛路真。

王任叔在《四明日报》工作期间，张秋人代表上海党组织曾来宁波指导工作，恽代英也率领上海大学的宁波学生来宁波开展反教会运动。他们对《四明日报》内的共产党组织生活提出了许多意见。王任叔就在一九二四年底或一九二五年初，由张秋人正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四明日报》社的党组织活动。由于他在报纸上言词激烈，这年春又被报社辞退，流落到上海，租住闸北一个亭子间，想做个职业文人。在郑振铎家里，他结识了沈雁冰、叶圣陶等。当他目击“五卅”惨案的发生经过后，深感肩负的责任首先在救国，加上他到上海并没有经过党组织的安排，于是返回奉化，重新投身当地的革命活动。

回到奉化，王任叔参加了由张秋人和中共宁波特别支部领导开展的声援“五卅”群众运动。六月七日，奉化各界组织成立“五卅”惨案奉化外交后援会。十日，万余群众冒雨在奉化县城大桥镇金沙滩集会，王任叔是大会司仪。会上发现县知事沈秉丞及教育科长杨范卿没有到会，于是以县议长庄崧甫为前导，冲进县衙门向沈秉丞兴师问罪，当时群众情绪之高昂，游行规模之盛大，在奉化是空前的。不久，成立了奉化学生联合会、奉化小学教师联合会。王任叔积极指导他们组织演讲队、演剧队，查抄英、日仇货，为死难烈士遗属募捐，在奉化城乡进行爱国宣传活动。

这些活动引起了以法治协会为中心的劣绅们的恐惧与仇恨。他们以反赤化为名，向刺社中的左翼人物进行攻击。“刺社”中有人开始动摇，劝王仲隅引退，王仲隅遂离奉化赴广

州。王任叔这时被聘为奉化初中的教务主任，直到一九二六年暑假。

在奉化初中的一年间，王任叔讲授注音字母、心理学和政治时事，编印《锦溪》校刊。在校外，他们则争取剡社里的进步力量，展开反劣绅土豪的斗争。王任叔在其主编的《新奉化》月刊上，接连发表抨击劣绅土豪的文章，并批评蒋介石不该在广州起用法治协会的俞飞鹏、朱守梅等右派人物。一九二六年三月间，王仲隅从广州回到奉化。离开广州时，他曾写信给蒋介石进行规劝。因当时要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苏联学习，王仲隅在信中还提出让三弟王任叔去苏留学。蒋介石当时以左派自居，对剡社表示“敬重”。他看过王任叔在《新奉化》上发表的社评，遂寄信到奉化，要求王任叔去广州襄助他工作。但信到时，广州已发生中山舰事件并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蒋介石逼迫自己的秘书长邵力子退出共产党。在此情势下，王任叔决定不去广州，继续留在奉化与地方顽固势力展开斗争。“五卅”周年时，王任叔参与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奉化县学生联合会、剡社、非基督教同盟、县议会等举行纪念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宁波《时事公报》发表了王任叔的纪念文章《“五卅”与赤化》。文章指出：“以中国人之血，任彼帝国主义者之吸吮，以‘赤化’吾中国的地皮，而吾国之不肖子孙，犹甘为虎作伥，千方掩护其丑态，为之卖力效劳，无端以‘赤化’罪名，搜罗赤化之主犯，而不知主犯固在其后也，能不悲哉，能不悲哉！”

六、七月间，宁波镇守司令段承泽奉孙传芳命令镇压革命力量，宁波市的国民党员遭到逮捕。奉化县知事沈秉丞与法治协会对县内的进步力量进行反扑，王任叔被控于法庭。他在赵

济猛等的支持下，决定以剌社名义召开各界青年招待会，以揭穿敌人的阴谋。当他与庄世楣去会场途中，有人告诉他县里的捕役正在那里等着他。仓促间，他去宁波避风。

(三)

孙传芳势力统治下的宁波，也是一片恐怖气氛。国民党在宁波的活动亦被禁绝了。王任叔在朋友家里躲避半个月后，于七月六日经上海乘船奔赴广州。他到广州时，北伐誓师大会刚刚开过。

广州虽然经过廖仲恺被害事件、中山舰事件，但政治气氛究竟与军阀统治下的江浙大不相同。工人、店员、工人纠察队员的革命组织性、自觉性，给他以极新鲜的印象。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接见并委派王任叔到总司令部秘书处作机要工作。

秘书处机要科长是陈立夫。王任叔的工作是为公文摘由、编译电码。这期间，他抽空阅读了考茨基的《通俗资本论》以及鲁迅的一些文章。北伐军司令部里，一些“革命者”假借革命为进身之阶，一些他所熟知的反三民主义、反共产党的人物麇集于蒋介石麾下，颇使王任叔感到厌恶。有一次蒋介石交下一份拍给孙传芳的电稿，要王任叔编码发出。在这份电稿中，蒋介石希望孙传芳效法唐生智同自己合作，以成中国统一大业^①。王任叔读后，对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更加有所了解。

^①巴人《旅广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2—43页。

王任叔来广州时没有带党的组织关系。到广州后，由张秋人为他接上了组织关系。总司令部里只有王任叔一个中共党员，组织生活与总政治部的党员一道过。王任叔在总司令部里，被人视作蒋介石邀来的同乡。因此在北伐军打到汉口之后，他在广州竟被任命为总司令部的机要科科长。他以工作之便，经常向组织汇报北伐军内各政治派系的动态。一次，他收到蒋介石在江西前线拍给总司令部留守主任、第四军军长、北伐军总参谋长李济深的密电。电文说：南昌和武汉两方面都各主张在自己方面建都，双方争执不下，余以为北伐大业没有完成，而党政内部意见如此分歧，并且集中意见于中正一人，“中正愿从此退休，以谢国人，未知参座意见如何。”^①当时国民党中央已在武汉，武汉建都已经成为事实。蒋介石慑于武汉革命力量的强大，在南昌扣留了一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由张静江等出面，要求国民政府迁都南昌，以要挟国民党中央。李济深是桂系的实力派，在军事力量上是可以同蒋介石相较量的第一个人。李济深的倾向性如何，关系到蒋介石另立中央的成败。蒋介石的电报，就是为试探李济深的态度的，李济深乃去电劝慰，并分发密电与其所属之第四军及其友军将领。这些行动实为“清共”密谋，是关系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成败的危险信号。王任叔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周恩来对他的报告很重视，并亲自接见了。周恩来的智慧、干练给他极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我一生常记起他那黑晶晶的眼睛，好象经常‘监视’我的行动。一到自己消沉和颓丧的时候，我就想起这眼光的威力。”^②

^①巴人：《旅广手记》第96页。

^②王任叔《自传》，存中央组织部档案处。

这期间，王任叔在广州过着严格的组织生活。他认真阅读党内刊物，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听周恩来、肖楚女的演讲，到中山大学与沙文求等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文化界的朋友如钟敬文、蒋径三等也有来往。在读了《文学周报》上胡适之写给徐志摩的讨论中国革命的通讯后，他想起当前国民革命中蒋介石的种种卑劣表现，如果中国革命按照胡适之提倡的“比较和平”的方法，当然要功败垂成。于是他即写信给《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说：“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一个阶级统治下，其他被统治的阶级，便绝对无自由之权，……在今日之中国，帝国主义者的种种的侵略，军阀土豪的剥削，他们早已互相勾结一起向民众进攻，阶级之势早已形成。是否还能够用‘比较和平，牺牲小些’的‘诗人方法’？再就另一方面说，太凡一个统治阶级见到被统治阶级抬起头来的时候，未有不顾虑自己的阶级地位之不安而施以压迫摧残的。”“所以我以为被统治阶级推倒了统治阶级的固有势力时，为自己一阶级的利益，为防止统治阶级的反动——因为统治阶级的自由，一向以剥夺被统治阶级的自由为自由的，一旦失却，未有不欲恢复的——而有专政的必要。直到反动派屈服了，阶级消灭了。这时，恐怕有全民自由的希望，于此，也可以说一个大多数的阶级的专政，也是消灭阶级的策略。”^① 信中还对《文学周报》提出批评：“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周报，对于批判旧社会之封建思想与提倡革命的新思想的文字似乎太少了。”^② 从这里可以看到，王任叔“为人生”的思想已为革命的功利主义所取代，已开始

^{①②}王任叔：《通讯》，载《文学周报》第267期，1927年3月27日。

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来观察中国的实际问题。

在广州，王任叔看到了国民革命的危机，想回上海或浙江作些实际性的工作。他的要求得到党组织同意。于是，他辞去了机要科长的职务，于三月底离开广州，乘船到了上海。此时，李济深已到上海；汪精卫和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已在报上发表了。蒋介石与李济深、汪精卫、虞洽卿频繁接触，上海局势顿时紧张。王任叔在上海接不上党的组织关系，去杭州的客车又不通，便决计先回宁波。四月一日，他乘船到了宁波。宁波的共产党员卓兰芳、江少怀等，正忙于搞打倒新军阀——宁波防守司令王俊、警察局长吴万能的公开运动，而对王任叔带来的信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王任叔在群众集会上也曾揭露新军阀正酝酿公开反共，但正处在热头上的群众难以理解。他又赶回奉化，想告诉奉化党组织赶快组织农民自卫队，彻底打倒土豪劣绅，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

奉化的革命形势很好，王仲隅、庄世楣、董子兴等共产党员，都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接管了奉化的党政大权，大家都在忙着组织农会，处理贫苦农民的上告状。四月八日，宁波的反动派开始“清党”，国民党市党部常委杨眉山（共产党员）、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共产党员）、《民国日报》主笔庄禹梅等被逮捕，总工会下属组织都被流氓分子改组。宁波党组织通知王任叔“速来宁波，详情面谈”。他于四月底匆匆赶到宁波，以第四中学（四师的后身）国文教师为职业，参加党的地下活动，负责中共宁波地委宣传部的工作。那时宁汉分家，汪精卫尚未提出“分共”主张，郭沫若所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经国从苏联寄来的斥责其父叛变革命的通讯，都在武汉的报纸上刊出。王任叔翻印成传单，组织青年学生四处散发，震动一

时。

反革命的大屠杀开始了。杨虎、陈群自上海带来大刀队在宁波进行血腥镇压。杨眉山、王颀首难牺牲。党组织命令王任叔转移去上海，但在动身前夕被捕。王任叔在被提审时，陈群出示奉化法治协会俞飞鹏、朱守梅拍来的指控他为共产党的电报，王任叔并不辩护，心地甚是坦然。这时，王任叔的大哥王伯庸和党外朋友王荫亭、裘公绹夫妇，都设法拍电报到杭州，向在省里任职的庄崧甫呼救。庄崧甫辛亥革命前在奉化办过新学，在地方上有威望，蒋介石称他为老师，执弟子礼。庄对王任叔、王仲隅弟兄甚是器重，闻讯后星夜赶到宁波，找杨虎、陈群，硬把王任叔保释出狱。

王任叔出狱后在宁波找不到党组织，便回到奉化故乡。二哥王仲隅被捕后亦由庄崧甫保出在故乡休养。兄弟二人想利用共产党员董子兴在国民党县党部任农运部长的方便，一起从事农民运动。但形势急剧恶化，农村也在进行大规模“清党”。王任叔与王仲隅在家乡呆不住，遂离开家乡，流浪于宁波、上海之间。后王任叔暂住上海新学会社^①。十一月间，许绍棣出任杭州商业高等学校校长，邀请王任叔任国文教员。他也想借此机会在杭州寻找组织关系，就答应了。但到杭州后，得知赵济猛被捕且遭杀害，不久，奉宁波党组织负责人沙文汉指示来杭州送交组织名单的奉化同乡董子兴，亦于半途被捕，惨遭枪杀。王任叔冒险为董子兴收尸之后，便去余杭庄崧甫办的农林试验场暂避。

一九二八年初，经四师同学、雪花社旧友张孟闻介绍，王

^①该社为庄崧甫所办，辛亥革命与反袁时是党人来往机关。

任叔赴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执教。春晖中学是经亨颐创办的进步学校，瞿秋白、杨之华、陈望道等都来此讲过学，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也曾在这里执教。王任叔在教学之余和张孟闻办了《山雨》杂志，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同时，他认真阅读彭康、李初梨的文章和朱镜我翻译的《经济学入门》等书籍，使他对社会结构等理论有进一步认识，更深感马列主义理论之重要。

一九二七年，王任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监狱》出版。一九二八年，他以极其旺盛的精力，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破屋》、《殉》、《影子》和中长篇小说《死线上》、《阿贵流浪记》等。这些小说记叙了他自己的经历，描写了大革命时期浙东地区的阶级冲突和社会面貌，刻画了家乡农民勤劳纯朴的形象以及他们的悲惨生活。特别是关于浙东农民的小说，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其中《疲惫者》被茅盾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并作了评论。同年，王任叔又以满腔激情写成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土地》（又名《莽秀才造反记》）的初稿。作品气势磅礴地描写了一九〇三年浙江宁海县人民在秀才王锡彤率领下反抗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残酷压迫而举行壮烈起义的英勇事迹。在这些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家乡地区父老乡亲的同情和热爱。为此，他被当时文坛称为“民间小说家”。

与此同时，王任叔还编辑出版了我国早期的革命文学理论书籍——《革命文学论文集》。该书收集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蒋光慈、李初梨、钱杏邨等著名进步作家以及他本人论述革命文学的论文。这些文章，对于大革命后所出现的革命文学运动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任叔撰写的《革

命文学的我见》一文中，直接了当地指出革命文学的实质是“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一种文学作品，是描写被压迫阶级痛苦辗转的情形与夫全个阶级的生理机制以及两个阶级间的利害冲突的作品。”^①“所以革命文学，即是被压迫阶级的文学，换一句话，即是反抗文学。”^②此外，他还在《贡献旬刊》、《生路》、《北新》等刊物上发表文艺理论文章，如《作品与时代》、《作家与人生》、《评〈短裤党〉》和《新诗漫谈》等。

这些书籍的出版和文章的发表，为王任叔筹备了必要的经费，使他得以赴日本学习日文，研究社会科学和普罗文学。

(四)

一九二九年初，王任叔从上海乘船去日本。他和潘念之一起住在东京郊区，自学日语，并参与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这一阶段，他学习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绪论》、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等著作。

在日本的一年中，王任叔翻译了日本进步作家和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如岩滕雪夫的长篇小说《铁》、克理各理衣夫的《苏俄女教师日记》等，并把这些作品介绍到国内。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爆发了中东路事件。蒋介石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唆使下指令东北军与苏联作战，完全背离了一九二四年签订的中苏协定的有关条款。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反

^{①②}赵冷：《革命文学的我见》，载《生路》第1卷第4期，1928年4月15日。

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日本当局又制造“十·三”事件，大肆逮捕中国进步留学生和共产党人。同年底，王任叔被迫回国，途中，日本暗探一直跟踪他到上海。

回上海后，王任叔立即投身于援助“十·三”事件的运动。他与江闻道、潘念之住在一起，并通过朱镜我和阿金寻找党的关系。不久，朱镜我为王任叔与中共闸北区委李一氓等接通了组织关系，王任叔被编在冯乃超领导的北四川路街道党支部。

一九三〇年二月，王任叔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署名发表宣言书。三月二日，他参加发起了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分工负责左翼青年文学研究会工作，并参加左联的党团，公开职业是在沈钧儒任名誉校长的浦江中学任教务主任；浦江中学停办后，王任叔又在党支持的建国中学任教。后因巡捕枪杀沪西赤色纠察队长事件，建国中学亦遭搜查并关闭。六月间，王任叔被中共沪西区委派到曹家渡，领导由日本人开办的绢丝厂的工人运动，并参加了在李立三错误指导下的党团合组的行动委员会。这期间，领导方面不考虑白色恐怖的环境和工人的觉悟条件，也不做黄色工会的工作，只是生硬地在工人中发动政治斗争。王任叔曾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

不久，行动委员会取消，上海划分为十一个区，沪西分别成立了两个区委即沪西区委和曹家渡区委，王任叔被任命为曹家渡区委宣传部负责人，并领导大夏大学党支部。这时，党内开展了反“立三路线”以及反“调和路线”的斗争。有一次，王任叔领导大夏大学支部在田野上开会，王明也从省委宣传部赶来参加，区委对支部工作的指示与王明在会上的指示相抵

悟，以致支部无所适从。王任叔向区委书记老赵汇报情况并提出意见，认为王明直接干预支部工作很不妥当。

十月间，王任叔被派到沪东去做海员工作。那时，上海赤色海员工会由陈郁领导，王任叔担任党团宣传委员。

一九三一年三月，王任叔的组织关系从沪东转往闸北北四川路街道支部。闸北区委在接转关系时，将王任叔转关系的信夹在一叠传单之中，被巡捕查抄区委住宅时搜出，王任叔因而被捕，关押于提蓝桥监狱。

不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就李伟森（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鉴的被害与王任叔的被捕，撰写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的信》，在美国刊物《新群众》上披露^①。沈钧儒先生为王任叔担任义务律师；他二兄王仲隅亦变卖家乡土地，四处奔走设法营救，王任叔被判决徒刑六个月，幸免死难。

同年十月，王任叔期满刚刚出狱，便得知二兄仲隅因辛劳过度，在从汉口来上海后急病死于宝隆医院。这给王任叔以极大刺激。王仲隅最爱护王任叔并是指导他走向革命的亲人。王任叔非常敬重他。二兄留下了孤儿寡妇，无依无靠；同时，近两年党内出现的“左”的政策使他难以理解；遂产生了寻找一个固定职业以抚幼卹寡，尽些义务的消极想法。于是，他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②。

一九三二年一月，王任叔乘船到武汉，经友人介绍去武

^①原载美国《新群众》第7卷第7期（1931年6月）。

^②转引自《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汉《新民报》工作。但该报已为叛党的谢传茂所霸占，无法，只得在武汉宁波小学教书。半年后，又经朋友介绍，在武昌第一中学和汉阳第十二中学教国文。这时，他住在方善境等所办的文化服务社，得与方善境习世界语。武汉的教员长年得不到薪金，教员们组织了“跪哭团”向当局请愿，也得不到解决。王任叔任教半年，领不到一文薪金，不但无法实现他抚幼卹寡的愿望，且无以自活，只好另谋出路。一九三三年一月，他通过南京沙孟海等介绍，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航政司任科员。这一时期，他经常以屈轶为笔名撰写短篇小说，发表在《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后集成《乡长先生》、《捉鬼篇》等小说集。这时，和他来往的朋友有张天翼、蒋牧良、吴组湘、蒋天佐、陈白尘、张孟闻、劳荣、瞿白音等。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工作使他感到痛苦，便主动地为共产党做些工作，比如为路过南京的党内同志提供住宿，经常探望在狱中的朱士翘（后改名何云）及送些东西给潘梓年等同志。

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张道藩组织了一个剧团，王任叔曾撰文对其演出进行批评。瞿白音等组织磨风剧社与张道藩剧团对抗，演出《娜拉》，甚得好评。一九三五年四月，磨风剧社遭国民党当局搜查，不少成员被捕。此事也株连到王任叔，王任叔亦遭逮捕。在狱中，他见到过朱镜我、田汉、杨翰笙等同志。后经友人营救，同年五月王任叔被保释出狱。由于他的案子归划磨风剧社一案，出狱前曾在集体“悔过书”上签了名^①。虽然当时王任叔已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但对于一个早

^①参见王任叔《自传》，存中联部档案室。

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一桩严重的政治错误。为此，他悔恨、痛苦至极，曾立誓隐姓埋名，卖文过日，如能以文字为党呐喊，即使为党所不齿也心甘情愿^①。

王任叔出狱后，辞去交通部职务，搬迁到上海与张天翼同住，专事写作。他为《申报·自由谈》撰写了一系列文艺理论文章：《论文学作品中的定命论思想》、《小说的发展过程》、《作品与批评》、《宫廷艺术与现实》、《典型的写出》等，并集成《常识以下》于次年出版。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日本侵略华北，华北危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民族解放的洪流，也不断地激发起王任叔的革命激情。

一九三六年七月，王任叔领衔发起中国文艺家协会。此后积极参加营救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他用多种笔名为《立报·言林》撰写大量杂文，评论时事、政治和社会；他创作出版了揭露南京国民党政府官僚丑恶面目的长篇讽刺小说《证章》，还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如《现代小说发展的动向的蠡测》、《文学上的还原论》等，以及我国早期研究介绍巴尔扎克的文章《关于巴尔扎克》。王任叔的言论和行动，被上海地下党所肯定。同年底，冯雪峰代表党组织与王任叔取得联系，并在他家与夏衍、胡风聚会^②。党的信任和关怀，使他获得新的生命。

①②参见王任叔《自传》。

(五)

“芦沟桥事变”后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被迫对日作战。王任叔受党组织委派，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协助该会宣传部长胡愈之工作，任秘书长。《救亡日报》出刊时，王任叔为编委。鲁迅逝世一周年前夕，王任叔为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文化团体撰写了两篇纪念鲁迅的宣传大纲，介绍鲁迅生平，宣传鲁迅的革命精神、思想方法和战斗作风，号召青年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以鲁迅为榜样，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其中一个提纲包括以下内容：鲁迅的精神是继承了中国民族精神最优秀的一面，鲁迅是个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个国际主义者；鲁迅的思想方法，是根于现实的实践上的，是辩证的，富于创造性的；鲁迅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勇敢的，站在最前线的战士，亲仇恩怨都非常分明；鲁迅又是富于自我批判精神的；鲁迅逝世前在《答客诮》中为我们指出了文学的民主革命任务和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任务；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我们应该象鲁迅一样，坚韧不拔地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发扬民族精神最优秀的方面，刻苦、耐劳、沉着、坚毅，对侵略者绝不屈膝妥协^①。

同年十一月十三日，日军占领了上海华界和周围地区，人们称日寇一时难以控制的英、法租界为“孤岛”。此时，大批文化工作者离沪去大后方，王任叔和其他同志进入租界继续坚

^①王任叔：《关于鲁迅学术思想之片面考察》（遗稿），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持斗争。我党利用英法与日本的矛盾，在“孤岛”极其险恶、复杂的条件下，组织进步文化人士和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取得极大成就，出现了抗日运动高涨、抗战文艺空前繁荣的独特局面。

一九三八年一月，为领导“孤岛”上海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中共江苏文委成立，王任叔是文委成员之一。文委领导人是沙文汉、孙冶方，其他成员有梅益、唐守愚等。从此，他又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绝不许动摇！”^①这是王任叔永远鞭策自己的座右铭。此后，在对敌斗争的严酷环境中，他始终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无所畏惧、冲锋陷阵，发挥了极大能量，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和人民所交托的各项任务。在“孤岛”抗战时期，王任叔的工作和建树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辑鲁迅全集，捍卫鲁迅旗帜。

编辑出版我国第一套《鲁迅全集》是江苏文委的重要工作之一。对外，《鲁迅全集》是由蔡元培、宋庆龄为首的鲁迅纪念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但实际的具体工作，是由王任叔在许广平和郑振铎支持下承担的。他把鲁迅著作分类整理，计划每卷字数大致平衡，认真研究鲁迅生前对汇编《三十年集》的设计，收集整理各地陆续送来的文章、材料。完成编辑工作后，他又担任义务校对，负责理论部分和古文部分的清样校对工作。为了宣传介绍初版的《鲁迅全集》，他撰写了《鲁迅全集总目提要》，对其中的每一卷都做了提纲挈领、简洁概括的介

^①王任叔《自传》。

绍。他几乎每天都到许广平住所工作，早出晚归，竭尽全力……。在王任叔和许多同志的努力下，我国第一套二十卷的《鲁迅全集》，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出版了，迅速发行到内地和海外。《鲁迅全集》保存和宣扬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神财富，及时地向中国人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鲁迅的爱国主义和战斗精神，极大地激励着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鲁迅逝世以后，有人企图贬低甚至污蔑鲁迅。王任叔针锋相对，发表了一系列纪念鲁迅的文章，如《学习鲁迅的精神》、《我们失掉了一面民族的镜子》、《鲁迅先生的眼力》等等，撰写了一批研究鲁迅的论文，如《鲁迅先生的治学方法》、《鲁迅先生的艺术观》、《鲁迅思想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等。还出版了理论专著——《论鲁迅的杂文》。这本书是继瞿秋白《鲁迅杂感集序言》之后，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献。他又以数十个笔名写作了大量的“鲁迅风”杂文，矛头直指日寇、汉奸和托派；他创办了提倡战斗性杂文的《鲁迅风》杂志，大声疾呼“我们还要鲁迅式的杂文，为的是我们要战斗文学。”^①他呼唤广大青年放弃对“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主义书籍的“热恋”，多读一点鲁迅的作品，沿着鲁迅的道路走去^②。与此同时，他积极支持许广平、李平心、卢豫冬等进步文化人的鲁迅思想座谈会及其研究成果《思想家的鲁迅》。

二、编辑出版各种抗日报刊、书籍。

“孤岛”时期，文委的重要任务是以各种方式创办党所领导和主持的报纸、杂志，以强大的声势宣传党的政策，发动民

^{①②}巴人：《论鲁迅的杂文》，远东书局1940年10月版。

众，打击敌人；并以此带动全社会抗日舆论的高涨和促进抗战文艺的繁荣。王任叔先后主编、主持或参与编辑出版过的报纸杂志有《译报·大家谈》、《华美周报》、《译报周刊》、《上海周报》、《公论丛书》、《时论丛刊》等。在《译报·大家谈》上，他用行者、八戒、巴人等笔名发表了许多有文采的尖锐锋利的杂文、随笔、评论。这些短文深得群众喜爱，引起日伪恐慌。在《华美周报》上，王任叔也撰写一系列生动的时事评论，如《赴河内佯称养病，飞香港谣传议和》、《整机构政府大员有调动，吃夹饼日本内阁总辞职》等。《译报周刊》由王任叔主持，他亲自撰写许多文章，有时事评论、杂文、读书指导、读书顾问、知识讲座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青年读者欢迎。《译报周刊》被日寇通过上海租界当局禁止出版后，文委通过张宗麟，以英商“佛利特通讯社”名义，又创办了《上海周报》。该刊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刊登了周恩来论日本新战略，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的情况。王任叔不仅参加刊物编辑出版工作，并发表大量杂文和政治、文艺理论文章。《公论丛书》是以丛书形式出版的刊物，由王任叔主编，每辑都以其中的主要文章为书名，如《领袖论及其它》、《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思想家鲁迅》等。该丛书还刊登了周恩来写的重要论文《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及叶剑英的文章《现阶段游击战与正规战》等。他为丛书撰写论文《青年的任务》和各辑编后记。这些报刊的出版，象在漆黑的长夜中点燃了一把明亮的火炬，使广大读者和敌占区的人民群众，了解了形势，鼓舞了斗志，增强了抗战的信心，提高了抗日救国的热情。在党的领导下，这一时期，王任叔还主编过《申报·自由谈》、《大时代文艺丛书》等报

刊、丛书。这些报刊、丛书中均有他撰写的大量文章及作品。此外，他还在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上发表许多杂文；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发表系列论文、评论；在《文艺新闻》上发表杂感；在《职工生活》上发表时事短评；在《学生杂志》上开辟青年修养讲座；在《求知文丛》上连载长篇讽刺小说《超然先生列传》；为《大陆月刊》撰写了一批人物论……。他的文章象匕首，直刺敌伪心脏，象号角，号召人民奋发。从这些难以计数的文章中，也清楚地看到他永不休止地挥笔疾书，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精神。

三、举办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

为了提高上海各界抗日骨干的理论水平，继续深入开展救亡运动，文委主持开办学校培训干部。一九三八年初，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创办，负责人是胡愈之。第一期附属上海沪江大学，以夜校形式利用沪江大学校舍进行教学活动。不久，胡愈之离沪，讲习所由王任叔接办。从第二期起，搬至福州路世界书局楼上，但在第四期开办不久，因形势剧变而停办。

讲习所的学员是各界抗日群众团体的骨干或负责人。讲习所的课程有哲学、国际时事、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社会运动史等；聘请的教师大多是社会著名学者或进步文化人，如郑振铎、周予同、严景耀、张宗麟、杨凡等，王任叔主讲哲学和国际时事课。讲习所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政治空气活跃，学员情绪饱满，由他们自己组织“学委会”，管理学校常务工作并开展各项活动。讲习所物质条件很差，却为学员提供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单行本，以及瞿秋白的《乱弹及其他》和《西行漫记》、

《鲁迅全集》等市面上很难买到的书籍。

在“孤岛”这个极其尖锐复杂的特殊环境里，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这样一所与解放区、根据地的干部学校类似的学校，培养造就进步文化界骨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直接为新四军和游击队输送了一批干部，这是上海党组织和王任叔等在抗战期间所从事的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四、从事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

王任叔是上海各界救亡协会文化界的代表，也是协会联席会的召集人。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并组织了“星期六座谈会”，以星期六聚餐的形式，宣传党的统战政策，争取社会上层人士对我抗日武装力量的支持，协调上海各界的关系，团结了一批知识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郑振铎、周予同、陈望道、严景耀等，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还有一些上层人士由此走上革命道路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如当时上海金星钢笔厂经理陈已生、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的胡咏祺等。

五、文艺理论的建树。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发表以后，给王任叔以极大的鼓舞，为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在署名巴人的论文《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一文中，热情洋溢地说：“毛泽东先生对于我们青年的一般学习，有非常高明的指示：革命的理论，历史的知识，实际运动的了解，这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国民所必须具有的学问。这指示一样可应用于文学上。革命的理论，是属于作家思想修养方面的，历史的知识，是属于作家对于传统文学作品的学习方面的，实际运动的了解，是属于作家生活实

践方面的。”^①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如《民主与现实》、《民族形式与大众文学》、《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略论民族文化》等等。这些论文就大众文学、关于民族形式、关于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诸问题，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论述和阐发。他对当时的文学作品如《家》三部曲、《华威先生》、《科尔沁旗草原》、《新生代》、《引力》、《地下》，及外国著名作家果戈里、普希金、高尔基等的作品，都撰写了一系列评论文章。

由于抗战文艺的空前繁荣，广大青年迫切需要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作指导。针对这种情况，王任叔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到次年五月，撰写出版了我国开创性的、系统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理论著作《文学读本》和《文学读本续编》。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王任叔立即在《文学读本续论》中加以大量引用和阐发，开辟专门的章节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学的特质。《文学读本》、《文学读本续编》问世之后，受到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不到一年时间，就连续再版三次。

“孤岛”时期，王任叔出版的杂文、论文集还有《边鼓集》、《横眉集》、《打蚤谈》、《生活思索与学习》、《学习与战斗》、《窄门集》、《读书的经验与方法》等，剧本有《前夜》（即《弗娜小姐》）、《两代的爱》，翻译小说《铁》、《和平》等。

^①巴人，《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载《文艺阵地》第3卷第10期，1939年9月1日。

王任叔在革命文化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取得的卓著成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重。日伪反动派对他则恨之入骨，侦伺、盯梢，继而通辑捉拿。老同志蒋天佐在回忆录中写道：“但如果就他在‘孤岛’时期的贡献说，我作为亲历其境的后死者之一，愿不揣冒昧地发表一种看法：没有王任叔，也许就没有那个时期的革命文化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巨大辉煌的成绩。”^①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孤岛上海的形势更为险恶，王任叔接受党的指示，于一九四一年初撤离上海。

(六)

一九四一年三月，王任叔全家到达香港。他在廖承志、刘少文领导下工作，并为胡愈之在新加坡主持的《南洋商报》的《狮声》副刊撰写《给文学青年》专稿，以信件形式讨论文学问题，很受华侨青年欢迎。此外，他还继续为《上海周报》撰写《不能忘却的记忆》、《还须沉着》、《四年来上海文艺》等文章。同年七月，他接受组织安排疏散去新加坡，夫人携两幼子回上海，长子旋被送安徽新四军军部。

王任叔到新加坡后，经胡愈之介绍在南洋华侨师范任教，教课之余仍致力写作，大多投稿《南洋周报》的《狮声》副刊，间或也为杨骚主编的《闽潮》杂志写稿。在《南洋商报》发起《反侵略文学专号》上，他撰有《关于反侵略文学》，以

^①蒋天佐：《一篇不合格的祭文》，载1982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

后又发表长篇论文《展开反法西斯文学运动》、《略论抗战八股》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逼近马来半岛，新加坡华侨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此时，以陈嘉庚为首发起组织了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杨骚、王纪元等发起组织了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以领导文化界抗日运动，郁达夫任团长，王任叔任宣传部长。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军袭击新加坡，英军撤退，王任叔、郁达夫、雷德容（刘岩）等，在炸弹声中乘小船飘泊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廖岛。胡愈之等也先后撤到苏门答腊。

一九四二年三月苏门答腊与爪哇相继被日寇侵占。王任叔与雷德容、杨骚一起，隐蔽在萨拉班让的亚里岛附近的一个华侨家中。王任叔与雷德容结为夫妻。此后四个月中，王任叔专心学习《列宁文选》、《斯大林文选》，学习印尼语言，调查印尼社会和华侨情况，执笔重写故乡反帝斗争长篇小说《土地》约十万字（该书稿后寄存友人处，在日寇搜查时被付之一炬）。同年八月，王任叔、雷德容去苏门答腊西部巴耶公务，住在化名厂商赵廉的郁达夫家中，并与胡愈之、邵宗汉商讨如何开展抗日活动。十月，王任叔、雷德容搬至苏门答腊东部居住在先达市。为了隐蔽身分，王任叔化名何秀生，由太平洋木器公司作保取得身分证。当地华侨青年有极高的抗日情绪，并自发组织了华侨抗敌协会和苏岛人民抗敌会等秘密抗日团体。一九四三年一月，王任叔又从先达移住棉兰市，参加和领导了由苏岛人民抗敌会改组的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简称“反法西斯同盟”）。改组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联合更多的印尼人民共同抗日。王任叔还负责主编出版地下抗日刊物《前进周报》。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日，日军发动大检举运动，华侨抗敌协会遭破坏，成员大多被捕；并涉及反法西斯同盟，损失十多位战士，幸大多数成员脱险。王任叔被张贴照片，到处通缉。他与雷德容在战友、侨胞和印尼人民的帮助下东避西躲，最后隐居于苏门答腊东海岸拉拉斯大农场附近的一个原始丛林中的小村落泗拉巴耶村，以刀耕火种自活，并从敌人的报纸上获取信息分析时事，写成传单，交给外界的战友。一九四四年底，王任叔患了严重伤寒症，缺医少药，生命垂危。他用颤抖的手，向组织写了遗嘱：“我在海外的一切行动，请问小刘（雷德容）就知道了。我也许犯过错误，但我尽自己能力做到不至于有负于组织的托付。希望组织能培养我的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写过一些东西，没有可以留下来的，不要因为纪念我出版什么。我这时的心境是平安的！我犯过错误，但这些年来是用行动赎自己的罪！”^①王任叔向党组织呈献了一颗战士的赤子之心。在雷德容的精心护理下，他竟奇迹般地战胜疾病，活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告投降，王任叔与雷德容进入城市，参加了苏岛华侨民主同盟，开展华侨民主爱国运动。他主编该盟刊物《前进周报》。这时，联合国指示日军继续维持原驻地的社会秩序，但日军却卑鄙无耻地杀害了郁达夫。苏门答腊各派势力的矛盾、斗争极为复杂，王任叔则坚决支持印尼革命力量和进步华侨团体。为了加强华侨与印尼人民的团结，他创作了大型话剧《五祖庙》。这个剧本取材于上世纪当地华侨

^①巴人：《在异国丛林里》（遗稿），载《江南》1981年创刊号。

工人不堪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残酷压榨、迫害，以陈炳益等五位华工发端，团结侨胞、印尼人民进行顽强斗争，最后遭殖民者杀害的壮烈史实。当地华侨怀念五位献身的华工，尊称为“五祖”，并建庙宇祀奉。该剧本由华侨青年新中国剧艺社广为演出，受到华侨和印尼人民热烈欢迎，增进了华侨和印尼军政民各界的团结。这期间，他还主编印尼文的《民主日报》（邵宗汉主编中文《民主日报》），用“巴人”笔名发表有关印尼民主运动的理论性文章供印尼人士参考。王任叔的社会活动受到印尼革命力量的重视，革命政府欲聘他为顾问，他坚辞未就，只担任了华侨总会联合会的顾问。“巴人”成为当地印尼人民所熟悉和敬重的名字。

通过与印尼人民的接触和对印尼社会的考察，王任叔深深地爱上了与自己祖国同命运的印度尼西亚和它的人民。他说：“我住在印尼——苏门答腊乡间避难时，常常见到印尼的农民和渔民。我看到他们为生活所磨老的棕色脸上，有我自己故乡父老兄弟一样的神情，这使我引起了流亡中难以言说的亲切之感。但我又在他们身上发现我那永远保持沉默的故乡父老兄弟所没有的一种和易与快乐的表情；这表情和我故乡父老比较起来，显出沉默的巉岩与波荡的海浪之间的不同。……我在这种情形下，常常总感到印尼劳动人民的善良性质和达观主义的情调，这使我对这个民族发生极大的兴趣”^①。王任叔把印尼作为第二祖国，对它的历史、民族、政治、经济等社会诸问题产生浓厚兴趣。他阅读许多日文、印尼文、英文等有关印尼问题

^①王任叔：《印度尼西亚革命观感》，载《南亚与东南亚资料》1983年第5辑。

的书籍和资料，即使在极其艰苦情况下，也以顽强毅力坚持学习和考察。这些努力为他撰写我国早期研究印尼的专著和以后撰写《印度尼西亚历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王任叔还以真挚、炽热的感情创作了歌颂印度尼西亚的史诗《印尼之歌》（暂名）。

这一时期，王任叔还在胡愈之于新加坡主编的《风下周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散文、小说，如《新民主主义史的发展》、《略论华侨团结问题》、《“五四”精神一定胜利》、《政党与阶级关系》、《邻人们》、《水客与工头》等。其中《新民主主义史的发展》一文，内容充实，是《风下周刊》编辑部特邀王任叔去新加坡突击写出的。他在几个钟头内一气呵成，使周围同志大为惊叹。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荷兰军队向印尼共和国进攻，一个多星期便占领了苏门答腊首府先达。因国民党政府驻先达领事的策动，王任叔被荷兰军队当作战俘逮捕，关押于棉兰海口俘虏集中营。国民党政府企图将他引渡国内。为此，印尼华侨总会多次抗议，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抗议书，印尼共和国政府向全世界广播并示抗议，胡愈之联络英国驻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撰写抗议文章。在这样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荷兰当局被迫释放王任叔，旋即将他驱逐出境。

同年十月，王任叔偕同雷德容回到香港，立即参加了党的组织生活，编在乔冠华领导的外事组，还参加连贯负责的华侨工作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王任叔的亲密战友和伴侣雷德容因劳累致疾，医治无效而不幸去世，郭沫若亲笔为她撰写了墓志。

这个时期，王任叔出版了《印尼社会发展概况》、《论印

尼的反帝斗争》两本学术性著作，撰写了《远东民族革命问题》书稿。同时，他还在当地报刊发表一系列论文，如《胡适的梦》、《文艺的宽容》、《略论华侨民主运动》、《印尼新文学运动概述》、《读〈围城〉》、《读〈引力〉并论及其它》以及回忆录《记达夫》等。

（七）

一九四八年八月，王任叔奉命由香港经天津潜入解放区，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被分配到中央统战部，任第三室组长、第二处副处长，研究东南亚各国革命情况。此外，他还担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一九四九年三月，他随中央机关搬到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一九五〇年八月，王任叔调外交部，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出国之前，根据需要，王任叔把一九四〇年出版的《文学读本》、《文学读本续编》合编成为《文学初步》一书出版。该书在建国初期成为大专院校文艺理论课的教材，广大文学工作者也多以此为重要参考书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九五二年二月，王任叔从印度尼西亚卸任回国，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党组成员。由于当时还没有一本系统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专著，他编的《文学初步》一书一再重版，王任叔心里非常不安。他在第四版的《文学初步》上，刊登《征求读者对本书的意见和批评启事》，直率指出《文学初步》最大缺陷是由于写作时间较早而没能将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予以阐发，恳切要求读者指出该书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文艺上还有什么问题应予论述及该书作为教材时所遇到的问题，以帮助作者对该书进行全面修订。这种公开的自我批评和广泛征求读者意见的做法，表现了王任叔实事求是、严谨的治学态度。

通过一年的努力，一九五四年《文学论稿》问世了。该书五十多万字，与《文学初步》比较，从标题到内容都作了大规模删削、补充，几乎是完全重写。它的思想理论基础贯穿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文学的社会基础、文学与现实、文学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语言与民族形式等方面都着重作了论述。《文学论稿》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并产生颇为重大的社会影响，一年之内连续三次重印。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九年，他又根据形势对该书作了修改。但他深知文艺理论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日新月异的事业需要更多更好的文艺理论著作。在这方面，他寄希望于广大理论工作者。他在一九五六年版的《后记》中写道：“我等着国内有人能写出一本中国风格的给青年看的文学概论之类的书。现在在出版社催迫之下，还得修改出版这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这回听说已经在集体动手写一本文艺学或文学概论之类的书了，我希望这本书快点写成，快点出版，好让《文学论稿》快点消灭！”表现了一位革命文艺理论家的高尚学风和追求真理的态度。

一九五四年四月，王任叔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继而任社长兼党委书记。他亲手制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庞大的中外古今文学名著选题规划，系统地介绍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为照顾广大青年人的阅读水平和需要，王任叔还倡议编印《文学小丛书》，专门刊载中外名篇著作。中国历史悠

久，历代保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卷帙浩繁，为了保存和研究祖国的这笔珍贵遗产，王任叔主持影印和出版了一大批古典文学书籍。他还积极支持编著《文学大辞典》的工作。他工作作风果断泼辣、雷厉风行、赏罚分明、一丝不苟，无论行政、业务、思想工作都抓得很扎实。他亲自率领编辑人员出外组稿，团结各方面作家为出版工作打开局面；他向全社作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报告，以提高工作人员理论思想水平；他特别关心青年同志，大胆培养、提拔了一批出色的文学编辑。他爱护青年文学工作者，亲自担任他们著作的责任编辑。王任叔这种勤奋忘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的作风在全社起了表率作用，受到同志们普遍的尊敬和爱戴。

值得强调的是，他作为文学研究会早期成员，一九四〇年以前发表过短篇小说一百五十余篇，解放前收集出版的小说、杂文、文艺论文、剧本、散文、专著和译著等总计四十余本数百万言，但在解放后他任出版社主要领导职务时，却没有为自己安排出版过一书籍。这时，他在工作之余仍勤奋创作，撰写了《泗拉巴耶村》、《从棉兰到蒂加笃罗》、《旅广手记》等回忆录，创作了长篇小说《冲突》、《土地》（即《莽秀才造反记》），重写了剧本《五祖庙》等，合计达百余万字。这些作品，也均未在他生前交付出版，直到近年才陆续与读者见面。

作为党的战士、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家，王任叔在社会主义建设繁荣昌盛的五十年代，在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文艺评论和时事评论。解放初期报刊上的杂文较少，其原因是有些同志认为杂文不适于写人民内部矛盾。但王任叔和另一些同志却认为杂文不但是对付敌人的匕首，也是对于人

民进行教育和歌颂的工具。当时林淡秋主持《人民日报》副刊工作，大力提倡杂文，王任叔成为该报杂文主要作者之一。他的一部分杂文是针对某些部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管理不善、作风简单粗暴等缺点，或对某一方面的工作和社会生活中某些现象加以批评和揭露，如《“多”和“拖”》、《唯动机论者》、《况钟的笔》、《略谈要爱人》等等。这些杂文是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改进工作的。他的另一些杂文是针对当时文学创作、文艺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论人情》、《以简代文》、《关于创作》、《关于删改》、《略谈生活的公式化》等等；这些杂文某些观点虽有偏颇，但它们的发表是有助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有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王任叔的杂文观点鲜明、文字精炼、畅叙己见，表达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实事求是的作风。此外，王任叔同期所写的文学评论如《读〈农村散记〉》、《略谈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漫谈〈百炼成钢〉》、《读小说〈青春之歌〉》等等，对于介绍和推动新中国文学创作事业起了积极作用。他的一系列苏联文学评论，如《我所看到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丹尼亚的印象》、《高尔基的〈母亲〉》、《读〈斯大林时代的人〉》、《〈青年近卫军〉的艺术构成及其人物形象》等等，对于新中国青年了解和學習蘇維埃青年的优秀品质，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都起了良好作用。

五十年代，王任叔怀着热爱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赤诚之心，勤奋工作，努力写作。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时，他被康生指定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姚文元接着打响了“批判巴人的‘人性论’”的第一炮。此后，国内报刊对王任

叔自一九五六年以来所发表的《论人情》、《关于‘氏族社会’》等十六篇杂文和《文学论稿》进行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批判”。他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到“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他的著作被诬为“毒草”禁止发行，并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力。王任叔非常痛苦，但没有消极悲观，因为他相信人民、相信党。虽然暂时没有明确分配他工作，他并不就此赋闲，而是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已，系统总结思想，制定了庞大的学习马列著作的计划。他每天坚持学习八小时以上，在一年多时间内，系统地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在这些厚厚地数千万言的经典著作中，到处都有他划的记号和写的心得。当时，他曾写短诗以自勉：

忘病忘老工作，
力求自强不息；
斩断资产根子，
犹如壮士断臂。
立定无产脚跟，
万事兢兢业业；
“鞠躬尽瘁”听命，
死而后已何惜^①。

这首诗反映了他严于律己，献身革命事业的崇高思想境界。

^①王克平：《我的爸爸巴人》，载《当代》1982年第4期。

一九六一年四月，王任叔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任编译室主任，研究印度尼西亚历史。对于新的工作，他是有基础和兴趣的，但更感到的是党对自己的信任、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委托。他决心把自己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对印度尼西亚历史的研究。他制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工作计划，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撰写出一部通史式的印度尼西亚历史专著，以弥补我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内的不足。为此，他先化了三年时间，阅读大量外文书籍资料，翻译了几百万字的著作，如由日文翻译了荷兰弗罗林·梅斯著的《爪哇古代史》，对照英日两种译本翻译了荷兰德克列支著的《荷属东印度史》，从印尼文翻译了荷兰克罗姆所著的研究东南亚古代史的经典著作《印度时代》等。他还撰写了长篇论文《河陵阁婆及其它试探——关于自七世纪至十二世纪爪哇历史的考察》等一批学术论文。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王任叔正式开始撰写《印度尼西亚历史》。虽然作了充分准备，积累了大量资料，但写作过程仍是极为艰巨的，他为此倾注了全部心血。从他一九六四年的部分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撰写该书的概况：

一月一日。下午，为明日写印尼史话作准备，翻出《印度尼西亚石器时代》一书来看，又参考一下中国史稿，揣摩其写法。

一月二日。开始写第一节：《原始人群出现前的印度尼西亚的地理环境》，到下午，约略写成了。

一月六日。写第二节，几乎蘑菇了一天，只写了二页。但

看来还不行，须下次着手时再改。有些古生物学上术语，不知怎样译好。科学知识还是不够。

一月二十一日。今天写苏拉威西，可是进行得非常慢。写了三页，不行，尚须重新概括。乃再看资料。

一月二十五日。整天看《世界通史》、《苏门答腊民族志》、《太平洋民族学》。为的是要从那些材料中看出远古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可以说大体有了概念了。

二月六日。上午写了一点，有些问题尚未搞清楚，乃重读莫尔根的《古代社会》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某些章节。

二月二十日。整天杂看参考书和地图，并为下一章设想。有时就在室内盘旋。上午，终于得到章次，乃笔下于随笔本上，再依章次要求来看译稿及其它有关参考书。

三月二日。昨晚睡不甚安。但今日还努力将第三章第二节写完。二个月时间还不能写完《原始公社》。须三个月，包括修改，则全书非有二年时间不可了①。

王任叔就是以这样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克服种种困难，用了二年时间，完成了一百六十万字的《印度

①摘自王任叔1964年日记。

尼西亚历史》书稿。该书资料极为丰富、翔实，马列主义观点鲜明，论述详尽，规模宏大，是我国研究印尼历史的开创性巨著^①。

正当王任叔在印尼历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并准备进一步完善之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革”期间，康生插手给他套上“大叛徒”、“大右派”的帽子，被“隔离审查”，残酷批斗。妻子、爱女被迫分离，他的体质也受到严重摧残，连续三次脑血管病变、大小便失禁。即使在这样灾难深重的情况下，王任叔仍然不忘修改他的《印度尼西亚历史》书稿。一九六九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但我还是打起精神，坚持搞派定的工作。现在在攻写《原始社会时期》，搞那一套我从未在学校里学过的‘考古学’方面的东西。这东西实在也化过我前几年中二三年的时间。我说搞近代吧，近代史资料有一大盒，我早在六六年一月交了，现在不知在哪里。”^②“我的健康是到家了，夹在三种矛盾之中，健康情况与工作的矛盾，健康、工作与定案的相互矛盾。而我现在，则只有抓住工作。为了工作健康也管不得了。因为只有工作，才能表明我对党对人民的态度，因工作而倒下去，我也心甘情愿，只是完成不了，仍然还不了对人民的欠债而已。”^③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王任叔在第三次严重晕倒之后，挣扎写下遗嘱：

.....

①王任叔的《印度尼西亚历史》，已作为重点科研学术著作，列入国家“六五”出版规划。

②摘自王任叔给王克平信，1969年11月20日。

③摘自王任叔给王克平信，1969年12月29日。

在处理书籍时，如果我奉化中学图书馆缺书，可尽量选择拿去。说是参加革命吧，我是从那里教书时开始的。

遗憾的是不能完成我希望搞的印尼历史，也是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债。

如果允许的话：死后火化，分骨灰为二瓶，一送我出生地大堰，在我们宅后竹山上埋下，一投之于海——我依然关心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胜利①！

一九七〇年三月，由康生亲笔批示，将身患重病的王任叔“遣返回乡”。他随身所带只有几件衣服和三大箱印尼历史稿件、资料。回到离别几十年的家乡，由于缺医少药，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但仍坚持每天在故居的木窗前翻阅修改《印度尼西亚历史》书稿，直至脑血管严重病变而神志不清。他的家属和乡亲多次写信给中央有关部门，要求为他提供治疗条件，但均遭江青、康生一伙拒绝，甚至不准外出求医。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王任叔终于含恨离开人间，遗体按照当地习俗，被埋葬在大堰村后的山坡上。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王任叔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他的错案和冤案得到改正，推倒了对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王子野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王任叔在革命的各个时期，在革命的各项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悼词还说：“王任叔同志热爱党的事业，他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同时努力刻苦钻研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他的作风雷厉风

① 《王任叔遗嘱》（1969年12月14日）。

行，一丝不苟；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对同志，特别是对青年同志，他既关切爱护，又严格要求，得到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他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这是党和人民对王任叔一生作出的严正结论。

附 本文主要参考材料：

1. 王任叔：《自传》。
2. 巴人：《旅广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3. 王任叔日记（1964年）。
4. 王任叔信件（1969年）。
5. 徐达：《“孤岛”时期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并记王任叔同志》，载《资料与研究》第43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1年4月。
6. 蒋天佐：《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载1982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
7. 访梅益谈话记录（1983年4月）。
8. 访王洛华谈话记录（1983年5月）。
9. 《王任叔论文、杂文篇目索引专辑》，载《资料与研究》第41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1年2月编印。
10. 中共人民文学出版社委员会《关于王任叔同志问题的复查意见》（1979年3月6日）。
11. 《王任叔同志追悼会悼词》（1979年6月20日）。

附 录

莫文骅同志来信

《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以来，陆续赠送给我的十二集（本）都收到了。谢谢！由于太忙，没有全部看完，抽暇翻阅了一些，颇受启发和教育。编辑出版这套书对先烈们是很好的纪念，对研究党史和教育后人有很大的意义。我谨对你们的工作表示祝贺和敬意。

你们来函，要我对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提提意见，由于我对一些人物和事情不熟悉和其它条件限制，提不出更多的意见，这里只谈谈对第十二卷上两个人物编写的一点看法。一篇是写陈延年同志的，此人我不认识。据聂荣臻同志回忆录介绍，他开始加入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受吴稚晖领导。后来陈延年同志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吴稚晖很生气。最后他成了我们党的领导者，壮烈地为革命牺牲了。我觉得这篇传记虽短，但写得很精彩。因为写了他的思想发展、转变的过程，如实地讲了他开始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说明马克思主义可以战胜无政府主义，改造无政府主义者。由此也可以看出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大。

还有一篇文章写韦拔群同志的。韦拔群是广西农民运动的领袖，是广西右江苏维埃和红七军的领导人之一，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的烈士。我个人对他是非常敬仰的，曾写过诗和

文章怀念回忆他。我个人与韦拔群只见过二次面。一次是一九三〇年初的广西隆安战斗时，李明瑞总指挥命我去传达命令给他。第二次是在河池（一九三〇年九月）红七军整编后，他任二十一师师长，带一个连队离开大部队回东兰去、坚持斗争的时候。韦拔群的整个斗争历史我不清楚。但有一段我知道，传记里没有写，就是关于他的思想发展过程问题，我准备和作者交换一下意见，这里就不讲了。

韦拔群同志的入党时间，你们的文章说是一九二九年，很对。但有人说是一九二六年，我以为不妥。我是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九二七年在南宁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时，韦拔群还没有入党。当时党曾派南宁共青团区委严敏同志到东兰去，做团结争取韦拔群的工作。我出狱后于一九二九年秋季，在南宁和一些共青团员接触，他们告诉我说，韦拔群最近来过南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加入了共产党，再是拿了几百条枪回去了。同年十一月，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到百色准备起义，我也跟随到了百色，在军部任中尉副官。此时，严敏被调到党的前敌委员会。他在由东兰赴龙州途经百色时，我曾关心地向他询问韦拔群的情况，他说，韦拔群已经在八月间入党了。严敏的话证实了南宁那些共青团员告诉我的情况，我听了非常高兴。由于韦拔群是我心目中非常崇敬的人物，所以这些情节我至今记忆犹新。《韦拔群》传的作者经过考证，说：“一九二九年八月，韦拔群被中共广西特委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如果说是一九二六年入党，许多事情就不好解释了。

最后，我的一点看法，就是写传记，一定要实事求是。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不那么容易。为了表彰先烈，把优点都写出

来，这是应该的。但一个人的思想有转变的过程，不写他的缺点，都说成是革命的完人，这样的传记就没有波澜、千篇一律。同时，还会引出一些矛盾。现在有些人写回忆录，把别人的东西编成烈士的遗作，甚至把错的说成对的，这样的东西影响不好，对后代也无益处。所以我赞成陈延年同志传记的写法。你们编辑工作是重要的，艰苦的。许多事，你们没有经历过，只能靠看材料，靠调查研究。这就要求你们在工作中做得更细致些。提供材料的同志要提高党性，去掉私心杂念，对党负责，对先烈们负责，力求准确求实。

我的这些意见是个人的一点看法，不作定论，仅供参考。
祝你们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莫文骅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于北京